

房山根据地的补军工作

王硕儒

1941年至1943年，平西抗日根据地处于极端的困难时期。敌人对我根据地加紧了“扫荡”和蚕食，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区日益缩小，处于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房山县不得不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房涞涿联合县（1941年6月建），其中二区、七区、九区在房山，巩固区主要是二区（十渡村、平峪村一带）、九区（蒲洼村、宝水村一带）；二是昌宛房联合县（1942年12月建），其中二区、四区在房山县，即史家营、金鸡台、大安山一带村庄，都是巩固区。补军工作的重点在两联合县的巩固区。

为了克服严重困难，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我抗日根据地曾采取了各项措施，在深入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改造村政权，实行土地和劳资政策，开展大生产运动，加强党的建设的同时，把加强部队的建设放在了重要的位置。1943年初，我房山根据地党政军民利用3个月（1、2、3月）时间，集中力量进行了一次补军工作。补军，即补充部队（包括地方武装）兵员，恢复建制，增强战斗力。补军，在当时是一项最重要最艰巨的任务。

当时，抗日根据地执行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村级政权虽实现了“三三制”（即代表工人阶级和贫农的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代表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代表中产阶级、开明士绅的中间分子占三分之一，下同），比过去有了很大进步，但还仅仅是各阶级联合的政权。有的村政权仍掌握在上层分子手中，人民的觉悟程度还不高。加之敌特汉奸的造谣和破坏，以往在扩军中青壮年跑往敌占区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就为这次补军工作造成极大的困难。为完成任务，县委县政府加强统一领导，集中时间，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

为全面贯彻党的一元化领导方法，在县委县政府直接领导下，建立了县、区各级补军委员会，由政府 and 武装部门负主要责任，抗日救国会与公安局领导参加。村级由村政权和各群众团体组织补军工作小组，以提高所有干部的责任心，避免互相推诿、互不负责的现象发生。各部门、各单位步调一致，虽各有

整理和巩固组织的任务，但在三个月内均围绕补军工作为中心，克服了过去强调部门工作的现象。专区于1月初曾抽调各部门强有力的干部组成督促检查工作组，分赴县检查指导。县根据干部的强弱和地区的不同，有计划有重点的分配干部深入到区村帮助工作。各部门均通过本部门的组织作用进行广泛的动员，不同部门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和号召。农会提出：“送儿子打东洋，保证抗属的生活”。青年救国会（简称青救会）提出：“青年打先锋，入伍做模范”。妇女救国会（简称妇救会）提出：“劝夫送郎上战场，丈夫立功妻光荣”。武装部提出：“给抗属挑水、打柴、代耕、秋收是我们的责任”、“民兵是完成入伍的先锋”。村政权提出：“保证抗属优待的经常化”。经过各种组织传达贯彻到小组、每个会员、队员以及村代表会。建立了定期的会议和汇报制度，区对县半个月汇报一次，村对区主要依靠区干部的直接检查汇报。

补军工作才一布置，有的区村就发现有的青壮年跑往敌占区；有的区村怕青壮年跑往敌占区而不敢向群众宣传。针对这一情况，县委强调指出：补军工作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秘而不宣，而是要深入各级组织系统广泛动员，通过各种会议形式把补军工作传达到每个群众，特别是青壮年身上，配合“优抗节”及过大年文化娱乐活动的开展，大力搞好宣传鼓动工作。

逐级开好党委会、支委会、支部党员大会和小组会，传达和讨论这次补军工作的伟大意义，详细研究动员入伍的办法和对象。党员有计划的参加补军工作小组。在群众提高觉悟、明确意义的基础上，有不少青壮年党员、干部带头报名参军，不是应征对象的党员、干部纷纷动员自己的亲属报名参军，这在群众中造成了良好的影响。

宣传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普遍宣讲这次补军工作的重要意义，指出这次补军在于充实抗战力量，准备反攻；宣传1943年是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一年，要取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需要壮大人民子弟兵，积极报名参军是壮大子弟兵的实际行动。通过群众会、部门会、座谈会、冬学识字班和各种文娱活动进行广泛的宣传。蒲洼村、芦子水村自编自演的剧目《参军》，受到群众的称赞。各村的秧歌舞、霸王鞭、小车会、高跷会等，为造成青壮年入伍提供了有利条件。

这次补军工作，自始至终坚持志愿兵役制，由本人自愿报名，经村干部会、代表会讨论同意，报专区批准。在具体工作中，由专区根据各县青壮年和工作基础的实际情况，把任务分配给各县，县将任务分解到区、村。入伍的条件：一是青壮年；二是本人自愿；三是身体健康；四是政治清白。各村根据县分配的任

务和本村实际，经干部会、代表会讨论，确定应入伍的对象，然后，干部明确分工，分头动员。

经过组织动员，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周密细致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有 13 名青壮年共产党员带头积极参军，并宣誓“不打败日本军不回家”。昌宛房二区（大安山）一带抗联干部王文汉利用各种关系和方法，一人动员出 12 名优秀青年入伍。平峪村一女劝弟“放下镰刀拿起枪，报名入伍打东洋”。兄弟相争、妻送郎、父母送子参军的事例很多。

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工作，补军任务基本完成。房涿涿县任务 50 名，报名入伍 60 名，实际批准入伍 57 名。昌宛房县任务 100 名，报名入伍 113 人，实际批准入伍 86 名。审查的主要依据是入伍条件，进行身体检查和政治审查，特别是在集训时发现情绪不高、表现不完全自愿者不批，予以退回。

这次补军工作，坚持了政治质量。从新战士的成份看，进步的共产党员与积极负责的村干部、忠实纯洁的贫农占绝大多数。房涿涿县报名入伍的 60 名新战士成份统计，贫农 53 名、雇农 6 名、中农 1 名；按实际入伍战士年龄统计，青年 22 名，壮年 35 名。昌宛房县实际完成入伍新战士 86 名，按成份统计：贫农 73 名、雇农 1 名、中农 12 名；按年龄统计：青年 48 名，壮年 38 名。这次补军工作，对我抗日根据地的党员、群众、特别是青壮年是一次实际的武装斗争的教育，同时在群众中进行了一次拥军的教育，提高了党、军在群众中的威信，更加密切了军民的血肉关系，为夺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奠定了一定基础。

抗战时期房山革命老区的经济政策

王硕儒

概 况

抗日战争时期，房山县革命老区执行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当时的经济政策主要是指土地、劳资、税收、大生产运动等方面的政策。贯彻土地政策，主要是减租减息。减租减息包含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两个方面。减租以实行“二五”（减25%）减租为原则，并规定“地租最高额不得超过土地正产物总收获的375%”，利息不要减到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土地权和财产权仍属于地主。在劳资政策上，主要是为工人增加工资，执行半实物工资制。一方面必须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规定劳动时间；同时，劳资间订立契约后，工人必须遵守劳动纪律，使资本家（雇主）有利可图。

1941年，我房山抗日根据地（当时称房涿涿联合县和昌宛房联合县）开始贯彻土地和劳资政策。但由于处在战争环境中，一些干部对政策掌握不准，群众发动不充分，减租减息政策执行的不彻底，使得在执行中发生不少问题。有的减租明减暗不减，甚至还有增租、高租和夺佃等。据房涿涿县二区（十渡村一带）3个村统计，地主59户，佃户129户，未实行减租的49户佃户，占39%；九区（蒲洼村一带）3个村统计，地主89户，佃户119户，未实行减租的56户佃户，占44%。据10个村比较，除东村普遍执行减租外，其余9个村均执行不彻底，王老铺村49户佃户中有43户没有减租；霞云岭村全部没有减租。在贯彻劳资政策上，据10个村统计，共有工人89名，增加工资的58名，占65%，未增加工资的31名，占35%。实行半实物工资的41名，占46%，实行货币工资的48名，占54%。执行半实物工资制不普遍、不彻底，增加工资部分多为货币。

由于敌人的“扫荡”，社会环境复杂多变，干部对土地和劳资政策掌握不准，群众对党的政策缺乏了解，存有顾虑，普遍存在三怕：一怕共产党站不长；二怕群众不齐心；三怕丧良心。针对这种情况，房涿涿和昌宛房县委均于1942

年上半年召开会议，总结过去一年工作，深入检查了执行政策中的右倾倾向，研究讨论了下一步的工作方针和具体方法。

贯彻《租佃条例》

房山县革命老区原来土地不太集中，未发现光靠出租土地的大地主，有些地主的土地出租一部分，自营一部分。土地最多的蒲洼村有3户，20人，土地241.85亩，其中自营46.55亩，出租195.2亩，占土地总数81%；龙门台村有2户，17人，土地203.77亩，其中自营55.27亩，出租168.5亩，占土地总数75.3%；堂上村有4户，48人，土地352.4亩，其中自营103.6亩，出租248.8亩，占土地总数70.6%。工作的具体步骤是：

召开政民联席会议，深入检查过去执行政策中所犯的右倾倾向，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指出右倾错误的危险性和严重性，给干部以深刻的教育，研究讨论了1942至1943年贯彻土地与劳资政策的工作方针和纠正的办法。

县级民政干部具体分工到区，召开民政全体干部会议，传达县里的决议，对区干部给予深刻教育，特别指出过去执行政策中干部的认识与右倾的事实以及右倾的危险性，并指出干部要熟悉《租佃条例》，作为反右倾的依据。

以区为单位选择一个问题多、能代表一般、工作基础较强的村进行重点示范。二区六渡村作为重点示范村，由县干部指导，区干部全体参加，取得经验，用来指导全盘工作。在示范村发动群众，召开群众斗争大会，被斗争对象主要是上层封建统治者。

示范村工作结束后，全区干部划分小组再进行中心村的工作，把中心村周围的村干部召集起来，举办训练班，进行政策条例的教育。之后，各村干部回村进行调查研究，搜集问题等准备工作，再逐村普遍进行。

工作方法

工作中，首先召开佃户、雇工动员大会，由县、区干部亲临讲话。会后，干部分散在佃户中，检查动员后的情况或继续个别动员，或利用各团体组织和积极分子进行再动员。动员的内容是：讲解租佃债息条例。着重的指出土地的使用权与优先权，强调在抗日时期不准夺佃，稳定佃户对于使用与优先权的心理。讲明中国共产党是解放全国被压迫、被奴役的人民大众的党，同时揭露顽

固分子的造谣及其阴谋，并在政治上予以打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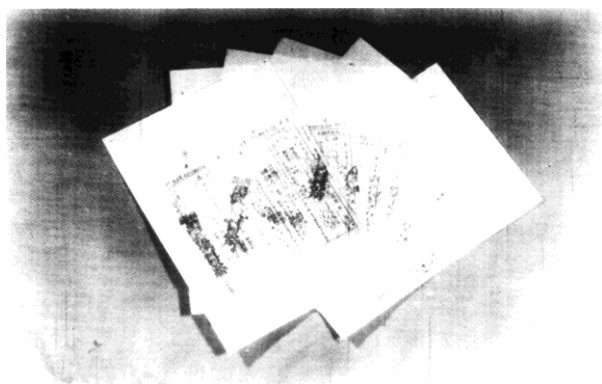
在宣传教育、组织发动的基础上，由村干部组成复工减租委员会，下分解决问题组、清算组和订立契约组，分别开展工作。

有关土地问题处理的原则，是遵照租佃债息条例的基本精神，保证土地的使用权和优先权。

一是土地使用权的处理。凡典地不到期限，原出佃人赎回其土地自耕或转卖转当。解决的方法是：让出佃人给原承典人补足期限。典地期中地主赎回自耕，视双方实际生活情况予以调解。如赎回土地，承典人无法生活时，说服地主租给原承典人一部或全部，或者赎回一部，但不能强迫。赎地时，地主需给承典人增补一部分地价或折合一部分粮食。赎回后，地主转卖转当或转租时，依租佃债息条例的规定，保证原承典人的优先权。后石门（现称北石门）村陈润林，是个小学教员，有土地 8 亩出典给隗甫有，出典人要赎回，承典人无地可种，经调解，出典人赎回 4 亩，其余 4 亩改为租佃关系，订立租契 3 年。地主如有违法夺佃，则根据土地政策条例予以制止，保证佃户的使用权。

二是土地优先权的处理。无论是典种地或租种地，契约期满者，地主转租转典时，依据租佃债息条例，保证原承租、承典人的优先权。1942 年春，庄户台村蔡德水将原租给郑玉春种的土地，转典给霞云岭村王有存，经解决，典给了郑玉春，保证了郑玉春的优先权。

三是特殊问题的处理。雇主贴地给工人问题，一律视为租佃关系，订立契约。因水灾冲坏的土地，经佃户全部修整者视为永佃权，在租额上第一年不交租，五年交齐，以后不长租（如地租做为斗，第一年不交租，第二年交 1 斗，第三年交 2 斗，第四年交 3 斗，第五年交 5 斗，以后无特殊灾害逐年交 5 斗）。修理滩地按当地习惯，使用 25 年以后交地。1941 年以后，佃户替地主交的责任，准许佃户向地主追讨。对于上打租，1941 年以后一律废除。再发现上打租者一律视为高利贷关系，由地主给佃户按一分息打利，佃户按法令给地主交租。霞云岭村任成琢租种杨玉丕土地 8 亩，租额 170 元，上打租，经解决按 1 分利计息，并改为下打租。还有卖青苗地问题、地内果木问



建国前房山县五侯村契约（王绍清 提供）

题等都作了适当的处理。

主要成效

在贯彻土地和劳资政策一开始，在庄户台村、十渡村等地开展了几个群众说理斗争大会，打开了沉闷的局面，给了上层封建势力一个很大的打击，提高了基本群众的觉悟，奠定了群众夺取胜利的信心。不少群众说：共产党、八路军是为劳苦大众办事的，跟着共产党、八路军走不会错。认清了抗日民主政府和自己的组织——抗联是代表自己利益的。王老铺村贯彻土地政策中发现了两个汉奸，经报告，送往县政府，加强了基本群众的团结。各级干部对土地政策、租佃债息条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能掌握政策，适当处理问题，多数群众都懂得了租佃债息条例规定的政策法令。通过贯彻政策，考验了干部，为巩固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打下了基础，发现了一批优秀分子，促进了革命老区的巩固和发展。贯彻政策后，经对 17 个村的分析：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的村有：八渡村、前石门（今改为西石门）村、太平村、王老铺村、西关上村、马安村、平峪村 7 个村；群众基本发动起来的村有：九渡村、东关上村、穆家口村、沈家庵村（今涞水县界内）、瓦沟村、六渡村、七渡村、干河口村 8 个村；群众初步发动起来的村有：五合村、后石门村（今称北石门村）2 个村。

贯彻土地和劳资政策后，广大农民群众切实得到实惠。据 1943 年统计：在减租方面，房涞涿县二区（十渡一带）7 个村，有地主 138 户，佃户 232 户，1941 年减租 225.4 斗，1942 年减租 32.653 斗，1943 年减租 279.75 斗；九区（蒲洼、霞云岭村一带）19 个村，有地主 446 户，佃户 676 户，1941 年减租 1295.31 斗，1942 年减租 1542.18 斗，1943 年减租 773.26 斗。在退租方面，十渡一带 7 个村，地主 138 户，退租 81.684 斗；蒲洼一带 19 个村，地主 446 户，退租 379.275 斗；史家营一带 14 个村，地主 129 户，退租 227.12 斗。把过去高额地租都减轻到正产物总收获量的 375% 以下。霞云岭村胡金亭退租 30 石，是全县退租最多户。在解决各类问题方面，十渡一带 10 个村，订立契约年限为：3 至 5 年 118 份，6 至 10 年 59 份，永佃 99 份。纠正土地使用权 17 份，土地 306 亩，典卖土地保证优先权 10 份，土地 41 亩，统一累进税隐报 6 份，土地 54 亩，替地主拿税 5 份，土地 163 亩。蒲洼一带 19 个村，纠正土地使用权 182 份，土地 637.7 亩，典卖土地保证优先权 31 份，土地 78.4 亩，统一累进税隐报 20 份，土地 98 亩，钱租改粮租 10 份，土地 54.7

亩。

工人（雇工）实现了半实物工资制，工资额达到了政策规定，每个工人都订立了劳动合同。十渡一带村庄工人共计 48 名，复工者 43 名，回家种田者 5 名。

平西兵工厂

卓成栋

平西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华北地区的抗日最重要的基地之一。因此，它也是侵占华北地区日本侵略军的眼中钉、肉中刺，成了日军进攻扫荡的主要目标之一。特别是1939年，也是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年代，这一年为了解决根据地抗日所需军火及军需物资的严重不足，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提出建立军火工厂，生产研制抗战的有关武器及弹药，以补充抗日前方战斗所需要的军火的建议，并于1939年正式实施。

而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兵工厂早于1938年在平西紫石口、沙岭西、刘家河建有被服厂、织布厂、皮鞋厂和修枪所，而即将筹建的军火工厂选址，他们选中了地处根据地深部（即京西南深山区的蒲洼地区）的芦子水村。

芦子水村地处大山深处，南、西面均与河北省涞水县的野三坡地区接壤，东面靠现北京市蒲洼地区的东村，由于该村所处地形、地势均较为隐蔽，且又东南西三个方向交通便利，抗日群众基础良好，故军区决定将平西兵工厂（当地称炸弹厂）设在这里，由晋察冀军区生产管理处直接管理。

1939年初春，晋察冀军区生产管理处委派何鸣歧亲自带队，一行十几个人来到了芦子水村。何鸣歧即是后来兵工厂的厂长，他原为军区东北学兵连的连长，后因战斗负伤调到兵工厂。他们此行的目的——一是勘察兵工厂所建地点的地域地理环境及政治情况，二是为将要筹建的兵工厂选择合适的建设地址。

他们来到芦子水村后，选中了东坡腰处的一座四合小院（即当时村民隗和俊和隗功青家）。这里位置在村中偏高，站在院门可视察到村中大半的情况，院后靠东坡坡脊爬上坡头可向东观察自东向进入芦子水村中的道路情况，向南又可眺望涞水野三坡的情况，地形十分有利。从军事上来讲，应算是一点带面的全攻全守型位置。小院房间不多，只有八间建筑，面积约六百平方米，建一个小型的兵工厂足够了。

同年3月，因事先已与山西晋察冀边区的工匠师傅协商好，兵工厂全体办公人员及部分工匠师傅一行二十多人于7日悄悄地来到芦子水村隗和俊家。同

行的不但有前次勘址的兵工厂厂长何鸣歧，还有生产管理处的副处长白贵云。筹备办公室地点暂设村中东坡脚下的一处民宅中（即现在的村俱乐部处），随即便开始了工厂的筹建。

兵工厂共设四个股级科室，即：铸造股主要技术人员是从八区高薪聘请来的，其实他们只是农村铸犁铧的师傅，一个叫杨文广，一个叫杨文茂。工人大部分来自野三坡。木工股的师傅从当地聘请，拉火股是生产炸药及导火线的，师傅全部来自山西老区，完成股是炸弹等弹药成品的最后完成的组装工序，也是工厂的最关键工序，所用师傅全部来自于山西老区。

兵工厂也成部队编制，每天出操、开会、活动，和部队一样，只有招来的民工不算军人。当时兵工厂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供给平西、平北、冀中、冀东，有时也供给地方，但主要是供给冀东和平北。但生产产品所需人力仅从老区带来的二十多个骨干是不够的，于是兵工厂还从当地百姓中招聘了一部分工人，使兵工厂人数一下增加到 50 多人，最多时达到了 70 多人。

1939 年初，确定兵工厂产品为生产手榴弹、地雷、爆破箱等，军区要求兵工厂在半年内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并培养出自己的技术人员能独立操作，原来自山西老区的工匠技师们，在完成产品的制造后返回老区，然后兵工厂正式投产。

从建厂到生产产品由于只给了半年的期限，这对兵工厂的领导和全厂的员工都是极大的压力。在厂长何鸣歧的带领下，全厂职工团结奋战，土法上马搭制化铁炉，师傅们手把手地教习新职工造型、铸模、翻砂工艺。铸造工艺，现在看起来很简单，可在当时却很难，因为很多工人都是农民，没有文化，素质又低，学起来非常困难，但在师傅的帮助下，不到一个月就学会了。生产军火的另一个难关是生产炸药，用从外面采购来得硝基炸药，爆炸威力太大，用土法铸的手榴弹壳都炸成了米粒状，杀伤力太低。于是，军工厂开始自己研制炸药。即：用“一硝二磺三木炭”合成的黑炸药，三种原料的功能为，“硝响磺炸碳引火”。但买来的硝不能直接用，必须用火熬去盐和卤，硫磺呢也得熬制去掉石头，所用木炭自己烧制，但一般的木炭不好，经过多次试制后，发现烧的一种“栾荆炭”最好。三种物质合理地搭配在一起，再加引火药，制出的黑色炸药手榴弹爆炸力适中，所炸开的弹片大小合适，极具杀伤力。

制造手榴弹先从翻砂开始，并组织动员在村中收集破锅烂铁，与由老区运来的铁锭合炉熔化，然后再将铁水倒入已造好的砂型中，仅用了二十多天第一批合格，弹壳就浇铸成功了。

可研制炸弹最难的工序是在拉火股，这个工序一是要完成装填炸弹的引火药，即：用赤磷、硫化碲、盐铂三种原料配制。二是要生产手榴弹和地雷的爆炸炸药及雷管等，由于急于生产，支援前线抗日，拉火股的几位师傅们在何厂长的直接指挥下没日没夜的苦干，单制作炸药就先后试验了多次，原因是碾制炸药原来所用的石碾子，是当地的紫石碾子，在碾制过程中，因碾子石质坚硬，又多含石英等矿物质，因此炸药一上到碾子上，碾到一定程度就起火燃烧，费了很大力气干出的半成品瞬间就变成了灰烬，为这还出了一次炸药起火的事情，这可急坏了大伙。后来经过反复的研究和试验，才发现炸药起火的原因是与碾制炸药的石碾子有关。最后，改用了灰石碾子做为炸药碾制工具才使炸药自制获得成功。

兵工厂生产所用的部分原料和半成品及零部件，除大部分自己制造外，也从外面调进一部分。如炸药，自己制的仅占一半数量，另一半数量有从山西老区调进。也有的从敌占区采购，所以工厂的材料采购任务不但繁重，有的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进入敌占区才能采购来的。那时在平西抗日根据地东向边缘的坨里、长辛店、房山城关、张坊、涿洲等地均留下过兵工厂材料采购员的足迹。

兵工厂产品生产的最后一道工序是完成股，即将生产的各种零部件组装成产品，即手榴弹、地雷、爆破箱等。即：将弹壳装上炸药、引信、导火索、木柄等，使之成为战场上应用的爆炸性武器，而这一工序也是工厂生产的最危险工序之一。

兵工厂产品出厂前需经过实际试验，以确保产品的质量和实际应用。产品试验场一般是在离工厂和村庄较远、较偏僻的地方，就连试验员本身的防护也是非常严格的。一般情况下枪弹、手榴弹、地雷等轻型弹药可选在工厂近处，而较大型的弹药试验，均选在专业的试验场地，如炮弹、炸弹等，则选在涑水县的刘家河试验基地。

经过四个多月的努力，芦子水兵工厂出色地提前完成了成品的试制工作，但开始生产的能力较低，一昼夜仅能生产二三百枚手榴弹和地雷，到后来能生产到五百枚，两年后已能生产一千多枚。这时兵工厂生产的弹药供不应求，每天都有民夫在厂外排队领取弹药向部队发送，随着第一批弹药的出厂，发送到边区的抗日前线马辉旅使用，兵工厂这架机器便开始了全速的运转，为抗日前方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军事补给，为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抗日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0年底，因战略的需要，兵工厂接到命令随大部队向陕北根据地转移，

以保存实力，当已经到达了陕北的枣树台时，又接到了上级的命令，“打回老家去，进行反扫荡”。兵工厂又长途跋涉，于 1941 年春天回到了芦子水村。但是坚壁在村中的部分物资被扫荡的鬼子破坏了，为此村中开展反奸反特斗争，还镇压了当地的一个汉奸头子。然后又恢复生产，一个月后工厂又开始了运营。

早在兵工厂成立之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萧克就曾亲自来到了芦子水村，在当时兵工厂办公室（原村隗永坡家），主持召开了兵工厂成立的第一次办公会议，他勉励大家，要克服困难，团结一致，尽快地生产出合格的产品，不辜负边区人民的希望。1943 年初，萧克再一次来到芦子水兵工厂，向全厂职工表示亲切的慰问。同年，萧克司令员第三次来到兵工厂并亲自来到了弹药试验场参观视察，观看了工厂生产产品的实地试验，并肯定了产品的威力和实际效果。

萧克司令员的三次视察，无疑激起了兵工厂全体职工的生产干劲和热情，他们在日寇多次的大扫荡面前，使兵工厂的生产一直没有间断，即使在遭到日寇极度破坏的前提下，都能积极创造条件，迅速恢复生产。

自 1940 年兵工厂成立，到 1945 年兵工厂转迁至涑水刘家河中间的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日寇先后扫荡十几次，兵工厂的车间被烧了又盖，炸了又修，甚至在鬼子扫荡完刚走，随后兵工厂又开始了生产。

1945 年，芦子水兵工厂因战事需要迁到涑水刘家河村，原任何鸣歧厂长，于 1945 年因一次在刘家河（检查坚壁弹药情况的）意外事故中牺牲。同年，原任晋察冀军区生产管理处副处长的白贵云接任兵工厂厂长。

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 年 8 月原芦子水兵工厂的全班人员在白贵云厂长的带领下，由刘家河村迁移到蒲洼村，人员约 70 人。此时的平西兵工厂下辖地雷部、修械部、弹药部及木工部。地雷部驻原村民晋耀臣家中，占用民房三间；木工部设在村民晋显科家，除占用五间民房外，还在院外设一加工工棚用于烤制未干的木材；弹药部及装配工序设在村民晋国忠家，占用西屋 5 间；修械部设在村民晋肖田家。兵工厂还盖了一间临时库房，以存放兵工厂生产的多种成品。

兵工厂在蒲洼村期间生产的产品主要提供于当时部队的七团、九团、十团使用。工厂迁村后的保密工作，在村里干部、群众支持帮助下做得很好。

蒲洼村民，既是兵工厂的间接保卫者，又是兵工厂对外联络、弹药成品运输的直接参与者，他们积极支前、出工、出人，把兵工厂的产品不失时机地送到部队，他们出夫向南 30 里送马安，向北 15 里送宝水，大件用牲口驮，易

爆炸的手榴弹、子弹、干脆人背肩扛送去。兵工厂民伕随叫随到，军民关系处理的很好，有时一个民伕一个月竟出了 40 多个工，由于蒲洼村民的大力支持，直接为部队的马安战役、解放石亭战役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46 年 8 月至 1948 年 8 月兵工厂在蒲洼村共驻守了三年后，因形势的变化又迁至河北省张家口。此间兵工厂的白贵云厂长在一次进行三八榴弹炮的试验中壮烈牺牲。

同年 7 月 6 日，根据地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当时有 4000 多军民参加，将白贵云厂长的遗体安葬在涞水县刘家河，并建立了纪念碑。

平西兵工厂从建立开始，始终没有辜负军民希望和重托，为平西根据地开展革命斗争提供了坚实的保证，在房山革命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萧克在森水村的日子

卓成栋

蒲洼地区森水村位于三坡地区、蒲洼地区、十渡地区的衔接地带，四周山高、坡陡、沟深，进村三条路不论从哪个方向都十分隐蔽。由于它的特殊位置，平西根据地我八路军总部选中了这里作为军部的临时驻扎地。1940年农历七月，正值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候，萧克、邓华将军带领军区的机关、县直机关及九团、七团部队约3000余人驻进了森水村。

七月初，正值日寇号称“十万大军，二十路进攻”秋季大扫荡的关键时刻。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军直机关指挥部设在了下森水村南头，萧克司令员住在湖沿上村民董德良家，邓华主任住在下森水董德奎家的羊圈里，萧克、邓华经常在羊棚子下临时支起的门板木桌前商量问题。地方虽小，却成了整个森水驻地的军事指挥中心。

为了及时沟通与外界各战场的联系，军直机关的电台就设在了上三湖，卫生所设在下三湖，而部队的战士除警卫部队驻扎在指挥部周围外，其余分驻在下三湖、上森水、西山脚下等。负责警卫部队的黄团长住在下森水董文通家的南屋。当时，森水村四周的大山隘口处均设立了保卫警戒线，在东北方向的雀鸣山隘口处修建了战壕，西山口挖了壕沟有几百米长，村南下三湖地区朝平峪方向也挖了几十米的战壕。部队实施24小时的警戒，随时提防日军的进犯。萧克、邓华等首长驻扎在森水期间，也是他们指挥平西抗日根据地最紧张的日子。村领导穆凤山带领全村百姓配合驻军部队，成立了运输组、缝纫组、担架组等。其中运输组负责将相应的军需物资，如弹药、粮食、物资等及时送到指定地点。甚至连部队的菜金粮票有时都负责递送。因为工作做得好，配合也默契，有时部队首长还直接找到村干部，请求他们帮助。一次，平西八路军某部一连急需菜金粮票，萧克找到穆凤山，希望他能帮助尽快将菜金粮票送去。这个艰巨的任务后来交给了运输组，任务完成后，受到部队首长的表扬。担架组是村中八名青壮年组成的担架队，紧随八路军主力部队，哪里战斗跟到哪里。缝纫组由村中的妇女组成，为前方战士做军装、做军鞋，仅两个多月就为部队

接了五次军鞋任务，为部队做了百余双军鞋，受到了战士的称赞。

军区机关驻扎森水村的日子，随部队前来森水村的还有 100 多名边区抚育院的儿童和军区的部分伤员。这部分儿童在村里都分到了村民各户家中，有的一家负责一个，有的家里负责两个。而伤员大部分由部队卫生所负责，个别轻伤员有的也分住在老乡家里。

九月底，部队接到通知，马上转移，原来日军已经发觉了森水有八路军驻扎。当月底，部队首先撤离，然后是机关、部队首长及相关单位，最后决定百余名抚育院的儿童暂时留在了森水村老乡家，等待新的驻地安排好了后，再行接走，伤员们则转到了附近的富合村。临别时，萧克将两头骡子驮的四个包袱，内有暂时不能带走的重要文件，要求穆凤山无论如何也要管好。部队走后，穆凤山当即找到村中的一名党员穆甫林，将这些文件秘密地藏进村北大山崖头的一个崖缝里。抗战形势稍稍平稳之后，部队派来联络人，才将文件取走。

从 1940 年农历七月至九月，萧克、邓华部在森水村住了不足三个月的时间，但在森水村却留下令村民难忘的记忆。据董凤金老人讲，那段时间，村中住满了部队，战士与村民友好的相处，战士有困难老百姓主动帮助，为在西山、下三湖、雀鸣山上站岗警卫的战士送饭、送水、送信。部队有事村中的运输组不论是什么时候，随叫随到，他们送粮、送物资、送弹药，最远到涑水的西北边界，向东到石亭，向北到门头沟的灵山地区。村中的妇救会，为战士缝补衣服、做军鞋，问寒送暖。使军民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意。在森水的日子，军民谱写一曲鱼水之情的赞歌，至今在世的老人，每每谈起还都津津乐道。

霍梁引导堂兄走上革命道路

李金志

众所周知，霍梁是房良地区早期的革命领导人之一，早在抗战初期就投身了革命事业。在他担任房良地区领导工作期间，曾把堂兄霍申千方百计地引上革命路。

霍申，南窖村人，霍梁的堂兄，1920年生，上过几年私塾，勤奋好学，数学尤为突出。日本入侵后，家道中落，生计艰难。1943年为养家糊口，无奈来到房山城孔宪江的伪保安团当了伪军。

当时房山县保安团团部设在仓房胡同与北大寺胡同之间。孔宪江在任期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也是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期间。他为了更充分地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便组织了一大批保安团的伪军到河北省永清县受训。

霍梁听说霍申参加了伪保安团之后，十分震惊。多次设法和他联系，让他弃暗投明，走革命之路，可一直未能联系上。后来霍梁在一次执行任务时路过南窖村，找到和他要好的邻居李印，要他无论如何要找到霍申，让他看清形势，不要与人民为敌。

李印受到霍梁的重托后，四处打探霍申的消息，终于打探到霍申参加伪军后，被派往黄山店的西山驻防。

于是李印以做生意为名，来到伪保安团的驻地见到了霍申，说明来意。又把霍梁的原话传给霍申，让他考虑。

李印的话对霍申的思想触动很大，决定弃暗投明。可在那时因为伪保安团正要去河北省永清县军训基地受训，防备极严，所以几次都没有走成。时隔不久，霍申被派去受训，大约两、三个月的时间，他回到驻地后任班长。这时，李印受到霍梁的委托又找到霍申。此刻，霍申决心已下，决定投奔八路军。不久，保安团换防，霍申所在的中队到房山县城驻防，他见时机已到，便脱离了保安团，于1945年3月正式参加了革命。

霍申参加革命后，被编排晋察冀十一军分区的“老七团”部队，当一名普

通战士。由于他是老区南窖村人，又在孔宪江的队伍里当过一年多兵，对于房山城内和保安团内部比较了解，同年7月，组织上让他夜间带领“老七团”奇袭房山城。在这次战斗中，他巧妙地把部队带到房山北城墙下，使部队顺利地攻进了房山城。在这次战斗中，他亲眼目睹了伪保安团长孔宪江的最终下场。

孔宪江被打死后，极大的鼓舞了房山县广大抗日军民的斗争。为迎接抗日的全面胜利，霍申受到上级组织的委派，秘密回到南窖村，利用他有文化的优势，广泛的宣传抗日爱国的思想，鼓舞青年参加革命。没几天的时间，本村就有十八名青年人踊跃报名参加八路军。而后，霍申带领这十八名青年人投奔在独四旅第一团。

由于霍申的数学基础较好，后来被分配在炮兵任班长。在日本帝国主义即将灭亡的关键时刻，盘踞在坨里据点的敌人妄图做垂死挣扎，负隅顽抗。在这次战争中，这个据点是否顺利拿掉，关系到全局的胜败。可是，当时我军只剩三发炮弹，强攻又怕伤亡大，损失战斗力。马辉怀着焦虑的心情亲自问霍申：“三发炮弹有没有把握？”霍申用双腿测了据点位置和距离，胸有成竹地报告：“没问题！”然后亲自操作，前一发炮弹，后一发炮弹，最后一发炮弹不偏不倚正中日寇据点，不仅为全面打响战斗铺平了道路，而且也起到了牵一发而动全局引蛇出洞的良好效果。随后，部队开始了全面总攻，顺利完成了战斗任务。

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对朝鲜的侵略战争，同年12月25日，霍申随同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作战，任志愿军某部炮兵营营长。在朝鲜战场上，大大小小地经历了上百次战斗。在一次无名高地歼灭战中，他所在的炮兵阵地被敌机偷袭，投下了大量的凝固的汽油弹，整个炮兵阵地被敌机摧毁。庆幸的是霍申和另外两名战士幸存下来，一直坚持到最后胜利。战斗结束后，霍申和另外两名战士受到了部队领导的特别嘉奖。

朝鲜战争结束后，1953年霍申随大部队回国，定居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前几年辞世。

（本文由霍申的邻居李印老人、霍申的盟弟支国华老人人口述整理而成。）

抢粮与反抢粮的斗争

康 富

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资，和平年代如此，战争年代则更为突出。

解放战争期间，房山县内存在两个政党和两种政权，实行的是两种不同的农政和粮政。一方面是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民主政府在解放区游击区开展的“土改”运动，铲除封建剥削制度，解放生产力，组织发展生产，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反动政府，对农村不仅施以苛政，横征暴敛，而且采取武装行动，大行抢劫。当时横行于房山一带的伪团张德祥部，曾在六区的石窝、辛庄等村疯狂抢粮，抢不到粮食就烧房子、抢牲畜，其残暴行径毫不逊色日本鬼子在扫荡中的“三光”政策。

1947年7月以后，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反动派屡遭重创，节节败退，从而加剧了国民党反动派地方势力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恐慌。于是他们更加穷凶极恶地与我展开了粮食的争夺。

为了实现麦收抢粮的阴谋，敌人首先在军事上采取了行动，企图将我武装力量压缩到山区。1948年6月初，敌人做好了武装抢粮的军事部署。首先从涿县调来李四成的一个营和一个连驻防花园；房山张德祥部便衣队百余人，驻扎在冯村、窦店、扫庄一带，组织了后备队八十余人，总兵力约六百余人，由李四成指挥。房山县城则有张德祥三个团的兵力，另配有“大乡队”百余人。

麦收开始后，房山县城和花园南北两个据点的敌人相互配合。李四成部以“三良各庄”（即东、西、南良各庄）为骚扰的主要目标，张德祥部则到五区的“四甘池”（即东、西、南、北甘池）一带活动。每次活动人数不定，最多的一次曾出动三百余人，分三路进发，企图抓捕我进行护麦工作的区干部。在大股敌人远离据点频繁出动、向纵深骚扰的同时，“大乡队”亦随之在县城附近的支楼、石楼一带活动，向各村催交小麦。

敌人在实施抢粮中，不但从军事上准备充分，而且在物质上也进行了准备。如向各村要大车、要口袋等。有口袋的交口袋，没口袋的要交口袋款。天开乡就是按每亩地摊派了五千元的买口袋款。

敌人抢粮主要采取了两种手段：一是到各地召开保长会，布置征麦数额，同时催交旧欠款。敌人征缴的数额极大，半壁店一个乡就要了六十六万六千斤；南河村一百多户，种麦三顷零五十亩，敌人要他们上交小麦两万五千九百四十四斤。凡不交的，以抗粮为名，实施抢掠。二是控制保长，即把县城附近，马路以东各村保长强迫搬到县城加以控制，形同人质。

为了保护麦收，粉碎敌人的抢粮阴谋，中共房山县委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反抢粮措施。一方面是在军事布置上，除人民解放军独立二营及五区武工队外，还从一、二区组织了有经验的民兵五十多名，到产麦区帮助掩护群众收麦，三、六区民兵就地坚持武装斗争。另外，还专门组织了火力爆破组9人，随部队和武工队出动，负责在主要路段埋设地雷，封锁敌人的抢粮路线。由于有了民兵的积极配合，小股敌人的抢粮行动受到控制，独立二营主要是压制对付敌人大范围大规模的抢粮活动。6月13日，武工队和独立二营在四甘池与张德祥部遭遇，共杀伤敌军三十余名。15日下午，为进一步压缩敌人，加强和保卫护麦工作，我主力深入到五区的赵各庄、大韩继、大次洛一带活动，将张德祥部二百余人打回县城。19日，武工队到五区的支楼和周口店活动，与伪大乡队遭遇，在支楼村北激战一个小时，杀伤敌人七、八名，迫敌逃回县城。23日，独二营在支楼设伏，与敌激战中，击毙天开伪乡长。三区民兵就地坚持武装斗争，一面放哨监视敌人，一面积极参加生产，帮助群众收麦。在生产中，通过互相拨工卖工等形式，帮助军烈属、孤寡户收割小麦五十八亩。

反抢粮另一措施是，组织群众快收快打快坚壁。早在麦收前半个多月，中共房山县委即着手部署了反抢粮工作。首先在边沿区的石窝村建立反抢粮指挥中心，县委委员分头到游击区和敌战区的平原产麦区宣传和组织反抢粮工作。针对敌人的抢粮阴谋，在产麦区进行麦收前的各项准备。例如组织动员群众，宣传群众，召开村干部会。除了宣传动员工作，还准备好了收麦工具，打麦场院及坚壁场所等。在组织工作上，做好了早熟户与晚熟户、有劳力户与无劳力户、有牲口户与无牲口户的搭帮结伙，合理分工，以便到时熟一块收一块，做到了忙而不乱，有条不紊。

到阴历五月初二，刚有少数地块的麦稍发黄，群众便说：“咱听共产党的，哪先熟就先收哪儿。”五月初二以后，旱地的麦子大都开始收割，各村男女老少都投入收麦活动之中。大家不分昼夜，青壮年在地里割（拔），妇女儿童赶牲口往场里运，场里的活儿，大都由妇女来干。后熟的帮助先熟的，有劳力的帮助无劳力的。石窝村由于敌人的抢粮，运粮的牲口少，麦收遇到困难。在党

领导下，大家有难同当，一头牲口几家串换着使。没有牲口的，人们就往回背，往回挑。仅五六天时间，该村就把麦子收完了。由于军民同心同德，全县麦收工作进展非常顺利。在打轧晾晒过程中，有的因为场里没地方晒，就弄到家里，在院中铺上被子晒。有时敌人突然来抢粮，群众就连夜转移到山里；有的户把炕拆掉，把麦藏好再搭起来；有的迅速把麦子送到解放区去坚壁；六区的三岔村，集体把粮食坚壁到山洞里，派人看守到阴历五月十五日，半个月时间所有水旱地麦子全部割完、坚壁起来。

由于中共房山县委采取了极为有力的措施，六区、三区和三良各庄以里地区，敌人连一粒小麦也没抢走，敌人的抢粮计划彻底失败。

反抢粮斗争的胜利，扩大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游击区、敌战区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促进了敌区工作。人民群众在反抢粮斗争中，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实面目，同时更加真心地拥护共产党、解放军，最终赢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房山县城解放简记

王绍清

1947 年秋，蒋家王朝即将崩溃，军心离散，朝不保夕。驻守房山的河北省三十三团（简称房山县保安团）团长张德祥，凭借房山城坚固的城防，做垂死的挣扎。

强征民夫 建筑工事

房山城垣，原系土城，1568 年重修。城墙外侧采用城西北山上的麻石砌成，石灰浆灌注；里侧取城垣四角黄土、周口店的石灰、南关的沙子，加水之后、打夯板筑（俗称板打墙），雄险坚固。日军侵华时，曾炮击房山城，城墙落弹之处，仅现一小坑，墙体依旧岿然屹立。张德祥利用坚如磐石的城垣，强征民夫，挖空城墙，用水泥筑暗堡。平时，射击孔封闭，战时打开，对方难以发现，由张德祥的嫡系部队驻守。

城墙外，有宽二丈、深一丈五、里侧打夯筑坡、高三丈的护城壕，壕内有水，一人多深，水从何来，众说纷纭。实际上是利用房山城“四水不流”的传说，取四个城脚低洼积水，民夫昼夜斗水而成。由七、十二、十五大乡队驻守。东西城门堵死，北关设有人行吊桥，南关是通往各地的咽喉要道。有军警站岗，凭保公所路条出入。南庙建有五丈多高炮楼，两个枪眼对准通道，日夜架着机枪。距壕外五百米的民房约有三百多间，全部拆除，百余户无家可归。南北通道由七大队把守（大队长姓隗，民众不知其名，皆称二虎，故有“二虎把门，戒备森严”之说）。

“七七事变”前，随着灰煤的开发，房山商业踵跟而起，山西、河北、天津等地商贾云集房山，店铺林立，买卖兴隆。挖壕后，交通受阻，货源断绝。有资本的老板，花钱为年轻伙计买个伪职空名，抓兵时穿上军装遮人耳目；有后台的店铺，年轻人手持军警证件随意出入，没钱、没势力的老板，只好老翁袖手扶柁，卖点少点，呼应度日。农民出壕种地，晚出早归，太阳一落，警察局

立即盘查户口，回答稍有迟慢，便被带到警察局，托人花钱保释，年轻人为了逃避抓兵，东躲西藏，土地不能按时耕种，地里草比谷子高。此时的房山城夜晚阴森恐怖，清晨只听到保安团训练时的跑步声。

攻打房山城

1948年12月12日，解放军冀中区七纵队二十旅旅长刘秉彦率五十八、五十九团围攻房山城。五十九团一营对小山坡据点发起攻击，两个五十公斤的炸药包爆炸后，壕沟帮没被炸塌，部队冲锋受阻，战斗失利。12月13日拂晓，张德祥在北门外架起迫击炮，由南向北炮击围攻齐家坡据点的解放军。12月13日上午八点左右，解放军五十八团二营对齐家坡据点进行火力侦察，发起冲击。因守敌未暴露火力，第一次冲锋失利。

13日中午，国民党党部召见城内绅士、商家老板、国民党党员、联保主任等人。随后，很快传出张德祥要死守房山城的消息。

13日午后一点多钟，解放军五十八团二营第二次向齐家坡发起总攻，城内民众听见激烈的枪炮声。解放军营教导员蒋志鸿率领突击队，冲入敌阵地占领了齐家坡，守敌举手投降。

下午三点多钟，五十九团一营调来山炮，第二次攻打小山坡据点，两声炮响，城内群众眼看小山坡敌炮楼揭了盖，黑烟滚滚，守敌溃逃。

下午四点多钟，山顶庙守敌从坡顶北侧向县城方向逃窜。

下午五点多钟，西北关据点守敌逃进城内，张德祥外围据点全部被解放军占领。

晚九点多钟，县城内一片混乱，国民党军政警及大乡队人员，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来去匆匆，乱哄哄。伪军到农民家里借衣裳，伺机逃跑，敌伪人员的家属，坐在屋里，哭天抹泪。农民乐在心里，盼着解放。

13日后半夜，驻守城壕东西南面的伪军往北跑，在县城北街团部（今仓房小区处）集合。此时，北关吊桥放下，准备从北门溃逃。真是兵败如山倒，张德祥部一窝蜂似的向北逃去。片刻，解放军从南北关进城，五十八团二营四连三排排长钟信（转业后曾任交道供销社支部书记）率队沿西城壕搜查残敌。到城隍庙，由一道士带领查看了殿堂，地下躺着的是张德祥抛弃的没有武器的伤兵（国民党医疗所驻在附近）。

解 放

14 日上午，房山县委书记刘祥庆、县长杜恩林等领导率入城工作队随攻城部队入城，进行接管工作。为及时揭破敌人谣言，稳定民心，他们张贴布告，散发传单和小报，用大灰水刷写大标语。临时用纸写的“房山县人民政府”大牌子挂在（原县衙）门前。还分别召开商人座谈会，讲解共产党保护工商业的有关政策，召集四街二关联合主任会议，宣布各村保公所立即改为“街公所”由城关“区公所”领导，保长及保公所办事人员临时不变，维持办公。产生新政权后，再办理移交。城内民众及各商号主动将堵塞的东西城门打开，清理城墙内外枪支弹药，动员敌伪人员登记，各店铺清理大街及店内卫生，擦洗招牌，重整开业。

17 日，房山县人民政府在东大操场（今招待所礼堂处）召开庆祝房山解放的群众大会。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等领导分别在会上讲了话。会场上人虽然很多，但鸦雀无声，群众都侧耳聆听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这次大会，解除了群众对人民政府和解放军的顾虑，冲散了压在人民心头的恐怖。群众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整个会场热情洋溢。大会散了，有的群众还围着县党政领导诉说多年之苦，表达获得解放之情，久久不肯离去。那时的儿童团员现在已古稀，但还能记得当时编的顺口溜：

1948 年，八路军围攻房山县。
先占齐家坡，小山坡炮楼冒了烟。
山顶庙守敌跳墙从北坡往下窜。
张德祥挠着脑袋在团部来回转。
顽伪人员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乱成团，
七嘴八舌乱轰轰拱门逃跑似窝蜂。
八路军进了城，政府人员忙不停。
贴布告与标语，四门大开庆解放。
书记县长紧握百姓的手，
问寒问暖大妈热泪往下流。
乌云散，阳光照，人民当家作主人，
老太太坐在炕头上抿着嘴儿笑。
老头儿去支前，孩子打起霸王鞭。
翻身不忘共产党喝水不忘打井人，
咱们救星毛主席，祖孙万代不忘本！

回忆在良乡县委的工作片段

罗玉源

我于1951年至1954年在良乡县一区任区委书记，1954年调中共良乡县委农村部工作任副部长，不久部长马有勋调河北省委工作，从此我接任农村部长，直至1958年4月房良合并划归北京市，前后约四年的时间。1956年4月20日至25日良乡县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我被选为县委委员、县委常委。农村部副部长王树瑞、李项荣被选为县委委员。四年中先后在农村部工作过的有：部长罗玉源、副部长王树瑞、李项荣、安成儒，干事有刘振祥、郎宝山、张庆贵、李贤、罗信、柳有春、冯国栋等十余人。这四年是我最为怀念的难忘岁月。那激情满怀、朝气蓬勃、艰苦奋斗的情景经常浮现在眼前。现将当时的工作情景回忆如下：

如饥似渴的学习热

农村部全体干部除一名同志是初中毕业外，其余同志大都是小学程度，在理论方面过去都从未系统的学习过。干工作往往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对农村部工作特别是农业合作化等新事物、新课题认识不深。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当好县委的参谋助手，在农村部很快掀起了学理论、学文化、学业务知识的热潮。

当时对各级干部的学习非常重视，县委从宣传部抽出一各文化程度较高、又有教学经验的干部刘孝任专职理论教员，定期到通县地委参加学习，回来后每周给全县干部上理论教育课。主要讲唯物论、唯心论、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等内容。后来县里又专门成立了干部业余学校，课程以文科初、高中语文为主。部内所有同志不论是学习理论还学习文化、业务，都积极参加，按时听课。理论教员随时随地对学员们的疑问不通之处进行细心讲解。直到想通弄明白为止。为了保证学以至用，一方面部内全体干部坚持学习制度按时听课；一方面通过工作实践不断提高理论认识水平。大家就实论虚，进一步提高了认识。对“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为什么说干工作看问

题主观片面把事情看成一成不变是错误的，为什么要坚持唯物的观点和辩证的方法，要客观的全面的历史的看问题和解决问题才是正确的等问题都有了正确认识。在部里的每月两次集中学习时，大家结合工作实际进行学习讨论，既是对学习的消化也是对工作的总结和提高。四年来，部里同志不论是理论水平、认识水平，还是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都有了明显的提高，为后来工作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日以继夜的工作“狂”

1954年初建农村工作部时，按照中央提示的工作内容是：农、材、水、气（气象）、合（合作化）、外加征兵。通过实践发现仅靠一个农业合作社，根本忙不过来。因此，实现农业合作化走大家共同富裕的道路，就成了县委和农村部重中之重的中心任务。

良乡全县187个村农业初级社从少到多，一个村由一个社到两三个社，又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后又并社到一个村一个社，又到九个村的联村社，直到后来的人民公社。农村部初建时按一个村两个社计就近400个农业社。每个农业社随着季节的变化，所有的关键环节都由农村部直接亲自抓，每建立一个农业社，县委把审核批准权授给农村部，经农村部签字盖章，这个农业社才能成立。秋收分配年终结算，每个社的分配方案，都要上报材料，经农村部批准才能进行实际分配。一年当中从生产计划管理、劳动管理、民主管理、财务管理等均需农社部帮助解决。

面对繁重的工作任务我们一靠县委领导，二靠分区划片建立起来且行之有效的互助合作网和会计辅导站，再加上部里十几名同志日以继夜的拼搏，农村部的工作始终都在顺利进行着。部里的同志常年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时间在基层，四名部领导干部也几乎常年在下边蹲点。部里几名主抓会计辅导的干事，以郎宝山同志为首，负责全县几百个农业社的财务管理、年终分配等繁重的任务，一年到头忙得脚



1955年春，中共良乡县委、县政府部分领导在昊天塔前合影（罗玉源 提供）

朝天，没有轻闲的时候。留守部内工作的一二名干事也不轻松，每周要向县委、地委农村部汇报一次部里工作情况，还要不断整理书面的简报、通报、总结报告，接待处理有关农业合作化方面来信来访等，连续作战到通宵达旦是常事。

当时部里几个领导是三十岁左右，其余干事均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干部，工作多压不倒，而且越干情绪越高，工作质量越好。全县农业合作化运动健康顺利的发展，当时在全社区是比较好的。岗上村的吴春山、军留庄村的李德生、于管营村的田思勤等出席了全国及河北省的劳动模范先进代表大会，成为农业战线的先进典型。

民主生活气氛浓

农村部每月两次集中学习讨论工作的制度、每月最少一次的部内党小组的生活会制度，四年中一直坚持不断在农村部形成了良好的民主氛围。

当时的小组生活会不走过场，不搞形式主义。通过生活会，党员之间加强了团结，统一了思想，有力的推动了工作的开展。在工作上大家都是抢着干，一次中共中央农村部要我们县委农村部直接去汇报座谈农业合作化的情况，搞材料的同志觉得手头掌握情况不多，又是向中央去汇报，有些犯难，副部长王树瑞便自报奋勇：“这有什么，我去！”由于他长期在基层蹲点，情况掌握的又细又多，汇报后领导很满意。由于工作顺利，上级表扬，在某些同志中出现了乐观自满的骄傲情绪的苗头，我便在小组生活会上及时提醒大家，要永远坚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并严格要求自己，检查自己的不足之处。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原来在农村部一起工作的同志，民主和谐的关系一直保持到现在。

艰苦奋斗的好传统

部内同志工作干劲足，情绪高，始终坚持着艰苦奋斗的好传统。例如当时交通工具短缺，县委常委至县委书记一个人配备一辆自行车。每个部、委、配备一辆自行车。下乡蹲点时，打背包步行的事习以为常。通县地委每年召开的乡支部书记以上的基层干部会，部里参加会的两各年轻干事，都是从良乡骑自己车到通县，毫无怨言。在吃的方面就更简单了。在机关时吃食堂（大伙房每月9元），下乡时吃派饭，从没在外吃过一次客饭。地委书记徐瑞林、专员王

宪、河北省委书记马国瑞、中央领导张闻天等各级领导都来过良乡县委机关，也都是在机关小食堂用饭。

县委机关是原国民党时的旧机构的旧房屋，各部委办都是利用两三间房集体办公。农村部就是在三间房里集体办公，住的是土炕或“连铺”，后来给副部长们挤出一间房单住，可王树瑞（农村部副部长）就是不去住，他不愿离开农村部干事们住的大连铺。当时的农村部工作和生活条件虽然很艰苦，但部里全体同志情绪高、干劲足、进取心强、工作效率高。这种艰苦奋斗的好传统，几十年过去了还难以忘怀。

房山县 1954 年的征兵工作

魏志华

1955 年我国制定了第一部兵役法，将志愿兵制改为义务兵役制。1954 年征兵工作就是根据这一精神进行的。

根据国务院 1954 年 9 月 11 日公布的征集兵员的命令，1954 年的新兵征集要在 1955 年 2 月底以前完成。这次征集新兵是为了补充人民解放军退伍兵员的缺额及逐步推行义务兵役制，加强国防、保卫祖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保卫远东和全世界和平。此次征集新兵是按照兵役法草案中的有关部分进行的，是实行义务兵役制的开始，是我国军事制度的重大改革。中央要求，这次征兵要加强政治动员，全面教育，普遍提高，打通思想，争取适龄青年全部报名。要征到好兵，开个好头，给实行义务兵役制打下基础。同时，中央要求，这次征兵要坚决贯彻和执行政策，应征对象是 18-22 岁男性公民，体质必须合乎标准，该征的征，不该征的不征。不征对象有四种：五类反革命分子；直系亲属被杀，被判长期徒刑，本人心怀不满意；敌伪军警宪人员，历史未交待清楚或已交待清楚但表现不好；兵痞流氓、惯偷、惯盗、尚未获得改造以及参加过我部队，被部队清洗过的。缓征对象包括：平时不征、战时缓征的独生子女和家中唯一劳动力。独生子女本人坚决要求入伍，家庭也满意的，也可批准。是独生子女又是家中唯一劳动力的，坚决不征。入伍时间：一律从 1955 年 3 月 1 日算起。服役期限：陆军 3 年、海军 4 年、空军 5 年。各乡村的征兵任务是按适龄青年的比例确定。

房山县根据中央的批示精神，对征兵工作几次进行认真的研究，制定了具体方案，编印了征兵工作的宣传提纲，于 1954 年 12 月 25 日召开了县乡两级扩大干部会议，会期 5 天。参加会议的有县直机关各部门的负责人，乡镇党总支部书记、乡长、宣传委员、团委书记、妇联主任、武装部长，县直机关抽调下乡的人员。会上由县委领导进行了动员，对报名登记的具体手续、方法进行了培训。

根据县委征兵工作方案、全县的征兵工作大体分三步进行。第一步：宣传

教育、思想发动。征兵工作开始后，首先召开一系列会议（分党委总支扩大会、村支委会、党团员会、群众会等）传达县征兵工作会议精神，进行思想发动。同时以乡为单位训练宣传员，利用各种形式开展宣传。在进行宣传发动的同时，各乡、村领导及县下乡工作组进行摸底排队。弄清年龄、身体情况、政治情况及独生子女等情况。第二步：报名登记，进行体检。平原区以乡为单位设登记站；山区居位分散，以村为单位设登记站。第三步：新兵入伍及总结工作。经体检、政审、确定录取新兵、由县兵役局发入伍通知书。批准入伍的新兵，于1955年3月1日由乡政府送县集中，同时做好总结工作。

为了搞好征兵工作，县委除定期开会研究讨论和解决征兵工作的问题以外，还采取了几项主要措施：

1、建立由21人组成的县征兵办公室。办公室主任：吕永珍（县委副书记）。副主任：袁德印（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秦岐（县兵役局副局长）、杜生聪（县委秘书）。办公室下设5个组。征集组：组长郭春明（兵役局科长）；宣传组：组长牛树文（县委宣传部）；体检组：组长王力（县卫生科科长）；组保组：组长杨宏仁（县委组织部）；行政组：组长张连科（县兵役局）。办公地点设在县委办公室。

2、培训宣传队伍。为了搞好宣传工作，县委组织67名报告员（都是县委和县直各单位的领导同志），协助各乡培训宣传员4949人（党员2300人、团员3100人、群众549人）。全县56个业余剧团还编演了36个宣传剧目，每个剧团都演了3至5场。

3、抽调下乡工作组。从县有关单位抽调180多人，划分21个工作组，由县委委员带队，分层负责。一个组抓2至3个乡，深入到各乡村检查指导，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4、抓好典型。为了及时总结经验，以点带面，指导工作，县委确定顾册村为重点，顾册是全县第二个大村，当时有800来户。抽调6名干部，由县委领导带队，亲自抓点。每个阶段都先行一步，及时将经验介绍到全县各乡。

由于房山县委重视，全县1954年的征兵工作，措施得力，群众发动的充分，提高了广大群众的国防观念和服兵役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的法律观念，为实行义务兵役制打下良好的基础。全县当年共有4784名适龄青年，上站报名的4557人，占总数的95.3%。而且还出现了不少动人的事例，全县父送子参军的30个，母送子的132个，祖母送孙子的12个，妻送郎的54个，姐妹劝兄弟的103个，兄弟相争参军的45个。全县共征新兵400名，圆满完成了

征兵任务。其中党员 30 人，团员 203 人，群众 167 人。从年龄上看，18 岁的 96 人，19 岁的 101 人，20 岁的 80 人，21 岁的 73 人，22 岁的 50 人。从文化程度看，文盲 154 人，半文盲 51 人，初小 117 人，高小 76 人，初中 2 人。从成份看，贫农 248 人，中农 152 人。体检情况：合格甲 123 人，合格乙 277 人。

新兵入伍是在顾册集中。平原地区新兵于 3 月 1 日由乡直接送到顾册。山区由于路程较远，新兵头一天分别集中到霞云岭和张坊，3 月 1 日再送到顾册。各乡欢送新兵时都很隆重，普遍召开了欢送会、座谈会。到房山来时，新兵披红戴花，有的骑马，有的从车（马车），由乡干部护送，群众敲锣打鼓、放鞭炮。到顾册新兵集中地点有领导和群众欢迎。新兵在顾册集中了 5 天。一是办理接交手续，接兵单位对新兵进行逐个审查。二是对新兵进行形势教育和部队基本知识教育。这几天晚上每天都在顾册戏楼唱戏不仅有本地剧团的，还从涞水县请来比较有名的剧团，有唱评剧的，也有唱河北梆子的。新兵经过几天的学习和思想工作，情绪都很高涨。不少人写了决心书、保证书，表示到部队后一定服从领导、学好本领。为保卫祖国做出贡献。

新兵上部队的时候，房山县委领导及征兵办公室的同志、顾册村的干部、群众、学生，敲锣打鼓，热烈欢送，新兵们高高兴兴的离开了房山。

1954 年度房山县的征兵工作，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了任务，真正做到了“领导、群众、部队”三满意。

五十年代的房山县委交通班

魏志华

解放初期，房山县里的通讯非常落后。县邮局条件很差，只有十几个人，几辆自行车。不仅信件送的慢，而且也不安全。为了保证各级党委的批示及时地贯彻执行，解放后不久，房山县委专门成立了机要交通班，由县委办公室直接领导。交通班一般是 5 至 6 个人，多时 7 至 8 人。都是从各区、村抽调的同志，他们身体好，贫下中农出身，政治可靠。第一任交通班长是穆江山，成员有隗有栋、刘存厚、王玉、任振芳。以后来的有王锦良、姚树芳、石占元、孔凡明、沙义、霍怀成、贾德启。穆江山调走后，先后任交通班长是隗有栋、王锦良、贾德启。

县委交通班的任务就是接送上下级的文件。具体的任务有三项：

第一，对上。从地委领文件，往地委送文件。1958 年以前，房山县属河北省通县专区。为了工作方便，地委在北京设立了一个机要交通站。地点在前门外煤市街（同时也是华北局的交通站）。负责接交房山、大兴、门头沟等西边几个县的文件。每天县委交通班要去北京一次。由于交通条件很差。县委没有汽车，发往北京的公共汽车，每天只有一次。所谓的“公共汽车”不过是辆烧劈柴的旧卡车。遇到雨雪天，道路不好走时就得停发。因此，往北京送文件一般都是骑自行车到良乡，再从良乡坐火车去北京，这样虽然慢，但比较安全。天气好时，有时也骑自行车直接去北京，当天返回。

第二，对县直各机关，每天一次。

第三，是对下。对区、乡送文件，也是最主要的任务，工作量也最重。对区、乡的文件，又分几个阶段。1949 年至 1954 年这一段是对各区。当时房山县共有 6 个区。各区政府的存在地是：一区在城关，二区在张坊，三区在长沟，四区在周口店，五区在河北，六区在霞云岭。1952 年初，河北及周口店、黄山店等几十个村划归京西矿区，四区搬到赵各庄，五区搬到南尚乐，称“新五区”。1955 至 1958 年，这一段是县直接对乡。1954 年开始撤区建乡，全县开始划 70 个乡，后来合并到 30 多个。这一段县里的文件直接送到乡。1958

年4月，房山、良乡两个县及门头沟的一部分乡、村合并为周口店区，划归北京市。乡级单位增加了一倍。因此，县委在张坊、霞云岭增设了两个交通点，每个点设2个人。县交通班把山区的文件送到这两个点，再由点上的人转送到各乡，减轻了一些县交通班的负担。1958年9月实行人民公社化。全区共建了7个大公社，即城关、良乡、琉璃河、长沟、马安、霞云岭、河北。这一段交通的任务是把文件送到各公社。

交通班的工作非常辛苦，尤其是跑农村的更为艰苦。交通班的同志每人配一把手枪、一辆自行车。但是山区没有公路，到山区送文件多靠步行。例如，去霞云岭有两条路，一条是从拴马庄、黄山店，经涑沥水爬清风岭、三流水到霞云岭。另一条路是从周口店东厂爬东大岭，经南窖、石堡到霞云岭。最高的地方1300多公尺，去一趟往返两天150多里，有些地方还非常危险。去十渡、蒲洼那道线也一样，平时沿着拒马河走。拒马河长年有水，每个渡口有桥，冬春季节可以从桥上走。每年8月上旬汛期到来之前，要把桥拆掉，防止桥木被水冲走，每年9月（阴历八月十五以后）再搭桥。所以每年雨季去十渡、蒲洼，要趟五、六道河。遇到发洪水的时候，就要走几十里山路。从张坊、干河口往北爬百尺岭到六渡、从六渡爬“狐狸险”到十渡。其间从六渡到八渡“狐狸险”这一段最险，有五里多地。山特别陡、直上直下，在离地面七、八十来米的山腰上有一个一尺多宽的道，这是发洪水时平原到十渡的唯一通道。由于山高路险，走的时候不敢往下看，只能扶着山石一步一步的挪动，有时甚至还得两手扶地往前爬，稍不注意就会掉下去，每次都是提心吊胆，出一身冷汗。

往山区送文件不仅累，而且有时还有危险。例如冬天下完大雪后，山上阴坡几个月不化，看不清道，稍有不慎就会掉下去。因此，都要拄个拐仗探路。跑平原的也很艰苦。例如1952年，王玉去张坊送文件，赶上大雨。他从房山一直推着车，过了长沟雨小时才骑。五十年代房山的公路都是土路，尤其是长沟，稻地多，每年春季返地气，从长沟到北正，地陷得很厉害，四、五里地连泥带水，没法骑车，有的地方车都推不动，要扛着自行车去。正常情况下往区、乡每天送一次文件，遇到紧急情况随时出动。

1952年10月，通县地委召开紧急会议，除县委领导外，各区委书记参加。由于山区电话不通，负责通知的王玉、刘存厚两人吃完晚饭就动身去山区发通知。道路不好走，没法骑车，他们就步行走小道，从岳各庄、尤门口、石门奔张坊。走了七个多小时直到夜里12点多才到了二区张坊。又连夜从干河口、长沟、东关上、爬大岭去六区霞云岭，到霞云岭已经天亮。第二天从南窖、东

大岭返回，到县城天已经又黑了。一天一夜走二百多里地。

交通班的同志长年外出，工作艰苦但生活待遇并不高。当时党政机关是供给制，他们和其他机关干部一样，每月 130 斤小米。折合人民币 14 元，出一天差补助 3 毛钱。尽管生活艰苦，他们丝毫没有怨言，始终是精神饱满，干劲十足。

交通班的同志不仅要按时完成工作任务，而且还要参加文化学习。这些同志都是农村来的，文化水平不高，都要和机关干部一样进行文化补课。每天早晨 6 点到干部学校去学习。学习 1 小时后，吃完早饭再出差。经过几年的学习。他们都达到了高小或初中的水平。

交通班的纪律严明，特别是保密制度更严。接送文件，不论是上级的，还是下边的，都要遵照严格的手续，发生差错就要追查责任。例如，1950 年有个同志骑自行车去北京取文件，回来时不慎将文件包丢失。其中有党刊《华北建设》、《河北建设》等，还有镇压反革命的绝密材料，回来后即被隔离审查（这个文件包被丰台的一个大车拾到，交给当地派出所，转送回房山县委）。

1960 年，北京市邮局成立了机要处，专门负责接送党政领导机关的文件，房山邮局也确定了专人负责。交通工具也有了改善，县委交通班也随之撤销，交通班的同志结束了他们的历史使命。

六十年代初期房山县的国民经济政策调整

许冬梅

1958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如火如荼地进行时，房山县同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全县各项经济收入遭受巨大损失，1961年工农业总产值8380万元，比1957年减少4165万元，粮食总产量8239万公斤，比1957年减461万公斤。面对严峻形势，1962年5月5日，中共房山县委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及时贯彻了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关于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大跃进”以来出现的“共产风”、“浮夸风”及生产上的“强迫命令”等错误进行了纠正，提出了新的工作方针和基本目标，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工农业生产发展的措施。会后，通过积极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到1964年，全县经济形势明显好转。

调整政策

调整人民公社的体制规模。1961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修正草案》（简称“六十条”）和《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全县7个人民公社调整为32个公社。除长阳公社（农场）为全民所有制外，其它31个公社均为集体所有制，大队由409个调整为441个，生产队由1343个调整为1723个，基本核算单位由193个调整为1675个。由于实行以生产队（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比较彻底地克服了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解决了分配同生产不相适应的矛盾，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增强了责任感。

清理平调帐，全面合理退赔。根据中央《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全县从县委到生产大队都建立了退赔委员会或领导小组，按照先易后难，先个人后集体，先物后款，先退后赔的原则，对人民公社化以来，县以上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各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违背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的原则，抽调或者占用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个人的生产资料、生

活资料、劳动力和其他财物的，都进行了彻底清算和退赔。截止到 1961 年 5 月，全县各级集体组织向社员兑现实物共 33722 件，兑现现款 150.7 万元。公社向基本核算单位兑现现款 104.53 万元。县和县以上各部门向基本核算单位兑现现款 354.6 万元，占平调总值的 97.1%。同时，生产队以上各级组织退还社员房屋共 12491 间。在经济兑现的基础上，认真地进行了政策兑现，大多数生产队都实现了“九兑现”，即 1960 年分配现金兑现；三包奖惩兑现：1961 年定期预分制度兑现；食堂社员节约粮食归己兑现；社员自留地固定到户兑现；家肥付酬兑现；社员养猪自食 40% 兑现；社员劳逸结合的制度兑现；生产小队实行土地、劳力、牲畜、农具四固定兑现，理顺了广大群众的思想情绪。

解决群众最关心的具体政策问题。首先，落实了 1961 年度的决算分配，实行了分配兑现：正确处理了国家、集体和社员三者之间的关系，按照政策确定了扣留和分配比例，完成了上缴积累和国家征购任务。其次，在生产管理上，执行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实行“三包一奖”，超产奖励，亏产受惩制度，彻底扭转了某些干部、社员的“包产年年定，就是不执行，春季耕得好，秋后一脚踢”的说法。

通过采取一系列具体有效的调整措施，绝大部分生产队出现了社员出勤多，购买农具多；关心集体生产、爱护公共财物的新气象。经过三年的调整，全县集体经济得到了巩固和提高，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64 年农业生产获得了全面大丰收，粮食总产量达到 12437 万公斤，比 1957 年增加 3737 万公斤，平均亩产达到 211.5 公斤，提前三年实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指标。周口店公社南韩继大队平均亩产达到 469 公斤，创全县粮食单产的最高记录。1964 年 2 月 3 日《北京日报》发表长篇通讯，介绍了南韩继大队艰苦奋斗，高产稳产的先进事迹。市委把南韩继作为全市的典型，在各郊区县开展了学习南韩继的热潮。

在工业方面。从 1960 年起，房山县对工业企业体制及规模适时调整，控制基本建设，合并了一些县营厂矿，压缩了社办工业。截止到 1965 年，全县工业企业由 1960 年 117 个减少到 65 个，其中县办企业由 1960 年 77 个减少到 34 个；社办企业由 1960 年 40 个减少到 31 个。棉纺厂、窦店砖厂、糖酒厂等 8 家企业因效益差管理不善而关闭；窦店砖瓦厂、马各庄化肥厂等 9 家企业移交市局经管，原于 1958 年下放至公社的企业收归县营（1963 年 6 月有 3 个厂）。1962 年，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共生产铁木制农具 50 多万件，荆柳竹编 21 万件，生活用品 20 多万件。1963 年，开展了以“反浪费”为中心的增

产节约运动，对 85%的产品和 88%的原辅料限定定额。依据《工业二十三条》等文件精神，对企业进行了整顿，改进了经营管理，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加品种达到 545 种，产品质量有明显提高。在发展地方工业的同时，还发展了手工业生产。分散在农村的手工业有 36 个行业、2000 多人，在修理、服务、制造等方面方便了群众。随着工业企业调整，减少城镇人口。1961 年下半年到 1963 年，全县共压缩非农业人口 4 万多人，绝大部分充实到农业第一线，增加了农业战线的力量。

在商业方面。1961 年 6 月，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坚持为农业第一线服务，同年全县恢复了 31 个基层供销社，增加了批发和零售网点，便利了农村的商品供应和农副产品的购销。1962 年 11 月，在 18 个余粮公社开展了余粮换购工作，以及四坊（酒坊、豆腐坊、粉坊、油坊）业务，发展了商品交换，改善了人民生活。市场供应也有明显改善，从 1963 年 8 月份，凭农村购货券供应的商品由原来的 47 种减到 16 种，凭工业券供应的商品由 49 种减到 12 种，扩大了出售的范围。商业工作通过扩大购销活动，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1964 年社会商品零售额 5328.2 万元，比 1957 年增加 1703.3 万元。

与此同时，全县还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通过自上而下的检查工作，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鸣放，对干部提出大量的善意的批评，使干部的思想认识水平和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1963 年，全县有 2485 名干部向群众检查了在强迫命令、不发扬民主、多吃多占、不参加劳动等方面的缺点错误。到年底，社队干部已退回侵占集体的实物折款和现款达万元，退回多记工分 15034 分，退回粮食 2500 余公斤。有的一时退不出来，都做了退还计划。同时对在“插红旗”、“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等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工作。房山县监察委员会从 1961 年 8 月开始至 1962 年底，经过贯彻政策、调查对证等项工作，对 3696 人重新甄别，其中维持原结论者 199 人、部分纠正的 498 人、全部平反的 1207 人，有效地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狠抓典型

中共房山县委为把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落到实处，狠抓典型，开展了“插红旗、树标兵；一带二、一片红”的比学

赶帮超群众竞赛活动，在全县各行业树立了十二面“红旗”。这十二面红旗是：高产稳产的南韩继大队；治山整地农牧双丰收的富合大队；自力更生，多种经营的岗上大队；猪多、肥多、粮多的惠南庄大队；努力赶超南韩继的北市大队；立下愚公志、山沟变粮田的庄户台大队；热心为山区群众服务的大安山信用社；充满革命精神的“红色背篓商店”；农业战线上的好后勤农机供应站；热心为农业生产服务的顾册铁业社；不断进取的大牲畜配种站；山区铁脚板河北镇邮电支局乡邮员任成水。这些典型说服力强，在全县产生了较强的带动作用，在全市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中，背篓商店作为全国农村商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其事迹被拍成电影《红色背篓》，在全国放映后轰动一时。该商店是黄山店公社范围内唯一的一家分销店，只有男女职工六名，负责居住在山沟、山腰、山顶的50多个自然村的群众生产生活物资供应和农副产品收购。这里交通很不方便，他们每天都要用背篓身背60多斤以上的各种商品，攀山越岭，送货上山，进村到户；又将农民生产的农副土特产品收购背运回采。群众亲切地叫它“背篓商店”。自1958年以来，该店一直被评为市供销社先进集体，1964年被评为北京市五好先进集体，1965年6月10日，中共北京市委向全市发出了《关于号召学习“背篓商店”的通知》；15日《北京日报》发表题为《充满革命精神的“背篓商店”》的长篇通讯。该店后来还被评为全国先进集体，对全县商业及各业乃至全市、全国都起到了极大的典型带动作用。

通过全县人民不懈努力，扭转了经济困难局面，完成了对经济的调整和恢复。到1965年，工农业生产稳步发展，主要经济指标除原煤产量和大牲畜以外均大幅度超过了1957年。人民生活水平也有很大提高，文化教育等事业有了较大发展，为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打下了基础。

六十年代房山县法院检查案件纪实

宋 湘

1957年春夏之交，全国掀起了整风反右运动。紧接着，疾风暴雨式的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汹涌而至。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应运而生，“左”的错误越演越烈。政法机关作为“专政工具”，把保卫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作为中心任务。虽然打击犯罪，调处纠纷，对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是这一时期政法工作的主流，但是由于紧跟形势，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左”的影响，发生了一些冤假错案，造成了不事低估的损失。

进入1960年以后，面对全国范围出现的严重经济困难，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意图纠正和扭转大跃进中的错误倾向。在这种情况下，政法系统也开始检查大跃进以来的工作。

1961年8月11日至16日，北京市高级法院召开区县法院院长会议，贯彻最高法院和北京市委“关于检查1958年至1961年8月审结的刑事案件执行政策情况”的工作。检查案件工作在全市展开。至1962年5月29日市高级法院作出检查案件工作总结，宣告这项工作结束。但检查出的冤假错案的改划手续、善后工作到当年9月方才逐步完成。全部检查案件工作实际上持续了一年时间。

房山县法院按照市院的部署，也开展了历时一年的检查案件工作。1958年4月1日房、良两县划归北京市后（合并成周口店区，后又改称房山县）所以原房山县和原良乡县法院从1958年1月至1961年8月审结的刑事案件共约1500件，均在这次检查之列。

当时，房山县法院院长谭万林因事离岗，市高级法院派高院刑庭审判员马英来房山法院主持工作。内部审批手续由马英签署，对外法律文书仍以谭万林署名。

为了做到正常审判业务和检查案件工作两不误，决定检查案件由马英负责。阅卷，重新调查取证，与有关单位联系，向市院、县委请示汇报，改判等具体工作主要由我办理（当时我任房山县法院书记员，负责办公室行政事务工

作)。其他审判人员仍坚持正常审判业务，只参加检查案件的研究会议。

这次检查案件的重点是整风反右、农村大辩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这一系列群众运动中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错判的案件。在逐一阅卷之后，将有可能属于错判的案件提出，向法院领导（全院审判人员参加）汇报，经讨论认定是否属于错判。然后到基层重新调查取证，征求有关方面意见，再向法院领导汇报（当时，审判委员会组织很不健全，院领导和全体审判人员会议代行了审判委员会职权），提出改判意见；向县委主管政法工作的副书记张革夫汇报；然后向市高级法院写出正式文字报告，市高院认为确需改判的案件向市委政法部报告；批准后发回县法院，再对外正式办理撤消原判、再审改判、宣判手续及善后工作。

经过近一年的工作，房山县法院共纠正冤假错案 20 余件（因法院文书档案在“文革”中被全部销毁，准确数字已难于查考）。

下面是几件我记忆比较深刻的案例。

（一）郭珍破坏水利案

郭珍，男，时年 26 岁，良乡公社邢家坞村人。

原判认定：“被告一贯对高级社不满，不服从领导分配，有计划地企图将合作社搞垮，从而出社单干。1957 年 7 月栽白菜时，故意调了十五、六个罗锅畦，并唆使他人也调了几个罗锅畦，因旱涝不均，淹死白菜 400 余棵。又于 1957 年 5 月挖刺猬河时，故意将活地目标（木橛）拔下扔掉，致使该村民工为此争论不休，造成 53 个民工停工半天。此种行为不仅有目的地破坏农业生产，更严重的是使修河工程未能按时完成，影响社员的生产与收入”。据此，原良乡县法院于 1957 年 12 月 28 日以破坏水利罪判处郭珍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1962 年 9 月 20 日房山县人民法院裁定：“……现经本院院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 12 条第 1 款之规定，将本案提交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发现本案原判在认定性质上和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故依法裁定如下：撤销前良县人民法院 1957 年 12 月 28 日（57）刑判字第 85 号刑事判决，重新审理郭珍破坏水利一案。”

1962 年 9 月 30 日房山县人民法院再审认定：“被告在栽白菜时调罗锅畦，挖河时拔掉工地标志，虽非故意破坏，但使生产造成一定损失，此种行为是严重错误的，应予批评教育。至于原判认定被告故意进行破坏，犯破坏水利罪，是不妥当的，应予否定。据此依法改判如下：对被告郭珍不予刑事处罚。”（“不

予刑事处分”是当时检查案件中的一项特殊政策规定。被告之行为不属于错误或仅是一般错误，不构成犯罪更不应判刑者，应宣告无罪，属于冤案，被告之行为虽不构成犯罪不应判刑，但有严重错误，可改判“不予刑事处分”，属于错案，不属于冤案。）

（二）马玉荣、张孝破坏案

马玉荣，男，1958年49岁，城关公社后朱各庄村人。

张孝，男，1958年45岁，城关公社后朱各庄村人。

原判认定：“1951年4月，马与张由政府贷购牙轮水车一辆（132元），安装其自留园内。1958年8月中旬，因浇菜将水车大八字轮拉掉一小块，经修理可使用。但马怕归公社，竟主动找张说：‘把水车拆掉卖铁’。当公社成立后，二犯在9月至11月1日间先后将水车零件砸毁，分三次卖给羊头岗分销店等处，得款17.63元，进行伙分（马得10.63元，张得7元）。”“马存有严重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仇视社会主义制度，积极组织张犯将水车砸坏卖铁”。

“本院为保护生产工具不受破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于1958年11月21日“判处马玉荣徒刑6个月，对张孝予当庭训诫处分，并没收卖水车之款。”

1962年6月，市高级法院在审批房山县法院对此案的检查报告时指出：“水车系被告私有财产，由于其觉悟不高，怕无偿将水车收归公社而砸毁卖铁，是一种错误行为，但构不成犯罪，不应判刑。”“当时为了保卫公社化，抓典型，赶及时，因此就把落后的错误行为当成破坏犯罪。”“在公社化初期，由于有‘共产风’的错误，部分社员对党的政策产生了误解，发生破坏自己的生产工具的错误，虽然对生产有害，但这同敌人的故意破坏有根本的不同。被告怕公社平调水车而砸坏卖铁，对生产有损害，是思想落后的表现，不是犯罪，不应判刑。由于原判混淆了落后行为与故意破坏的政策界限，又有客观上支持‘共产风’的错误，我们同意将原判撤消，改判不予刑事处分，将没收的卖铁款予以发还”。

1962年9月30日房山县法院改判“被告马玉荣、张孝不予刑事处分；没收的卖铁款17.63元分别发还马玉荣、张孝”。

（三）马文破坏白薯案

马文，又名马进才，男，1962年时42岁，良乡公社苏庄村人，捕前任生产队长。

原判认定：“1959年11月，队内收秋之白薯，除入窖和分配以外，尚余一万斤左右，即存放于露天地。大队党支书曾指出两次让作适当处理，其未执行。……其为了蒙蔽领导，竟于12月7日主谋派4人将白薯拉运14大车

倒入村南土坑内全部埋掉。……事后经多方查证，能食用和切干的占 50%。被告身为队长，对白薯不加妥善保管，造成冻伤，为逃避责任竟偷偷埋掉，显系一种破坏行为，情节恶劣，影响很坏”。据此，于 1960 年 1 月 15 日以破坏白薯罪判处马文有期徒刑六个月。

复查中对此案重新进行了调查。有关干部、群众证实：当时该村主要干部和强劳力去修水库，村中只剩了 40 个妇女，活多人少，白薯没刨在地里即受冻。刨后先拣好的入了窖，剩下的一万斤是烂的和创伤了的，其中只有 30% 烂得轻点。当时曾分一部分让社员切干，有的社员没法切也扔了。保管员曾弄一部分去喂牛，被告怕把牛喂坏了，没让喂。被告怕反映上去，就派人把烂白薯扔掉埋了。埋掉这一万斤中只能拣出 5% 的好白薯来。良乡公社领导干部证实：“1959 年白薯种的多，当时劳力紧张，活茬多，不光马文那队坏了白薯，别的村也坏了”。

市高级法院审批中认为：“因活多、劳力少而冻烂白薯，马文责任不大。将未完全烂掉的白薯埋掉也是一般工作上的缺点，并非故意破坏，构不成犯罪。原判属于认定性质错误不应判刑而判了的错案。当时所以发生错判，主要是调查中片面听取了少数人的一面之词，没有深入群众当中征求意见，造成偏听偏信。其次，缺乏分析研究，只看表面现象（埋了白薯造成了损失），而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因此错误地认定为破坏，造成错判”。

1962 年 9 月 30 日，房山县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撤消了原判，改判宣告马文无罪。

宝水村叛变事件

卓成栋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 1940 年，日本侵略军向平西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大扫荡，其惨烈程度前所未有的。很多抗日军民在反扫荡中壮烈牺牲，很多中国平民百姓惨遭日军杀害。日军在平西地区制造了数十起血腥惨案，一时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正是这种惨烈灰暗的大背景下，在平西地区的一些意志薄弱者，与地区内土匪、劣豪、地主等坏分子相勾结叛变投敌，给平西地区抗日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宝水村的叛变事件，就是这些事件中的一个。

1940 年 11 月，地处平西抗日根据地的蒲洼地区宝水村，刚进入初冬，天气就十分寒冷。八路军九团供给部于 1939 年初，因地理位置的优越和地处交通要道的重要原因，驻扎进宝水村，同年夏便在这里展开了军需供给部的各项工作。

供给部当时共 80 多人，分别住在全村的十几户村民家中，其中供给部的领导机关设在村民张××家，伙房安在张××家，战士和民兵白天在村北和村南主要路口设卡放哨，供给部承担着为八路军九团供应各类军需物资的工作，每天都有大量的军械物资，生活物资及相关物品等由这里送往部队。

在严峻的形势下，驻扎在宝水村的九团供给部接到了团部的命令，于 1940 年 11 月撤离了宝水村。这时已近隆冬，天气十分寒冷。在村干部的带领下部队的战士和民兵一起将部队还未来得及送走的部分物资，运到东山，对其实施坚壁清野，其中坚壁地点除了部队参加的人知道外，村中只有几个村干部知道。当部队撤离后，日军随后向蒲洼地区扫荡，先后在霞云岭的王家台庄户台等地制造了多起惨案，给宝水村一带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这时，正值日军疯狂地向我平西抗日根据地深部推进，使原为抗日后方的蒲洼地区宝水村一带成为敌我交战双方拉锯式地控制地带。地域内的豪绅、土匪开始与日寇串通一气，严峻的形势也使当时的宝水村主要村干部张国权、梁巨双等人的思想发生了逆转。

10 月末的一天，邻村的变节分子任成云派人偷偷地来到宝水村，找到了

村长张国权等人，密告日本人这次大扫荡，“已经把八路等打的差不多了，跟着八路军干有啥前程，吃苦受罪不用说，等到日本皇军来了，那还得杀头，还不如跟日本人干，要啥有啥，吃香的喝辣的……”，张国权等人禁不住叛徒的诱惑，暗中与邻村的土匪和叛徒约定，一遇机会便开始行动。

转眼已到了11月初，因在平西河东地区作战的八路军主力急需入冬的棉装和相应补给，委派原九团供给部的王班长带领一名干事，先期来到宝水村，探察部队原坚壁在这里的部分军需物资。

由于部队派来的两人不知村长张国权等人已经把八路军的一些情报密告给敌人，还把在宝水村坚壁的物资泄露给日军这一投敌情况，所以一进村他们就照直朝村部（杨成荣家）走去。进门就找村长和村副，说是要去看看部队在这里坚壁的物资。他们不知村长张国权、村副梁巨双早在前一天就听说部队派人来村查看物资，他们事先召集七八个人在村部密谋如何处理这一突发情况，所以在第二天部队来人后，他们又是倒茶水，又是弄饭，想方设法地留住部队派来的人，一直磨蹭到傍晚。与此同时，他们偷偷地叫另一个变节分子到邻村报信，通知土匪傍晚在宝水村子东坡埋伏，事成事不成也好有个接应。

此后，张国权又假惺惺地带领班长去东山查看坚壁在那里的物资。这时天已黄昏，班长在前面走，张国权跟在后面，最后面是张国杰。当他们三人走到村中的水泉处时，张国权突然抱住了王班长，两人一齐摔倒在路上，两人在地上滚来滚去。这时张国杰也窜上来帮忙，三个人搅在一起，但是王班长个子高大，足足近半小时，张国权和张国杰也没将八路军的班长按住。正这时，从邻村赶来接应的土匪冲到了水泉，才将王班长捆住。

这时，留在村公所杨成荣家的另一名八路军战士贾功臣，也被变节分子原村中民兵指导员梁文永等人抓住。当天晚上，王班长和贾功臣被土匪高福录、高福万、任成云带往邻村的土匪窝点。

在通过东坡去邻村的路上，贾功臣乘天黑土匪不备，挣脱了绳索逃进山岭南侧的密林之中。土匪押着人，天黑不敢追击，只好先将王班长带回交差。

贾功臣一直躲到树林深处，等到土匪走远之后，又摸黑回到了宝水村。他见村东头有一户人家还亮着灯，便悄悄翻进院里叩开了那户人家的屋门，可他哪里知道，这家正是变节分子张国义家。

见进屋的八路军战士大吃一惊，“他不是被抓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他自言自语地说，但他马上明白过来。

张国义先稳住贾功臣，安排他在家中休息，告诉他第二天送他回部队。就

在贾功臣睡熟之机，张国义悄悄地溜到村部向张国权送了信儿。第二天早上，贾功臣还未睡醒之时，又被变节分子抓住，再一次送到了邻村的土匪手中。王班长、贾功臣后被土匪送到日本鬼子盘踞的南窖据点，被日军杀害。

我八路军战士在宝水被叛徒出卖，被日寇杀害，激起了根据地军民的极大愤慨，纷纷要求严惩叛徒，为我军战士复仇。

一个月后的一天夜里，由原住九团供给部司务长王瑞高带领的八路军一个班趁黑夜悄悄地摸进了宝水村。

宝水村的叛徒们自抓捕了八路军战士后，终日惶惶不安。他们每天都悄悄地派人在村边蹲守，一连十几天，不敢大意。但是两个放哨的还是被悄悄摸进村的八路军战士在村边抓获，并把为叛徒站岗放哨的梁巨强、梁文志连夜带回野三坡军部。其余战士进村摸清情况后，指派村民王文起任村长，并由他带队逐家逐户地搜查叛变分子，但主犯张国权因先知消息逃跑到敌军据点南窖。叛徒梁文永也跑到了门头沟躲了起来，另一变节分子梁巨双当时也躲到附近的山沟里。

得知消息后，八路军战士到了梁巨双家，反复地向梁巨双的家人做工作，并说梁不是主犯，希望他坦白自首，一定能宽大处理。经过多次反复的工作，家人才同意将梁交给部队处理。当天晚上，梁巨双被抓获。经审问才知道梁是此次叛变的真正主犯。

此后，梁巨双与同时被抓获的探子任全立被押解回到河东军部，经过军事法庭审判后，由供给部移交当地转运公署处，后由公署办案机关将梁巨双押回宝水村，在村西北山坡处正法。

与其同时被抓的探子梁巨祥、梁文志因是被强迫作探子被释放，另一名探子任全立因其在村中救护一位八路军小战士，将功抵过释放。

逃到南窖据点的张国权在日本投降后偷偷回到村里，后被当地公安部门抓获，立案后被判死刑缓期执行，后病死。

事发后跑到了门头沟躲了起来的梁文永，终因惶惶不可终日，三年后重病身亡。

至此，抗日战争期间发生在宝水村的叛变事件所涉及到的变节分子全部抓捕归案，并得到应有的惩处。

原良乡县六区工作的回顾

罗玉源

1948 年底，良乡县城解放，我奉命由良乡五区武装部调到六区工作。当时区政府设在张谢村，后不久又迁到六股道村。这时正值腊月，我们一面安排驻所，一面组织群众过春节。由于刚建区，工作人员配备还不齐全，区委由我们四人组成：区委书记李洪琪（不久就调到县委工作），后任为刘吉祥，我任组织委员，史福俊任宣传委员。区长刘玉常，财粮委员申克俊，实业委员李顶荣，民政委员董明清，文教委员罗玉坦，秘书崔德信，武装部长张廷荣，妇女主任白云香，青年主任韩德瑞。

原良乡六区共辖 27 个行政村。解放初期广大群众载歌载舞，欢天喜地的欢庆解放，拥护共产党。区政府一方面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一方面为建立健全各方面的组织培养积极分子和骨干人才，为建立组织打下基础。

现在回忆起在良乡六区将近两年的工作，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是良乡刚解放，广大群众欢欣鼓舞，万民同庆，真心实意的拥护共产党，但是国民党的残余势力还在兴风作浪，社会治安还不稳定。加之待改编的傅作义部队驻在良乡六区所在地；区政府所在地处于傅作义待改编部队的包围之中，今天要粮要菜要草，明天要钱要吃的，嘴里不干不净，态度很不好，搅的区政府工作休息都不得安宁。有时区政府只能留下少数人值班，多数人到农村就住在老乡家，一方面向群众作解释工作，说明傅作义部队很快就进行改编，现在的情况是暂时的，一方面还要组织群众搞好生产，作好支援前线的工作。当时开展工作非常困难，有一次文教委员罗玉坦去大高舍村下乡，被傅作义部队给扣下了，还下了他的武器，经区县领导跟他们交涉，才被放出。

二是六区是个新解放区，时间很短，工作又紧张，区里的各项工作各个组织还不健全。当时开展工作，一开始还得依靠原来的行政组织（伪保、甲长等），我们首先对这些人进行政策教育，要他们必须执行我们的政策，绝对服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完成我们布置的各项任务。经过近一年的工作，在 1949 年 10 月以前，全区 27 个村大部建立了我们的组织，为新区土地改革培养出

一部分贫下中农骨干分子。

1949年冬，原良乡县六区27个村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全面展开。为把土改工作搞好，原通县地委还由蓟县老解放区抽调部分干部，来我们六区协助土改工作。新区的土地改革是广大贫下中农彻底翻身得解放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1950年春季，良乡六区新区的土改工作全部完成。广大贫下中农在自己新分的土地上播种，使用的是新分得的农具，精神振奋，欢天喜地地投入到农业生产运动中，为提高生产、改善生活、支援前线、支援祖国而奋斗。

1951年，根据形势的变化，原良乡县的行政区有了新的变动，我也又调到良乡二区工作了。

忆平西房良联合县妇女抗日救国会

松伟 口述 许冬梅 整理

1939年，北平西南郊的房山、良乡地区绝大部分被日伪占领，只有山区敌人不常来，以房山的堂上村为中心，建立了我们党的房良联合县县委。堂上村附近的十几个村子组成抗日一区。山区的生活非常艰苦，群众几乎没有粮食，除了极少量的玉米之外，主要是以树叶和野菜为食。当地群众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很深，妇女大部分缠足，戴大耳环；男人还有不少留着辫子和长指甲。虽然这里离北平并不远，但语言不通，有的地方山前和山后的语言都有很大差异。

由于县委刚刚建立，根据地的范围还很小，所以最初工作的重点是在一区，虽然仅有十几个村子，然而开辟工作非常艰难。每天都要翻山越岭，走门串户，向群众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动员妇女们参加抗日工作。

开始一段时间，我们的宣传在群众中并没有产生明显效果，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我们及时研究分析了情况，原来是因为我们都穿着军装，群众有些怕我们，我们说话他们也听不懂。找出原因以后，我们就换上了便衣，再次登门，并有重点地做了一些人的思想工作。有个小学教师，同这一带群众的关系很好，影响较大。我们反复地对他进行启发教育，使他懂得了抗日救国的道理，加入了抗日的队伍，同我们一起向群众宣传团结抗日的主张。我原籍吉林，“九一八”事变后，从东北逃亡到北平，就以自己亲身经历、所见所闻的大量事实，揭露日本鬼子的侵略暴行。在各种会议上，我们还给妇女唱抗日歌曲，如《五月的鲜花》、《流亡三部曲》等。唱到国土沦丧，人民惨遭涂炭的悲惨情节时，妇女们都落下热泪，台上台下一片悲泣。她们同情日寇铁蹄下的骨肉同胞，懂得了“不抗日就要当亡国奴”的道理，开始主动接近我们了，感情也越来越深。在初步发动的基础上，一区各村先后成立了村妇救会组织，由贫下中农妇女代表当主任。基层妇女组织的建立和巩固，为成立县妇救会积累了经验，创造了条件。通过反封建的宣传，大部分妇女都放了足，男人剪掉了辫子。由于妇女思想觉悟的不断提高和其他社会力量的大力支持，1939年9月，正式成立了房良县妇女抗日救国会，由我任主任，兼县大队大队长。根据党的指示，按照

“巩固发展”的原则，在一区的工作全面展开以后，又到以十渡为中心的二区做开辟工作了。为了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妇女组织在党的领导下，一方面向地主、富农宣传一致抗日的政策，动员他们减租、减息；另一方面，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加二五减租和统一累进税的工作。减租减息运动开展以后，群众生活有所改善，抗日热情更高了。在工农妇青联合组织下，群众支援前线的活动热烈地开展起来了。在四次扩军中，男青年踊跃报名，妇女们高兴地送自己的丈夫和兄弟上前线。

1939年冬天，上级下达了一项做棉军装的紧急任务，妇救会立即向各区布置，通过各区妇女组织，把各村的妇女都动员起来了。数量多，任务重，她们白天抓紧时间干，晚上在油灯下熬夜做。妇救会的干部除了完成分给自己的任务以外，还到各村去检查质量，发现不合格的军装就及时组织返工。经过妇女们的共同努力，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了这项任务，受到了上级领导的表扬。

虽然根据地是在山区，但日本鬼子的飞机也经常来轰炸。妇女们每人都有做鞋的任务，白天为了躲避敌机的轰炸，许多妇女都带着孩子拿着针线到深山沟或树林里去做鞋。那时群众生活极其艰苦。1939年夏天，拒马河发大水，两岸的庄稼几乎颗粒未收，所有的树皮、树叶也都吃光了。水退以后，群众都在河边捞小鱼、小虾充饥，一些饿急了群众，就把小鱼和蝌蚪生着吃了下去。县委也拿不出粮食来救济群众。县委书记赵然就让妇救会做了许多小油灯，底下钉上木板，天黑以后放到拒马河上。日本鬼子的飞机发现以后，以为这一片灯光是村户或有大的活动，就来轰炸。第二天早上，拒马河两岸到处是被炸死的鱼，大的有二尺多长，把这些鱼分给群众。后来我们还像这样“请”鬼子来炸了几次，缓解了群众生活上的困难。

在一、二区妇救会巩固发展的基础上，三区的妇救会工作也逐步展开。三区是以张坊为中心，地处半游击区，妇救会工作较一、二区更困难，更危险。但是，由于坚持了广泛活动、慎重发展的方针，终于打开了局面，建立了三区妇救会。从而全县的妇救会工作普遍开展起来了。

随着斗争发展的需要，妇救会逐步组建起一支由青年妇女组成的妇女基干自卫队。最初，这支队伍的任务只是做军装、军鞋、军被，参加识字班学文化和为八路军洗补军装等，以后又增加了军事训练，组织起妇女武装，担负起掩护群众，协助八路军做支前运输任务。

1940年夏季，在反“扫荡”的夺麦斗争中，男自卫队从敌占区把粮食夺回来，全部集中到大黑山。妇女基干自卫队的任务是把这批粮食经二区、三区

最后送到一区的芦子水村。为了绕过敌占区的封锁线，只能走山路，全程有二三百里。各区都组织起一百多名妇女自卫队员，沿途转送。她们背着粮食，沿着羊肠小道，不顾饥渴和劳累，不分白天和黑夜，冒着随时可能发生战斗的危险，终于将这批粮食安全送到了目的地。以后又接受了运送钢轨的任务。为了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和让我们的兵工厂能够多生产武器，男自卫队破坏敌人的铁路，把钢轨送到大黑山，妇女基干自卫队再把钢轨一根一根地送到芦子水兵工厂。

房良联合县的妇女抗日救国会在党的领导下，战胜了许多艰难险阻，积极地参加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武装斗争，做出了令人敬佩的贡献。

房山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

王硕儒

由于日本侵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的“分割”、“包围”、“封锁”和严重的自然灾害，1941年至1943年，我抗日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平西房山抗日根据地（房涞涿联合县和昌宛房联合县）地处山区，土地贫瘠，困难更大。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采取了减租减息，减轻农民负担，精兵简政，节衣缩食，开展大生产运动等各项政策和措施，渡过了难关。

为了解决吃饭穿衣问题，我房山抗日根据地从1940年开始就发动群众开荒种地。拒马河两岸村庄的军民，先后在干河口、六渡、西河村、平峪等地沿拒马河河滩开荒砌堰，利用雨季拒马河水涨时挟带的泥沙淤地造田，种植水稻。到1943年，县、区政府分别下达生产任务，要求县、区干部除领导人民生产自救外，必须实际参加生产劳动。部队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都必须开荒种地，形势开始好转。尽管日本侵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的“蚕食”、“扫荡”和“清剿”还相当残酷，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但整个局面有了很大改变。我抗日军民不是在退却，而是在正面开展反蚕食、反扫荡的同时，在敌后广泛地建立起隐蔽的或公开的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政权，仅我平西地区就恢复和开辟了200多个村庄。

1944年，我抗日根据地对日本在华侵略军开始了局部反攻。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同年2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做出《对1944年边区形势与政府工作方针的决定》，强调以强化对敌斗争，开展大生产运动，以深入整风和反法西斯教育为中心任务。为了全面贯彻边区的《决定》，房山抗日根据地积极强化对敌斗争，把大生产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这次大生产运动最大的特点是：将全县的人力畜力组织起来，开展生产互助。组织起来的形式是组织价工组（或称价工队），特别是缺少劳动力的农户，在自愿互利的前提下自由组合，每组人数多少不等。一村多组的村，有的还组织了价工队，但农活还是由组安排。农活安排的先后由集体商讨决定。谁家用了多少个工，年终齐工找价或转入下年。价工组的出现，克服了许多人力畜力缺乏的困难，受到了群

众广泛的欢迎。据统计，当年农村组织起来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 46%。

大生产运动，扩大了耕地种植面积，增产了粮食。由于价工组的成立，克服了人力畜力不足的困难，大部分土地不耕而种的现象不存在了，而且精耕细作，增施肥料，修梯田，垒石埝，增加耕地面积，及时中耕锄草，加强田间管理。往年锄地多则两遍，这一年不仅锄过 3 遍，而且节省了许多人力，全力开荒种地。秋林铺村开垦荒地 400 余亩，种上谷子、山药、荞麦、秋菜等。鸳鸯水村价工组除正常生产外，集体开了很多荒地，约可增收粮食 30 多石。曹家房村有个价工组都是无男劳力的，叫做寡妇组，到 8 月份，全组所有土地都锄过两遍，而且集体开垦荒地 1 亩多，种上谷子，长势很好。中山村在锄地时提出：大安山小区女劳力去锄地，男劳力每人开荒 5 分，种萝卜、种菜。驻秋林铺村的部队，集体开荒种土豆，每沟收获一、两千斤。各群众团体都通过集体开荒解决本组织的需要。各村抗联集体开荒解决了团体的经费需要。民兵在开荒中解决了民兵战粮的多数。金鸡台村 21 名童子军开生荒地 6 亩，种上大麻籽，收获归了学校，解决了会费问题。粗略统计，除部队外，全县新开生荒约 5000 亩，产粮约 4000 余石，为我抗日根据地解决了大问题。

价工组的成立，实行集体生产互助，多人在一起劳动，谁都不甘落后，充分发挥了每个劳动力的干劲。堂上村有一户没有男劳力，用着一个做活的耕种全家的土地，因就一个人干活，劳动效率很低。组织价工组以后，这户参加了价工组。因多人在一起干活，速度快多了，仅这一户的耕地就省下 6 个工时。组织价工组，有些过去很少参加劳动的人都参加了生产。曹家房村有个人称“懒汉”的人，过去很少参加劳动，组织价工组后，他号召组里成员早起晚归，哪个成员不早起他就到户内去叫。他说：“咱要争口气，别让村干部批评咱们。”堂上村有个人过去从不劳动，1943 年挨了饿，成立价工组时，开始没有人要他，后来他请出保人担保，才参加了价工组。史家营村有个人好吃懒做出了名，区抗联干部下乡批评了他。他说：“我今年保证不懒了，而且还要做出成绩来。”他参加了价工组，真的勤劳了。

由于战争环境，青壮年男劳力大部分参加了民兵组织，肩负保卫根据地和支援前线的任务，而农业生产任务大部分由女劳力承担。因而组织妇女参加田间劳动，是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重要内容。曹家房村在自愿互助的原则下，组织几个价工组，其中有个寡妇组，经过几次改组而这个寡妇组始终未改。往年，几个寡妇家的土地都是雇人耕种，1944 年成立价工组后，寡妇组不仅种完自家的土地，还集体开垦生荒地。二区中山村，开春时就一名妇女背粪往地里上

肥，后来几个妇女成立了价工组，几个妇女一起劳动，热情高了，干劲大了，速度快了许多，带动了全村妇女参加劳动。有个5名妇女参加的价工组，由1人在家给全组人做饭，其余4名参加田间劳动。全村妇女送肥280篓，收拾耕地290亩，节省许多男劳力从事其他生产。蒲洼村有一户无男劳力，过去都是靠雇人种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后，发动妇女参加田间劳动，这户的土地由妇女自己种了，不但种得好，还开垦了3亩生荒地。在大生产的号召下，一般男女劳力都动员到生产上去了，尤其是上层妇女，过去没有上过地，现在也参加了生产。

由于处于战争环境，随时准备迎击敌人的进犯，我根据地的农业生产实行劳武结合。特别是靠近敌占区的村庄，民兵都是一手拿锄，一手拿枪，平时生产劳动，敌人来了就去迎击敌人。长操村设有敌人的据点，驻有日伪军。贾峪口村靠近长操，经常有日伪军出没。因此，靠近长操村的土地，让民兵去种，距长操村较远的民兵家的土地由妇女和老少耕种。既没有荒废土地，又保卫了根据地的安全。驻莲花庵村一带的八路军，除部分连队在根据地边缘担任警戒外，从团长、政委到战士，人人上山开荒种地，同时发展各种副业。驻森水村一带的九团，组织30多人的开荒团上山开荒。军民合力开荒种地，呈现出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

组织价工组，增强了人与人相互之间的团结。在生产上各有所长，在价工组中可以互相取长补短。曹家房村有个木工，具有一身好手艺，木匠活做得特别好，就是没干过农活。动员他参加田间劳动时，他说想干就是不会干，他的邻居说：“不会不要紧，跟我在一起，我垒石埝你填槽，慢慢就学会了。”事后，他成了一个农业生产上的全面手。中山村妇女价工组，有两家因病不能劳动，村妇救会主任带价工组先将这两户土地给锄了，两家病人很受感动，他们说：“八路军的办法就是好，我生了病，可土地比别家锄的还早。”年终，因不能还工了，齐工后，给了村妇救会主任1件衣料，双方都很高兴。有一户原来婆媳不和，常发生纠纷。开展大生产运动后，婆媳进行分工，婆婆在家做饭、做家务活，儿媳下田参加劳动，互相帮助，不仅不再发生纠纷，而且还互相鼓励。还有的户在生产上男女分工，女的种熟地，男的开荒地。

开展大生产运动，所有的人都投身到生产战线。党政军民各机关的工作人员，不仅领导生产。而且亲自参加生产，干群关系更密切了，而且都得到了实惠。群众普遍反映说：“共产党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真神了。不说别的，就说开荒地吧，哪儿都长得那么好的庄稼，种什么，收什么，真是好年景。”

良乡县民兵团建立始末

张成基

1947年下半年，根据国内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上级决定良乡县要建立一个民兵团，以配合大兵团作战。12月24日县委开会，决定成立民兵团。根据上级指示，民兵团长由县武装部正、副部长担任，政委由县委副书记或部长担任。因良乡县地处前沿，对敌斗争任务很重，县里主要领导不能带民兵出外作战，上级同意选够条件的人担任团的领导。团部由五人组成，团长由良乡县五区大队长张九清担任，政委由五区组织委员张成基担任，副政委由五区公安助理张成董担任，参谋长由县武装部作战参谋付全才担任。同时，配粮食局一般干部牛助国专管粮食。

这个团编制较大，全团要编六个连，外加两个排、两个班，全团要1030人，一个连要150人。连队的编制由县武装部定，该团内抽调的干部，由县委组织部办理手续。县武装部于12月25日召集民兵团干部开会，首先选出连长。连队定了，一切工作就好开展了。

一连长马振杉，陈家台村人，在部队当过连长，指挥作战能力强，在地方指挥民兵也有方法，这连民兵由陈家台村出。陈家台是个七百来户的村子。一个村子就够一连民兵数了。二连长王国连，北安村人，几年来他带领民兵很有方法。民兵出在北安和西安两个村。三连长李万泰，是五区生产助理，民兵由东、西班各庄两村组成。四连长赵国荣，是三区公安助理。民兵由河北、河南、李各庄、檀木港四个村子组成。五连长刘庆瑞，县武装部干事，由他带东庄子、河东、三福村、黄土坡四个村的民兵。六连长陈存，南窖村人，由他带南窖一个村民兵。另外编制两个排，即通讯排、警卫排；两个班，即伙食班、卫生班。李忠，陈家坟村人，任通讯排排长，编制50人，人员由陈家坟、北峪两个村组成，任务是传达团部命令。史福俊，石板房村人，任警卫排排长，人员由石板房、贾峪口两个村组成，任务是担任全团警戒。田德清，南窖村人，伙食班班长，编制12人，都出在南窖村，负责团部吃饭。徐国兰，长操村人，卫生班班长，编制12人，人员以长操为主，又从其它村选出几个懂医术的人。

25日晚，县武装部召开连长会，要求各连在26、27日两天时间，以班为单位，把每个队员调查好，必须是政治、身体、思想都好的。凡不够条件、身体弱的都要换掉。每班12人，每排3个班，每连4个排，每连要有150人。各连组建完后，以连队为单位召开了成立大会。

29日，全团集中在上水峪村小学操场开会，由政委张成基主持会议，团长张九清做报告。报告的要点是：第一、我们民兵团已经正式成立了，这是全团召开的第一次大会，是我们全体成员一段光荣历史的开始，我们要牢牢记住1947年12月29日这个不平凡的日子。第二、我们民兵团要整编制地外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我们也就成了部队。今后，要和部队一样，要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一切行动听指挥，不能搞自由主义。第三、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我们人多，吃住条件都不会很好，自己要注意，要在可能的条件下，尽量把生活搞好。第四、要加强纪律性，一切行动听指挥。

大会结束后，民兵团立即出发去霞云岭待命。民兵团过水峪村、大草岭，很顺利到达霞云岭。

30日早饭后，民兵团经过四合村，过佛爷岭、东关上、大峪沟、南白岱，驻扎在张坊村。团长张九清、政委张成基、副政委张成董前往龙安村民兵司令部报到，向司令员、平西专员高振德汇报了良乡民兵团组建的经过。

高振德司令员讲，第一、良乡民兵团编制很好，来的也很及时，希望你们配合作战时要勇往直前，多立战功。第二、当地涞涿县是个小县，组织不了民兵团，他们只组织了一个连，由你们领导。这样你们团就有7个连。第三、民兵团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我独立四旅、独立一团和独立二团开展活动。第四、主要任务是破坏敌人的交通线，这次要把长辛店至汉口这条平汉铁路来个“大翻身”。第五、最近国民党华北兵团认为晋察冀、平西地区的部队太多，对他们不利，企图集中十个团的兵力，围剿我们。我们要集中兵力给他来个反包围战，共同努力歼灭这部分敌人。第六、冬季作战，天气很冷。民兵穿的很单薄，多年的封锁，买不来布，很困难，但不能让战士们挨冻。第七、要加强群众纪律教育，不能脱离群众，要使群众拥护我们。第八、由柳长青、赵永存负责司令部和良乡民兵团联络。

我们回到团部后，立即召集连、排、班长开会，传达了高司令的指示。从此，新建立的良乡县民兵团开始了她神圣的使命。

蒲洼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卓成栋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开始全面进攻中国。面对国家存亡的生死关头，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抗日军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深入敌后，建立广阔的抗日根据地。当时，宋时轮、邓华率领八路军一部挺进平西，开辟平西抗日根据地，建立房良抗日联合县政府，拉开了这里军民齐心协力抗战的序幕。

1938年5月房良联合县政府在长操正式成立，县委书记郭强，县长杜伯华，组织部长赵然，宣传部长付伯英，妇救会主任松伟。县政府机构健全，分设民、财、实、教、粮五科，根据地下辖河北至东村等29个村庄。

为了扩大根据地，房良联合县的领导郭强、赵然、松伟等在蒲洼地区的七八个自然村中，均留下了他们革命的足迹。

同年春，宋邓支队奉命挺进冀东，平西由五支队接防。八路军总部又派五支队来到平西，与房良联合县政府的主要领导郭强、赵然、松伟等同志汇合后，商讨根据地建设和发展大事。他们率先来到蒲洼地区，随即组织召集地区部分上层人物和进步的知识分子、革命青年开会。赵然等同志作了重要报告，报告着重讲解了当前抗日战场的形势，全民动员抗日救国的道理，唤醒广大民众行动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发展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斗争。

在五支队来蒲洼地区阻击日寇向平西地区的进犯，并在蒲洼地区驻扎，帮助地区进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对地区抗日工作的开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为根据地的开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同年十月邓宋支队返回平西。此后，地区内抗日支前活动高涨，人民踊跃参军，抗日武装蜂起。当时蒲洼、十渡地区民间自发组织成立的“六山会”的一百多名成员，也被收编到八路军九团三营。

这次会议是蒲洼地区抗日斗争的一次新的转折，会后地区的一些大村都积极地行动起来。1938年底，联合县委书记赵然在蒲洼村发展了秘密党员晋耀臣、晋国禄、隗有生等。

1939年初村民晋显汉入党。3月，赵然再次来到蒲洼村，并参加了蒲洼

地区第一个党支部——蒲洼村党支部的成立大会。这是一次在蒲洼地区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在蒲洼村东台的大东屋进行，由县委书记赵然亲自主持了会议，并宣布，蒲洼村党支部正式成立。从此，这块土地上有了我党自己的基层党组织，开辟了蒲洼地区建党的先河。这个党支部由 1938 年 11 月入党的蒲洼村民晋国禄任支部书记，晋显汉任宣传委员，隗有生任组织委员。此后，党的工作便在蒲洼村秘密地进行着。1939 年 9 月由松伟介绍晋显汉的妻子史凤婷入党。同年底蒲洼村已发展了党员十余名，党的各项工作都在村中有组织地开展起来。

同年，村子又成立了妇救会，史凤婷任主任。16 岁以上青年组织了青救会，参加人数为 40 至 50 人，晋显政为主任，带领青年成员站岗放哨，盘查进入根据地的行人和客商，严防特务和汉奸进入根据地破坏。在村青救会基础上，蒲洼村开始建立了自己的民兵组织，当时又称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青抗先）。

与此同时，在 1938 年 2 月，郭强化装成货郎又来到了蒲洼地区的东村，在村中结识了村民隗甫森，并将隗甫森发展成秘密党员。后在隗甫森的联络和努力工作下，先后又发展了村民李甫奎、隗有忠等人。在东村组建了一个秘密的党小组。此后郭强又在芦子水、鱼斗泉发展了党员隗永科等。

1938 年底至 1939 年，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蒲洼地区的地下党组织已逐渐建立。除蒲洼村外，东村、芦子水、鱼斗泉、宝水等村党支部也相继建立起来。到 1940 年，蒲洼地区的主要村落，已全部在我党的领导下开展抗日工作。至此，蒲洼大部分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也初见端倪，成为平西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根据地东方的前哨。

蒲洼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为我军民抗日斗争创造了很多有利的条件。根据地人民为我八路军做了大量的支前工作，一些年青人入伍参军，一些优秀的党的积极分子在这块土地上浴血奋战，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如根据地人民组建的抗日宣传队，在平西地区更是留下了闪光的足迹。到 1939 年，蒲洼地区组织的抗日救国宣传队人数多达百人。他们一方面广泛向人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另一方面配合八路军在平西地区与日寇作战，为根据地的建设和扩大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抗日根据地蒲洼地区的军民，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中，始终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当时平西抗日根据地的边界东到十渡、马安，西到涑水、易县一线，向北可达百花山、灵山一线，向南可达野三坡、紫荆关，这一阔大的区域正处于晋

察冀边区抗战前沿的主要战略位置之上。在此开辟根据地，东可直接挺进冀东，深入敌人腹地；南又可和冀中根据地相呼应，同时也成为抗日军民向日寇斗争的桥头堡，而蒲洼地区恰恰是根据地的东线前沿。

随着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扩大，日寇把根据地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多次组织力量对平西根据地进行扫荡，尤以1940年的大扫荡特别惨烈。此次大扫荡日寇组织了7000余名日伪军，分十路向我平西根据地进犯，其中有两路日伪军直接进入大安山、柳林水、蒲洼地区宝水、东村一线。此间，蒲洼人民也同根据地军民一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日寇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如蒲洼村的晋耀臣同志，1938年由赵然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1939年至1940年，先后担任房良联合县三区、七区、一区、九区区委书记，哪里危险艰苦哪里去，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面对敌人的残酷扫荡英勇顽强浴血斗争，为根据地的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在1944年4月的一次外出开展工作时不幸被捕，面对敌人惨无人道的迫害视死如归，牺牲时年仅28岁。

抗日战争期间，蒲洼地区先后有32名党员和干部，在深入敌后作战中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正是由于这些革命志士和根据地人民不屈不挠地斗争，才使平西抗日根据地及蒲洼地区不断巩固发展和扩大。

1939至1940年，随着芦子水村、宝水村、东村党支部的建立与完善，各村民兵组织相继成立。到1939年蒲洼大部分地区的村级党组织、民兵组织及支前组织逐步完善，并形成根据地中心区的整体优势。

随着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兴起，巩固了根据地的建设，振奋了前方军民抗战的斗志，当时在蒲洼地区就掀起了参军支前热潮，涌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如在蒲洼地区东南大山之后的森水村，自发地组织起担架队、运粮队、缝纫组，全力支援八路军前方打击日寇。

森水村的担架队由本村的青壮年男性村民参加，负责战场抢救伤病员，然后运送回森水的后方卫生部治疗。当时的富合村就曾有一大批八路军伤病员在此养伤治疗，伤愈后由森水返回部队。

森水的运输队的任务主要是为前方的抗日部队运送粮食和弹药，以保障部队在战斗中保持旺盛的战斗力的。

森水村的缝纫组则是组织全村的妇女为部队赶制服装和军鞋及相关用品。当时是部队将制做任务分别下达到各村，由村党支部组织人力进行突击抢做，以不误战士前方使用，保证了部队的军需物资的供应。

1940年间，地处百花山脚的宝水村，八路军九团的供给部设在这里，下

设被服厂、运输队。供给部办公室设在梁济中家，伙房设在梁文章家。供给部保护排负责全部的保卫任务。运输队设在宝水村南，被服厂设在村北头。1939至1940年在芦子水村建立了兵工厂（炸弹厂），隶属晋察冀军区生产管理处。宝水的供给部运输队就负责将兵工厂生产的弹药、被服厂生产的军需物资，经供给部发往前方作战的八路军。到1940年供给部在宝水村人员最多时超过了80人。那时蒲洼地区成了抗日前线的大后方，很多物资都是由这里发往前线的。难怪和当地65岁以上的老人谈起抗日战争那段日子，他们几乎都为前方送过物资、出过民工、支过前线。

1937至1940年是蒲洼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阶段。这一时期根据地的军民抗日的情绪高涨，边区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各级抗日组织和群众团体相继完善和健全，为前方抗战提供了必要的保障，为战胜日寇、粉碎敌人的扫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六年政协工作的回顾

张本荣 口述 张玉泉 整理

房山县政协是从 1979 年开始，经过充分的酝酿协商筹备，于 1981 年 3 月正式建立的。

从 1981 年至 1987 年原房山县政协从成立到“两撤一建”（即撤销房山县和燕山区，建立房山区），走过了从筹建、建立健全机构到逐步完善并发挥政协职能作用的过程。

房山县政协是怎样建立的

1983 年以前，我任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并兼机关党委书记等职务，分管统战工作。1979 年 3 月初，我参加了北京市民族工作会议。时任北京市民委主任的王续东同志问我：“房山有政协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为什么不建政协？成立政协，可以更好地落实党的统战政策，进一步做好统战工作。”回到县里，我向县委书记李平作了汇报。他说，可以在书记碰头会上议一议（当时县委副书记有吕镒、张革夫、姜永刚、张成基四人）。经过几次书记会研究后，在常委会上做出建立政协和恢复县委统战部的决定。

从 1980 年初开始筹备组织政协工作，当初只抽出了一名干部即当时人防办公室副主任张秉章来做具体筹备工作。为了工作方便，让他挂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的职务。主要任务是先下去进行房山非农业人口所占的比重、少数民族及人数、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数、港澳同胞及海外侨胞人数等方面的调查。调查结果表明，非农业人口占全县人口总数不足百分之二十四，按当时规定，县成立政协非农业人口必须达到百分之二十四以上。那时燕山石化公司只是在房山境内一个企业，还没有单独建立行政区划。北京市召开人民代表会时燕山编入房山县一个代表团，按规定建立政协是以人民代表团为单位，所以燕山地区的非农业人口应加进去，这样非农业人口总数绰绰有余了。

在此期间，我就县政协机构、人选、委员数额、性别和比例以及统战部的

恢复、产生办法等一系列问题和筹备情况先后六次去市委统战部汇报。市委统战部同意后报市委，于1981年初正式批准房山县建立政协机构。

1981年3月经过一番紧张地准备，房山县政协正式成立了。由张成基同志兼任主席、王新华任副主席（驻会），李希良任副主席兼秘书长（当时兼任县委统战部长）。我兼副主席、任政协党组副书记，实际承担着政协的全面领导工作。

县政协建立后遇到的问题

房山县政协组织建立后，遇到的问题很多。首先是认识问题，政协是干什么的，建它有什么用。况且现在还精简机构，人们在观望，不少人也包括县委的部分领导存在疑惑。因此以后的工作中，不可能没有阻力。就在县政协建立的同时，也恢复了县委统战部。这在县委机构中出现了一个新形势，并不断出现不协调的现象。如原来统战工作都分别由组宣部代管，这样一来会有一段不协调的过程，需要及时加以调整。上面说到的那些疑惑，只能通过以后的政协工作实践逐步认识，它所起到的作用是任何部门替代不了的。

其二，由于县政协一届委员会才刚刚建立，工作缺乏经验，加上驻会副主席之间，副主席与秘书长之间，分工不够明确。彼此之间又通气少，加上县委让我主抓，又抓得不那么及时具体，所以需要不断解决矛盾，疏理关系，因而使政协工作正常开展受到一定影响。

其三，因白手起家，又是新增机构，主要是人们对政协的认识不够，开展工作困难较多，办公地点和办公设备也都非常简陋。之后解决了办公地点（尽管很挤），就连必要的办公用品，因财力紧张都不能及时批复。特别是交通工具，市里给配备的一辆上海轿车、一辆工具车，县里还把工具车收了。四大部门之一的政协只有一辆车，这时政协工作的开展还有不少的困难。

随着整个形势的发展，房山县政协工作开始逐渐走上了正常的工作轨道，通过实践不断摸索前进，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为以后的工作顺利开展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第二届政协工作出现新局面

1984年3月，房山县第一届政协届满。11月，市委决定将我由县委正式

调到县政协，驻会专任主席职务。经过一系列的筹备工作，房山县第二届政协换届大会延迟到 1984 年 5 月才正式召开。

从 1984 年 5 月至 1987 年年底，我集中精力抓政协工作，政协的工作也不断出现一些新局面。现在回忆起来，这三年中“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委员们为房山县的两个文明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通过考察、视察、走访、咨询服务，解决了很多疑难问题，受到了当时县委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好评。

首先抓了落实党的统战政策及民族政策工作。由于多年极左路线的干扰，当时房山县的统战工作同样受到巨大损失。政协一建立，首先协助有关部门做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工作，包括知识分子政策，对台胞台属及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侨务政策及民族宗教政策等。如台属李敏仙，当时六十余岁，早年就读于天津女子中学。因其哥哥居于台湾，文革中不仅她受到牵连，连其爱人也被开除党籍，一家人处在贫病交加的境地。针对这一情况，县政协大胆地给她落实政策，如给她安排工作，帮助治病，使她很快摆脱了困境。又如原居于马来西亚的归侨黄锦茂。当共和国成立的当天，天安门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时，他和所在学校的几个同学也升起五星红旗，却被英殖民当局拘捕，后逃出，辗转回到祖国，被分到房山某中学任教。谁曾想就是这样一个赤子之心的热血青年竟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遭劫难。尽管如此他对党仍是一片赤诚的心，他每年都向党交一份申请书。我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曾亲自找他阐明党的政策，并找有关部门给他解决住房，安排工作。后又提任了房山县人大副主任职务，并于 1983 年调市任北京市侨办副主任。调任前县委破例发展他为共产党员。还有国民党少将高参刘建廷，属起义人员，当时在长阳农场劳动，他与溥仪之弟溥杰有关系，是统战对象。为了给他落实政策，我跑了数次市委统战部，开始安排他为县政协常委，后又任房山县、区人大常委会委员。仅从这几个例子中可以看出，政协和统战工作对全县的影响之大。

再如二届县政协委员戴富，在政协的直接帮助下，于 1984 年在良乡镇办起了电器安装公司，仅两年时间即为国家和集体创造五十二万元的经济效益，现在已发展成同行业的中等企业。据此，当时县政协就向县委、县政府提出了“解放思想，打破常规，大胆引进和起用有技术专长人才”的提案，受到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并认真采纳，从而也从另一方面调动了政协建言献策的积极性。

房山县第二届政协工作日趋活跃，也受到了市政协的关注和高度重视。

1985年初，西藏自治区统战工作代表团到北京市参观学习，市政协推荐我代表郊区县介绍我县政协工作经验。1985年12月，我参加了北京市建国以来统战系统召开的首次群英会。这是在市委直接领导下，由市政协、市委统战部、各民主党派以及各有关单位等共同筹建的，在全部的筹建工作中我都参加了。全市筹备委员会委员共13名，大会主席团共30名，我都列为成员之一。1986年初全国政协召开政协地方工作会，市政协推荐房山县政协做为郊区政协工作先进县（东城区做为先进城区代表）出席了大会。会议结束后市政协召开全市工作会议，市政协副主席甘英同志主持。会上，我以谈体会的形式向大会传达全国政协地方工作会议精神。随后，不少区县来房山学习。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都曾来房山政协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党和国家领导人关怀琉璃河水泥厂二三事

王 良

1939年建厂的琉璃河水泥厂，如今已成为北京市一个现代化的大型水泥企业。每当看到琉璃河水泥厂的发展变化，职工们特别是曾经亲耳聆听老一辈革命家教诲的离退休老同志，无不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他们对琉璃河水泥厂寄予的深切关怀和殷切希望。往事历历在目，尤如昨天。

1949年5月25日，朱德总司令来到了琉璃河水泥厂。这天早晨，朱德等领导同志（陪同的有康克清、刘宁一等）乘火车到琉璃河车站。下车步行到工厂门口，门卫不认识，不让进。便在门外停留一会儿，后来才请到办公室，军代表田光璧向总司令汇报了工厂的情况。总司令到各个车间参观，看望工人。这时，工人听到总司令来了，都来看望。朱总司令向工人们问寒问暖，并向聚拢来的工人讲话。要求工人当家作主，国家建设需要水泥，要尽快把水泥生产搞上去。这件事极大地鼓舞了全厂职工。党和国家这么高的领导人对普通工人这样的亲切，这样的关怀，是长期饱受反动统治，做牛做马的工人做梦也想不到的。因此，工人们由内心迸发出来的热爱党、热爱党的干部的强烈感情和革命的积极性，成为工厂恢复生产的强大力量。

1955年5月29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同志视察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以后，乘火车来到琉璃河水泥厂视察。领导同志到车间和工人见了面。刘少奇、朱德、林伯渠听取了党总支书记范霄峰、厂长袁功庭和总工程师郑孟荷等同志的汇报，对工厂的生产和职工生活做了重要指示。朱德同志还清楚地记得他在1949年5月第一次来厂时回转窑的小时产量是4吨，当总工程师郑孟荷向他汇报现已达到6吨时，他表示赞许。中央领导同志的来厂视察，再次鼓舞了职工的士气，大家以创记录、夺高产来回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琉璃河水泥厂的关怀。

1953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一五”计划开始的第一年很不顺利，琉璃河水泥厂上半年没有完成任务。这主要是计划制订偏高，没有留有余地；制定的指标，许多是虽已达到过，但尚未巩固的高指标，没有群众基础。在这

个问题上该厂与上级机关有不同看法。《工人日报》还刊登了“不是指标过高，而是思想保守”的批评稿件。职工情绪低落，认为反正怎么干也完不成计划，积极性受到影响，生产相当被动。

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彭真和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及市委工业部副部长陆禹来厂视察，到车间看望工人，对厂的生产、环境及职工生活十分关注。此时，厂长袁功庭、副厂长徐翔向彭真汇报了生产的被动情况。对此，彭真十分重视，指示有关部门研究。不久，重工业部建筑材料管理局筹备组长杨思九带工作组下厂，组织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多次研究，重新修改生产指标和生产计划。与此相对应，厂党、政、工、团各级组织在大抓扩建的同时组织职工进行劳动竞赛，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推广先进技术等，进一步挖掘生产潜力，提前完成了1953年的生产计划。

1959年9月，彭真第二次来琉璃河水泥厂视察。党委书记范霄峰、厂长王文庆汇报了工作。彭真同志对生产发展、粉尘治理、职工生活等工作甚为关切。当彭真从生产区到生活区过铁路道口时，发现火车停在道口，职工上下班非常不便，指示应修建过路天桥。贾庭三、陆禹同志向北京铁路局转达了彭真同志的意见。铁路部门很快派人勘测。1960年建起了一座横跨京广铁路的天桥，方便了职工上下班。

房山县法院复查“文革”案件情况纪实

宋 湘

错误地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和国家造成了空前的灾难。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百废待兴，拨乱反正成为全党、全国的首要任务；复查平反大量的冤假错案则是拨乱反正的重要内容。

1978年5月至1980年6月，全国、全市各级法院开展了复查“文革”10年及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判处的反革命案件和普通刑事案件的工作。这是人民法院历史上为期最长、规模最大、工作量最多的一次复查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笔者当时在房山县人民法院先后任审判员、办公室主任、党组成员、副院长，参与了复查工作的全过程。

复查工作进度

根据1978年春第8次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精神和市委、市法院的部署，1978年5月复查工作开始。由于“文革”10年的禁锢，人们的思想解放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复查工作也有一个由浅而深的进程。

1978年5月中旬，房山县法院抽出6名审判人员，由一名副院长主管，组成专门复查班子，开始复查1966年至1977年11年间判处的反革命案件和1976年下半年判处的“破坏抗震”（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区发生7.8级大地震，波及北京地区，损失严重。此后3个月左右全民进行防震抗震）案件。是为第一轮复查。

1979年初，复查组增至14人。对已复查过但限于第一轮复查时的认识水平应予平反未能平反的和新找到的反革命案件进行第二轮复查。反革命案件复查工作至1979年6月基本告一段落。

1980年上半年，贯彻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精神，专门复查因刘少奇同志遭诬陷而受株连的案件，对全部已复查过的反革命案件

再次进行了复查。是为第三轮复查。

1979年8月，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开始复查“文革”中判处的全部普通刑事案件。全院干警除坚持日常工作外，全力以赴投入此项工作。因工作量大，任务艰巨，9月初县委从县直各机关抽调27名干部到法院协助复查工作。此后一段时间是复查工作最为紧张、繁忙的一个阶段。到1980年6月底复查工作基本结束。法院正式建立申诉庭，当事人申诉即予受理，申诉复查转为日常工作。

复查工作方法

复查案件的方法是：普面复查（无论当事人有无申诉），逐案汇报；集体研究，统一认识；分类排队，确定重点；组织力量，调查走访；请示上级，落实政策。

以第一轮（1978年5月至1978年底）复查为例。第一步，首先组织审判人员学习中央、市院文件，解放思想；然后把全部反革命案卷调出，审判人员分工阅卷，从中发现问题，提出复查意见，向审判委员会汇报。第二步，首先将初步认为可能是冤假错案的案件向市法院领导作口头汇报；然后抽出6名审判人员，由一名副院长主管，组成专门班子，进一步阅卷。把属于冤假错案应予平反纠正的案件列为重点；把现在仍在服刑应立即放人的列为急案；有计划地深入原单位和群众中开展调查。第三步，经审判委员会逐案研究，提出改判意见，向县委、市院文字汇报，审批后进行改判，落实政策。

以后第二轮、第三轮复查反革命案件，复查“破坏抗震”案件，以及全面复查普通刑事案件大体上也是采取上述方法。

复查的方针政策

1978年5月复查工作开始时，上级只有一个“复查‘文革’中判处的全部反革命案件，平反、纠正一切冤假错案”的总的精神，尚无具体的政策界限规定。随着复查工作的深入，思路逐渐明确，具体政策界限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坚持一条原则，即实事求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是实事求是原则的集中体现。当前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鼓起“有错必纠”的勇气，特别注意克服“宁左勿右”的情绪。确属冤案要敢于昭雪，错案要敢于纠正，全错全平，部分错部

分平，不抓辫子，不留尾巴。

冤假错案的政策界限：

冤案：因纯属反林彪、“四人帮”而被关押判刑的；因事实黑白颠倒，或无中生有、捏造罪名而被关押判刑的；虽有一般缺点、错误，但不构成原则性的、政治性的错误，更不构成犯罪而被关押判刑的。定为冤案应予平反恢复名誉，补发被关押期间的工资。如原小学教师张×（男，复查时年 55 岁），1958 年错划为右派分子，1962 年摘掉帽子。“文革”初期曾对运动加以评论，如说：“说是‘要文斗，不要武斗’，又说‘文攻武卫’，武斗闹得不好收拾了，工农业都减产了。”1967 年 12 月 14 日被逮捕，认定“恶毒诬蔑攻击领袖和江青”，以“现行反革命”判处徒刑 10 年，剥夺政治权利 3 年，复查时已刑满回村。复查认为：被告之言论完全是对江青挑动全国性武斗而不满，决非反革命，原判纯属冤案。复查改判宣告无罪，平反后安排工作，补发工资。

错案：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定反革命罪欠妥，但又确有较严重的政治错误，不属于冤狱，按复查当时的政策精神，定为错案。对于错案，应撤销原判，重新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关押期间不补发工资，生活困难者酌情予以补助。

复查的结果

全部反革命案件经过第一轮、第二轮复查，到 1979 年 6 月底累计复查 80 件，其中平反纠正冤假错案 51 件，占复查总数的 63.8%。1980 年上半年专项复查因刘少奇同志遭诬陷而受株连的案件（即第三轮复查）中，发现有关此类案件 8 件，在第一、二轮复查中已予平反纠正。

在第一轮复查反革命案件的同时，复查了 1976 年抗震期间处理的“破坏抗震”案件 9 件，其中有问题的 8 件，复查后宣告无罪 1 人，免于刑事处分 3 人，减轻刑罚 4 人。

“文革”10 年及 1977 年房山县法院处理普通刑事案件 942 件，除中止、撤诉、外转的以外，截至 1979 年底复查结案 788 件。其中，改判宣告无罪 9 件，不负刑事责任 1 件，不予刑事处分 3 件，免于刑事处分 15 件，减轻刑罚 43 件，改变定性 5 件；以上 6 项属于冤假错案共 76 件，占复查总数的 9.65%。

深刻的教训

十年“文革”是党和国家的一场浩劫，也给法院系统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建国建院以来，特别是1957年整风反右、1958年大跃进以后，由于“左”的错误，历次政治运动都曾出现一些冤假错案，但远不及“文革”十年数量之多，比重之大，情况之严重，影响之恶劣。回顾那十年，许多荒诞不经的事情真实地发生了，给人民法院历史上留下了惨痛的教训。

林彪、“四人帮”为了实现篡党夺权的目的，“砸烂公检法”，把政法机关从政治上搞臭，思想上搞乱，组织上搞垮，业务上搞掉，成了他们的重要手段。“文革”开始，房山法院带“长”字的领导干部（院长鲁敏生，副院长曲珣，副庭长常彬）全部被打成“走资派”“三反分子”而揪斗、罢官，一般干警也被诬蔑为“没有一个人”，有的被迫自杀，有的被打成反革命，有的被认为是“修正主义黑苗子”而遭批判。1968年2月，政法机关实行“军管”，成立了“公检法军管会”，检察院与法院合并（检察机关的职能从此名存实亡），成立了“检法军管小组”。检法两院干警共30人，经过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整党，80%的人被赶出法院，下放农村、“五七农场”劳动改造。检法两院从组织上被基本砸烂。“军管”人员虽然都是解放军中的很好的官兵，但他们根本不懂政法业务，被仓促派来“军管”，又执行了“四人帮”的爪牙谢富治（当时的公安部长）、刘传新（当时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市公安局长）推行的极“左”路线，从而干了不少蠢事。房山县法院建国前至“文革”二十多年的文书档案数百册，竟被他们认为是“没用的废物”，装上麻袋拉到燕京造纸厂。从此房山法院“文革”前的历史再也无从查考，造成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

建国以后，国家法制建设逐步进行，到“文革”时还很不完备。即使这还不完备的法制，也被林彪、“四人帮”诬蔑为“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搬来的”，审判程序、规章制度“都是修正主义的”，“需要彻底砸烂”。“文革”中的反革命案件多是造反派扭送，或基层组织举报、扭送来的，《逮捕拘留条例》被完全废止。无手续押人，以拘代捕，长期拘留不审不判是普遍现象。有的既无内部审批手续，也无对外宣布的手续，却将人长期拘押起来。刘××（女）、韩××（女）两案，内部批示刑事拘留10天，却被拘押了半年以上。案件到了公安局，由军管会分派，一部分由公安局直接审判，法院只起盖章作用。一部分交法院办理的，也没有审判员、书记员之分，没有开庭审理的程序。

因此，有的案件没有起诉书，案子不知从何而来。有的案卷从头至尾没有主办人姓名，不知何人所判。有的只有预审卷，没有审判卷；有的只有审判卷，没有预审卷；有的预审、审判卷全无下落。人民陪审员制度也被取消。审案时承办人“自拉自唱（自己审自己记）”，无人支持公诉，无人出庭辩护。对未成年人的审判没有监护人到庭。一审终结，不准上诉，也是“军管”期间的“特殊规定”；法律规定的“两审终审制”完全遭到破坏。判处反革命案件本应援引《惩治反革命条例》，做为定罪量刑的依据，然而各项法律法规既然已被诬蔑为“修正主义的”，所以也不敢再引用。所有判决书都是抽象的“依法判决如下”。而且适用刑罚也是五花八门。有的判处“监外执行”，有的判处“交群众监督执行”。更为可笑的是，为了所谓“防扩散”，反动标语、反动日记的原件，有的在预审前即行销毁，有的虽然随案起诉，但已被挖了“天窗”（即把反动字句挖掉）。理由是反动内容不准更多的人看到；让任何人看到都是“替敌人进行反动宣传”。这里所说的“反动”，实际上大多是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内容。由此可见所谓“防扩散”实际上是惧怕广大群众起来反对林彪、“四人帮”。对于反动言论的原话，不准承办人问，也不准被告人供。只准问“你说过‘打倒×××’吗？”只准供“我说过‘打倒×××’！”所以笔录中大量出现“打倒×××”。通观全卷，如不加以联想或推测，谁也不知道被告说的到底是什么！

“文革”中，广大群众出于对领袖的热爱和迷信，喊出“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的口号。林彪、“四人帮”乘机偷换概念，把这一口号扩大为“谁反对林彪、江青谁是反革命”，成为风靡一时的所谓“五保卫”（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文化大革命）。这样一来，许多反对林彪、“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的人民群众被打成反革命。这是“文革”十年反革命案件将近三分之二是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周口店公社西庄小学女教师王××，“文革”中与同事议论当时形势，表达了对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的不满，即以“恶毒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罪名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扭送拘押达9个月。周口店公社辛街村沙×，男，时年26岁，回族，下中农成分。1966年初中毕业回村劳动。1975年5月在周张公路当民工，任班长。1976年9月9日下午，沙在工棚听到广播“毛主席逝世”的消息，说：“这回毁了，毛主席逝世了，咱们国家还不塌了锅，这回咱们国家不是爷爷就是奶奶了！”接着，沙来到拴马庄工地，碰上4名民工，沙说：“刚才广播你们听见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完蛋了！”有人说：“你竟胡说八道。”沙立即说：“哎呀，

我怎么胡说了，以后真得注意！”此前，沙在工地曾说：“中央领导分两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是一派，邓小平、李先念是一派。这样没法搞好，非得乱了不可！”毛主席逝世后，沙还说：“总理逝世他们还这么争，那么抢，主席逝世了，非乱了不可！”沙又说：“周总理是被江青气死的，江青想当总理，总理很生气，不看在私人情面上饶不了她！主席知道了也很生气，主席说能舍江青不舍总理！”1976年10月8日，沙被定为反革命罪，判管制3年。1976年12月19日，沙给最高法院院长江华写信申诉。复查认为：沙的言论主要是针对“四人帮”的，原判应予推倒；说“毛主席完蛋了”，结合其一贯表现属于口误，更不能因此定反革命罪，应撤销原判，改判宣告无罪。

主观归罪，客观归罪，这是人民法院审判实践中早已批判过的。但“文革”中唯心主义横行，把不是反革命的人当成反革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反动想法就是犯罪”，在当时成了定反革命罪的“理论根据”。长沟公社沿村大队王××（其伯父王兰亭是房山县日伪特务头子，1950年被处死刑）因与反革命子弟吴××关系密切，被公社办班审查。自供：“想成立‘同盟赤化游击队’，还没实际行动。暗中写过三张反动标语，没人看见，也没有张贴就烧了！”侦查结论明确写道：“这些事实不能认定”。但因他有反动想法，所以仍按“组织反革命集团，书写反动标语”，定现行反革命，判刑5年。坨里中学16岁学生谷××，见公安局到当地拍照一条反动标语，出于好奇心理，对某同学说：“我也试一试，看公安局能不能破案。”于是写了一封反动匿名信，投寄给坨里公社。破案后，虽从其家庭出身、在校表现等各方面分析，均未查出反革命动机，但仍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是“文革”中迫害干部、群众的一个重要手法。办案中出现了捕风捉影、无限上纲，先定罪名再凑证据的怪现象。房山中学美术教师翟××，因系旧官吏家庭出身，即被认定“思想当然反动”。他画了一幅“农村小景”，农家门前几只小鸡在啄食，被上纲为“丑化农村大好形势”。他画毛主席像，画了双腿未画双脚，被上纲为“有意污损伟大领袖光辉形象”。学生画一张女青年做棉被的画，他提议棉被图案画蓝地野菊花，被说成“指使学生画国民党党旗”。由于诸如此类的“罪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拘押11个月。

林彪、“四人帮”极力鼓吹“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文革”中为了“不准挫伤群众积极性”，只要是群众扭送来，不问青红皂白就要收押甚至判刑。县棉织厂工人刘××，因书写反动匿名信于1968年4月8日被群众扭送，既无审批手续，也未宣布拘留抑或逮捕，即押入看守所，按现行反革命判刑10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复查时已刑满就业。复查查明，该人是多年精神分裂症患者，“文革”前曾两次住精神病院治疗。1968 年 3 月作案期间，精神病院再次诊断“需等床收住院鉴定”，厂里群众却将其扭送到公安局，公安局即予收押。经 10 年服刑，精神病仍未痊愈。

十年梦魇已成过去，留给后人的是深刻的教训，无尽的启迪。我们要牢记这段历史。

活捉中统特务刘国俊

安庆谭

1948年12月14日，良乡县城解放。我党政军进城后迅速展开全面工作，大力宣传我党各项入城的方针政策，安定民心，稳定社会秩序，废除日伪保甲制，建立起新的村政权和党的基层组织，做好支援前线的各项工作。1949年至1950年完成了土地改革工作，广大农民翻身当家做了主人，他们以主人翁的革命热情投身到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高潮中。1950年6月，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妄图以朝鲜为跳板，对我国进行侵略。我们党和政府带领全国人民开展了抗美援朝运动。蒋介石也妄想借此机会卷土重来，就利用派遣特务和潜伏特务的方式并与反动会道门相勾结，造谣惑众，蛊惑人心，破坏抗美援朝运动，扰乱社会秩序。

1951年春，潜伏特务刘国俊窜到良乡，企图利用后天道作掩护，进行反革命活动。开始梦想在良乡县城附近太平庄为立脚点，刺探我党政军经济各方面情报。没想到到达绳庄子毛某家后，经毛某说明情况后拒绝留住。一天，这个特务被较高觉悟的群众积极分子王某发现，及时来县公安局汇报。他说今日午前有一个陌生人来到太平庄村绳庄子毛某家。经查阅反动道会门档案，毛某是后天道天桥（是道内忠实信徒，道首来传道居住此地。家中存有道内物资，收敛道费和生活用品），来人可能是道首，应立即抓捕。经王士才局长下令，派侦缉股长张成栋、侦缉股员陈起贤、潘成祥三人去抓捕。他们到毛某家后，发现来人已走了。经审问，毛某交待，已去西石羊附属村王家台段某家去了。又速到段某家去抓捕，来人又跑了。经审问段某交待已去闫仙袋周玉文家去了。又速到周玉文家，仍然没有抓到。周某交待已去南独义肖玉春家去了。到肖玉春家后，肖玉春交待去赵辛店了，地址姓名不详。当时赵辛店为北京市丰台区管辖，良乡县为河北省管辖。故抓捕工作暂时停止。

1952年春这个特务又浮出水面，被赵辛店村民李有成在本村西南坡顶（即盆子坑村东坡顶）放羊时偶然发现，山坡上居住多年的赵连祥家院内有一陌生人，有时在院中散步，有时坐着晒太阳。在一段时间里曾见到几次。还发现赵

家院场很大，围墙很高，院门关闭很紧，经常上门栓，院内还养一大黄狗。每次听到大黄狗狂叫，院门外准有人等候，主人出来迎接。有时将来人带进院，有时叫来人在门口等候不准进院。放羊人老李深感异常，晚间回家将此种情况汇报给村公安员刘群。第二天刘群到长辛店派出所去汇报，正好碰上所长马长太与镇党委书记张谦谈工作。刘群汇报后引起所长和书记的重视。二人当时商定由所长马长太负责和副所长师文志、所员宋玉成三人为一小组，立即侦查。经查，赵连祥是后天道忠实信徒。对来人确认无误后，经请示丰台公安分局批准，对来人及其事主进行抓捕，并对赵家进行搜查。

在一天晚上，由长辛店镇党委书记张谦带队，派出所全体干警出动，对其实施抓捕。没费一枪一弹，从赵家屋内炉坑里地洞中擒住。缴获 2 号驳克枪一支，子弹 20 余发。同时从赵家抄出部分被褥生活用品、后天道的其他物资和道费。事主赵连祥以窝藏反革命罪被逮捕。经审讯来人真名刘国俊，是潜伏下来的中统特务。刘国俊被审讯时如实交待说，我原来本想在良乡落脚，后得知良乡道内首要人物都被逮捕，中小头目也被管制监督，广大农村群众觉悟提高，深感在良乡无处立足。自认为赵辛店是一个边沿地，又是山坡上，人烟稀少，比较僻静，不易被人发现，没想到这里也不能藏身。

上述情况是笔者于 1953 年在佃起乡（赵辛店近邻）搞普选工作时由当时镇党委书记张谦作的介绍，现整理出来，供读者了解。

骨肉离别四十年

白永水 口述 张玉泉 整理

我叫白永水，是青龙湖镇大苑村人，今年 78 岁。1947 年 5 月，我当时 17 岁，在良乡中学上初中一年级并结婚，被国民党征兵带走，后去台湾。与家人一别便是四十余年。时代的变迁，历史的沧桑，使我经历了无可奈何的境况人生。

我当时参加的是蒋经国的青年军 208 师。跟我同时应征的还有同村的周路、赵家驹、陈芝洞等 5 人，还有附近各村约 20 多人，我被分配到 208 师二旅四团一营三连一班，在南苑、马驹桥、石景山、门头沟这条线上执行防卫任务。

1948 年 9 月，东北形势很紧。208 师与驻东北的 205 师换防，结果没出山海关就停下来了。林彪部队把锦州以北围得很严实，我们根本过不去。不久东北全部失守，辽沈战役结束了。我们 208 师还有东北逃出来的军队被迫撤到唐山。在唐山我们驻防了一个月，产生了厌战心理，很想家。由于看管很严没有办法，只好跟着走。

1948 年 11 月我们撤退到天津，很快天津失守。

1949 年 2 月我们又撤到了上海，驻守上海西南端嘉兴一带。在上海我度过了在大陆最后一个春节。这个节是在紧张的备战和防卫中渡过的，思乡的情绪一直在困扰着我，可以说没有一点儿节的气氛。

在上海驻扎了两个多月，眼看守不住了，4 月初向南撤往宁波，驻防在镇海口守江。上海即将解放，形势非常紧迫。不久接到命令，又到舟山县沈家门港口。从整个形势看解放军势如破竹，从陆地步步近逼。只有一条活路，就是向台湾撤退。

从 1949 年 8 月至 9 月，大批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仓皇逃到台湾。我于 9 月初坐上当地招商局的一艘名叫铁桥号的商船，走了一天一夜，来到台南基隆港。

到基隆不久，就乘火车到了台中驻扎，此时惊魂开始安定下来。离开大陆时 208 师扩充了许多刚征来的苏、浙、皖籍的新兵，被改编为 211 师和 212 师两个师。我在 211 师被提升为三连三排的排长。干了 4 年多，又调入军区

总部后勤处当了上尉参谋。不久到汽车修理厂搞建筑工作。

1954年台湾当局颁布兵役法，部队进行整编，一大批从大陆来的老兵转业到地方工作。我转业到台南市社会局当干事，分管复转军人的安置和社会救济等工作。此时我已33岁。在台湾举目无亲，家乡音讯不通，回乡已无望，形影孤单。不久我与台南市平东县一位19岁的姑娘结了婚，新的家庭组成后，我们生育了三个儿子。长子现在台中一个公园当管理员，二子现在台中市开珠宝商店，三子现从事水果批发业。

初到台湾的几年，生活十分艰苦，有的地区靠吃地瓜干维持生活。其原因是日本统治时把台湾的资源搜刮一空，加上从大陆到台湾的国民党兵、难民等一下增加10多万人，所以百姓生活一度极端困难。我在结婚后几年，太太没工作，孩子又小，只靠国民政府发的有限的生活补贴金和我的工资维持生活。

我太太后来来到了一家儿童玩具厂当了工人，生活得到了好转。我于1988年退休了，主要精力帮儿子搞买卖，生活开始富足起来。

虽然生活美满，但是我仍然思念着家乡，思念着家乡的亲人，我时刻想知道她们母女至今的状况如何。总是盼望有朝一日跟她们团圆。何时才能归？何日能相见？

1978年以后，大陆改革开放的前夕，我通过台湾在美国经商的朋友打听到我在大陆的妻子不仅健在，而且生活温饱有保证，兄嫂也生活得不错。当他们得知我的消息以及家庭生活的状况时，也兴奋不已。

1988年，台湾、大陆都放宽了探亲的规定。这年5月，我携太太还有二儿子，回到了阔别几十年的故乡，回到了阔别整整40年的亲人身边，与大陆白发苍苍的老妻及年过半百儿孙满堂的女儿团聚，离别多年的苦水化作幸福的泪水。

在家乡，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给予我们热情地接待，详细地介绍了家乡的大好形势，还参观了一些地方。看到祖国和家乡的巨大变化我感到欢欣鼓舞。从1988年第一次回家至今我已回了21次家，有时一年回来两次。

为了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让台湾人了解祖国，看看祖国的新面貌，我曾七次在台湾组团，共百余人次，先后到东北、山东、云南、贵州、重庆等地旅游观光，深切地感受到了美丽的祖国河山、中华民族的强大。

田纪云副总理视察房山纪实

李耀

1986年4月下旬，县政府办公室接市政府办公厅电话通知，近日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同志到房山视察工作，并提出要到窦店村、云居寺和原拟建的张坊水库库址参观视察。通知还要求县里陪同视察的人员不要过多，并要把陪同视察的人员名单报市政府备案。经县领导研究，决定由县委书记王俊起、县长李庆余、县计委主任夏方伟和我（时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负责全程陪同视察，并向市政府办公厅报了名单、备了案。县领导在研究时又考虑为有利于工作，能让更多的领导同志聆听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故又对当时有关的副县长作了接待安排。为了避免全程陪同人员过多，各位副县长按当时的分管工作，安排张中兴同志在窦店村，高海量同志在云居寺，李炳田同志在原张坊水库库址参与了接待工作。

1986年4月27日上午10点，田纪云副总理一行来到房山。中央机关陪同视察的有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副秘书长闫颖，国家计委副主任柳随年，国家经委副主任赵维臣，财政部副部长田一农，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邱晴，建设银行行长周道炯等同志。市委、市政府及市里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有市委书记李锡铭，市长陈希同、副市长韩伯平、张百发、黄超，市政府顾问王宪，市政府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铁瑛，办公厅副主任朱祖朴，市计委主任王军，市建委主任苏兆林，市政管委主任黄纪诚等。



1986年4月27日，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左二）在云居寺视察（李耀提供）

田纪云副总理一行来

到窦店村后，在会议室听取了窦店村党总支书记仇振亮的汇报。在汇报的过程中，田副总理还就农村的生产和管理等多方面工作做了深入的了解。田副总理对窦店村重视农业科技、农机服务、大力发展畜牧业、积极兴办村办工业等工作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对窦店村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等工作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高兴的说：“窦店的经验是充分发挥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开拓创新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新路子。体现了既有一定差别，又坚持了一条共同富裕的道路，是应该学习和推广的。”他还赞许的说：“窦店我没来过，真不简单，你这个书记（指仇振亮）也不简单！”田纪云副总理一行听完汇报后，又参观了农机车队、养牛场、屠宰场、粮食加工厂、沼气池、服装厂、小学校等。中午在窦店村食堂用餐后，乘车到房山宾馆稍事休息。

田纪云副总理在窦店村视察时，还就以下几方面发表了一些意见：

在农业和科技的结合，他高度赞扬了窦店村主动请科技人员下乡，走农业与科技相结合的道路是非常对的，他说这样既推广了农业科学技术，增加了生产，又充分发挥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使他们有了用武之地，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在农机服务方面，对窦店村重视发展农业机械化，积极推行农机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责任制形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这种服务性的合作方式是中央1号文件所提倡的，现在有的地方的一些干部群众把这种服务方式错误的理解为又搞合作化了。其实这种互利互惠的合作方式广大群众还是欢迎的。”在村办工业方面，田副总理说：“现在村办企业基础还比较薄弱，群众生活水平也比较低，因此从事工业生产的农民工资不要提的过高，防止务工与务农人员的收入差别过大，避免产生新的矛盾，这样还可以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厂子经营好了，钱多了可以扩大再生产，还可以多办一些集体福利事业。”

在农村基层干部的使用上，当市委领导同志向田副总理介绍仇振亮同志当村干部三十多年不怕难，不收礼，艰苦创业，廉洁奉公的事迹时，提出农村基层干部能力强，群众威信高，身体又比较好的应该坚持多干几年时，田副总理表示同意，并说：“刘庄的支部书记年岁也大了，但工作搞的很好，他就退不下来！”

窦店村在仇振亮带领下，通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坚持走农业与科技、畜牧、农机、工业相结合的发展道路，改变了过去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为农村的发

展和建设开创了一条新的路子，得到了田副总理的表扬和充分肯定。此后，中央、市里各大媒体高度重视并纷纷报道，其影响范围越来越大。全国各地参观学习的络绎不绝，已成为全国农业系统的一个先进典型。窦店村这面先进旗帜的举旗人仇振亮也先后被评为全国劳模，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区人大副主任。

田副总理在宾馆休息时，又听取了县委书记王俊起关于房山基本情况的简要汇报。随后趋车去云居寺参观。首先由云居寺事物管理处的同志作了简要介绍，然后参观了石经展览室、嘉庆皇帝御碑和静琬的纪念碑，以及北塔和塔院内的石碑、佛像雕刻等艺术珍品，对云居寺石经的书法和雕刻艺术十分赞赏，特别是对历代僧人克服重重困难，千年不辍的虔诚和敬业精神十分钦佩。田副总理在参观云居寺当年熬粥用的大锅时，无限感慨地说：“从这口大锅就可以看出当年云居寺的兴盛和红火的场景，这也说明当年僧人生活的艰辛。在这样艰苦条件下，还能干出这么巨大的工程，真是难能可贵！”田副总理还进一步了解了石经用材的来源、材质、参观收费标准、纪念品的制作和销售以及参观游览人员的饮食住宿条件等问题，还特别对市里领导提出要重视抓好云居寺的绿化，要求把四周的山头都要植上树，并开玩笑说，谁要把绿化搞好了，就给谁树个碑，流传百世！

下午4点多，田纪云副总理一行离开云居寺，又趋车到了原准备兴建的张坊水库坝址（干河口村边）视察，并就原如何选址、坝的高度、地质勘探、蓄水能力和效益等情况进行了了解。下午6点，田纪云副总理一行从张坊返回北京。

回顾原良乡县二区工作

罗玉源

1948年11月，良乡县解放后，由于形势变化快，所以行政区域的划分也变动频繁。1950年初，我奉命从六区调到二区工作。当时二区区址设在大十三里村，因此也叫十三里区。因住房困难，区里的部分干部在附近的炒米店村办公。

二区的机构设施和人员安排大体是：区委书记王成善，组织委员罗玉源、陈希善，宣传委员罗玉庆、陈林森，妇联主任乔淑贞。团委书记王淑清，组织委员杨瑞芝，宣传委员杜景华。行政方面：区长刘增勤，秘书马德云，公安员陈安、潘成祥，武装部长潘成勋、孙玉堂，民政委员安成儒，财粮委员蒋振水。

当时二区共辖三十多个行政村，正处在解放初期，情况复杂，任务比较繁重。广大农民拥护共产党，拥护人民解放军。他们欢天喜地庆解放，歌唱新中国的诞生。区委区政府一面宣传党的政策，一面组织农民开展大生产，物色培养积极分子，在进行一般工作的同时，着重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各行政村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

当时良乡二区的三十多个行政村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多数村土地改革已基本结束，还剩下分房、分地、定地权、填土地证等工作，这些都是比较细致的工作。另一种情况是，土地改革工作结束的早，房屋、土地所有权都已确定，分得土地的广大农民兴高彩烈，积极备耕管好种好自己分得的土地，争取一个丰收年。以上两种情况，在1950年春耕前，经过全区干部的努力工作已基本完成。广大农民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成了土地的主人。

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经过物色培养，各村都出现了一批骨干积极分子，党、团、妇联、民兵等组织都相继建立和健全起来，同时还由各村抽调一批骨干充实了区里干部的不足，如张义峰、马德云等都抽调为区里的脱产干部。随着组织的健全，对于党在农村的各项工作，各项政策，各村都能积极贯彻努力完成。各村干部带领着广大群众开展艰苦奋斗，耕劳生产争取农业丰收的亮富运动。各村的骨干积极分子，在以后的各项工作中，特别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中，

绝大多数都成了积极分子和带头人。

当时全国还有的地方没有解放或刚刚解放，各村面临着备战、支援前线的任务。上级政府下达的扩军征兵、筹粮、筹草、筹柴和运转任务，都必须及时组织，按时完成。对此，二区各村虽是解放时间不长，但经过土地改革，干部群众政治觉悟都有了很大的进高，各村都积极拥护，踊跃参加，努力完成上级政府交给的光荣任务。

1950年良乡解放还时间不长，各个组织还刚刚建立，地富的坏分子和国民党的残余势力还不甘心失败，在社会上还兴风作浪，甚致造谣恐吓威胁基层干部，搅的社会不安定，从思想上、政策上生产上等方面搞破坏活动，所以治安保卫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还很繁重，需要教育干部、群众认清形势，提高觉悟，做好保卫工作。当时各村的治安以及民兵武装等组织，都要日夜组织好值班巡逻，保卫好刚得来的胜利果实，保卫好生产、生活和安定的社会秩序不受破坏。同时对社会上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不良思想和人民内部矛盾，还要作大量的宣传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的矛盾。

良乡县第二区，从建立到1950年6月撤销，前后共一年多的时间。在二区宣布撤销时，除暂留部分人员作善后工作外，大部分都由上级另行分配了新的工作，我也被调到良乡县一区工作了。



1950年6月，良乡县第二区工作人员合影（李耀 提供）

房良两县县直机关的“三反”运动

魏志华

1952年的“三反”运动是建国后继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后又一个大的政治运动，也是我参加革命工作后经历的头一个大的政治运动。因此，印象极为深刻。

房山、良乡两县的县委对“三反”运动极为重视。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作了具体部署。县委和各单位领导，这一时期主要抓“三反”运动。县委成立了“三反”办公室、各单位有一名领导专门抓“三反”运动的情况，运动紧张阶段，各单位每天向县委汇报一次，县委每天向通县地委汇报。

“三反”运动从1952年年初开始，6月底结束，进行了半年的时间。运动大体分五步进行。一是学习动员，二是领导带头检查，三是“打老虎”斗争，四是查证定案，五是总结和民主建设。

学习动员阶段。共进行了半个多月的时间。由县委领导向县直机关全体干部传达中央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决定及省、地委的有关指示精神、县委的安排。学习有关文件和报纸。房山县几次大会，都是由县委书记崔乐春亲自作报告，各单位都认真组织讨论。通过学习动员，提高了大家的认识，克服了各种错误思想，端正了对“三反”的态度。

领导带头检查。在学习动员的基础上，各单位由领导带头，检查交待自己的问题（主要是经济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搞得都非常严肃认真。如房山县政府教育科长，常到镇中书店（当时房山城内较大的书店）去串门、看书，在书店吃过几次饭，书店送给他一些毛巾、香皂等东西，总价值36万元（旧币合人民币36元）。为此，他在机关作过四五次检查，大家按受贿对他进行严肃的批评。各单位在领导的带动下，一般干部（主要是管钱、管物的财会人员）也都作了检查交待。同时进行揭发检举。这样，一方面使没问题或问题不大的干部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参加“三反”。另一方面，也通过检查交待、检举揭发，发现线索、确定“三反”的重点。

“打老虎”阶段。这是“三反”的重要内容，占的时间最长、斗争也最激

烈。从 1952 年 2 月至 4 月，“三反”的重点是财经单位和财会人员，如县政府财政科、银行、税务所、县社等都是重点。当时把贪污分子当作“老虎”。贪污 100 万以上为“小老虎”，贪污 500 万以上为“中老虎”，贪污 1000 万以上为“大老虎”。在打虎斗争中基本上是对敌斗争的方法。对审查对象较普遍的进行了“逼供信”，搞得非常紧张。如良乡县粮食局长交待贪污粮食一车皮，约 50 吨。贪污的钱给家里和亲戚买地、买车了。认为态度好、受表扬。而一位副局长交待不出问题、认为态度不老实，不仅批判，而且几次挨打。后来经过调查，局长交待贪污粮食的问题全是假的。房山县烟酒专卖公司经理吴××只交待喝过公家几次酒，认为他掌管那么多烟酒能不贪污？大小会批判，分几个组昼夜轮流作战，不叫他休息，使他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最后什么问题也没搞出来。对当时受审查的对象，全部按单位或按系统由“打虎队”集中看管，没有行动自由。

在“打老虎”斗争中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一是对主要领导有问题的单位，增派力量，加强领导。如房山县公安局长反映较大，领导不力，由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宋广宽亲自去抓。县公安队队长和指导员问题较多，县委从武装部抽调一名科长去领导。认为良乡县煤栈（后来的煤炭公司）问题大，就从县直机关抽调 12 名干部，组成“打虎队”，由县委常委、县武装部长带队到这个单位抓，这个单位 50 多名干部、职工中定贪污的 16 人。二是领导有问题，在本单位搞不起来的，调到别的单位去搞。如房山县烟酒专卖公司经理吴××，调到县委机关搞。通县地委机关的车子窑煤矿（地点在房山县南窖）的经理、总会计反映较大、也调到县委来搞。县税务局所属的城关、河北专卖公司的几个领导，都调回县税务局参加“三反”。三是各单位组织“打虎队”。一方面对重点人进行揭发批判，追查问题；一方面对揭发和交待的问题随时进行查证，同时对重点人进行看管。四是典型处理。1952 年 2 月，河北省在保定召开对省直机关贪污分子的处理大会和对大贪污犯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的公审大会。房山县派副县长刘同春去参加了大会。会上省长杨秀峰代表省委、省政府讲了话，河北日报发表了这一讲话，题目是《沉痛的责任，惨痛的教训》。随后各县对贪污分子也进行了公开处理。

查证定案、组织处理。“打虎”斗争告一段落后，即转入查证定案、组织处理。各单位抽调一批骨干，集中进行内查外调。在问题基本查清的基础上做了组织处理。房山县当时定为贪污问题的 120 多人（包括房山矿、车子窑煤矿，当时他们的组织关系在房山，随房山一起搞运动）。除逮捕 3 人外，撤职和开

除党籍的 20 多人。有些人问题不大，态度较好，免于处分。良乡县定有贪污的 251 人，贪污款 159000 万元（旧合人民币 15.9 万元）。其中，贪污 100 万以下的 132 人，100 万以上的 56 人，1000 万以上的 63 人。受党内处分的 11 人，行政处分的 11 人，免于处分的 80 人，未定的 109 人，当时退赃 1198 万元。

“三反”运动时处理的问题，有些由于证据不足，有的由于定性不准，处理偏差，不少人的问题后来陆续作了纠正。

按照 1952 年 4 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贪污人民币 1 亿元以上（旧币）判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判处死刑；贪污 5000 万以上，1 亿元以下的，判处 5 年以上，10 年以下徒刑；贪污 1000 万以上，5000 万以下的，判处 1 年以上，5 年以下徒刑；贪污不满 1000 万元的，判处 1 年以下徒刑，劳役或管制，或免于刑事处分，分别予以开除、撤职、辞职、降级、记过处分。房山、良乡当时逮捕的 12 个人，当时都没有正式判决。有的以后判了几年，有的在县公安局押了几个月，“三反”结束后即予释放，重新安排了工作。

总结和民主建设。在“打虎”斗争结束后，进行了总结和民主建设。每个人都进行了认真总结，在小组会上谈收获，谈感想，并对每个人解放以来，特别是“三反”运动中的表现，做一次全面的鉴定。同时，各单位对增产节约（主要是节约）制定了具体措施。

县以下区级的“三反”，原计划于 1952 年 8 月后进行，由于种种原因，只在重点地区进行（如房山的一区、城关、四区周口店）。其他地区主要是领导进行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没有象县直机关那样进行。

1952 年的“三反”运动虽然在进行中出现不少问题，但它的意义和作用还是很大的。通过“三反”，不仅清除了腐败分子，挽救了犯错误的干部，更主要的是使全体党员、干部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从 1952 年到上世纪 80 年代初，在机关干部中，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中，极少发生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的现象。

房山县委机关精简工作的回忆

李 耀

看了《房山文史资料》第 18 辑刊载的刘振祥同志关于《我在工口八年的回顾》一文很受启发，特别是文章提到“三年困难时期精简机构，精简人员，财贸部取消，合并为工交财贸部……”等内容，使我也联想到亲身经历的那一段历史过程。时至今日，转眼已过去四十余载，当时我还是二十五六岁的小青年，现在已成为年近七旬的老人了，而那时朝暮相处的同事，现在有的已经作古，而健在的大多已是耄耋老人了。对这一段历史的回忆，也是对这些老同事的相思相念，顺便借此文也对振祥同志的文章再作一点具体的补充。

上世纪 60 年代初期，县委机关于 1961 年和 1963 年有过两次机构变动，而这两次的机构调整又都与我所工作的县委财贸部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振祥同志在文章中的寥寥数语，也勾起了我对这一段历史的回忆。

精简工作的时代背景

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或经济建设时期，有过多次精简，但不同时期提出精简，都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

1957 年以后，我们党在左的思想指导下，错误地分析了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右斗争。1958 年又主观地认为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极大地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继而又提出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于思想上的狂热，使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瞎指挥、家长制、“一言堂”等不良作风泛滥。1959 年庐山会议以后，又掀起了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使我们党左的错误思想发展到了极至，这给党和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造成了重大损失，人民群众的生活也陷于贫困之中。

1960 年下半年，在挫折和失误面前，党中央开始认识和纠正左的指导思想，认真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方针，制定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工农业和其他各项事业的政策。与此同时，在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制度

建设上也采取了很多有力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大力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县委机关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调整的形势下，对机构和人员也作了相应的精简，而县委财贸部又是这两次变动的重点单位。

两次机构变动情况

房山县委机关精简前是七部一室一委。1961年县委撤销了统战部，把统战工作纳入财贸部的职责范围。统战部撤销后，原统战部长李敬芳调任县妇联主任，原统战部干事刘振铎并入财贸部。财贸部原编制7人，郑玉森任部长，赵福林任副部长，干事有程德贵、蔡景贤、刘宝树、丁艾中、李耀。两部合并后有的同志相继调出，程德贵调市二服局，刘宝树调南尚乐公社工作。又调进苏维斌接替程德贵分管人事工作。为什么把统战工作纳入财贸部的工作范围呢？因为那时的统战对象主要都在商业系统。过去的私营企业主，也就是当时所称的资本家，小业主大多都是经商的，而经营工业的私营企业主是少数。这样合并有利于工作上的协调与配合。那时财贸部只有一人抓统战工作，但工商联主要抓统战工作，主任是私营企业主的代表人物李雅三先生，工商联秘书是高树森，另外还有两名专职工作人员。

1963年县委又进行了一次精简工作，这次实行了“两撤一建”，撤销了工交部和财贸部，组建了财经部，县委保留了五部一室一委。新组建的财经部编制10人，秦芝儒任部长，赵福林、胡长存任副部长。干事有7人，史维义、孙奎春、王绍清三人仍分管工交工作，蔡景贤、李耀、苏维斌三人仍分管财贸工作，刘振铎仍分管统战工作。工交、财贸两部撤销前，人员都有一些变动，财贸部原部长郑玉森调岳各庄公社任党委书记，丁艾中也调到商业局任秘书科长。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一是县委1963年精简不是“财贸部取消，合并为工交财贸部”，而是工交、财贸两部同时撤销，新组建了财经部，不仅名称变了，连办公地点也从原来的县委北院搬到了县委西院，与农村部在一院办公了。二是新组建的财经部对于领导干部的安排是属于重新任命，原工交部副部长马成歧在精简后已调出另行任命新职，因此说“又增添了赵福林、胡长存两位副部长”的提法就不够准确了。三是财经部开始办公以后，对外已不能称为“工口”了，而是称为“财经口”了。

新建的财经部，承担了原来三个部的工作任务，人员又相应减少了，当时

工作确实紧张繁重。但同志之间都很团结，工作上相互配合，做到有张有弛，也很快乐。不过不久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四清”和文化大革命运动，又打乱了平静和谐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县委机关的机构也随之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1961年，房山县财贸部全体同志合影（李耀提供）

回顾参加河北省劳模大会的情景

罗玉源

1948年至1958年近十年的时间，原良乡县归属河北省通县专区领导。良乡县解放后，经过全面认真的宣传贯彻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经过广泛深入的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经过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改良土壤、推广科学种田等工作，又经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广大农民走大家共同致富的合作化道路的社会主义觉悟和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农民在生产生活等各方面都有了很大变化，与此同时，全县涌现出许多先进人物和劳动模范，在各项工作中起到了骨干带头作用，带领广大群众积极投入到各项工作和生产建设中。

为了总结工作，表彰先进，河北省于1956年秋在省会保定市召开了全省劳动模范大会。当时我在良乡县担任县委农村工作部长职务。根据省地委的要求，经县委研究，县委书记张令德、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解德元和我参加大会。参加省劳模大会的劳模有：良乡县岗上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吴春山、于管营村大队党支部书记田思勤。会议地址是河北省会保定市，参加大会的人员都住在河北饭店。

大会开得隆重热烈。大会期间，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副书记马国瑞，省委省政府有关部门领导都来到大会作报告并参加讨论。通县专区地委书记徐瑞林、地委第二书记兼专员王宪和专区有关部门的领导也参加了会议。大会总结了工作，交流了经验，表彰了先进，奖励了劳动模范，还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良乡县、房山县和大兴县为一个小组。在会上，我们介绍了岗上大队吴春山勤俭办社的经验，于管营村的低洼地区改造和建立台田防涝工程，北刘庄村种植小麦由平播大垌改为小对垌的科学种植方法。房山县介绍了北直河大队的驴生骡繁殖牲畜经验，惠南庄杜宝珍的稻麦兼作的经验。大兴县重点介绍了沙地改造引水种稻田的经验。各县的一些经验对推广因地制宜、科学种田、实现增产增收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会议期间，我们还利用晚上的空余时间进行互访交流活动，县委书记张令

德带领我们与会的几位同志，到其他专区有关县去面对面的访问交谈。我们先后拜访了尧阳县五公村的耿长锁、遵化的王国藩，又到宝坻县、霸县等低洼县代表商定换取水稻的优良品种，这些引进的优良品种都取得了较好的收成。河北省劳模大会对全省各项工作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对农村农业工作，实现农业增产增收作用更大。

大会结束后，一部分人回原单位贯彻落实大会精神，一部分人留下参加反右整风会议。

我被留下继续参加反右整风会议，这与刚刚结束的劳模会的气氛完全不一样了。一夜之间大字报像雪片一样贴满了会场，有的省级领导干部被点名批判，后来划成为右派分子，一时空气非常紧张。不久，全国上下一场疾风暴雨式的反右运动迅速的展开了。房、良两县合并划归北京市后，即 1958 年上半年全县反右工作才告结束。

北白岱下乡纪事

宋 湘

1965年4、5月间，我在张坊公社北白岱大队下乡“蹲点”。这一段往事对我来说却终生难忘。

—

“文革”前，房山县委、县政府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在干部力量部署上除靠社、队两级干部外，还采取以下几种形式：第一，重大的全面性的政治运动（如农村整党整社、“四清”）由县委从县直机关统一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队（组），进驻全县各村普遍开展工作。第二，少数社、队发生突出问题由县委、县政府抽调工作组前去，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第三，一些班子松散无力，生产落后，群众生活困难的后进社队，由县直各部、委、办、局分工包点，领导带队，抽人进驻，常年帮扶。这后一种形式多年来已成习惯作法，每年年初县委给县直各单位分派任务。

1965年春，县法院、检察院共同分包张坊公社北白岱大队。这是一个只有200多户4个生产队的小村。当时正值“小四清”之后、“大四清”之前，全国开始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农业生产强调以粮为纲，村里基本没有工副业，生产力低下，农民普遍贫困，是许多“油饼队”（当时一个炸油饼8分钱，一些生产队社员劳动日值只有8分左右，故被称为“油饼队”）之一。

法院院长鲁敏生、检察长李忠孝分别带一两名干部进驻该村。两院分别侧重抓两个生产队的工作；法院分包第三生产队。两院领导基本长住，有时因县里开会等情况离村时，由所带干部坚持工作。

二

我当时在房山县法院任助理审判员、办公室负责人。平时主要负责办公室

的上报下达、档案及其他行政事务工作，也办理一些简易案件。当年4、5月间，我被抽调同院长鲁敏生到北白岱大队蹲点。我是一个典型的“三门”（出家门进校门，出校门进机关门）干部。此前虽也多次下乡，但只是就案办案，对当事人个别询问，办完案就走，从没有深入过农村和农业生产，所以对农村情况很不熟悉，农业生产知识贫乏，更没有做过群众工作。这次到北白岱下乡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深入了农村，接触群众。

当时我们住在该村村民苏维斌（我在房山师范学校上学时的同班同学）家两间西屋里，白天到地里与社员一起劳动，晚上召开干部会和社员会，研究布置当前工作。一日三餐在社员家轮流吃派饭。当时社员生活普遍困难，以干菜为主加少量玉米面窝头，还有白薯粥，是多日不变的食谱。有的户把玉米面掺上榆皮面擀成“板条”已是对下乡干部的“特殊优待”了。

我由于是初次下乡，不懂如何接近群众，更不会组织和主持干部会、群众会。每天只是跟着领导下地干活，“歇盼”时鲁敏生院长能够和社员坐在一起聊天，拉家常，从中了解社情民意，我只是坐在一边“旁听”。晚上开会时我也无从插嘴，只能做做记录。

通过十几天劳动，也有了一些收获。当时正是栽白薯的季节。每天到地里向生产队长贾德旺要一副水桶，到往返一里多地的河沟里挑水。开始两支水桶前后左右晃动，挑到地里一挑水还剩两半桶。后来逐渐掌握了一些技巧，虽然肩膀压得红肿，但能够挑回两满桶水了。栽白薯，过去了没有干过，这一次也慢慢懂得了全套“工序”：先是往地里撒一层“草廐粪”作底肥，牛拉犁耕过一遍使土壤松软；然后用镐左一下右一下兜成一条条白薯埂，再创坑，浇水；把专门搭建的“白薯埂”培育的秧苗运到地里；秧苗不能直插入土，而是把下半截横按在浇过水的坑里，最后，“封按”。这样简单的农业生产知识对于“三门”干部也只有从实践中才能得来！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房山地区盛传两则“笑话”。一位从市里下放农村的同志在地里劳动时，见到毛驴啃麦苗，想好意地报告队长，但又不知毛驴，麦苗为何物，只好说：“报告队长，动物吃植物了！”引得在场社员哄堂大笑。还有一位市里下放山区的同志，生产队长派他到一条梯田的玉米地里拔草。山区习惯种法是玉米带豆角。这位同志见豆角秧缠绕在玉米秆上，误以为是野草，于是把豆角秧一根根全都拔掉。地里是干净了，可豆角全没了。生产队长发现后又好气又好笑。这真实的笑话现在看来并不奇怪。一些没有到农村来过的市里干部不懂农业生产是情理之中的事，只有吃过梨子才能知道梨子的滋味啊！

三

一天，鲁敏生院长接到通知回县开会。临行给我布置两项任务：“第一，正在开展的评选‘五好社员’活动已经开过几次会做了动员和准备，你再召开一次生产队班子会研究确定候选人及其它准备工作；然后召开社员大会进行评选。第二，生产队没有任何工副业，光靠‘土里刨食’社员收入永远得不到提高。我已跟队长初步研究，可以发展畜牧业，买十几头母驴，驴生驴，驴生骡，一头母驴三年发展五头驴或骡，三年后这个小生产队可以发展到上百头牲畜，卖掉后就是一大笔收入，每户每年可以增加几百元，社员生活就能明显改善。你在班子会上、社员会上让大家再讨论一下，把它定下来”。院长回县了，我可发了愁。我本“木讷”，不善言谈，在干部、群众面前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怎能组织、主持会议？在屋里“转磨”，躺在炕上望房椽，也无心去参加劳动。两天后我骑车跑回县里。院长见我回来很高兴，以为我完成了任务。当听我说“发了两天愁，什么也没干”时，院长并没有生气，只说：“万事开头难，可以理解，但是没有第一次就没有第二次，你必须再去！”然后又给我讲了些开会的具体方法和内容。

第二天，我又骑车返回北白岱，硬着头皮找生产队长贾德旺商量，当晚开了一个班子会。当时心中忐忑，深怕自己人微言轻，语无伦次，被人耻笑，只得“拉大旗作虎皮”；“鲁院长开会走前要求我们研究两件事，具体怎么办请贾队长说吧！”我就再也无话可说了。至于班子成员都说了些什么，我当时就没有听得太清，脑子里一片空白。不过总算把两件事都议过了，下一步该开社员大会了。我更加忧心忡忡，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一夜辗转无眠。第二天早晨我又骑车跑回县里。这次鲁院长冲我发了火，对我狠狠批评了一顿：“你必须再去！会讲也得讲，不会讲的也得讲，不完成任务别回来！”当天我只得又返回北白岱，心想：就算是刀山也得上了！我找贾队长商定第二天晚上召开社员大会，事先写了一个讲话提纲。开会时，每户一人，几十名社员挤满了队部办公室。我心想：这回豁出去了，就照着稿子念吧！讲了约有十几分钟，总算讲完了。我发现社员们也没有什么异常反应，我如释重负，心情逐渐平静下来。经过讨论，社员们评出了十几名“五好社员”，对于发展畜牧业生产也都表示同意。过了几天，我再次回到县里向院长做了“完成任务”的汇报。

四

说怪不怪，经过这次“逼上梁山”的锻炼我终于悟出了“实践出真知”的道理，也体会到上级领导培养锻炼年轻干部的良好用心。此后，再遇到开群众会需要我讲话的场合我也敢讲了。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政法机关被砸烂。1969年6月，我和常彬（原房山县法院副庭长）、张永海（原房山县法院审判员）、王书田（原房山县法院审判员）等同志被下放到太紫草坞公社太紫草坞大队劳动，同时按上级要求给所在大队充当参谋。有了北白岱下乡一个月的基础，不但干农活很快就适应了，而且在几十人、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大会讲话再也不发怵了。

房山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

王硕儒

1937年“七七”事变不久，为深入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延安八路军总部、中共北方局和北平地下党先后派干部到平西开辟工作。1938年春，宋（时轮）邓（华）支队到达平西，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广泛发动群众，建政、建党，开辟并巩固平西抗日根据地。4月底，晋察冀军区五支队到达平西，从部队中抽调部分干部到地方工作，建立健全县政权，改造地方武装。5月，建立了房（山）良（乡）联合县抗日救国会和房良联合县抗日民主政府。

1937年7月7日夜，侵华日军炮击卢沟桥，中国守军英勇还击，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不久，北平、天津沦陷。在房良地区，国民党部分爱国官兵顽强抵抗，于大石河与日军对峙二十多天，终因死伤惨重，全线撤退。日本侵略军于8月初侵占了良乡县城，9月16日，日本侵略军又侵占了房山县城。

房、良两县被日军侵占后，各种地方武装风起云涌，组织大小不等，名目繁多，兴起得快，变化得也快。原有各区的保卫团，甚至为地主豪绅看家护院的武装也改变为自卫团。这些自卫武装大多数打着抗日旗号，属于保境安民的自卫性质，但并没有什么战斗力，而且抗日态度不尽相同。当时影响较大的是以陈东来为司令，胡振海、白秀亭等分任各路司令的“抗日复仇军”，同年11月合编为“华北抗日救国同盟军”，共分为十路，合计约数千人，号称“十万”。这支杂色武装成员非常复杂，有逃避日军杀戮的各地无家可归的农民，有国民党残兵，有从国民党监狱中逃出的“犯人”，还有地痞、流氓、大烟鬼等，因开支大，又无经费来源，就去抢老百姓，扰民害民，故群众称之为“老便”。最后，一部分被收编为真正抗日的队伍。

平西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通往北平、天津、平北和冀东的门户，也是冀中十分区的战略后方，中共北方局、延安八路军总部、中共河北省委等都派过军政干部到平西开辟工作。最先到平西的是宋邓支队政委邓华。1938年春，邓华率部队一路上征服了地方地主武装的反抗，依靠群众，于同年3月，在涑水

县马水村建立了房（山）涞（水）涿（县）联合县抗日民主政权。联合县辖 3 个区，其中包括房山县五区（国民政府旧称）。房涞涿联合县建立后，经邓华支队和房涞涿县工委决定，派包森（赵宝森）以县游击支队队长和邓华支队代表的身份，带一个小连队到房山五区开辟工作。包森先到房山五区大安山，结识了进步青年王振择，进一步了解了房山五区的情况。

当时，驻房山城日军已通知房山五区（南窖一带）给日军送 50 名壮丁和 50 条枪。对此事，五区商会、窑商会和各村村长商议，大多数不愿当亡国奴，反对给日军送人送枪。但面对敌人的压力，又不能公开违抗，后来把暂时在南窖小学任教的爱国志士姜时喆请出商谈，姜时喆提出去找八路军。在场的大安山村长张振武说：我知道哪有八路军。于是决定由张振武找八路军。

姜时喆，原名姜振政，字实泽，曾用名江石之。1908 年 10 月 15 日出生于房山县佛子庄村，童年就读于通州师范。1932 年后曾在房山、顺义、怀柔等地任教。姜时喆在通师读书时读过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受到过新文化、新思想的一定影响，痛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1932 年在房山简师任教时，曾组织爱好文学的学生成立群众性的“文艺研究会”，受到国民党房山县党部的敌视，以“赤色嫌疑分子”被驱逐。虽遭迫害，但他并未向恶势力低头。

1938 年 3 月末（农历二月二十八日），包森到达房山县旧五区南窖村，姜时喆带领南窖小学全体师生到村边迎接。当天晚上，原五区自卫团团总、各村村长、各界爱国志士及当地进步青年在东庙集会欢迎。包森是房山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个开拓者，他在南窖一带，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多种方式，团结进步青年和爱国志士，先后团结了姜时喆、王友吾、陈伯诚等十余名进步人士。积极宣传抗日主张，通过演讲会、讲课、写标语等宣传抗日方针政策，向群众反复宣讲党中央《关于日军进攻卢沟桥的通电》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各界人士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物出物，各尽其力，团结抗日，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姜时喆向包森表示了自己要求参加革命和抗日救国的迫切愿望。经包森介绍，邓华批准，姜时喆参加了革命，并于同年 4 月 20 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包森懂得建立抗日根据地必须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做后盾。他和姜时喆一起在发动和组织群众抗日的同时，积极做改编旧五区自卫团的工作，和五区自卫团团总谢景波连续谈了 4 天，反复讲明在大敌当前之时，必须枪口对外，共同抗日的道理。谢景波明晓大义，同意抗日。根据谈判决议，在班各庄村召开旧五区自卫团改编大会，南窖、大安山、北峪等各村自卫团成员一百五十余人到

会。包森在大会上宣布了将旧五区自卫团改编为房涞涿抗日游击支队的决定，支队长包森，政治部主任姜时喆。包森还做了原四区自卫团的争取工作，虽未改编，但同意抗日。特别是争取“抗日救国同盟军”三路司令胡振海，为三路官兵讲抗日道理，讲了三天三夜。看到了胡振海队伍纪律涣散，人员复杂，不便改编，经商议决定，胡振海 5000 人的队伍与八路军成为友军，互不侵犯，共同联防，共同抗日，互相支援。

在建立房山五区地方抗日武装的同时，包森同姜时喆、王友吾等人商议后，决定废除伪维持会，建立抗日政权组织。经多方面的酝酿和筹备，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包森在群众大会上郑重宣布：南窖地区抗日救国会和房山五区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区长王友吾。这是房山建立的第一个区级抗日民主政权。

王友吾，房山县长操村人，出生于 1911 年 5 月，8 岁入学，累读至黄村初中毕业。1930 年后曾在房山县安子村、陈家台村任教两年有余，后归乡。他性格刚介，凡见义勇为。县政府报考区长，他应试遴中，初任房山三区区长，继至南窖任五区区长。时南窖高线站工人无端遭工头打骂和资方欺诈，怒而硬毁机器，双方柔盾激化。王友吾仗义执言，令人将捆打工人的人犯抓捕。资方上告，王友吾始终站在工人一边。牵延数月，资方终让步，答应工人条件。后因工人殴打护路巡警，王友吾受牵连被免职。卢沟桥事变后，王友吾联合四、五区民众组织武装，抵御外侮，因遭维持会破坏而未成。包森到南窖开辟工作，闻他声名，至信王友吾，要他仍为房山五区区长。负责南窖地区抗日工作。王友吾同赵然等进步青年一赴，广泛进行抗日宣传，筹粮筹款，并将五区抗日民主政府迁址长操。

长操村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四面环山，大石河在村前呈环形绕过。从这里循大石河上行十余里是房山九区霞云岭地区，向北是宛平县史家营地区，回旋的余地很大。

1938 年 4 月末，晋察冀军区五支队到平西接防。根据晋察冀军区分局和晋察冀边区委员会的指示，从部队抽调得力干部到地方开辟工作，建立健全县政权，改造地方武装。五支队派杜伯华、郭方、贾嵩明、尚英到房山五区抗日根据地筹备建县工作。五支队司令员赵同率支队一个连及二十余名警卫员到达长操，做对地方武装收容和改编工作。首先收编了宛平县八区自卫团部分成员参加抗日队伍。当得知房山旧四区河北村一带，自卫团头目暗中勾结日军，准备投敌，并领到日军发给的服装的消息，便通知四区自卫团在陈家台河滩开会，收编了旧四区自卫团的武装。并将大部分成员编入了平西游击四支队。在改造

地方武装的同时，杜伯华、郭方等人积极召集旧五区、四区部分上层人物和进步知识分子以及各界爱国志士开会，反复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筹建县级抗日民主政权。经过多方筹备，于5月5日在长操村建立了房良联合县抗日救国会，由郭方任主任，下设组织部、宣传部。5月8日，房良联合县抗日民主政府在长操村建立，县长杜伯华。县政府的工作机构有：秘书室，秘书马梦飞；民政科，科长郝仲林；财政科，科长谢景波；实业科，科长杨天资；教育科，科长郝绍尧；司法科，科长姜永聪；贸易局，局长贝敬贤。同时组建了房良县大队（即平西游击四支队），队长贾嵩明，政治委员尚英。下设3个大队：第一大队队长陈伯诚，第二大队队长郝洪如，第三大队（特务队）队长李兴。全县设3个区（按旧区划），其中五区是巩固区，区长罗化之，四区、九区是联防区，四区区长张定宇，九区区长庄敬山。整个河套沟下起磁家务村，上至堂上村，南起南窖、北安，北至大安山、北峪村约50个村庄成了抗日根据地，其中29个村为巩固村。

在开辟房良抗日根据地工作中，姜时喆、王友吾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河套沟的声望也大。经组织决定，姜时喆、王友吾随邓宋队伍挺进冀东开辟工作。房良联合县抗日救国会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创建，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第一，广泛开展了抗日宣传工作。县长杜伯华根据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的精神，亲笔写了《告全县同胞书》，号召全县人民行动起来，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物出物，为打败日本侵略军，保卫房良，保卫祖国，浴血奋战。

第二，大力进行各级政权的建设。县政府成立后，经过党的统一战线和抗日政策的宣传，先后有姜时喆、王友吾、赵然、傅伯英、陈伯诚、王培忠、王希久、郝绍尧、景松年、罗化之等六十多名知识分子到县、区政府参加抗日，为县、区的抗日组织充实了人才。杜伯华知人善任，组建得力的县、区政府领导班子。同时进行了基层村政权和群众组织的建设。许多村建立起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先锋队、妇女救国会及模范队等。

第三，改造和发展地方武装，保卫房良抗日根据地。房涑涑抗日游击支队成立后，曾到羊耳峪打过地方土匪武装，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和粮食，扩大了抗日力量，士气大振。对房涑涑游击支队进行了整顿，改房涑涑游击支队为房良县大队（平西游击四支队），驻防在房良抗日的前线。为扩大抗日武装，积极号召和组织青年参军参战，出现了不少的母送子、妻送郎参军抗日的动人场面。

第四，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谢景波原是房山五区自卫团团长，在当地颇有影响，杜伯华亲自做他的工作，使他在当时的形势下愿意抗日，安排他到县政府任财政科长。四区的郝绍尧，曾任国民政府房山县教育科督学，杜伯华任命他为房良县教育科长。北安村罗化之开煤窑，当村长，有权势，在杜伯华的动员下，弃家投身抗战，任命他为房良五区区长。这些人到县、区政府工作，对动员各界人士和爱国知识分子及青年参军参政起了重要作用。

第五，深入基层，联系群众，积极筹粮筹款，支援抗战。杜伯华及其县政权的工作人员，深入各村，广泛号召人民群众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支援抗日战争。县政府的筹粮筹款任务如期完成。一次，五区商会到县政府送交抗日捐款，县长杜伯华亲自接待时说：“我军抗日有困难，感谢窑商会的支援”。在筹粮筹款的工作中不仅能如期完成任务，还能搞到一些根据地紧缺的物资，如油印机等。

正在县政权逐步深入发展之际，1938年9月，日伪军向平西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杜伯华率领县、区干部被迫由长操向九区下石堡等地转移，同敌人展开了游击斗争。房良联合县抗日民主政权，是房山境内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它的创建，为房良乃至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民国时期的房山县议参两会

王硕儒

民国初期，房山县仍然沿用清末的立宪制度，设立房山县议事会和房山县参事会。议事会的职权是对全县自治事项行使立法权；参事会的职责是对议事会商议决定的事项，帮助县知事贯彻执行。房山县议事会议员 15 名，其中议长 1 名，副议长 2 名；参事会参事员 4 名。议事会议员和参事会参事员，均按区（县辖区）的大小和人口多少确定名额，由区推选产生。民国三年（1914）北洋政府反对共和，公然宣布解散议事会、参事会。民国十二年恢复立宪制度，房山县于当年恢复了议事会和参事会。议事会议员 10 名，其中议长 1 名；副议长 1 名，参事会参事员 5 名，参事会会长由县知事兼任。1937 年 7 月卢沟桥事变后，日军侵入房山县，县政府及议、参两会人员逃散。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房山县开始恢复和筹建房山县临时参议会。1946 年 8 月，经各区乡绅举荐，推选出殷耀东等 16 人为房山县临时参议会参议员。1946 年 9 月 1 日，房山县临时参议会召开成立大会，临时参议员 13 人出席了大会，县长常玉及 23 个单位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上，议决提案及临时动议案 39 件。选举殷耀东等 5 人为常务委员会委员，殷耀东为议长。常务委员均为驻会委员，处理日常事务，同时配备秘书、干事、雇员等十余人。

根据河北省临时参议会组织规程等十一条规定，临时参议会每年举行大会两次，1947 年 3 月 20 日，召开了房山县临时参议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参议员 11 人出席，县长常玉等 17 个单位负责人参加，议决提案及临时动议案 37 件。第一届第三次临时参议会于 1947 年 9 月 3 日召开，出席参议员 11 名，县长常玉及各机关负责人 17 人参加会议。会上，议决提案 56 件、临时动议案 5 件。1948 年 4 月 16 日，房山县临时参议会举行第一届第四次大会，出席参议员 13 名，县长常玉、国民党房山县党部、房山县工会、童子军理事会和塔照乡、长沟镇、天开乡、夏村乡、赵各庄乡、半壁店乡、周口店乡、南窖乡、城关镇、坨里乡负责人列席了会议，会上议决提案 37 件、临时动议案 3 件。

河北省临时参议会组织规程还规定，在大会闭会期间，遇有地方主要问题及人民请愿事项要召开常务会议，决议事项在下次大会中提请追认。房山县临时参议会自 1946 年 9 月至 1948 年 4 月，共召开常务会议 55 次（一般每周召开常务会议一次），议决提案共计 147 件，其中有关民政方面 42 件，有关财政方面 50 件，有关建设方面 6 件，有关教育方面 6 件，有关社会方面 12 件，其它方面 31 件。所有议决案，均依法提请大会予以追认。

房山县临时参议会，自 1946 年 9 月成立至 1948 年 4 月，先后共一年零八个月时间，曾参与县政和社会救济等工作。1948 年末解散。

发生在尤家坟村的一场战斗

张 珍

我的家乡是韩村河镇尤家坟村，在 1943 年抗日战争最艰苦最激烈的年代，村子被日伪占领。这年 7 月的一天夜晚，坚持抗日第一线的房良联合县政府一支抗日游击队共三十余人，由连长刘吉（本县霞云岭乡三流水村人）带领，秘密潜入我村侦察敌情。为了隐蔽行踪，队员分两处入户驻扎。游击队员中，因有我的一位本家大爷叫张宝山，熟悉这村的地形和住户的政治情况，在他的安排下，有十多名游击队员住进我村最北头靠村边的贫苦农民陈志忠家中。另有十多名游击队员住进村内靠边的我家。两处驻地相距不足一华里的距离。刘吉随张宝山住在我家。

游击队住下后，刘吉对我们全家人说：“部队住这里要绝对保密，明天白天你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就当家里没有来过任何人一样。”那年我 13 岁，弟弟 11 岁，都正上小学，刘吉反复叮嘱我们，不要对外人说任何情况。

第二天我们按照刘连长的要求，都各自做自己的事去了。当天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伪长沟镇警察所的武装伪警察，出动三十多人，扑向尤家坟村。进村后，就打听“张红眼”家住在哪里（这个“张红眼”是我的当家子叔伯三哥张贵的绰号）。张贵家在我家的东边不过一百米左右。敌人找到张贵家后，迅速地登上了他家的北房房顶，边放枪边投掷手榴弹，还大声喊抓活的。游击队驻军听到枪声喊声，判断是被敌人包围了。刘吉沉着应战，一边指挥队员扒树跃墙、抢占院外的开阔地带，一边还击敌人，掩护同志跳墙出院，经过一阵的游烈战斗，十多名游击队员全部突围出去。不久，敌人占领我家的北房顶，敌人利用至高点，继续围攻院内没有突围的队员。战斗中刘吉在最后一个跳出院墙后，牺牲在园田的开阔地，年仅 24 岁。其余游击队员全部冲破敌人包围。

我游击队被敌人突然包围并造成重大伤亡事件，一直没有查清是谁向敌人报告的。全国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在县、区、乡政府的主持下，虽然经多次调查审查，至今仍无结果。

日军飞机轰炸下英水村

隗和坤 范占元 口述 李志国 整理

1938年腊月二十八日（1939年2月16日）下午2点多钟，天气很冷，吃完午饭后的人们，有的准备出门，有的在家聊天，小孩子们则围着火炉烤火。突然，一架日军飞机向下英水村呼啸冲来，将两颗炸弹投到了李宗芝和范占元家，给他们带来沉重的悲痛和永久的悲伤。

隗合坤：我们家当时共6口人，加上大伯家一共10口人。父亲李宗芝，母亲罗氏，姐姐8岁，二哥李印田5岁，我4岁。吃完午饭，父亲准备从西屋去北屋，大伯李宗堂准备外出，临走时对父亲说：“飞机要来你们去后山躲一躲。”父亲应声说：“咱们这山沟沟，四面都是大山，飞机来了还不撞得粉身碎骨，自取灭亡啊，甭耽心”。父亲去了北屋。我和姐姐等人每人抓了把黑枣儿，去东屋围着火炉吃。大妈和娘抱着小妹随后也准备去北屋。当走到二门楼时，日军飞机从村南方向，擦着房顶向我家冲来，投下了一颗炸弹。把二门楼炸成两米深的大坑。北屋两间房炸塌了，东屋3间只有两个立柱托着个柁，还立在那里。轰炸时，飞落下茶杯大小的弹片，巴掌大小的石头，脸盆大小的石板，在我们头上乱窜。我们姐弟四人，被巨大的爆炸声震昏过去了。我姐被炸弹震的掉到炉坑里，受了轻伤。接着又听外面大妈叫人的喊声。原来是大妈和她的女儿被压在石板下了。我们几个就把石板扒开，把大妈救出来，只见她脸上血肉模糊。压在大妈身下的小女儿安全无恙。这时，大伯和街坊四邻也都跑来了。大伙都急着找我的父母。在一堆乱石板下找到了父亲。他倒在血泊中，头被炸开了花。见到父亲死的惨状，我们三个全都哭了。然后又从废墟下找到了妈妈和小妹子。他们都成了血人，也早已停止了呼吸。

第三天，大伯和亲友们把父母发了丧。第二天就是农历大年初一。别人家都欢欢喜喜过年，而我们家却过的是泪水洗面的年。

父母的死，大妈的严重炸伤，给本来就很穷苦的家庭真是雪上加霜啊！再加上我们三个“吃货”。大伯也着实为难。在那个兵慌马乱的年代，甭说一个身体很弱的大伯，就是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都难以养活自己呀！

冻饿加悲痛，真是山穷水尽。半个月过后，正月十五刚过，姐姐就冻饿而死。姐姐死后，二哥也离家出走，踏上了讨饭之路。

范占元：日军轰炸那年我6周岁。那天午饭后，我的老师崔化宣正好也来我家。父亲范朝瑞去了安子药铺。爷爷和母亲都在家。我们正在聊天，说学校和我学习的事。突然，从村南传来飞机的嗡嗡声。说话间，一架日军飞机在离我们二百米处的李宗芝家投下了炸弹，发生了巨大的响声。倾刻，飞机又朝我家冲来，把一颗炸弹投到了我们的房子，轰地一声巨大响声，弹片、石板、石头、椽子和杂物向四处飞砸。爷爷范春被炸昏了，身上穿的棉袄被炸了好多大窟窿，前胸鲜血直流，湿透了棉袄大襟，有气无力地躺在地上。崔老师头部多处受伤，鲜血直流。叔叔范朝旺本来在他的房间呆着，也被弹片炸穿了右胳膊。我的右半边脸从右眼眶到耳垂下，炸有二寸长的一道大口子，疼得我一个劲地喊叫。妈妈被炸塌的一架木柁压在里屋门后的椅角处。费了很大的劲挣脱出来，把上衣撕下一块，给我缠上了伤口。

妈妈含着眼泪，一边给我包扎，一边安慰我说：“好孩子，忍着点，晚上你爸爸回来就有救了……。”爸爸是名医生，晚上回家后，看到三间房被炸平了。爷爷、叔叔和我又炸成这个样子，心里很是难过，打开药箱，给我们都换了药。冬天的伤口很难愈合。吃得很差又缺乏营养。崔老师几个月在家养伤，不能到学校为学生上课。叔叔造成了终身残废。右胳膊不能提重物，劳动受限。爷爷胸部肋骨一遇天气变化就隐隐作痛。我的伤口虽说有父亲的精心治疗，爱心呵护，但因面积大，脸部肌肉薄，且又是斜向伤口。反复难愈，三个多月后才开始愈合。这就是日本侵略者罪行的历史明证。日军狂轰滥炸，惨无人道的罪行，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不能抹去。

下英水村遭到这次轰炸，造成人心慌慌，人们提心吊胆过日子，耽心日军再次来轰炸。人们也总结了教训，家家户户都挖了防空洞，甚至有不少人家在自家地里和山里还挖了永久性的防空洞，以防日军的轰炸。

日军轰炸云居寺

高永来

1940年农历正月初三，我和母亲去水头村看我外婆，走到云居寺附近时，亲眼见到日本侵略军飞机第三次轰炸这座千年古刹。我根据自己的亲生经历、母亲生前的口述，另外收集了当时云居寺的马夫刘明启等人提供的资料，特整理本文，以警示后人牢记历史，不忘过去。

日军三炸云居寺

日军飞机对云居寺的轰炸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1939年9月的一天下午，天上突然响起隆隆的声音，人们抬头一看原来是几架日本轰炸机排成三个“品”字型，向云居寺扑来。飞到云居寺上空后，扔下许多炸弹，进行了密集的轰炸，造成一个云居寺看门的僧人和六个村民被炸身亡。云居寺的那个僧人被炸死在山门前，肠子挂到树梢上，其余的人被炸死在杖引河边上。死人的鲜血把河水染红，还有不少人炸成轻伤或重伤。因水头村农民靠山养牛羊的农户很多，死牛、死羊到处可见。羊头挂上树梢，牛头离身十多米，鲜血染红炸弹坑。云居寺大殿和配房被炸了很多窟窿，院中东山墙被炸塌，碎石满地，弹痕累累。杖引河两岸的云居寺大树，有的被拦腰炸断，有的被连根拨起，有的东倒西歪，真是惨不忍睹。

事隔七八天后，日军飞机又来第二次轰炸。这次又来六架，飞的很低、很慢，目标是轰炸云居寺院内庙宇，扔下了很多炸弹。多数炸弹投在山墙四周，有三颗落在云居寺正殿上。一颗落在释迦殿南配房屋顶上，整个大殿被炸塌，另一颗落在毗卢殿的正顶上，把毗卢殿基本上炸落了架；第三颗落在天王殿门前，左右院墙炸塌大半，钟鼓楼被炸的乱七八糟，不成样子，山门前左侧的石狮子右前腿被炸断。

第三次轰炸是1940年的正月初三，正赶上那天我和母亲骑驴去水头村看外婆。这次轰炸来势猛，规模更大，我亲眼目睹十二架飞机向云居寺扑来，扔

下一串串炸弹，就立即返回去，接着又返回轮番轰炸，反复多次，轰炸了很长时间。我村“大废石”（人名）打柴路过此地，被炸成重伤。我和母亲骑驴走过这里，母亲头部受伤，鲜血染红了上衣，我的右腿被炸倒的树木压断，毛驴被炸死。还见到蔡家口村羊信王有水放羊被炸成重伤，牛羊炸死一片。受伤的人被水头村、下庄村、三岔村的乡亲们救走。具体炸死炸伤多少人当时无法得知。当时云居寺南道边上的十八株大杨树全都二尺多粗，二十多米高左右，全被炸毁。

为什么要轰炸云居寺

卢沟桥事变后，房良两县是日军南侵的必经之途，日本侵略军就想在房山境内发动试探性的进攻。1937年8月中旬，退出宛平城的二十九军吉星文团和来增援的二十六军孙连仲部，在良乡城失陷后，在房山地区大石河一线英勇抵抗日军进攻，阻其南下，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血战一个月后，被迫撤离。9月16日，日本军队侵占房山县城，房良境内的平原地区全部沦陷。

云居寺是平西的重要根据地，是通往十渡、霞云岭的交通要道。当时十渡地区有中共领导的平西七团、九团部分连队在此休整。西河村有冀中部队和冀中被服厂。七渡、八渡、九渡有冀中军区修械所。前石门村、后石门村是冀中医院，有不少伤病员在这里养伤。当时云居寺还有一股以陈东来为首的武装势力，有石秀亭、周文龙、胡镇海、郭志和等人组建的十路“华北抗日救国同盟军”。其中一、二、三路主要活动在房山，总司令陈东来，号称十万人，总司令部就设在云居寺。这支武装力量填补了国民党军队撤退后的军事空白，曾多次与日军交战，日军对其恨之入骨。当时日军认为云居寺是平西抗日根据地首脑机关驻地，加之有大面积目标不好发现，于是决定要把云居寺炸平。

抢劫云居寺

1940年农历八月十五日，日军对我根据地进行秋季大扫荡。一股日军来到云居寺，见到经过三次轰炸后，寺院内僧人多已转往他处。于是丧心病狂的日军对云居寺进行了疯狂的抢劫，一些贵重的文物被洗劫一空。

日军洗劫后放火烧了云居寺，把中轴线上的六层主殿和中轴线南北两侧的建筑放火烧毁。大火着了一天一夜，烟雾弥漫了白带山麓。火烧云居寺后，日

军又来到附近水头村，抢走了老百姓的牲畜和粮食无数，又将全村 308 间民房也全部烧毁。

云居寺南塔被毁

日军为封锁平西抗日根据地与平南翼中的通道，在云居寺东南方向建立了三道防线，第一道外围在蔡家口，三岔村的山头上；第二道在下庄村西南的山头上；第三道在石窝村南通张坊公路边上。这三道封锁线都建起岗楼，炮楼驻扎日本军队和伪军，建筑炮楼的材料由当地大编乡设法解决。

被封锁的这条道路是通往平西抗日根据地，为八路军送物资转交情报的主要干线。敌人修的岗楼很多，给平西抗日根据地军民带来很大困难。云居寺南塔是辽代所建，密檐式十三层，耸立在石经地穴的北沿上，弥足珍贵。盖炮楼材料怎么办？日军强迫大编乡各村维持会抽调下庄、水头、三岔、前石门、后石门、高庄、下营、岩上等村青壮年当民夫，赶着毛驴去云居寺拆南塔。由于塔很牢固不好拆，只能从塔基下找砖缝，用锹杆翘，用板镐刨，围着四周一块一块的往下拆。拆下的砖装上驮子，送到下庄南坡顶上建盖炮楼。一块大砖重五十多斤，一头毛驴每次只能驮运两块。小伙子们搬一块都觉得吃力，拆了几天后，塔基和塔的四周一至三层都搜空了，只剩下孤零零的塔心，支撑着上边十多层塔身。干活的民夫都担心，不知道哪天会倒塌，谁也不敢再登上去拆了。

一天中午，附近的民夫回家吃饭了，远道的民夫也到离塔身远处的林子里去吃干粮。只听到“轰隆”一声巨响，南塔倒了。“一朝颓坏哀烽烟，空留碑碣对尘寰”，这座建于唐初，具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云居寺，就这样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中化为了一片瓦砾。

磁家务地雷战

王硕儒

1946年6月，蒋介石背信弃义，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公然向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进犯。1947年7月，曾调集兵力进占我冀中解放区。驻北平（今北京）地区及房、良的敌人也在积极活动，妄图配合冀中之敌的进犯和破坏平西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我解放区的军民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当时，平西解放区良乡县机关所在地驻河北村。对敌斗争主要依靠民兵的力量，防御重点是磁家务、南窖两条主要路线。磁家务是由坨里通向河北村乃至整个河套沟的必经之路，在当时是保卫良乡县机关所在地、保卫平西解放区的前沿阵地。因此，良乡县在磁家务一带建立了民兵联防小区，加强防御。

1947年7月15日，我良乡县武装委员会获得确切情报，得知国民党三十五军的两个营，纠集驻长辛店、良乡、坨里、房山还乡团共约三千人在坨里集结，准备向平西解放区良乡县机关所在地进犯。对此，我良乡县领导在河北村召开区村干部紧急会议，分析敌情，进行战斗部署。决定在磁家务一带给敌人摆下一个地雷阵，并明确磁家务联防小区，由张丰田负责，统一指挥，集中优势兵力，从坨里附近开始，在磁家务一带通向河北的各个路口上布设地雷。同时，对坨里通向河北村的南、北两条山径小路和河北村附近，也派民兵布雷防御，要求区村干部带领民兵迅速行动，在敌人发动进犯的前夜，分头进入指定地点，完成布雷任务。各区接受任务后，各就各位，连夜共布雷150枚。

16日晨，开始有小股敌人进行试探性进攻，当日返回坨里驻地。17日，敌人主力全部从坨里出发，沿河套沟向河北村大举进攻。另一方面两小股敌人沿南、北两条小路向河北村包围。敌人主力在磁家务一带踏炸地雷21枚，在河东、东庄子、河北村边踏炸地雷4枚，造成敌人寸步难行，终未进入河北村。北路小股敌人经漫水河村边踏炸地雷3枚，在北后山上踏炸地雷5枚，在北车营村边踏炸地雷1枚。南路小股敌人沿口头村东经小长峪、口头山、万佛堂、半壁店、黄土坡等地向河北村包围，在口头桥被敌人起炸地雷1枚，口头村附近敌人踏炸地雷3枚，在小长峪岭、万佛堂路上、东山、黄土坡，桑峪岭又踏

炸地雷 10 枚。敌人共踏炸地雷 48 枚。另外，被敌人拉响、自己人踏响、狗踏响的失效爆炸 19 枚，被敌人起走 10 枚。

据 17、18 日统计，敌人共伤亡 87 人（伤 72 人，亡 15 人）。磁家务的地雷战，大大发挥了地雷的威力，使敌人到处挨打、挨炸，不敢轻举妄动。有力地阻击和破坏了敌人的进犯，迫使敌人不得不退回坨里。7 月 25 日，敌人再次进犯磁家务，又踏炸地雷 6 枚，炸死炸伤敌人 7 人。至此，这次战斗，终以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这次战斗，受到了晋察冀军区武装部的好评，被称之为成功的战例。

“土改”工作中的一次遇险

张玉泉

“随着岁月的流逝，参加工作后的许多往事被淡忘了，但是刚刚调来良乡县就参加土地改革运动，进村开展工作刚十多天就遇险了。这件事常常闪现在脑海中，让我永生不忘。”今年78岁的离休干部秦芝儒回忆说。

1947年8月底，21岁的秦芝儒从涞水县调入良乡县委实业开发科任科员（当时良乡县委设在房山区佛子庄乡佛子庄村）。当年冬天，秦和良乡县五区区委委员刘玉常一起，被派往南窖乡水峪村搞土地改革运动。刘玉常任水峪村“土改”工作组组长。秦芝儒是组员。

此次“土改”是为了贯彻1947年初华北局在阜平召开的土地改革工作会议精神，对地富阶级分子进行“坚决斗争，无情打击”，那时叫“搬石头”。

他们进村后首先积极发动群众，通过各种形式进行摸底调查，为顺利开展工作做准备。

进村十多天后，一天夜晚，工作队准备召开骨干会，等了半天人也不齐，刘玉常派秦芝儒去村里找人。水峪村住户分布在一条大山沟里，他摸黑走到村西，迎面过来一个大高个子，一点儿也看不清他的面孔，大个子问：“你是‘土改’工作队的？”秦芝儒说：“是”。那个人说：“我跟你反映点儿情况”。秦芝儒于是跟着那人走入岔路口往南拐到一个崖下。大个子见四下没人，用背后藏着的木棒冲秦芝儒的头猛打几下，把他打晕在地上，又用口袋把他套上，想扔进不远的大山沟里。正在这时迎面有一伙人打着灯笼举着火把过来了。那人以为是找秦芝儒的人，实际是娶亲的人到山那边去接人的。这个人慌忙地扔下秦芝儒就跑了。娶亲的人发现秦芝儒赶紧去驻地报告给刘玉常。刘玉常连忙找人把秦芝儒抬到驻地，并组织担架队把他抬回县委。这时天快亮了，秦芝儒仍没有清醒，眼睛红肿得睁不开，耳朵也被打聋了，过了很久他才清醒了。

时任县委秘书的张令德，立即找来医生看病，派专人护理。秦芝儒在县委院里养了一个多月。左耳一直听不见，右眼一直布满白丝，看不清东西。经过近一年的治疗，症状才渐渐消失。

出事后，县委派公安人员到村里调查了很久，虽然确定了怀疑对象，但始终找不到有力的证据。

1948年初，秦芝儒才回到科里工作。此次遇险引起了县委的高度重视，专门给各工作队发了注意安全，严防阶级敌人打击报复的通知。

(根据秦芝儒口述整理)

房山东关的一次劫难

张广文

房山老城为 500 米见方的一座石头城，说是石头城，因为城墙主体均由大块花岗石砌成。城墙一直存在到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后来，因为县城内各项公用建筑需要用地、用石料，就断断续续拆了城墙砌院墙了。一座城本来应该有四门，门外有四关，不知什么原因，到 1948 年解放前房山城只有南关、北关有关有村，而出西门就是一条沙河，没有村。出东门是一条大路，路南路北，沿城墙稀稀落落分布着二十几户人家，不成关又不像村，于是不叫东关叫小村。

小村的住户除了吴家、崔家两个大户居住时间比较长久，其他大多是数年前从河北省中部、南部地区逃荒来的穷家小户，以保定、沧州、石家庄地区来的居多。解放前，小村的住户有的家有少量的田地耕种，但都不够吃喝，多数都租种县城里地主家的地种粮、种菜，而且要打短工、卖菜，做小买卖和耍手艺贴补家用。比较有名气的有糊纸活的画匠崔家、弹棉花的棉花王家、木匠耿家、菜园孙家。其他的还有卖菜、卖布、卖黄土、焊洋铁壶、编筐、编篮子、编酱蓬（一种草编的蒸笼）等。

当时的小村没有一座砖瓦房，富裕一点的是带砖腿的土坯房，大多都是低矮的土房。1948 年，解放战争中解放军取得节节胜利，进入了决战决胜阶段。统治房山县的张德祥保安团感到了穷途末日，又不甘灭亡，于是进行了垂死挣扎。先是到四乡抓民夫，在距城墙几十米的地方挖护城壕，放进水。到了当年的秋天，县城十里地以外的乡村都有共产党武装的活动，保安团龟缩在县城里惶惶不可终日，就怕解放军攻城。当时，南关、北关都有保安团守卫，他们怕解放军从东面攻城时把民房当作进攻阵地，就出了坏主意：把东城墙外的房屋全部拆光，住户全部赶走。

记得当时人们都在忙着秋收，一天早上，村里突然来了一队荷枪实弹，拿着铁锹、铁镐和大绳的国民党兵，告诉各家各户，限当天把房子拆平，人员一律搬走。由于事情来得太突然，老百姓又没有丝毫准备，房拆了，人往哪儿搬？没家了，地里的庄稼和菜怎么办？一时间，村里哭的、喊的、闹的此起彼伏，

有的跪地哭求，有的据理力争，要求宽限几天，先找地方搬家再拆房。来的国民党兵根本不听这些，只是说这是命令，死活不管，反正得先拆房。后来知道来拆房的主要是当时大乡队的人，十二大队的拆南沟（现今褚榆树街一带），其他由十四大队管。一开始还是挨家挨户通知。你同意拆了，他们就看着你从屋里往外搬东西，谁家说个不字就要捆人往城里送。看着把屋里东西搬完了，拆房队就开始“帮助”拆房了。后来听说，十二大队的兵还有点人性，拆房是从房顶上拆，让房主慢慢拆出木料门窗还能使用。十四大队的兵就灭绝人性了，他们硬是先拆墙，露出柱子以后拴上绳子，十几个人一拉，整座房屋就塌了，石板、木料、门窗，碎的、毁的一大片，辛辛苦苦几十年置办的家业毁于一旦，惨不忍睹。

只半天时间，东门外一里地以内的房全都拆平，向东一直拆到陈家坟（现在药材公司一带），连同挖壕，县城周围共拆毁民房 1000 多间。几十户老百姓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了，还得赶紧到周围的村子找房准备下午搬家。从此以后，东门外再也没有了人家，保安团回城后把东西城门都关了，只开南北两门，还得过吊桥，吊桥一提，不能出，不能进，几乎是一座死城。晚秋的夜晚，天气已经很凉了，一些当天没能搬走的人家，只好把破门破窗架在残垣断壁上，再盖上些柴草，钻到里面御寒。

我那年已经 8 岁，记得天黑之前跟着祖父、父母，带着弟弟来到饶乐府村南后头的一个地主家的场院里，算是搬家了。“新家”原是地主家的场房，是一座低矮破旧的南房，两个小小的南窗，一到太阳西斜屋里就看不清面孔，冬天冷夏天热，有雨到处漏。这样的房子，我家一直住到 1953 年。

两三天的时间，一个村子就这样毁灭了。全村人以投亲靠友为主，也有租赁房子的，没有一户搬家后是买房的。几十年心血就这样完了。几十户人家又一次背井离乡。搬到饶乐府的较多，有吴家、魏家、张家、郭家、王家。崔家几十口人搬到南关孙家店院内，耿家搬到北市，肖家搬到洪寺，蔡家搬到顾册。也有几户搬进城内，还有几户搬到陈家坟以东姑娘坟的（现房山医院北侧一带）树林里暂时栖身。

多行不义必自毙，得人心者得天下。拆房赶人也好，挖壕修工事也罢，都阻挡不住解放军的强大攻势。1948 年 12 月 12 日，解放大军终于来到城下。13 日那天，从早到晚枪炮声不断，先是拿下齐家坡据点，夜里又拿下小山坡（也叫兵盘山）据点。张德祥见大势已去，当夜带着残兵败将从北门逃出了房山城。14 日早晨解放军入城，房山县获得解放。

解放以后，经过五六年时间，小村的老百姓大部分克服各种困难，陆陆续续从各地回到村里，在废墟上盖起了自己的房子。东门外的村落正式叫东关。而搬到陈家坟和姑娘坟一带落户的则叫新东关。

1958年公社化以后，东关划归了东街大队，新东关为一队，老东关为二队，从此小村的村名就消失了。

在良乡县委工作的回忆

罗玉源

1948年12月良乡县解放，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良乡县委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一样——由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转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良乡县委领导广大党员群众，经过三年恢复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之后，全面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至1952年，恢复国民经济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全县完成了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广大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愿望，欢天喜地庆解放，满腔热情迎土改，开展农业大生产运动，组织互助合作，农业取得了好收成，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和提高，社会秩序空前安定祥和。

1953年，良乡县委全面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了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县委统筹全局，双管齐下：一方面组织全县人民大力发展生产，建立健全各级组织工作，发动群众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一方面对农业、手工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到1956年，全县农村出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互助组、初级社，又到高级农业社，并且形成了高潮。同时，对手工业、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从而使全县各方面的工作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然而任何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工作中的问题还是有的，因为解放时间还不长，工作中的困难还不少。

为了发展大好形势，1956年4月，县委召开了中共良乡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由各基层和县直机关党组织选举大会代表138人。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良乡县第一次代表大会组织法》和议事规则，总结了解放后几年的工作，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和工作任务。最后全体代表投票，选出县委委员29人。经县委第一届一次会议选出书记1人，副书记3人，常委9人。县委书记张令德，第二书记兼县长曹庶民，副书记姜永刚、胡汉文，常委有罗玉源（农村工作部长）、金宝巨（县武装部长）、许庆山（副县长）、秦芝儒（县财贸部长）、尚元基（县供销社主任）。县委下设秘书室、组织部、宣传部、农村工作

部、财贸部、文化教育部、纪律检察委员会和党校。县委所属的区有 4 个：一区设在城关，二区设在魏各庄，三区设在琉璃河，四区设在葫芦堡。全县共有 47 个乡党总支部。

新当选的首届县委领导班子，在上级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朝气蓬勃地率领全县广大党员群众，全面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良乡县是个农业县，笔者作为农村工作部长，如何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是一种神圣职责。根据县委的整体部署，以农业为中心开展了农业大生产运动。为了做到旱涝保丰收，广泛发动群众大规模开展农田基本建设，修渠打井，植树造林，防止水土流失，改变生产条件，大搞平整土地，积肥造肥，合理施肥，千方百计夺取农业增产增收。为了充分发挥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把农业合作社办好，县委召开了三级干部会，深入学习毛泽东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和党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积极推广农业合作社增产增收的经验，推广劳动、生产、财务三大管理经验，推广勤俭办社的经验，使全县农业生产合作社健康发展。

新县委领导班子认真贯彻执行毛泽东主席关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指示，在全县深入开展粮、棉、油统购统销工作。通过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做到了征购销合理，完成了全县征购任务，确保了全县物资正常供应和人民生活安居乐业。

从 1948 年至 1956 年的八年间，良乡县旱涝灾害不断。为了确保全县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县委着手进行水利规划，将县境内永定河、大石河两条大的河流进行分段治理，加固堤防，引水灌溉，改旱田为水田，种植水稻、养鱼。同时对小清河进行疏通、截流，并计划在刺猬河上游修建中型水库——崇各庄水库。1957 年，经县委研究决定，报请河北省通县专区批准，后经省、专区、县三级水利部门实地考察，制定方案，正式实施。水库的修建坚持以蓄为主、蓄泄结合、开发水源、兴利除害的原则，由通县专区水利部门设计，由良乡县政府组织人力物力进行施工。为了加强领导，组成了修建水库指挥部，曹庶民任总指挥。笔者任副总指挥，负责组织民工、调集车辆和粮油供应等工作。至 1958 年 4 月，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水库基本建成。水库总容量为 1400 多立方米，可控制流域面积 70 余公里，总用工 45 万工日，完成土石方约 42 万立方米，总投资近 20 万元。为了给水库增加水源，扩大灌溉面积，保证水库长年有水，开发养殖业，又实施了漫水河引水工程，从而使青龙头与崇各庄两水库相连，名为崇青水库。真正达到了蓄水开源，扩大灌溉，防旱防涝，兴利除害之目的。

今天回顾建设水库的岁月，激起了笔者对当时那个年代的怀念，因为这是良乡县解放后建设的一项较大工程。当时全县的经济状况和财政收入并不富裕，主要靠两条：一是靠领导的决心和信心，县委领导第一书记张令德亲自挂帅，第二书记兼县长曹庶民亲自带队到工地现场指挥，县委、县政府有关部门大力支持，共同做好组织宣传、后勤供应等方面的工作；二是靠全县广大水库建设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战严寒，斗酷暑，艰苦奋斗，克服了种种困难，充分发扬了吃大苦、耐大劳、无私奉献的精神。水库建成至今已有 40 余年的历史，然而昔日建设工地热火朝天的施工场面，至今仍记忆犹新，难以忘怀。水库建设者的光辉业绩将永垂青史，为子孙后代所敬慕。

从 1956 年第一次党代会选出新县委领导班子，到 1958 年三年间，除了完成工农业方面的工作以外，还完成了整党建设、党内整风、肃反审干、城市建设，以及文教卫生和商业等方面工作。

1958 年 4 月，房山县、良乡县两个县合并，由河北省划归北京市领导，从此，房山便掀开了新的一页。

房山县“革委会”的组建

罗玉源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全国人民积极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号召，纷纷投入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来，各种自发的、名目繁多的群众组织相继成立。特别是同年8月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之后，学生停课“闹革命”，开始了大串联，红卫兵组织涉及全国各地，使形势的发展失去了控制。为了确保红卫兵大串联稳妥有序地进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派出解放军负责组织接待和安置工作。

文化大革命斗争的矛头是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即当时执掌党政大权的领导干部。房山县和全国的形势一样，首先是各单位被“夺权”，使县直领导机关不能正常办公；然后把矛头对准县委书记霍梁、县长曹庶民。从1967年到1968年，全县党、政机关负责干部都一无幸免地被“罢官”，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批斗，甚至住进“牛棚”，后来大部分同志去“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此时，从县直机关到各公社党政组织都处于瘫痪状态，无人负责，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受到了影响。

不久，党中央、中央军委又派解放军参加“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当时包括县武装部在内，房山县有六个团级以上驻军单位，根据上级的指令，抽调官兵到县直局、委、办和各公社参加“三支两军”工作，实行解放军、机关干部和群众组织三结合的领导，形势发展有所缓和，但动乱不止，派别斗争依然很激烈。1967年，市、县都成立了以解放军为首的“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负责领导工作。于1968年春，市革委会第一线指挥部召开全市抓革命促生产会议，总结了一年来的工作，房山罗玉源、张仲林（军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受到表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及北京市领导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

在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的基础上，经过多方协商，并报请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批准，1968年2月13日，在房山东关中学大操场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房山县革命委员会成立，由军代表刘光师长任县委会主任兼党的核心组组长。

1969年6月调整领导班子，市革委会任命铁四师孙海同任县革委会主任兼党的核心组组长。县革委会副主任、党的核心组副组长有彭绍智(驻军副师长)、罗玉源(原县农村部长)、郭馨亭、艾光华(县武装部政委)。县革委会副主任、党的核心组成员有张成基(原县农机局长)、孟常友(原县纪检副书记)和领导成员、驻军团级干部张仲林、杨斌、杜仰峰、何殿国、冷玉彬等。

县革委会和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办事机构，本着精简的原则，实行两个组织一套领导班子。下设8个组，以军代表为主，适当安排原县委、县政府的干部，还有群众组织的代表。办事组组长柳景民(军代表)、副组长赵玉文；政治组负责人由罗玉源副主任兼，组长李太忠、郑建才(军代表)副组长5人；计划组组长王悦兴(军代表)、副组长夏方伟；财贸组组长刘增勒、副组长秦芝儒；工交组组长张茂林(市下放干部)；文卫组组长刘庆恺；农业生产组组长冷玉彬(军代表)；政法组组长李忠孝、副组长张志。

房山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原县委、县政府干部，大部分集中到大石河“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后来又到天开村附近一个医院办学习班，之后陆续分配工作。全县31个公社也先后建立了革委会。为了建好公社党委，经县党的核心小组研究决定，张成基、孟常友、罗玉源三人负责调查研究，提出候选人名单，各方协商一致，召开党代会选举等事宜，此项工作到1969年完成。

回顾“文革”十年，这是我党历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和重大损失，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受到了很大影响，广大领导干部受到很多挫折。在这种情况下，房山县在解放军“三支两军”的支持下，建立了“房山县革命委员会”和“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从而结束了无政府状态，并且领导全县人民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直至1976年10月，房山县召开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选出新的县委领导班子，“房山县革命委员会”及其“党的核心组”完成了它特殊的历史使命。

下放劳动琐记

宋 湘

1966年春夏之交，“文革”风暴席卷全国。房山自难幸免，县委、县人委及县直各部、委、办、局领导干部绝大多数被揪斗，惨遭迫害，机关工作陷于瘫痪。1967年全县形成两大派，武斗时有发生，全县一片混乱。当时笔者在房山县人民法院任助理审判员、办公室负责人，亲历了这场浩劫。

1966年9月1日，院长鲁敏生、副庭长常彬被揪斗。1967年2月，副院长曲珣也被揪出。全院仅有的3名领导干部全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审判工作和法院各项业务完全瘫痪。揪斗“走资派”，开展“革命大批判”，两派“舌战”、“笔战”，大搞“红海洋（所有房屋、院墙刷上红漆，用黄漆书写“语录”）”成了全部活动。

1967年2月，驻房各部队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分赴机关、企业、学校、农村“支左”，促使两派“大联合”。1968年2月13日，成立房山县革命委员会。同月，公、检、法宣布“军管”，成立房山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检、法两院合并，成立检法军管小组，隶属于公检法军管会。2月19日，军管小组进驻法两院。

1968年9月5日，县直机关全体干部（除少量留守机关工作外）集中到岳各庄公社天开村北京市第二精神病院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行军事化管理。各机关编成7个连，政法三家编为第7连。9月18日正式举行开学典礼。在“活学活用”的基础上，准备开展清理阶级队伍、整党、“一斗二批三改”。

10月，上级指示，实行军管单位撤回原单位单独搞运动。公安局先期撤回。11月19日，检法两院也撤回房山。在军管小组领导下，以“活学活用”为中心，以“革命大批判”为先导，先后开展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斗批改活动。在此期间，除继续批斗“走资派”外，一般干部有的因为说错几句话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遭多次批斗或批判；有的因家庭出身问题、工作中的一般缺点

错误问题，被诬陷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修正主义的黑苗子”、“走资派的保皇派”，被大字报点名，大会检查批判；有的人上吊自杀。

1969年6月，整党中人人过关。党员分两批恢复组织生活。我有幸与被“解放”了的“走资派”同时第二批恢复组织生活。接着，又用了一段时间专题批判不少人存在的“斗批走”“错误”思想。检法两院除抽调县革委会工作3人、1人自杀外，共有干警25人，留机关4人，占16%，下放劳动21人，占84%。

下放劳动的21人分成4个组。周口店公社车厂大队一组5人，组长是原院长鲁敏生；长阳公社西营大队一组5人，组长是原副院长曲珣；大紫草坞公社大紫草坞大队一组5人，组长是原副庭长常彬，我被编在这一组；分到县直属大石河“五七干校”一组6人。

初到农村

1969年6月24日上午，军代表主持了下放干部“欢送”大会。人们一个个心事重重，默默无语。会后各自收拾行装，同志间悄悄地互道珍重。下午乘汽车分赴各自岗位。

我们大紫草坞下放小组5人（原副庭长常彬，原审判员张永海、王书田，原检察员谢全德和笔者）到公社后，受到公社革委会主任霍占山同志（“文革”前团县委书记）热情接待，夜宿于公社。第二天，大紫草坞大队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把我们领到该村。

到村第二天，我们五人就来到二队场院与社员一起劳动。当时已是麦收尾声，在场院拆垛、摊场、轧麦。虽然我们的体力远不如社员们的健壮，又缺乏干活的技巧，但我们使出浑身的力气不停地干，尽管汗流如雨，腰酸腿软，也不愿停下来歇一会儿。

进村时村支部书记说：“来不及安排住处，暂时借住社员家，过几天给你们收拾好房子再搬家。”7月4日，大队通知我们搬家。到了“新居”一看，原来是二队刚刚腾出来的一个饲养院。两间西房是驴棚，安上了门窗，抹了白灰，低矮、阴暗、潮湿，牲口粪尿味刺鼻；一间东屋是饲养员宿舍，对于这种待遇，我们毫无怨言，二话不说，7月5日我们搬进了“新居”。

在劳动中锻炼

按照市革委会规定，下放干部的主要任务有三条：一是“高举”、“突出”、“活学活用”，实现自身思想革命化；二是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向贫下中农学习；三是帮助基层干部搞好抓革命、促生产；后来，第三条任务进一步明确为给基层干部当好“参谋”。

开始，我们把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作为首要任务，深入生活，磨炼自己。除公社、大队开会外，基本上天天与社员一起上下工。当时，已是麦收尾声，主要活儿是在场院，扬场机扬起的尘土，麦糠灌得满头满脸，浑身上下如同泥人。我们不仅从中体会到农民劳动的艰苦，而且从中学到了许多农业生产知识。

8月下旬，处暑节后，我们和社员一起到地里收割芝麻。我突然发现，上百只燕子在人们头顶穿梭不息。问到社员方才知：芝麻地里蚊蝇昆虫极多，人们进地轰起昆虫，正是燕子捕食的大好时机，年年如此。这幅农田小景令我惊奇不已。当我看到芝麻秸杆还湛青碧绿，以为尚未成熟。社员告诉我：到节气就必须收割，如果等到秸杆干了再收，芝麻就全都爆洒在地里了。就是现在，也要用镰刀一根一根地割下来，把上半截爆开的芝麻粒抖在筐箩里，然后用黍秸把芝麻秸捆起来，直立码好运回场院，等下半截干透再抖。这时我才发现，与芝麻地相邻的是一片黍子地。两种作物同时成熟收割，正好用黍秸作捆扎芝麻的工具。

9月中旬，玉米成熟，掰玉米棒子倒不算累活。掰完棒子要用小板镐一棵一棵地砍掉玉米秸，以便腾地种小麦。这是一项重体力劳动，对于长期干活的社员们，包括许多女青年，这也不算什么。只见他们一人一垌、一镐一棵，很快就倒下一大片。我使出浑身力气也跟不上人家，而且一会儿工夫，右手掌已经磨出四个大血泡。用手绢把手包扎上，咬牙坚持下来。

当好参谋

我们进村时，正值“文革”进入“落实政策”阶段。办案是我们的本行，这回派上了用场。我们和大队干部一起，对于原有戴着帽子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和运动中揪出的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逐个谈话审卷，开展内查外调，发动群众讨论定案，上报公社审批。用了两个多月时间搞完了落实政策，除“戴帽四类”按当时政策需继续改造外，其余十几人全部得以解脱。

接着，着手整党，重点整顿领导班子。我们进村时班子涣散，有些主要干部“撂挑子”。经过一个冬天的整顿，调整了领导班子，工作面貌焕然一新。

从此，该大队成为全公社各项工作的先进典型。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我们帮助支部班子制订来年生产计划，冬季发动社员兴修水利，平整土地，安排劳力、车辆，农闲输出搞副业。

青年中蕴藏着巨大潜力。我们帮助支部在三个生产队培训骨干，发起成立“青年突出队”、“青年学习小组”。每队由开始的几个人迅速发展到十几人、二十几人，在各生产队“抓革命，促生产”中起到了生力军作用。学雷锋、做好事成了这些青年经常性的活动。一批青年骨干被评为出席公社、县的积极分子、模范、标兵、代表。许多青年申请入团、入党。

下放小组上了《人民日报》

积极参加劳动，密切联系群众，参与村中工作，当好参谋，很快改变了我们在群众中的印象，再也没人把我们看做“黑家伙”。组长常彬同志被社员尊称为“参谋长”。我们的住处也由牲口棚迁到了一户社员家，待大队盖了新的办公房和礼堂后，我们又迁到大队院里。

我们的工作很快得到公社和县里的重视。1969年9月，我们小组被评为公社和县“下放干部先进小组”；常彬被推选为参加建国二十周年观礼代表，10月1日在天安门观礼台上参加了国庆观礼和焰火晚会。

1970年3月20日，《人民日报》两位记者来公社。此后几天我执笔起草稿件。3月23日我和常彬去北京王府井《人民日报》社。记者郭龙春热情接待了我们，并连夜帮我们修改稿件。4月初，《人民日报》将稿件清样发到县和公社征求意见。4月7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如何办好五·七干校的讨论》专刊第18期刊登了署名“房山县大紫草坞下放干部小组”的文章《切实学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全文约4000字)。4月10日，《人民日报》给我们小组寄来《毛主席论世界革命》、《马恩列斯论报刊宣传》、《毛主席语录卡片簿》各5份，以示对我们的鼓励。

1970年4月21日，常彬调任赵各庄公社副主任，王书田继任组长。6月23日，王书田调良乡公社工作，我继任组长。1971年11月24日，我调到大紫草坞公社“一打三反”办公室工作(后任政治组副组长、常委、宣传委员)，结束了两年零五个月的下放劳动生活。

一段难忘的劳动生活

魏志华

1969年5月底，根据中央的“五七”指示，绝大部分县直机关干部，到农村下放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被分配到当时的长操公社长操村，和我一起去的还有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刘占武和组织部的罗玉坛同志，罗玉坛同志任组长。1970年初，市、县又有5名同志下放到长操村，其中有2名北京友谊医院的大夫，包括一名儿科副主任。1970年6月至7月间，刘占武、罗玉坛二人先后调走，我担任下放干部小组组长。1971年7月调回县委，其他人也陆续调回安排了工作。这两年多的劳动锻炼，使我受到很大教育，学会了很多东西，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严格要求

县里的几个同志都是做农村工作的，过去经常下乡，也没少参加劳动，但这次不同，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因此，我们到村后就下定决心，彻底放下干部架子，虚心向群众学习，高标准、严要求，实实在在的劳动。每个人领了记工本，和其他社员一样记工。我们谢绝了村里对我们的照顾，除老罗年岁大(已50多岁)随老人在近地外，其他人常年到远地干活。

长操村在山区来说是个大村，400多户，户数人口都占全公社的一半以上。尤其是土地特别分散，特别远，近地很少。除老人和有吃奶小孩的妇女外，全都上远地。西边过岭与贾峪口相连，北边到山川北沟，东边到红煤厂，南边过岭接近南窖公社的花港村，一年四季都是早出晚归，中午不能回来，往返要走二、三十里路。在山区干活难度很大，尤其是市区来的几位同志，以前没进过山，困难更大。但每个同志都抱定一个决心，不会就学，别人能做到的自己也一定要做到。在山区除一般农活外有两样必须首先学会。一是爬山，长操四周都是山，到那里干活都要爬山。到岭西干活要爬过近千米高

的山，而且比较陡，尤其是下山的时候更难，稍不注意就会掉下去，真是上山容易下山难。遇到雨雪天，路很滑，更不好走。还有几处山道非常危险，山很陡，直上直下，山腰上的小道宽不足一尺，离地面 200 多米高。山下是大河，说实在的，我头几次走的时候真害怕，腿有些发软，我只好夹在社员中间，壮着胆跟着他们慢慢走，如果是自己是绝对不敢走。这几个地方曾出过几次事，有些群众走到那里也发怵。第二件事是背篓。别说是市里来的下放干部，连我以前也没背过，而在山区干活必须学会背篓。因为在山区，春天要往山上地里背土、背粪，秋收要往山下背庄稼，背水果。每天干活要带家具，还要带饭、带水，如果不会背篓拿这些东西是没法爬山的。另外，中午休息的时候，社员还要背些野菜、柴草，秋后割些荆条，都得用篓背。背篓最难的是扣篓。社员们背土背篓，到地方身子一歪，篓不用放下，土就倒了，而我们必须篓放下再倒，又费劲又费事。我们有的人也想像社员那样，一歪身子连篓带人都倒在地上。就这样一个活，我们练了很长时间才掌握了要领，倒土时再不用放篓了。上山下山也能背七、八十斤的东西了。还有摘花椒也是技术性很强的活。长操村的花椒很多，每年从“去暑”节开始摘要，摘半个月。这里摘花椒不用剪刀，全用手掐。社员摘的又干净又快，而我们摘的很慢，还总是被扎。我们就虚心向社员求教，慢慢摸索经验，终于掌握了它的规律。每个人每天最后也能摘十五、六斤。

一年的学习锻炼，长操村的地我们绝大部分都去过。从种到收，从大田到林果，什么活我们都干过，而且除每月休几天或者开会外，绝大部分做到全勤。有的同志有着病，骨质增生，腰疼的很厉害，吃着药也照常背篓上地干活。我们下放干部，基本上达到一个普通社员的水平。

艰苦奋斗

我们在长操村下放劳动，不但干活艰苦，又脏又累，在生活上也遇到不少的困难和问题。比如吃饭，开始我们在公社吃，主食是馒头、窝头、粗米饭，菜很少。下放劳动期间，我们没吃过一顿肉。当时肉是定时供应，山区没有供应点。每月休假回家也很困难。当时房山至霞云岭每天一趟客车，是县交通局的一辆带蓬卡车，经过长操。由于人多车少，经常挤不上去。

对于生活上的这些问题，开始大家也有些想法，觉得很委屈，可是一看见当地群众的生活就想开了。遇到困难，我们就想“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的教导，看看周围的群众生活，和当地的老干部，就什么困难，什么怨言也没有了。

多办实事

下放劳动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们的重要任务是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锻炼和改造自己。但我们也结合劳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办些实事，解决一些群众困难和群众关心的问题。

我们到村不久，发现这个村理发很困难。400 多户大村没有一个理发的，只有几个人能剃头，而年轻人又都不愿意剃光头，没地方理发，有的几个月剪一次。所以我们个人就买了两套理发工具(推子、刀子、剪子、梳子等)，抽时间给群众理发。有时还带理发用具下地，很受群众欢迎。友谊医院的两位大夫，主要是帮助群众看病和帮助培养村合作医疗的赤脚医生群众非常满意。

1970 年，全县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公社没有给长操村派工作组，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我们。我们和党支部一起作了具体安排。经过几个月的宣传教育，发动群众、内查外调，重点解决了两个群众最关心的、反映最大的问题。

这年从北京来了十几名插队青年。当时知青插队的高潮已经过去，这些人是不好安排工作的。有的是本人表现不好，也有的人是受家庭牵连。其中有二个女孩子是高干子女，一个是郝洁，她是彭真同志的亲外甥女，父母都是高干，被关押审查。另一个是阙雷，她父亲是中国银行的领导干部，父母都被隔离审查。她们两个非常诚实认真、品学兼优。这批知青中有些人不仅生活不习惯，而且吃不了苦，挑吃挑喝，还闹不团结。对表现好的进行讽刺、打击。他们见到郝洁就喊“打倒彭真”，对他们刺激很大。我们与支部进行研究，对他们的生活进行妥善安排，几次办学习班，对个别人进行批评教育。把两人安排在群众家里住，生活上派人进行帮助，解决生活上、劳动上的困难，使矛盾逐步缓解。基本稳定下来，劳动都比较积极肯干。1971 年有 2 个招工指标，经支部和群众推荐，郝洁、阙雷首批当了工人。

由于我们在村里严格要求，实实在在的劳动，并真心实意的帮助群众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受到干部和群众的一致好评，把我们当成他们知心朋友。生活上对我们很关心。有的送给我们野菜，有的帮我们修理干活的工具，尤其是我们的房东，帮我们看火，怕我们背篓硌腰，用自己的棉衣、布给我们做篓子垫。

1970年，我们被评为出席北京市的下放干部先进集体，出席了表彰大会。

两年多的下放劳动生活，使我们受到很大教育，也有很大的收获。不仅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农村、学会了山区各项农业生产技术，锻炼了身体，更使我们加深了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爱。

难忘的房山城关铁道民兵第二十三连

张万波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中苏边界剑拔弩张，大战似有一触即发之势。为准备打仗，国防工程的建设开始快马加鞭的进行。北京至山西省原平县的京原线，铁道兵正在加紧施工中，铁道的隧洞早已打好，因为战备工程急迫，急调房山各公社农村的民兵，组建房山铁道民兵团共3个连，协助铁道兵尽快修通京原铁路。

3月19日，民兵进入燕山地区工地，住在铁道兵的毛毡帐篷及羊耳峪的民房。所负责的工程名为2735工程，包括羊耳峪村南一条高十多米、长四五十米花岗岩铁道沟以及白水寺东侧的花岗岩路沟，需要打通。每天三班倒，风雪无阻与铁道兵共同战斗，每班装运石碴，用风钻打眼，交班之前装药放炮，为下一班做好准备。说是装碴，实际是大的石块用炸药炸碎或大锤砸碎，大小不等的花岗岩石块，重则一二百斤，需要几个人同时进行清理。

经过一个多月的军民艰苦奋战，两个路沟已基本打通。这时春耕已到，有两个连的民兵回到自己的村里。留守的民兵连有一百多人，连长董连生是东流水村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指导员王琪是凤凰亭村人，退伍军人。

留守民兵连负责的工程，是由东起东流水隧洞北口，南至凤凰亭三零八隧道南口，全长有四五公里。主要的任务是与铁道兵共同平整路基，铺垫铁轨下的石碴。

近5月底时，城关民兵连调到正在建设中的良各庄火车站。说是火车站，实际是把两个花岗岩的山头削平，填两条一二百米宽，深几十米的大山沟，周口店民兵连和城关民兵连与铁道兵战士共同施工。工班为四班倒，六个小时一班。

施工时，打炮眼的几十个风枪，两个汽压链轨凿岩机在不停的打着不同直径的炮眼，粗的十多厘米，细的四五厘米，浅的需用一两天，深的需用四五天。每昼夜放四次炮，放炮时响汽笛。每班正点汽笛响起时，数不清的炮点炸起的大小石块和着烟尘如同下暴雨一样的落下，人躲在躲炮棚内，看不清一二十米

外的景物。

经过三四个月的艰苦奋战，大沟被填平，基本达到了宽度。从石景山方向铺过来的铁轨已到达凤凰亭大桥。架桥部队架桥时，茶杯粗的钢缆吊起庞然大物的砼预应力桥梁，轻轻放在几十米高的桥墩上，哨音阵阵，指挥小旗子来回晃动，场面十分壮观。

两三天后，凤凰亭的大桥架设完工。接着就向良各庄方向铺轨。铺轨机将已在工厂上好砼路枕的铁道，从身后的大铁路平板车吊起，向前方落下，一节节的前往接，很快就铺到了良各庄车站。

1969年11月，城关民兵第二十三连调到凤凰亭大桥，负责南北桥墩的两个护坡垒砌任务。两个月后，护坡工程完工。

随后的任务是在铁路旁的花岗石山上破片石，破好的片石装火车运到拴马庄，那里有一个民兵连在砌一个明洞及护坡，用的石料量非常大。第二十三连自1970年1月至1971年9月底一直开采片石。一天上午，董连生连长与排长纪华到良各庄开完会回来(当时连驻地在凤凰亭大桥下的东南侧)，二人来到良各庄站北口约二三十米时，董连生看到铁轨中心有一块篮球大小的花岗岩石块，怕火车运行时发生事故，就上前把那块石头抱了起来。刚要迈出路轨时，一列从良各庄火车站发往石景山南站的火车，从隧洞内急驰出来，董连生躲闪不及，被火车撞了出去。闻讯后我们急忙把董连生往房山医院送，因伤重那里治不了，又往北京转。在去北京的半路上，董连生同志离开了人世。后来，连里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会。

1971年9月底，第二十三连又调到云居寺水头村西约二里地远的一处高地上，与铁道兵的一个营部及琉璃河的一个民兵连相邻。

京原铁路从云居寺石经山的南侧山下路过，往西有座铁道隧道洞，洞口那边就是三合庄村。二十三连的任务是在洞上的大山上修一条盘山公路，过了大山是大峪沟，是房山盛产柿子的地方。公路是铁路的辅路，为了维护铁路之用。

在修盘山公路中，有时是秋雨连绵，有时是风雪交加，民兵们在极艰苦的环境中劳动至1972年1月下旬，公路已修过山岭。此时京原线往西已通至白涧，京原线房山段已经贯通。月底，房山铁道民兵团城关二十三连的历史使命完成。

时间已过近四十年，当看到京原线这条大动脉为祖国的繁荣起着巨大的作用时，参加过施工的当年民兵连战友们心中一定会无比的自豪和光荣。

朝鲜大使参观房山

李 耀

1983年6月1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金明洙及夫人，率大使馆武官、参赞、一二三秘及其夫人等一行20多人，来房山参观访问。

中朝两国是友好邻邦，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朝两党两国人民在共同抗击以美国为首的侵略者的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和平建设时期，又互相学习，相互支持，使两国人民的友谊又有了新的发展。因此，对这次朝鲜大使一行的参观访问，县委县政府是十分重视的，并做了精心的研究和准备。为了展示我县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精湛的石雕工艺，确定了云居寺、周口店猿人遗址和石窝大理石雕刻厂为贵宾参观点，并对大使一行的迎送都作了安排。

上午10时，大使一行来到房山县政府。县委书记李永芳、县长邢春华，县委副书记张成基、王俊起，副县长马文舫、郑玉山、高海量等领导在县政府楼迎接。县政府办公室、县文化局等有关负责同志李耀、王建忠等也参与了接待工作。

在二楼会议室，举行了欢迎仪式。县长邢春华代表县委县政府致欢迎词。会上，金明洙大使发表了热情友好的答谢词。随后，李永芳书记简要介绍了房山县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项事业的发展情况和当年夏粮长势良好、丰收在望的大好形势。朝鲜大使对我县在各项事业中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并对房山热情友好的接待表示衷心的感谢，会上，还向房山赠送了介绍朝鲜革命和建设成就的一些书籍。

欢迎会后，宾主双方在政府门前合影留念。随后开始了参观访问的行程。第一站首先到云居寺参观，文物管理局的同志作了简要的介绍，随后大使一行参观了石经、碑、塔和石刻佛像，朝鲜贵宾对历代僧人千年刻经锲而不舍的



1983年6月19日，朝鲜大使金明洙（前排左四）一行来房山参观（李耀提供）

精神和精湛的石刻艺术无不感到惊叹和感动。参观后，金明洙大使在留言簿上高兴的写下了“朝中两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万岁”的题字。

下午 1 时半，大使一行离开云居寺乘车到高庄水磨石厂和石窝大理石雕刻厂参观，在石窝大理石雕刻厂参观的格外仔细，对工匠们的精湛技艺赞叹不已。邢春华县长当场代表县委县政府将已加工好的一对精美的小石狮子赠送给金明珠大使。随后大使一行返回县招待所。

下午 4 时半，大使一行又乘车到周口店猿人遗址展览馆参观。下午 6 时，离开北京猿人遗址返回大使馆。通过这次参观访问活动，双方建立了友好的联系，此后朝鲜大使馆还曾多次派人来房山，房山曾赠送过红果和红果树苗等。

朝鲜大使一行来房山参观访问，这与时任县长的邢春华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邢春华于 1982 年 12 月调房山任代理县长之前，曾任大兴县红星公社主任(即原北京农场局红星农场)，红星公社已被国家命名为“中朝友好人民公社”。过去他们往来较多，关系很好。后来金明洙大使调任回国，申仁夏接任了朝鲜驻中国大使，虽然他没有来房山，但双方仍保持着友好的联系。1984 年初，申仁夏大使通过外交部，特邀了房山县政府的主要领导到大使馆做客。

唐幽州良乡县十二乡考

张东升

有确切记载，唐代幽州良乡县辖有十二个乡。但其名称及所在位置，却是个难解之谜。县以下设乡，实行乡、里（村）制，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良乡县至少可见到隋代记载。目前所知的良乡县隋代辖乡有两个，均见于出土碑记。

1992年出土于东营乡，现藏于房山文物管理所的“韩智墓志”，为隋开皇九年（589）十一月刊石，上有“墓主韩志字子哲，燕国良乡县秤邑乡临流里人”一句，表明秤邑乡即在今天的韩村河一代。墓志中还出现了一个“里”的名字——临流里。

同期出土于东营乡，一并藏于房山文物管理所的“韩辅墓志”，刊石时间为隋仁寿元年（601）。志文讲韩辅曾任良乡县司功，大概是个掌管土地和土木建筑一类的小官。后悟心易志，“慕求大道”，“舍己珍物，劝导乡亲，刻造《一切经》，并做经藏”。韩辅于仁寿元年四月八日卒于昌乐乡临治里，窆于秤邑乡。这里又出现了一个乡和一个里的名字——昌乐乡临治里。韩辅于昌乐乡临治里有宅第，但此地并非故土，因此卒后归葬于秤邑乡故里。韩辅曾在昌乐乡临治里劝导乡亲刻经，由此推断，昌乐乡应在今天的云居寺一代。另有一点，说静琬是房山刻经第一人，似又值得商榷了，因为韩辅刻经要早于静琬。因无其他史料，仅从出土的两块碑记得知，隋代良乡县曾设秤邑乡和昌乐乡。

唐代，仍沿袭乡、里（村）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

幽州良乡县辖有十二个乡。其中《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中载有六乡，即观音乡、昌乐乡、金山乡、尚义乡、复叶乡、复乡。北窖村鸡毛洞洞壁记有一乡，即房山乡。出土墓志又增补一乡——仁凤乡。

《房山石经题记汇编》是一部汇集云居寺和石经山各代石经题记的资料性著作。房山刻经事业发达，不仅在于静琬法师及其后继者心志笃诚，有铁杵磨针之志，还有赖于一些虔诚向佛者捐资相助。“石经题记”俨然是为捐助刻经事业者留下来的“功德碑”，这些刻在经石上的说明性文字，包括刻经人的姓名、故里、刻经目的、时间、数量等，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石经题记”中所

载的 6 乡，散见于唐代题记：如“题记” 136 页载有“良乡县观音乡成村”和“昌乐乡北陶村”（书中有几处载有昌乐乡北陶村）；151 页载有“良乡县金山乡中继村”；158 页载有“尚义乡北乐城村”；262 页载有“良乡县复乡董村”……

石经题记中所载的几乡，在出土墓志中也得到了印证。

1989 年 5 月出土的“蔡雄墓志”，为唐贞元十九年（803）十月刊石。讲蔡雄于贞元三年（787）二月十六日终于官舍，于贞元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迁窆于良乡邑北复叶乡原礼。此墓志出土于房山城关西坟砖厂。而石经题记记载，复叶乡辖村有白水里。依相关史料，白水里和房山城西北燕山火车站西侧的白水寺有一定渊源。依此推断，唐良乡县复叶乡应在今天的西坟到白水寺一带。

1987 年 3 月，房山城关东坟出土“史光墓志”一方，为唐元和三年（808）一月刊石。墓志载大唐故征君史光于元和三年“卜吉地于良乡县仁凤乡以夫人防氏合衬……”由此墓志看出，城关东坟和西坟并不是一个乡，东坟属良乡县仁凤乡。

2004 年 5 月，韩村河镇管厂出土的“孙英暨妻王氏墓志”，为唐咸通十一年（870）十月刻石。上有“四月二十八日归葬于良乡县金山乡韩村管西南二里大茔礼也”一句。今天的韩村河村，唐代似称韩村，从墓志出土位置来看，此说或为不谬。结合石经题记记载——金山乡辖村有五口村（五口村即今天的五侯村），综合分析，唐代良乡县金山乡位置，应在今天的韩村河到五侯一带。

2004 年 7 月，同样出土于韩村河镇管厂的“刘如泉墓志”，为唐建中四年（783）二月刊石。墓志有“葬于良乡县正南尚义乡”一句。和 2004 年 5 月出土的孙英暨妻王氏墓志比较，金山乡和尚义乡交界地应在今天的韩村河。尚义乡位置在“良乡县正南”，即窦店以南，大约今天的琉璃河一带。

北窖村鸡毛洞原来并不为人所知。鸡毛洞一名也是俗称，因洞道幽邃，有狐狸叼鸡归洞，常于洞口深处衔毛吮血，年深日久，自然积下不少鸡毛，洞穴遂由此得名。上世纪 90 年代初，出于旅游开发的目的，有人冒险探洞，才发现了洞内唐代探险者留下的墨迹及遗物。洞壁上最引人注目的文字，为“奉旨采集乳水”几个字，时间为唐开元二十三年（739）。“开元”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开元”只有 29 年，之后，又用“天宝”作年号。公元 743 年，应是天宝二年。乳水即钟乳石岩溶水，细腻而滑润。“奉旨采集”，当然是奉李隆基的旨意采集。据推测，采集乳水，或作药用，或用来美容。可叹洞穴幽深，采集乳水的人下去后再也无法上来，终至困死洞中。历千年岁月，只留下涉险探洞人的枯骨及少量遗物。另外，大概是用炭黑写在岩壁上的文字。其中有研

究价值的有“房山乡”几个字，是研究唐代良乡县县以下行政建置的难得史料。根据北窖村“唐人洞”洞壁上的文字，可知唐幽州良乡县房山乡就在今天的北窖村一带。

史书虽记载唐幽州良乡县有十二乡，但迄今为止，只有八个乡散见于各类石刻碑记及洞壁残留文字，另外几个乡尚未见到。和隋代良乡县乡一级建置比较，同是昌乐乡，隋代昌乐乡在云居寺一带，唐代昌乐乡却在北陶村一带。北陶村当是今天的小陶村和大陶村的前身。可见，隋唐两代虽同有昌乐乡，但唐代并未沿袭隋代建置。

综合各种史料分析，唐代幽州良乡县所辖的十二个乡，仅从考据得出的八个乡来看，其位置大致如下：复叶乡在西坟至白水寺一带；仁凤乡在东坟以南，大概沿及今天的石楼一带；金山乡在今天的韩村河到五侯、韩继一带；尚义乡在今天的南北尚乐到琉璃河一带；昌乐乡在今天的大小陶村一带；房山乡在今天的佛子庄、北窖一带；复乡在大董村一带；另有一乡——观音乡，石经题记记载辖村有成村，因不能确定成村在今天的什么地方，后来演化成什么村，故很难确定其位置。

直皖战争期间房良地区的兵祸

张广明

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但辛亥革命没有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官僚集团窃取了革命果实。

在北洋军阀系统中，存在着以段祺瑞（安徽合肥人）为首的皖系军阀和以冯国璋（直隶河间人）为首的直系军阀两个派别。袁世凯死后，两派的分裂逐渐表面化。皖系军阀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势力日渐扩大，盘据北京政府，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名，多次向日本帝国主义借款，购买军火，编练军队，积极扩充军备，企图“武力统一”中国，不久与得到英美帝国主义支持的直系军阀发生了严重的利益冲突，双方在良乡琉璃河和涿州高碑店一带摆开战场。于1920年7月爆发了战争，被称作直皖战争。当时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加入了直系一方，结果，皖军全线崩溃，7月19日段祺瑞通电辞职。直、奉军阀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这时直系的头子已经换成曹錕、吴佩孚了。不久直、奉军阀间因争夺地盘和权利又发生了日益尖锐的矛盾，于1922年4月又发生了直奉战争，结果奉军大败，退出关外。1923年，曹錕以五千银元一票的价格购买国会议员，被选为“大总统”，世称“贿选总统”。1924年被冯玉祥赶下台。

由于直皖战争的战区在良、房、涿一线，京汉铁路两旁，因此兵过之处，供给粮草，供给车辆，供给民夫，强占房屋土地。在皖军失败后，溃兵四窜，沿途掳掠。男女老幼，争相躲避。据《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档案》记载：“金鸡台村，被兵打入，村民以火枪抵御，杀伤男女六、七口，索去银元三百五十元。后继又勾来逃兵百名之多，于二十七日，将史家营村包围攻打，又杀伤十余口，烧毁房院四所。村人均逃，尚无结局。克下盘据该村，蹂躏不堪言状。并向附近的秋林铺村索得银洋九百元，莲花庵村索洋八百元，无力供给，尚在威迫之间。探闻该索钱到手后，即来斋堂各村大索特索。”

正在百姓遭受掠夺之时，又有由东路第七区来的逃兵四十多人，在安家庄

村索钱，无力供给，砸毁十二家，其余村庄索得千余元，在军留村索去银洋三百元，斋堂村索去银洋三百七十元。沿途各村“无一村幸免者。”（当时的金鸡台、史家营属宛平县。）从档案的记录中，除点名的村庄外，“然无一村幸免”。告诉我们这一带遭兵灾损失有多么惨重了。而这一年又赶上天旱无雨，蝗虫遍野，老百姓的生活，已经令人“不忍闻见、死生莫卜”了。

当时，做为京兆尹的王瑚，在给内务总长呈报各县战后损失情形时，有如下统计：

良乡县供给车辆民夫挑挖战壕占用民地房屋估计银数：共洋三百六十七元五角三分。共给食品用品骡马估计银数：共洋五千一百六十七元六角三分二厘。溃兵土匪动劫掠银钱财物估计银数：共洋五万八千二百三十七元二角五分。无伤亡。

房山县供给车辆民夫挑挖战壕占用民地房屋估计银数：共洋九百八十五元。供给食品用品骡马估计银数：共洋四千八百六十八元二角七分八厘。溃兵土匪劫掠银钱衣物估计银数：共洋四万四千五百二十元零三角二分六厘。伤十名，亡十一名。

在王瑚的呈文中，还有这样一段表述：“通令各县知事，将战后损失详加调查，按照物值估列银数，俾便审核。现据各县知事先后呈报前来，经京兆尹严加考查，尚无浮冒情事。”这说明上述损失（约折合洋十二万余元），虽然只是概数，但并无虚假。我们从中可知房良地区在直皖战争中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已相当惨重的。

侵华日军在房良地区的暴行

张文玲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日军侵入房良地区后，一路烧杀淫掠，无恶不作。甚至采用刺刀挑、打活人靶、铡刀铡、锯子锯、军马拖、灌凉水、开水烫、毒气熏、砍头、挖心、剜眼、剥皮、肢解、活埋、奸淫妇女、割乳房喂狼狗等骇人听闻的残酷手段折磨杀害百姓，疯狂野蛮，残忍无情，令人发指。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仅房良地区被日军杀害之无辜百姓2500多人，烧民房22011间。

1937年8月，日军侵占良乡城。9月15日，日军飞机轰炸房山城。日本侵略军占领房（山）良（乡）两县城后，所到之处，无不施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房良地区在抗战时期是平西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日本侵略者在华北的重点侵略地区。村村都经历过日本侵略者的烧杀抢掠。日军曾多次分五路、十路、二十路，由万人到几万人的兵力，大举进攻，采取了五次“强化治安”，故此房良地区无辜的百姓受尽蹂躏惨遭杀戮。

8月19日到20日，日军进犯坨里、八十亩地、南观、羊耳峪等地，坨里惨案发生。他们前边用坦克开道，车后托着粗大的圆木，所到之处，路边的庄稼轧成席地，造成数百亩庄稼颗粒无收。对坨里、辛开口百姓进行野蛮屠杀，用骇人听闻的残酷手段折磨杀害百姓130余人。

9月15日，定府辛庄遭日军践踏，杀害无辜百姓60余人，烧毁房屋数间。日本鬼子杀人手段十分残忍，他们把抓来的成年男子，每两个人捆在一起，随意砍死一个，留下一个活着，再踢一脚或打几拳，让他拉着死的跑，以此取乐。还有的日军把抓来的百姓集中起来，男女分别排成两行，对面跪着，两个日军手拿锤子，从两行人中间，用力猛敲男人的头部，让女人瞧着，被敲的人从头上往脖子里流血，有的当场死亡，惨不忍睹。

9月16日，日军占据房山城，兵分数路血洗附近村庄，坨头惨案发生。日本侵略军突破了国民党军队孙连仲部大石河防线后，由此向南推进，通过田各庄、瓜市、辛庄直奔坨头村。日军坦克在前，步兵在后，坦克从老百姓的庄

稼地里轧，眼看到嘴的粮食全被坦克轧烂在地里。就连地头的树木，村内的房屋宅院，也都一碾而过。坦克过后，步兵像一群群恶狼一样冲进村中，冲进百姓家里。他们见人就杀，连 80 多岁的老人都不放过。一位叫宋成年的老人，当时 80 多岁，已经瘫痪下不了地，日本兵进屋后，把宋老汉由炕上拉到门口，用战刀将老人砍死。一个姓郑的邮差，正在坨头村送信，也被日军枪杀在大街上。老百姓看见日军疯狂杀人，便携家带口逃命，成年人抱着幼小的孩子，青年人背着年迈的老人纷纷逃往村外庄稼地躲避。日本兵在后边追杀，追上后用刺刀捅、用战刀砍，追不上的就开枪打。在村内没来得及躲避的群众被日本兵抓到后用枪押着，去给日本兵做饭。因为下雨，没有干柴禾烧，日本兵就闯到老百姓家里，把箱子、柜、桌子等家具砸坏当柴烧。把老百姓家的猪鸡抓到用刺刀捅死，用火一烧就吃，真是一群披着人皮的野兽。被抓的群众为日本兵做熟饭以后，日本兵叽里呱啦乱叫几声后，一挥手，一个翻译对群众说：“你们走吧！”不料想，乡亲们刚刚迈出大门口，日本兵就从他们的背后开了枪，一个个被打死在大街上。仅 9 月 16 日一天，日军就在坨头村杀害无辜百姓 40 多人。

同日，一股日军窜到羊头岗，60 多名无辜百姓惨遭杀害。另一队日本兵糟踏了梨元店村，又来到双柳树村。这个只有几十户人家，不足百口人的村子，日本兵一来，就到处抓人，把没来得及躲藏的 40 多人抓到了村北的“老爷庙”前，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枪驱赶着群众，庙上架着机枪，枪口对着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一个日本军官叽哩呱啦乱叫了一阵，手一挥，架在庙台上的机枪就响开了，随着枪响，庙台底下的群众纷纷倒下；当时没被打死的群众四处乱跑，日本兵端着血淋淋的刺刀在后紧紧追赶，追上就是一刺刀，追不上就用枪打。杀人成性的日本兵连小孩都不放过，一名妇女抱着孩子，眼看要被日本兵追上了，她忍痛扔下了孩子，自己躲进了庄稼地里，日本兵一刺刀将不满周岁的婴儿扎死。仅半天时间就有 40 多人惨死在日本兵的屠刀下。

与此同时，有一股日军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奔向石楼村，三架飞机在村内外侦察扫射，如今还健在的石楼村肖永春老人，亲眼看到本村的宋占奎、刘伍等三人在村外瓜地被日军飞机炸死。日本兵进村后，如同发了疯的恶狼，叽哩呱啦乱叫，见人就杀，用枪打，用刺刀挑。石楼村有一个宋姓，外号叫“沙老二”的讨饭乞丐，在大街上被日本兵用刺刀挑死。一个叫侯大楞的老人，在自家房内椅子上抽烟，日军闯进屋后二话不说，照准老人的胸膛就是一刺刀，当场将老人扎死在椅子上。

日军一辆汽车陷进了泥塘里，他们到处抓人去推汽车。先后抓了 39 人，在日军刺刀的威逼下，乡亲们只好穿着单衣，饿着肚子，冒着雨给日军推车。车推上来，日军用细麻绳把他们分别捆起来，关押在宋、侯两家院子内，又把抓来的妇女、儿童关押在屋内，院内和门口都有日军把守。这时，日军仨一群俩一伙又二次闯进老百姓家中，翻箱倒柜，把值钱的东西全部拿走，把猪、鸡抓去吃肉，把桌椅板凳、箱子、柜等木制家具抬出去砸烂当柴烧。日军吃完饭后，定出了杀人诡计：准备先杀院内捆绑的男人，后糟踏屋内的妇女、杀害儿童。大约在晚上十点左右，日军把院内捆着的人分成三堆，把每堆的人都拴在一起，先叫被捆绑的人跪下，然后用乱枪打死。如今还活着的宋连成老人，当时 22 岁，就是被捆绑的 39 人之一。他当时左臂上中了三枪，当场倒下，一阵乱枪过后，日军点着火把逐个照看是不是死了，如果发现没有死的就再捅一刀或再补一枪。由于宋连成被压在下边，又是阴雨天，日军没发现他还活着，就到另一个院杀人去了。当时一个年仅 8 岁的小男孩，名叫宋宽由屋内出来撒尿，宋连成低声把他叫到跟前，让小孩给他解开捆着双臂的绳子，由于绳子捆得紧，孩子用手解不开，便找来一把镰刀将绳子割断，宋连成才死里逃生。这次被捆的 39 人中，除宋连成和另一个人在混乱中跳墙逃跑以外，其余 37 人全部被杀害。

屋内被关押的妇女见日本兵在院内杀人，趁着天黑由窗户爬出去跳墙逃跑了。第二天日军骑马在村外到处搜索，在一块棉花地里，一个日本兵听到有婴儿哭声，便跳下马来，把刺刀扎进婴儿的肚子里，就这样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惨死在日军恶魔的刀下。

仅 9 月 16、17 日两天，石楼村就有 50 多名手无寸铁的无辜老百姓被日军杀害。

9 月 17 日，日军窜至支楼村，14 名无辜百姓被日本兵用刺刀挑死。

是日，二站惨案发生。二站村有个法国教士开办的天主教堂，日军窜入该地区后，村民及附近村逃难的百姓，躲进教堂避难，妇女、儿童都藏到地窖，男人躲于院内。日军闯入教堂，把 110 多名青壮年分三批带到村外，列队排枪射杀，未死者又用战刀砍死。杀完人的日本兵又返回教堂，向妇女寻欢作乐，法国神父提出抗议，惨遭枪杀，并将神父的尸体钉在十字架上，计遇难者 80 余人。

9 月 17 日，日军窜至坟庄村，70 余无辜百姓惨遭日军杀害。

9 月 19 日，日军进袭阎村，将 6 名百姓押至村边一白薯井旁，每人脖子上砍一刀，杀死后推入井内。

9月×日，日军窜入江村，用绳子将8名百姓串绑一起，用战刀砍死。

10月17日，日军袭击干河口村。清晨，上百名日本侵略军从张坊出发，去河套沟扫荡，路过干河口村。先强迫干河口村村民为他们搭桥，桥搭好后，日军过河将干河口村围得水泄不通，名曰搜查“八路”，实为烧、杀、强、掠。村民看到日军进村，急忙跑进山沟躲藏，没来得及躲藏的被日军抓住，又打又骂，有的惨遭杀害。晋国顺一家四口人就惨死于日军的屠刀下。其父在日军进村后，只顾催促、掩护家里人逃走，自己还未来得及躲避，被日军捉住，遭毒打后，又被带至百米高的山岭上，打一枪，见其未死，日军觉得不过瘾，又砍脑袋一刀，然后将他的尸体踹下山崖；其伯父被日军连砍数刀后，也踹下山崖，活活摔死在崖下；其叔婶夫妇二人，躲到山崖上的石堂里，被日军发现后，连续用机枪扫射，双双死在日军的枪口下。日军杀中国人真是不眨眼，见一个杀一个，就连村里的一个哑巴也不放过。这名哑巴不知道躲藏，被日军捉住后，用枪把拼命地往他身上砸，竟将他活活砸死。仅这一天，全村就有十二名无辜的百姓惨死于日军之手。日军不仅杀人，还放火烧房。从村东烧到村西，全村一百多间草房，一日之间化为灰烬。就这样，日军从干河口村开始，一路烧、杀、抢、掠直到百里以外的蒲洼村，整个河套沟一百多个村庄尽遭日军的蹂躏。到1939年日军在张坊建立据点，干河口村还经常遭飞机轰炸，三天一炸，两天一扫荡，搅得百姓惶恐不安，不论严寒酷暑，都得在深山老林中躲避。直到日本投降，这里的百姓才结束了这种惊慌动荡的生活。

12月22日，面对日军的野蛮行径，地方武装纷纷组织起来积极抗日。当时，一路司令周文龙率领的地方武装于长沟、夔店一带。他们经常袭击日军，捉拿日军探子，并把探子捆绑在太和庄村的天主教堂里进行审讯。因此，日军疯狂地对这一地区进行扫荡，23日太和庄惨案发生。全副武装的日军突然从太和庄东北的砖窑沟偷袭过来，包围了村子，在村西交通要道沿村沟对面的大坝上架设了机枪，封锁路口。大约凌晨四、五点钟，村东北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村民们从睡梦中惊醒，吓的不知所措。有的缩在屋内不敢出门，有的慌不择路四处乱跑。驻扎在天主教堂里的地方武装部队听到枪声，打了几枪，欲与还击，但因寡不敌众，只好撤走。他们边撤边喊：“乡亲们，快跑吧，日本兵来了。”随即，枪声大作，响成一片，乱作一团。

一阵枪声过后，日本兵便从村东北角跑进村来。村民孙明发现日本兵，径直朝村中跑去。日本兵端着枪，一边射击一边追赶，孙明一口气跑到十字街，一拐弯，躲进于凤全家厕所里。日本兵追到这里搜查半天没见人影，孙明躲过

去了，方免一难。而于凤全的父亲却被日本兵发现，上去就用刺刀挑，于父当场被杀身亡。日军来到村中十字路口，朝东、西、南、北各个方向又乱放了一阵枪，紧接着日本兵朝着麦秸垛，草垛放了两下火焰喷射枪，大火马上燃烧了起来。火光冲天，很快蔓延到了住户的房屋。于永生家墙头上的草烧着了，路北的草房也烧着了。人们一看，赶紧往外跑。到了门口，见有日本兵把守，又跳墙往南跑。

这时，日本兵见人就杀，见草垛、房子就放火，孙秀一家十四口人，来不及逃跑，全被堵在了家中，无奈，只好扒墙往外跳。结果，跳过一个就被日军的刺刀挑死一个，这样，孙家一连被凶恶的日本兵挑死了七口人。孙士元的奶奶、父亲、叔叔等一家人也拼命往外跑，日本兵看见孙奎，端着刺刀冲了上去，老太太看见日本兵要刺杀自己的儿子，奋不顾身冲上去，使尽全身的力气，双手把刺刀紧紧攥住。日本兵见老太太攥住刺刀不撒手，用力一拽，老太太的手指立刻就断了，鲜血如泉水般涌了出来。这个日本兵还不罢休，又几步追上孙奎，对准他的后心猛刺两刀，惨死在血泊之中。日本兵又来到于福家，于福的母亲吓得哆哩哆嗦，背着小闺女往外跑，结果没跑出多远，日本兵就朝她开了枪。老太太背上的孩子被子弹打中当即死去。鲜血顺着老人的脊背往下淌。王以寿见日本兵到处杀人放火，吓的钻进于永家的草垛藏起来，结果被日本兵活活烧死。一时间，太和庄村浓烟四起，枪声一片，人们扶老携幼，连拉带扯，顺着大道往西逃，日本兵穷追不舍追上的用刺刀挑死，追不上的就开枪射击。有些跑得快的刚刚跑到沿村沟，就被架好的机枪射中，整个一条沟，死难者如同麦个子似的横七竖八倒了一片，其中有孙秀一家人，姜茂恒的妻子、姜小奇、李德福兄弟俩，姜玉坤的父亲、叔叔及所有逃到这里的人。尸体有趴着的、仰着的、蜷着的，有当时未死挣扎、呻吟的。大人被打死了，有的婴儿还活着。刚刚出生几个月的姜家小女孩哇哇地哭着，在死尸堆里爬行，悲惨的情景令人目不忍睹。在这次惨案中，全村有 78 人惨遭杀害，数十间房屋和柴垛、草垛被大火烧光。

1938 年 3 月 19 日，日寇闯入龙宝峪村，40 多名无辜百姓惨遭杀戮，尸首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1939 年 4 月，日军以重兵 2000 余人向平西根据地十渡、霞云岭、蒲洼一带进犯，沿途各村尽遭蹂躏，计 15 个村子房屋被烧，多名妇女遭辱。

1940 年 1 月 26 日，日军 12 架飞机轰炸佛子庄村，除三架飞往其它边缘村庄外，其余九架轮翻对佛子庄狂轰滥炸，炸毁房屋 317 间，炸死无辜百姓

52人，炸伤60余人，街头残臂断肢横弃，惨不忍睹。3月9日至22日，日伪军近万人分十路对平西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此次扫荡，仅金鸡台一村，就有31人被杀，150余间房子被烧。日寇在村子抓到一个要饭的小孩，用脚踢来踹去，用刺刀挑来挑去，把五脏六腑都甩出来，余下的烂肉喂狼狗；一名侦察员被他们抓住，捆上双腿倒拖在马后，拖得只剩下两条小腿；村内一病妇，遭30多名日本兵轮奸后，又被拉着双腿，掰成了两半。大安山村，42人被杀，900余间房屋被焚毁，15万斤粮食被洗劫一空。8月20日，日军出动十万人，分二十路对平西根据地进行秋季扫荡，109名同胞遇难，抓走1200多人，烧毁房屋12043间，抢粮17200石，抢大牲畜6800多头。

1942年4月15日，日寇将元港村民兵队长肖仕儒抓住钉在门板上示众，还不准收尸。其母也被抓去，受尽折磨。12月10日，日军偷袭曹家坊，打死妇联委员张国敏等11人，抓捕区小队司务长张成弟等7人，并押至庙安据点，张成弟等3人受尽酷刑也不屈服，日寇就放出数条狼狗，将其3人撕咬得鲜血淋漓，又用刺刀乱挑，3人倒在了血泊之中。

1943年4月，日伪军300多人，携带轻重机枪和迫击炮，从南窖方向向十渡进犯，企图袭击房涿涿联合县委、县政府及冀中十分区部队指挥机关。冀中十分区二十七团派一个排在老帽山凭险扼守，阻击敌人。战士们凭借有利地形，顽强地阻击来犯之敌。当他们完成预定阻击任务，开始撤离时，背后突然响起枪声，几位战士应声倒下，这时发现敌人由汉奸带路，从背后包抄上来，战士们背腹受敌，撤退已来不及，英勇的八路军战士与强敌殊死搏斗，最后只剩下六名战士，他们在子弹用尽后，一步步退到山崖边，纵身抱枪跳下山崖。后当地百姓将他们的遗体安葬在十渡村北的老帽山上。

1944年4月，时任房涿涿联合县七区（南白岱、南尚乐一带）区委书记的晋耀臣。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战争，敌人对他恨之入骨，多次张贴布告悬赏捉拿他，并在布告中写到：“谁捉到晋耀臣重赏，一两骨头一两金，一两肉一两银，晋耀臣身体有多重，就给多少金和银。”晋耀臣把敌人的恐吓、暗害、捉拿都置之度外，照常活动在七区各村。4月，晋耀臣到郑家磨村开展工作，住在马仲录家，由于叛徒出卖，晋耀臣被敌人抓捕。被捕后，受尽敌人的百般折磨，敌人在押解他去石亭的20多里路上，用铅丝穿着他的锁骨拉着走，晋耀臣强忍剧痛，被送到石亭后，敌人更加残忍地折磨他，迫害他，敌人将他倒挂在墙上，用开水浇身，见他毫不屈服，又用刺刀戳瞎双眼，还在其身上连砍数刀，晋耀臣被折磨得遍体刀伤，血染全身，已气息奄奄，敌人仍不死

心，又叫狼狗撕扯晋耀臣的肢体，最后将其推入山下的壕坑中活埋。晋耀臣在敌人惨无人道的迫害下，从容就义。

日本侵略中国所犯下的罪行，日本军人的残忍可见一斑。他们奴役中国人民，抢劫财产，烧毁房屋；奸淫妇女，上至老妇，下至幼女，无一幸免；割去妇女的乳房，用刺刀插入妇女的阴户，挖出孕妇体内的胎儿；更施以剖腹等种种酷刑，必置之死地而后快；刑讯中国革命志士，枪毙无辜；对中国人民进行集体活埋，或挖眼，割鼻，活体解剖……无所不用其极，给中国人民造成无比深重的灾难和耻辱。

但是，日本政界总有一股反华势力，遮掩当年侵略战争的罪行，为侵略者翻案，为东条英机等战争罪犯招魂，在教科书中竭力掩盖侵华的罪恶历史，这些无可辩驳的史料证据和真实事件，充分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罪行，揭穿了日本右翼势力歪曲侵华历史、美化侵略中国的谎言。

接管北平干部良乡培训纪事

许冬梅

1948年11月8日，毛泽东函告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彭真：“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解放在即，即须准备接管干部及党政机构的配备，务于一个月至多一个半月内准备完毕。”12月13日，中共中央任命彭真为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市委副书记、北平军管会主席兼市长。同月17日，中共北平市委第一次会议在河北省保定召开，会上宣布了北平市领导机构和组成人员名单，研究了接管北平工作。21日，彭真、叶剑英等率领部分接管北平的人员到达良乡。

良乡，当时是河北省良乡县县城，位于北平的西南部，于1948年12月14日凌晨解放。县城距北平市中心20公里，交通便利，在北平解放前夕，中共北平市委、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办公地都曾暂驻这里。市委办公室驻县城楸树街10号，市委秘书处驻乔家胡同10号。1949年1月6日，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招待所改称干部训练班，主要负责培训接管北平的干部。干训班办公室设在县城罗府街39号。据干训班有关文件记载，干训班在北平市委学委的领导下，成立了学委分会，由王鹤峰、宋乃耕、彭宝山、石羽、王峰5位同志组成。学委分会下设组织、教育、供给、管理4股，分别由石羽、王峰、陈培元、崔玉章4位同志负责。为了便于组织管理，干训班把每三个区的工作组编为一个队，共编为10个队，由每区的支部书记组成队部，队部设队长1人，副队长1人至2人，文书1人，通讯员1人至3人(由各区通讯员组成)。各队序列、驻地、负责人如下：

1. 以内一区、内六区、内七区编为第一队，暂指定周仁任队长，翟林×、王鸿兵任副队长，驻纸房村。

2. 以内三区、外二区、外四区编为第二队，暂指定贺翼张为队长，王云、宋国藩任副队长，亦驻纸房村。

3. 以沙河区、郊十五区、郊十六区编为第三队，暂指定孙正民任队长，牛小庆、宋平二任副队长，亦驻纸房村。

4. 以黄村区、郊十三区、郊十九区编为第四队，暂指定苏民任队长，李友良、宁雪山任副队长，驻夏庄村。

5. 以内四区、外一区、外五区编为第五队，暂指定张北芳任队长，杜景林、高云超任副队长，驻苏庄村。

6. 以内二区、内五区、外三区编为第六队，暂指定张旭任队长，范志刚、韩林光任副队长，驻太平庄村。

7. 以郊十七区、十八区、二十区、十四区编为第七队，暂指定张宗平任队长，牛天锡、王景民、毛维仁任副队长，驻东关。

8. 以团校、四支、七支、机关支部编为第八队，暂指定刘守华同志任队长，赵克明、张玉任副队长，驻东杨庄村。

9. 以北岳区（当时驻东杨庄、徐庄、常庄等各支）编为第九队，暂指定张曙光任队长，杜凤鸣、贾贵发、刘荣任副队长，驻东杨庄村。

10. 以机关支部、直属队编为第十队，暂指定李爱华任队长，刘周映、张子荣任副队长，驻南关。

在中央统一调配下，准备接管北平的干部于 1948 年 12 月上旬从各地陆续集中到达良乡。到次年 1 月下旬，从中央及各地调派来的干部已达 2800 多人，这些干部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1. 西柏坡中央机关部分干部。彭真从中央组织部及政策研究室带来的干部。叶剑英带了一批军委干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后勤部、卫生部及交通部等单位抽调干部，上述共约 200 多人。

2. 华北局党校的干部。少数是领导干部，多数是中下层骨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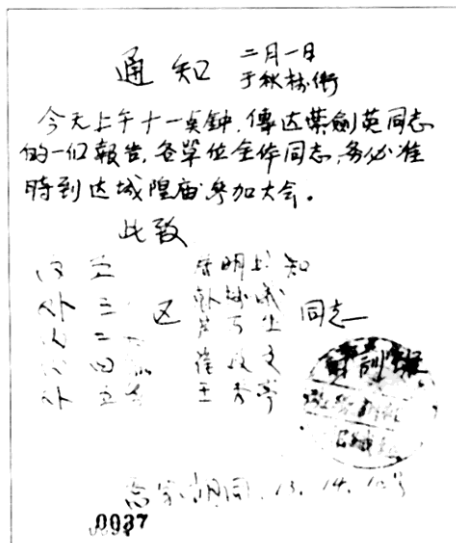
3. 华北大学师生，大约 400 人。既有根据地的干部，也有平津去的知识青年。

4. 华北局城工部干部。大部分为地下党员、进步学生、知识分子及工人。

在良乡培训的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工作经历不同，思想水平不一。大多数人对城市工作没有经验，对党的有关政策了解不多。有不少干部甚至从未到过大城市，对城市生活很陌生。因此，干训班对干部进行了必要的时事、政策和纪律教育。

1 月 4 日，叶剑英在城隍庙作《关于军管会问题的报告要点》。他讲了三点：“第一，平津现在的状况。我们现在拿下平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不能轻敌，敌人集中几个师突击一下的可能还是有的。所以我们还不能把四郊变成平安无事的环境，不能不在戒备的条件下来进行工作，不能盲目乐观，太平观念，

麻痹，不能过右，在这方面我们已受到些教训，我们要大胆地工作，要谨慎细心。第二，认识北平工作的重要性。北平为故都，并为很多国际人士注意之城。从历史上看是个文化城，是国际的，也是文化的，有很多工人、学生，大中小学学生共有十一万。北平也是个老城，历代大官僚、没落腐朽的士大夫仍存在……北平是个大学，我们这几千个干部都是小学生，要向北平人学习，但又要帮助他们改造他们，从他们中培养出大批新干部来。若我们对北平无充足认识，则不能严肃地负起责任完成任务。我们要能把北平管理好，就必须战战兢兢严肃地面对任务。中央下了很大决心调出大批干部，这表示中央重视北平工作，要求我们无条件的要把北平工作做好。第三，军管会的任务：（1）肃清一切反动势力；（2）接管敌人遗产；（3）建立人民政府秩序。接管文化、外侨问题。对外侨要谨慎，工作要慢，但不是不管，而是要多考虑。对接管文化要慎重，尊重文化界，要斯斯文文地对待他们，让他们逐渐能为人民服务。”



▲培训会议通知

1月6日，彭真在城隍庙作《关于掌握党的基本政策做好入城后的工作》报告。他要求：大家进城以后，首要的就是掌握基本方针、基本政策。具体地讲，进城以后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工作呢？我想应先做下面三项工作：第一是掌握政权。政权即刀，是阶级压迫的武器，阶级斗争的武器……故进城后首先必须善于掌握及使用政权，然后利用政权的力量搜缴敌人武器，除奸，接收工厂及所有物资。第二是建立民主。民主制度要逐步建立，决不能马上就实行民主普选，因为我们吃过这个亏……所以进城后不要马上召开代表会议，先开座谈会，民主建设应先从座谈会做起，然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最后再召开人民普选的代表会。现在首先是要把狼打死，肃清敌人就是根本的民主建设。第三是工商业问题。我们进城以后，除了推翻旧的政权建立新的政权以外，必须抓工商业。如石景山钢铁厂等，要组织起来供给他们原料。还有许多手工业者，如不好好组织，他就没有饭吃。所以，必须好好组织，用他们生产的东西，供给农民使用，这样他们就有饭吃了。大家都有了饭吃，无产阶级的天下就好坐了。1月13日11时，戎子和在城隍庙作《关于工商业政策与金融贸易政策的报告》。

1月20日，叶剑英在良乡中学礼堂作《关于北平情况和接管任务的报告要点》。

1月22日11时，钱俊瑞在城隍庙作《关于文化教育政策及宣传工作的报告》。

2月1日11时，在城隍庙召开大会，传达叶剑英关于全国形势的报告、彭真《关于进城后的工作与纪律问题的讲话要点》。彭真在报告中明确了入城三项根本任务：一是摧毁旧政权，建立新的人民民主政权。二是经济建设。三是按新民主主义方针改造学校教育。同时，还提出进城后的四项具体紧急任务：安定秩序、接管、肃清特务、人民生活问题。

培训期间，除集中学习时事、形势、城市政策等方面的专题报告外，还学习了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对目前时局的声明》等文章；学习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新收复城市的指示》、《正确执行对新区和新解放城市的政策》（节录《人民解放战争两年总结与第三年任务》）、《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接管太原的决定》、《新民主主义的纲领》（节录《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工商业政策》（节录任弼时《土改中的几个问题》）、《正确执行劳资两利方针》（新华社短评）、《中共中央中原局争取团结改造培养知识分子的指示》、《知识分子在人民革命中的作用》（节录《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论联合政府》）、《知识分子问题》（节录任弼时《土改中的几个问题》）等。

在学习政策的同时，为了提高培训干部思想认识，还学习了《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一章前言》、《“左派”幼稚病第二章》、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1948年12月22日颁布的关于党的城市政策的《约法八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入城纪律守则》等。

接管北平的工作任务重大，为了保证接管工作进行，在培训干部的同时，在良乡新组建了部分接管北平干部的组织机构。

1948年12月初，平津卫戍区第一纠察总队进驻良乡待命进驻北平，并改名为北平纠察总队。北平纠察总队于1949年2月1日从良乡移驻北平，由叶剑英直接领导。

1948年12月24日，北平市公安局在良乡待命入城，准备接管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人员基本上是中共中央社会部系统训练班“黄泥警校”的“一百单八将”。中央警备第三、第四营的741名战士到达良乡归入市公安局编制，改称公安大队。

1948年12月，成立北平市文化接管委员会文物部，部长尹达，副部长王

冶秋，联络员王毅、李枫、于坚、罗歌，负责接管北平市内的文物、博物馆、图书馆等工作。

1949年1月14日，成立中共北平市文艺工作委员会（简称“市文委”），书记李伯钊，负责全市的文化艺术工作。

1949年1月31日，成立中国共产党华北人民政府华北法院审判委员会临时党支部，王斐然任支部书记，负责接管国民党北平地方法院的工作。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5日，培训工作结束，全部人员从良乡乘火车赴北平，开始了接管北平工作。

培训干部、建立接管机构是北平实施接管工作的重要步骤，为顺利完成北平接管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良乡也因此在此房山革命史上、北京革命史上留下了难忘而特殊的一页。

“两弹一星”发祥地

赵润东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位于房山区阎村镇域内，当地人俗称它为“四〇一所”。

多年来，人们只知道它是研究原子能的科研单位，却不知道这里是“两弹一星”的发祥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创建于1950年，是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研究基地。特别是我国第一座实验性重水反应堆，第一台回旋加速器的建成，促进了我国核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1955年8月15日，中央决定在北京西南郊建设新的科研基地（代号601厂，1959年改为四〇一所，即现在院址）。1958年7月1日，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1982年9月16日核工业部决定将“二机部北京“四〇一所”改为“核工业部原子能所”，1984年11月12日又改名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1958年6月，我国第一座试验型原子能反应堆开始运转。主管国防科研工作的聂荣臻元帅抓住这个契机，立即把海军苏振华政委、罗舜初副司令、中科院张劲夫副院长、国防部五院钱学森院士、王诤副院长以及第一、第二机械工业部的领导召来，就研制核动力潜艇进行了研究。与会者一致赞同抓住时机，尽快上马，并对研制原则、任务分工、组织领导、具体步骤、总装厂建设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意见。6月27日，聂荣臻元帅向党中央递交了关于研制核动力潜艇的报告。报告阐明了展开此项工作的条件和基础，拟定了依靠现有力量、坚持自力更生、争取苏联帮助的方针，并提出了组织领导人员名单。一项关系国防现代化建设大局的尖端技术工程由此决定下来，一项旷古未有的开创性事业，在中国大地上秘密地拉开了帷幕。

1958年9月27日，国务院为我国第一座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建成举行隆重的移交生产典礼。典礼仪式由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主持，中外来宾1000余人参加典礼。郭沫若院长、聂荣臻副总理先后讲话，陈毅副总理剪彩；1958年10月9日和12月21日，朱德委员长、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北京市市长彭真来所视察并指导工作；1985年9月27

日，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隆重集会，庆祝建院 35 周年。国务委员张劲夫、政协副主席周培源等出席大会；1990 年 11 月 19 日，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来院为快堆研究中心工程奠基揭幕；1994 年 2 月 27 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同志亲切看望了王方定院士；1999 年 9 月 1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的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重要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曾在该院工作过的于敏、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陈芳允、钱三强、彭桓武等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0 年 5 月，国家主席江泽民为该院题写院名；2000 年 9 月 27 日该院召开建院 50 周年庆祝大会，刘华清、朱光亚等领导出席大会；2002 年 6 月 27 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对该院专项治理经费、运行费和提高待遇等方面的报告作出重要批示；2002 年 8 月 21 日，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为中国先进研究堆工程开工作出批示；2004 年 3 月 11 日，在北京举行的第八届中国国际核工业展览会上，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参观该院展台。同年 8 月 27 日，“中国核事业 50 年成就展”在北京举办。胡锦涛、江泽民、温家宝、曾庆红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观展览并听取赵志祥院长汇报；2004 年 12 月 1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来该院视察工作。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机构设置为下设五个研究所：核物理研究所、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所、放射化学研究所、同位素研究所、核技术应用研究所；所下设研究室或中心：7 个工程技术和研究部：串列加速器升级工程部、中国实验快堆工程部、中国先进研究堆工程部、核燃料后处理放化实验设施工程部、放射性计量测试部、保健物理部、另有原子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原丰科技开发总公司、实验工厂、电子仪器厂等 20 个产业实体。中国核数据中心、中国快堆研究中心、北京串列加速器核物理国家实验室、核工业核保障技术重点实验室、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放射性计量一级站、国家同位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核工业研究生部等设在这里。

作为一个先导性、基础性、前瞻性的综合研究基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在核基础研究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果，为国防及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提供了人才和技术储备。如，串列加速器升级工程，在空间辐射物理研究和核数据测量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开发出的新型的放射性同位素，核物理及其交叉学科的研究又有新的突破。

一个国家，只要在海洋深处还保留有一条战略导弹核潜艇，那么，即使地面军事设施全部被敌国摧毁，它仍可以进行规模可观的战略反击，敌国的一大批重

要军事设施、政治中心势必在它成功的反击下化为灰烬。中国是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动力潜艇的国家。中国不但拥有鱼雷核潜艇，也拥有战略导弹核潜艇。

中国第一艘装备声自导鱼雷的反潜核潜艇采用水滴线型，单轴推进，自持力几十昼夜，下潜深度和水下航速达到或接近国外同期核潜艇的水平。全艇分为7个舱，指挥台围壳在二舱上面，潜望镜及各种天线升降装置由此伸出。从远处看，艇的外形像一条灰色的大鲸鱼。

核潜艇研制技术极为复杂，不仅要研制紧凑可靠的艇用核动力装置，选好适于水下高速航行的艇体线型，而且要装备保障艇员长期在水下工作和生活的空调、空气再生、净化系统，水下导航定位系统，远距离隐蔽通信系统，水下远程警戒、搜索、侦察、通信、目标定位的综合声呐系统，以及与潜艇的作战使用相适应的反潜鱼雷武器系统等。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是我国最早建立的反应堆研究基地与核燃料生产研究基地，在为实现核能利用的研究上，先后进行了先进堆工程技术、快堆工程技术、新燃料元件、堆物理、核电安全、乏燃料的处理、核燃料循环及洁净能源等课题研究，均取得了显著成绩。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核能源的广泛应用，该院坚持“军民结合、寓军于民”，以“建设基础性、综合性、世界先进水平的核科技研究基地”和“创造一流业绩，造就一流人才、建设一流核科研基地”为目标，以中国先进研究堆、中国实验快堆、北京串列加速器升级工程和核燃料后处理放化实验设施四大工程为科技创新平台，以国防科技、核电基础和先进核能、核基础科技与交叉学科、核技术应用及产业化为主要方向，在核能源的转化与利用上做出了新的贡献。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是拥有3200多人的高科技研究单位，这里聚集了多名著名科学家和高级科研人员，其中有两院院士6名，博士生导师70余名，高级科研与技术人员700余人。吴有训、钱三强、王淦昌、戴传曾、孙祖训、樊明武等著名科学家先后担任院长。现任院长为赵志祥研究员。在五十多年的科研工作中，形成了核物理、核化学与放射化学、反应堆工程技术、加速器技术、核电子与探测技术、同位素技术、放射性计量、核保障技术、辐射防护技术等众多学科领域，先后获得国家 and 部级奖励1200多项。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产品覆盖最广、并且是唯一同时拥有反应堆和加速器生产的放射性同位素研究基地。为了进一步研制开发以同位素与辐射技术为主导的一批高新技术和产品，建立了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控股的第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原子高科股份有限公司，放射性

药物生产线、核医疗器械及配套用放射源、安装有钴——60 集装箱检测装置、可杀死炭疽菌等病菌的自屏蔽电子束灭菌消毒装置以及各种核探测器等工业与民用成品，正在广泛应用和推广，并且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该院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上已经与国外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特别是在反应堆工程技术方面，享有良好的声誉，被誉为“南南合作的典范”。

房山县二区工作回顾

王硕儒

1948 年底，我晋察冀地区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迅速。察哈尔省第三专署（即后来河北省通县专署）的房山县、良乡县、涿县、涞水县四座县城和广大地区，都已全部解放。东北、华北解放战争节节胜利。随着革命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地方干部力量已经严重不足，为此，除从部队、各级党政机关抽调干部予以补充外，还要快速培养大量干部。

1948 年 12 月中旬，察哈尔省第三专员公署知识分子训练班在房山县南白岱村开班。参加培训的学员来自房山县、良乡县、涿县、涞水县四个县的知识青年，共计二三百名。这些青年大部分是初中学生或高小毕业生，年龄最小的 15 岁，我参加了这期知训班，当时也只有 17 岁。学员都是由各县、区选送的。训练班设总部，由专署民政科长李午亭、教育科长陈啸二人负责。总部下设房良、涞涿两个大队。房良大队由房山县教育科长常健负责领导和管理工作。大队以下按居住地点设中队，每个中队一般 10 至 15 人，设一名中队长，负责学习讨论和管理工作。

学员的生活管理由总部统一负责，伙食以粗粮为主，吃小米焖饭或玉米碴粥，每周还吃一、两次细粮改善生活，一般人感到吃的不错，只有少数人不习惯。住的是借用群众的民房，有的还火烧炕，很暖和，穿的盖的用的都由学员自理。知训班的学员，完全坚持自愿的原则，对感到生活不习惯、不愿学习的学员不强留，因而有不少人虽然参加了知训班，但中途又回家了，如房山县五区顾册村，开始县区选送学员 12 名，开班几天后又回家 9 名，最后只剩下王振海、王庆元和我三人。

知训班学习的内容是：形势教育、政策教育、社会发展简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等。突出讲了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人，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我国历史上历次农民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式发展之快，必然取得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土地政策、

知识分子政策、对敌斗争政策；中国革命要坚决进行到底等内容。

知训班的学习方式，主要采取讲大课与中队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学员集中在一个大院内席地而坐，主讲人站在院中心宣讲。主讲人是李午亭或陈啸同志。没有书，也没有讲义，讲稿都是主讲人自己准备的，讲的很认真，学员听的很细心。每讲一次课，以中队为单位组织讨论，重点是领会精神，加深认识，不懂的地方可以提问。讨论的情况由中队长定期向大队汇报，对学员提出的问题，下次讲课时统一予以解答。

知训班的大队，开办墙报，要求学员结合个人实际，写出学习心得体会，向大队墙报投稿，大队在墙报上予以选登。如在学习党的政策过程中，曾号召学员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有参加过反动会道门、国民党党员，三青团员的，在自愿的基础上实事求是登记清楚，一时不想登记的也可以不登。当时，历史有污点的学员大部分都进行了登记，有的在墙报上公开发表。

这个知识分子训练班，采取抗大式办学的道路，无固定校址，无固定学习时限，短短三个月时间，在三个地址办学，开始在房山县南白岱村，这是革命老区，办学后勤方面的事好解决，安全形势也好。随着平津及华北地区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1949年2月，校址由南白岱村迁往房山县城关洪寺村；不到一个月，又由洪寺村迁址良乡县城北大街。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学员在陆续分配工作。最后一次分配给房山县38名，我被分配在房山县二区作文教工作。

1949年3月，我开始被分配在房山县二区工作，区址先在六渡村，后迁址张坊村。房山县二区初辖张坊村、下寺村、片上村、沈家庵村、干河口村、瓦沟村、三合庄村、东关上村、穆家口村、西关上村、六渡村、五合村、王老铺村、栗元厂村、七渡村、八渡村、九渡村、十渡村、马安村、卧龙村、西太平村、东太平村、六合村、西庄村、西河村、前石门村、后石门村、平峪村共28个行政村，1950年调整区划时，房山县二区增王家磨村、蔡庄村、下滩村、郑家村、镇江营村、史各庄村、西白岱村、南白岱村、广录庄村、北白岱村、蔡家口村11个行政村，减沈家庵村1个行政村（划归涞水县）。全区行政村38个。

房山县二区处于一个非常偏僻的深山区，属革命老区，是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区。机构设置同全县各区一样，干部配备流动量很大。我初到二区时，干部多是本区、村新提任的。有的是新调入的。还有的是国民党县政府留用分配的。总的说是新人多，中共房山县二区委员会书记先是刘天相，后是蔡景超，组织委员李宗全、蔡景超，宣传委员柴振江、范永田，区政府区长初是郑有【FJF】

版【FJJ】、后是陈希亭，秘书张风荣，助理员（干事）有：民政隗有堂、蔡廷于、邵玉玲先后任，财粮方存勤、罗志生，实业隗甫太、邱孝起、梁德举，公安晋天志，文教王硕儒（后又增设民校总校长李廷珍、小学总校长白磊，区文化教员赵作）。区武装部长晋国旺，区妇联郭晓亭、陈松玲，后勤管理员蔡玉清等。

区里的工作，包括民政、财政、实业（生产）、文教、粮食各方面工作。这个地区，早在抗日战争前，经济、政治、文化、教育都相当落后，交通十分不便，基层政权掌握在少数统治者手中，欺压百姓，广大人民群众苦不堪言。抗战开始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平西抗日战争巩固的根据地，特别是抗战最艰苦的岁月，既是房涑涑联合县和昌宛房联合县机关的所在地，又是冀中十分区后勤机关的大后方。我党对这一地区的工作非常重视，全面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即改造旧政权，发展生产，不断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建立小学校、开展冬学、识字班运动。二区的小学校大部分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干部和群众十分重视教育，尊重教师，甚至到达崇拜的程度。

文化教育工作，是我份内的工作。在小学教育上，全区先是分十渡、六渡、三合庄、张坊四个学区，1950年增设南白岱、下滩学区。当时的小学校，大部分行政村都是一村一校一个教师。无论几个年级，都是一个大复式班，办学条件很差，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小学校还是民宅，一般是3间房，屋内靠一头有块黑板（不少是大石板），是教师教学的地方，另一头盘个土坑和炉灶，是教师住宿和做饭的地方，学生用的课桌和坐位是用木板（石板）或石头搭成的。教师的工作很辛苦，既要教几个年级的复式班，还要自己做饭，参加社会活动。村干部有事就去找教师，让教师给出主意，特别是搞宣传（屋顶广播、写黑板报）、教冬学（民校）、搞文体活动等都要教师管。甚至村干部开行政会议，也让教师参加，有看不懂的文件让教师给传达。为克服学校的混乱现象，减轻教师社会活动的负担，提高办学质量，县、区政府曾三令五申，要求村干部不得影响学校的教学秩序，制止教师的社会活动，但有些村有时还是难以避免。各校的学生一般二、三十人，三、四十人不等，很多都是十七、八岁的大龄学生。冬、春季入学学生最多群众在冬闲期间千方百计送自己的子弟上学，由于居住分散，离学校远的地方甚至临时搬到靠近学校的地方住。春耕生产开始后，由于生产的需要（特别是大龄学生）开始减少，到了夏季，学生大约要减少到半数，秋收大忙季节，坚持学习的学生就很少了，教师要随时做好

学生及其家长的工作，尽量多坚持学习。当时在山区教育上有个顺口溜，叫“冬满棚，夏一半，到了秋天不见面。”就是形容当时山区小学教育情况的。这不是因为学生和家長不愿学习，而是因为当时群众生产和生活的需要。

我到二区工作时，小学校尚未在行政村完全普及。卧龙、六合村两行政村还没建小学校，这不是因为县、区不重视，也不是村干部和群众缺乏积极性，其主要原因是山区师资特别缺乏，当地识些字的人都脱产当了干部，再找不出能教书的人，县政府由平原往山区调教师又调不进来，从新中国成立前（1949年）开始，就由平原往山区派教师，但由于山区离家远，交通很不方便，办学条件极差。再一个原因是山区居住特别分散，一个行政村分几个，十几个自然片，能集中在一个地方学习也非常困难。建六合村小学校，是我在二区建立的最后一所小学。

六合村的干部和群众，十分渴望建立小学校，让自己的子弟学习文化。曾多次要求政府给他们派教师、办学校，可政府就是无人可派。1951年冬，他们就从邻村（马安村）请了一位识字的老先生，办起了一所村办小学。三、四个月後，村干部约我去六合村小学看看。这个村有十二个自然片，小学就建在全村距区政府较近又较集中的自然片（地名荆子站），学校原来是三间民房，屋内一端墙上有一块黑板，另一端盘一土炕和炉灶，学生的课桌是木板搭的，坐的是一些小石墩。有二十多个学生，大部分都是，十七、八岁的大龄学生。不少学生离家有十几里路，中午不能回家，都是带饭上学，一般带的多是菜粥，放在沙锅内，用小篮提着，或用葫芦制成罐子提着，用勺儿吃。学生学习很辛苦，但他们不怕艰苦，很懂事，很知足。我问他们，他们说能上学识字，很不容易。

1949年和1950年，房山二区的成人教育，主要是开展冬学运动、办民校，识字班。由于居住分散，集中学习有困难的村庄就采取以自然片分散学习的方法。民校教师集中培训，民校经费开支由区负责。1952年，推行祁建华速成识字法。河北省通县专区，为尽快推行速成识字法，在通州潞河中学举办了全专区推行祁建华速成识字法师资培训班，各县派人参加。房山县文教局派了各区文教助理员、民校总校长等人参加。二区是我和李廷珍，赵作3人参加的，结业时，赵作被专区文教局借用到其他县推行速成识字法，我和李廷珍回县。

培训班共用了一周的时间，学习拼音字母，必须死记硬背，要记准记实，保证拼音的准确性。为了学好字母，采取了不少方法。即把字母写成“字号”，带

在身上，出门见面，拿出来互相提问，遇有不认识的字母，就互教互学。大家学习得很快，兴趣很高。培训班后期转入学习班后怎样推广的问题，根据专区文教局的部署，各县都要举办速成识字法实验班，成功后再行推广。房山县确定试点45个，开办实验班53个。二区确定试点村1个，办实验班1个，即西关上村速成识字法实验班。我主管，李廷珍具体负责，学员十四、五名，学习方法按通专学习的方法（其他村仍坚持原来的学习方法不变）。学员学习非常认真，在学习拼音字母过程中，真是死记硬背，有些学员到山上没人的地方去背，直至背熟才回家。学习拼音就容易了，ㄅY拼成个爸，ㄇY拼成妈。初步办班结束时，组织学员座谈学习体会，大家认为：速成识字法是好办法，可以加速识字，拼音好比一个拐杖，有了这个拐杖，一些生字就都认识了。学习班结束后，转入了巩固班。后来这个班有不少人都脱产参加了工作。

区政府的工作，助理员相互之间有明确分工，但又团体协作。区干部大部分时间是下乡，有时几个人为一个组，分组包片（几个村）。有时是以人包村，凡是群众要求办的事，下乡干部都要管。各个部门的工作，由看机关的干部处理。每次下乡的时间不等，根据实际情况决定，一般是一、两月集中汇报一次。叫作：“下去一把抓，中心带其他，回区再分家。”

我参加工作的第一次下乡，是去前石门村，除领导农业生产外，重点是解决土改遗留问题，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工作，区里安排由小区委员李凤全带领我工作。李凤全家住西河村，是石门小区不脱产的干部，他每天晚上到石门村听取我的汇报，参加村干部会，研究工作等。前石门村，曾于1946年冬进行了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1947年5至6月间，又进行了土地复查，通过发动群众，清算斗争，分配胜利果实，整顿村政权和群众组织，使土地的分配更加合理，涌现出一批斗争骨干，壮大了骨干队伍，人民群众得到了彻底解放。但是出了严重的“左”倾现象。特别是11月以后，贯彻《土地法大纲》，实行土地平分，并在土改中整党，审查干部，查三代“搬石头”伤害了一些干部和中农利益。解决土改遗留问题，就是要做好村干部的思想工作和经济补偿，解决土地、房产和浮财分配的遗留问题。

我第一次下乡，面对如此问题，真是不知如何是好。我向李凤全汇报，他说有些事我们村干部研究，能办的就办，不能办的把事情弄清楚，回区向领导汇报就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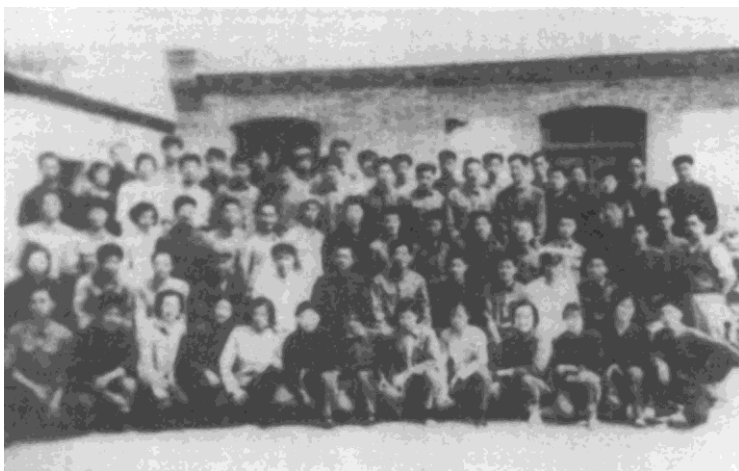
这次下乡，我的印象比较深，觉得什么都是新鲜的，回区汇报以后，受到领导的好评。

“四清”见闻

苏宝敦

1963年的暑伏时期，阴雨连绵，洪水泛滥。当时房山县正在召开四级（县、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干部大会，我们张坊公社的干部住宿在原房山中学的学生宿舍内。因拒马河洪水每秒高达10000多流量，南尚乐公社辖区的下滩、蔡庄、土堤、郑家磨、王家磨五村被洪水围困；张坊公社的穆家口、干河口、瓦沟与公社机关失去了联系，片上、张坊、西白岱、史各庄村的部分地段被洪水毁掉，南白岱村地势较低，洪水进村已成一片汪洋。所以，会议暂且终止，各公社主要领导回本公社抗洪救灾。我作为一名办公室干事与会计张哲生一起留守在房山中学。

在这次四级干部会上，主要是号召基层干部“洗手，洗澡”，退赔贪污受贿和多吃多占的各种钱物。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王纯所讲的一句话。他说：“人们都说共产党卸磨杀驴（那时农村均用毛驴拉磨磨面），是因为我不杀你们这些驴，我这老驴就要被杀了！”1964年的“小四清”运动，主要是针对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两级干部开展“清帐目、清分工、清仓库、清钱物”运动。张坊公社派驻的是中央民族学院、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讲师等资深教职人员。我和组织委员杨春荣一起到西白岱村驻点，配合他们工作。在工作中，到县城听了一次县委书记霍梁的报告，印象最深是他讲了这样一句话：“搞小四清如同给自家小孩子洗澡，洗干净后只许将脏水泼掉，不准许将脏水与小孩子一起泼掉！”这句话深刻形象，保护基层干部未受太大伤害。



1965年新华社派驻张坊乡“四清”工作队与机关干部合影

1965年，“大四清”运动开始。张坊公社派驻的是新华社高级干部和高级编辑、记者。何青（朱穆之，新华社副社长）任四清分团团长，石少华（原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新华社副社长）、王天章（新华社机关党委书记）任副团长，王天章重点负责公社机关。公社机关工作队队长王子英（女），是一位高级编辑，新华社副社长邓岗夫人。当时，公社机关是主要四清对象，党委书记蔡景超、公社主任张凤荣以及党委副书记傅长兴是被整的主要目标。特别是蔡景超同志“被整”过程我记忆得十分清晰。因为，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任主要领导就是蔡景超。那是1959年，我从东北果树学校毕业后分配在长沟大公社（当时全县有八个公社）农业部当果树技术员，公社党委书记蔡景超、副书记兼主任隗合龙、副书记袁德印、柴振江。农业部部长刘树春，党委办公室负责人魏志华、赵文瑞。后来大公社划分成小公社，我被分配到张坊公社工作，又因为我不断写点新闻报导在报刊上发表，就转行在办公室当干事，原张坊公社党委书记宿廷印调离后，蔡景超又调任张坊公社党委书记。他对我比较了解，也比较器重，一直跟他在党委办公室做文秘工作。蔡景超对自己要求很严，在我心目中是廉洁奉公的好书记。所以在大四清运动中，王天章、王子英曾多次找他谈话，叫他承认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接受不了，沉默相对抗。工作队叫他承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理由是：一、张坊公社的自留地吊起来种六面子，庄稼好于集体；二、社员开小片荒地，种十边地，肥了自己，不顾集体；三、社员饲养鸡鸭，嘴对着集体，屁股对着自己；四、自留地种烟叶，用烟叶到石亭集市（当时河北省涞水县开设的一个集市，离张坊很近）换粮米，奸滑人捞好处，老实社员吃亏；五、灯下不亮屋内黑。具体指张坊、史各庄两个村，一个是公社所在地，另一个离公社最近，偏偏这两个村的资本主义现象表现得最明显。蔡景超书记当时叫我帮助写检查，私下对我说：这些事是上级叫干的，是为了叫社员有口饭吃，不被饿死，渡过三年困难时期，罪责不在我呀！他觉得委屈，我也想不通。蔡景超书记的检查不过关，张凤荣主任的检查也通不过，二人下不了“楼”，过不了关，直到最后受处分。工作队叫机关党员讨论给蔡景超书记留党查看、降两级处分。因为蔡景超书记是十六级市管干部，处分要上报市委，听说没有通过，但他还是觉得冤屈加之长期肺气肿病折磨而逝世了。张凤荣主任是县管干部，给予免职、降两级处分。他也觉得冤屈，几年后也逝世了。1966年“文革”开始前，新华社驻张坊公社的四清工作队全部撤离。

“四清”运动已过去四十多年，但所见所闻一直在我脑海中萦绕，引起我无限思考。

房山小矿区建撤始末

李 耀

1980年10月15日，经市委、市政府决定将原房山县区域内的重点产煤山区乡镇（当时称公社）的河北、南窖、大安山、班各庄、黄山店5个乡镇所属57个村和周口店镇所属的山口、车厂、良各庄、西庄、官地5个村，以及史家营乡的金鸡台村共63个村，划归北京矿务局领导。为此，矿务局专门成立了工农区办事处（也称小矿区），具体负责这一地区的领导工作。然而在13年后的1993年6月1日，又经市委、市政府决定，撤销了北京矿务局工农区办事处，原从房山区县划出的“五乡两办”共63个村以及文教、卫生、供销部门又全部划回房山区建制。房山小矿区的建立与撤销，前后历经13年之久，这是市委市政府在房山区域内为解决工农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实现共同发展，根据不同历史时期所采取的一项重要决策。

成立小矿区的历史背景

房山西北部山区煤炭矿产资源丰富，储量近10亿吨，解放前已有一定规模的开采。解放后由于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国家大力发展煤炭事业，在房山相继建起了长沟峪、大安山、磁家务等几个国家大型煤矿。在国有煤炭工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给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群众的生活带来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由于管理体制、国矿与地方群众利益关系等多种原因，使这些矛盾和问题没有及时得到解决，甚至不断加深，致使群众多次上访，进而发展到群众集体到矿上闹事，严重地影响了国矿的生产和正常的工作秩序，其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国矿与地方小煤窖在采煤资源上的矛盾。国矿由于资金雄厚，设备先进，规模较大，占据着主要产煤区域，而山区产煤乡镇和村办煤窖的煤炭开采也是其主要的经济来源，因此国矿和地方小煤窖的地下采煤巷道纵横交错，争采煤源，致使矛盾不断发生。

国矿与当地农林牧业生产发展上的矛盾。国矿多年大量采煤，形成了一些地下采空区，使上方岩体、土体失去了支撑，造成地面塌陷，破坏了耕地和林地。据统计，全区地面塌陷有 180 余处，主要分布在重点产煤乡镇。大量采煤也破坏了原有的地下水系，造成水源下降或流失，使山区的农业和林果业生产得不到及时浇灌，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国矿与当地群众生活的矛盾。由于采煤造成的地面塌陷，使很多村民的住房开裂，甚至倒塌，不仅给群众造成财产上的损失，而且生命安全也受到了威胁，如南窖乡的西安村就有 80% 的民房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由于采空区地下水源遭到破坏，群众饮水也十分困难。

为了解决好工农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安排好群众生活，保障国家煤炭的稳定生产，市委市政府于 1980 年初决定建立小矿区，把在房山区县域内的产煤乡镇和几个重点产煤村划归矿务局统一管理。

小矿区筹建的简要过程

成立小矿区牵扯面广，工作十分复杂，市委市政府对这项工作十分慎重，决定采取先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再全面推开的办法。为此首先由房山县政府和北京矿务局共同组成工作组，于 1980 年 6 月中旬先确定在大安山乡进行试点。工作组通过座谈走访，广泛听取意见。

当时就多数群众对建小矿区这一管理体制是接受的，但也存在一些思想顾虑，主要是：

担心划小矿区后，原有的口粮供应标准和粮食品种不能保障。山区是缺粮地区，山区群众口粮标准和粮食品种的调剂都由县粮食局优先保障供应，因此划小矿区后能否继续保持原有水平是群众最关心的。

担心划归矿务局管理后，乡镇和村办的小煤窖开采受到限制，收入减少，群众生活水平降低。

担心农副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渠道不通，采购不便，影响当地的生产和群众生活。

担心煤炭行业的招工政策影响部分户的招工。因国矿招工只招男不招女，所以男劳力少的村和有女无男户对划小矿区不积极。并提出划归后在招工上要制定照顾的措施。

乡镇原有的社调干部，要求划小矿区后招工，要给予解决农转非的户口

问题。

针对干部群众中存在的思想顾虑和要求，县政府（当时称革委会）和北京矿务局经过充分讨论，就划小矿区后的管理体制、领导关系、职责分工、经费开支等具体问题达成一致，于8月1日共同向市委、市政府写了试点情况报告。市委市政府于10月15日批转了这一报告，房山小矿区正式成立，并要求在年底前双方交接完毕。市委市政府在批转试点报告的同时，具体明确了以下几个问题：

关于领导原则和管理体制。建小矿区后，各乡镇受矿务局和房山县政府双重领导。矿务局负责党的工作、人事工作、农林牧副各业生产和组织安排好群众的生活。小矿区范围内的文教、卫生部门和供销社亦同时划归矿务局领导。属于政府职能的治安、武装、民政、计划生育以及原县属各职能部门派驻乡镇的财税、银行、路政、粮食等单位的领导关系不变。

关于群众口粮标准。明确规定在数量和品种上要照顾到历史水平，要按不低于邻近乡镇口粮标准供应。同时对由于采煤造成的土地塌陷以及山区苗圃地、菜地要核减耕地面积，增加反销粮供应。

关于招工问题。由于煤矿工作有其特殊性，18至30周岁男劳力，根据需要逐年招工，对个别村男劳力少且年龄偏大的和有女无儿户要给予适当照顾。乡镇社调干部在招工时应一并予以解决。

关于小煤窖的生产管理问题。鉴于产煤是乡镇和各村的主要收入来源，为保证群众生活和国家对煤炭的需要，小煤窖要继续发展。为合理开发煤炭资源，在国矿井田范围内的小煤窖，由矿务局统一规划，统筹安排，共同发展。小煤窖的产供销统一由矿务局工农区办事处管理，由市有关部门统一分配。小煤窖开采所需的材料、设备、物资指标划归小矿区，小煤窖管理经费和修路等所需资金从地方煤炭产量提成中拨付。

房山县区域内划归小矿区范围内的五个乡镇和周口店、史家营两乡镇的所属部分村共63个村于1980年前全部交接完毕。

撤销小矿区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

成立小矿区，这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特别是在工农矛盾比较突出的产煤区，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解工农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但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多种经济成分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

步确立，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原有的地区封闭式的管理体制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甚至制约山区经济的发展，影响了山区群众生活的改善和提高，因此有些干部和群众又提出了回归原建制的要求。市委市政府经过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决定于1993年6月1日撤销小矿区建制，各乡镇重归房山区领导。存在13年之久的小矿区建制为什么撤销，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不利于政府加强统一领导，影响政府职能的发挥。由于小矿区隶属于矿务局和区政府的双重管理体制，而又有不同的职责，使行政管理与组织发展经济、安排群众生活割裂开来，不利于全区统筹规划，协调发展。如小区采煤形成的采空区，险村险户急需搬迁，要占用相当数量的耕地，小矿区本身无力解决。又如山区教育，由于居住分散，交通不便，要建立寄宿制学校，也需在平原征地筹建，这都是小矿区管理体制下难以解决的。

不利于发挥区域优势，带动和加快山区经济的发展。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平原乡镇经济发展很快，而小矿区地处深山，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由于管理体制不顺，区政府和有关部门不能统筹规划，发挥区域整体优势，做到优势互补，资源合理配置，加强深度开发，带动山区经济快速协调发展。

不利于推进机构改革。建小矿区后，由于管辖范围分散，小矿区又相应建立了长沟峪办事处负责管理周口店镇划入的5个村。还建立了金鸡台办事处负责管理从史家营乡划归的金鸡台村，这就在同一地区又新增加了两个管理机构，造成机构重叠，形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

不利于矿务局集中精力抓好企业自身的管理和建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企业竞争日趋激烈，提高企业自身的管理水平，增强竞争能力是企业兴衰的关键。然而小矿区这种“企业办社会”的管理体制，使矿务局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如继续执行下去，由于领导精力分散，将会使矿务局和小矿区双方经济发展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基于上述原因，撤销小矿区则是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的必然要求。自1993年6月1日撤销小矿区后，理顺了管理体制，区委区政府加强领导，统筹规划，全面安排，充分发挥整体优势，因地制宜开发建设，使山区的农林副各业生产和文教、卫生、公路交通、旅游等各项事业协调发展，特别是群众关心的险村险户搬迁，山区寄宿制教育等老大难问题，都在分期分批组织落实，山区人民和全区人民一样，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水平也应有很大改善和提高。

房山区区址东移纪事

张广文

1987年1月，根据国务院（86）164号文件批复，撤销房山县和燕山区建制，成立房山区，区府所在地仍设房山城内。房山区辖区历史上为两县，其中，良乡县于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六年）设置，房山县于公元1189年（金大定二十九年）设置。新中国成立后两县同属河北省通县专区，1958年3月撤销房、良二县合并成立周口店区（1960年改称房山县），划归北京市，县府一直设在原房山县老城内。

房山区一届五次人民代表大会1990年3月31日审议通过的《北京市房山区1989—2000年经济社会综合发展规划》中，根据发展战略需要，提出了全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逐步东移良乡设想。议论了多年的区址迁移问题，进入了正式实施阶段。经过全区上下及市有关部门八年的努力工作，于1998年11月18日实现了区府东移的战略任务。本人从制定规划，到后来担任房山区区域规划办公室副总工程师，目睹和参与了区址迁移的全过程，本文仅将区址迁移这一庞大的系统工程实施和曲折艰难的历史过程作一个简要侧记。

区址迁移 由来已久

历史上良乡地处京南交通要道，明清小说描写京城多提及良乡，良乡板栗历史上颇为知名。1958年房、良两县合并为周口店区时，就有过区府选址的争论。尽管当时良乡的设施比房山好，但房山城在全区的地理位置适中，在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下，便于领导和开展工作，靠近山区对战备也有利，就决定将区址放在房山老城。

1969年东方红炼油厂在房山境内建成投产，并逐步发展成为燕山石化总公司，给房山城关镇的发展和建设带来了许多变化因素。化工企业的发展和城市建设的要求各有特点，矛盾逐步凸显。1973年，房山县曾向市里提出将县府迁移至良乡的建议。但经过调研，认为良乡旧城内用地面积有限，在城外建

设又要大量占用土地。而且在当时条件下搞大规模基本建设有很多困难，建议未被市里采纳。

1979年，燕化公司准备上一套30万吨乙烯工程，希望扩大占地规模，跨越大石河向东发展。但市有关部门建议燕化公司集中在大石河以西发展，房山县府可以迁移良乡，后来因多方面原因，这一设想并未实施。

1985年，房山城关镇旧城改造时，不少部门和单位提出城关不应有太多的建设项目，而应将城市建设的投资向良乡转移。因为当时建设项目急于开工，这样的建议未被采纳。

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房山区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诸多的新变化新形势，面临更多的新机遇、新挑战。道路和交通运输工具的改善，供电和电信事业的发展，缩短了人与人的距离，现代化的经济社会需要更广阔的空间。区府所在地成为影响房山区对外形象和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问题。

从区域发展来看，区府所在地城关镇，对全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中心的积极作用越发不明显。城关镇自身对外界吸引力不大。十多年来除1975年华北石油管道局以外，没有吸引过任何外来企业和单位入驻；房山、良乡、燕山三足鼎立，分散了城市建设的人力、物力。燕房两地区址与化工企业混杂，建设与管理交叉；良乡镇则丧失不少发展机会，全区经济发展受到影响。

从发展环境看，房山城关镇已不具备带动全区的优势。其一，地域狭小，1985—2000年总体规划用地9平方公里已所剩不多；其二，水资源有限，很难满足地区人口发展需要；其三，大气和地表、地下水污染严重；其四，交通属于山前“盲肠”地带，放射作用不大，又距北京市区较远，对吸引市区人口及投资，开展横向联合不利。

从文化心理因素来看，认为城关镇未来发展受燕化影响太大，不少人逐步选择了到良乡居住或创业。

因此，区址迁移得到了全区人民的共识，获得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区址迁移工作进入了正式实施阶段。

战略转移科学论证

区址迁移作为房山区一次重大战略决策，不仅涉及良乡镇是否具备发展成为全区中心的良好工程条件和区址迁移的经济可行性，而且还涉及北京市西南方向卫星城镇的布局问题。为了向市政府、市区域规划领导小组提供科学的

决策依据，市计委和房山区政府委托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对区址迁移进行可行性研究论证。市规划院由副院长张其昆亲自主持此项工作。从 1990 年 4 月开始，先后组织了市地矿局、市地震办公室、市水利局、市劳动保护研究所、市卫生防疫站、房山区区域规划办公室、房山区规划局等 7 个单位，采用多种先进的监测、检测仪器进行实地调查，用计算机地理信息系统进行数据分析，以获得经济、社会、环境最佳效益为原则，根据国家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对良乡镇的工程环境条件作出评价，并对区址迁移经济投资及社会环境效益进行综合评价。于 1990 年 10 月完成了《北京市房山区区址迁移可行性研究》报告。报告分为房山概况、区址迁移问题的提出，新区址选择在良乡的主要依据、良乡镇工程和环境条件评价，区址迁移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评价、新区址良乡镇总体布局性方案、结论与建议 7 个部分。

报告指出，新区址选在良乡主要是良乡镇具有比房山城关更优越的区位优势和环境优势。良乡位于北京西南大通道京石公路与北京公路六环的交汇处，还有多条公路由此通向全区各处，距市中心区仅为 20 多公里，是大城市极富潜力的生长和快速发展点。良乡地势开阔地形平坦，大部分地区为工程地质二类用地，适宜工程建设。这对于城镇体系布局带动生产力布局的调整，实现“中间起飞，带动两厢”的战略具有关键的“龙调头”作用。但区址迁移毕竟还要看工程环境条件和社会经济诸多方面，需要系统全面论证。

对于良乡镇的工程环境条件能否满足区址未来发展，报告进行了城镇防洪、水资源、地质条件地震基本烈度、核辐射、噪声、地面震动和干扰震动六个方面的评价。综合评价认为，仅从工程条件和环境条件考虑，良乡镇作为区址发展是基本可行的，但由于水资源的限制和跨京广铁路发展的困难，2000 年以前发展规模以 10 万人左右为宜。

区址迁移的主要任务是行政中心的转移，与之有关的投资应包括行政办公建筑、住宅建筑、部分公共和基础服务设施的建设。区直属机关单位 60 多个，需总建筑面积 15 万平方米，需新建住宅 14 万平方米，公共服务设施 3 万平方米，加上新建和改造基础设施共需投资 2.8 亿元左右，根据当时的财政收入和筹资条件，预计迁址要用 6 至 10 年时间才能完成。

区址迁移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如果仅仅是行政中心转移，很难保证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因此，报告建议房山区将区址迁移与经济开发结合起来。在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区址迁移后，抓紧制定总体规划和中心区详细规划，争取市政府从财力上政策上予以支持，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投资项目，增强良

乡卫星城的竞争力，尽快树立新区址的良好形象。

迁址报告完成后，区委书记邵乾坤、区长李庆余等主要领导多次向市有关部门和领导汇报，请求支持和帮助运作此项工作。房山籍的市民政局局长段天顺专门就迁址事到房山区调研并给予程序上的指导。段天顺指出，区名更改和区址迁移涉及国家版图，不但要北京市批准，还要国务院审批，建议区名不改，只办理区址迁移手续，程序相对简单容易一些。区领导采纳了这一建议。1990年12月7日由市民政局邀请国家民政部行政区划和地名管理司司长张文范来房山视察，区委书记邵乾坤就区址迁移作了汇报。张文范同意房山区向民政部报送正式文件，以便研究审批。

在区址迁移可行性研究基础上，房山区政府于1991年1月25日向北京市政府报送了《关于报审〈房山区1989—2000年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请示》。请示中扼要报告了区域规划的基本内容和特点，还对区址迁移良乡作为实施规划的关键问题进行重点说明：“区址迁移良乡，用城镇建设格局的转变带动生产力布局调整的战略决策，对于实现‘中间起飞、带动两厢’的战略思想和实现燕房一体化，促进燕化地区发展，为大企业特别是燕化公司做好服务，以及推动全区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有着深远意义。”

请示中还建议市政府在收归蚕种场用地、商品住宅小区开发、良乡工业区享受优惠待遇、提高城市建设维护税留成比例方面给予支持。

开发建设 规划先行

1991年2月28日，房山区政府以房政文字〔1991〕7号文，向市政府正式送报了《关于区址迁移良乡的请示》，区址迁移工作进入了实质性运作阶段。经过向市政府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请示和协商，房山区区址迁移工作可以边运作边建设，但一定要按照1983年国务院对北京市总体规划的批复精神进行规划和建设。

从1991年下半年开始，房山区规划局组织技术力量配合市规划局按照北京市总体规划对良乡卫星城的功能定位，开始编制良乡工业开发区和良乡卫星城总体规划。

1992年10月4日，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办公室（92）首规办规字第140号文，签发了《关于〈良乡工业开发区总体规划方案〉的批复》，原则同意工业区的规划布局及功能分区、道路布局及市政方案，指出：“良乡工业区应是

有效接收市区经济技术扩散，重点发展高新技术项目，“三资”企业和出口创汇企业，争取尽快发挥较好的社会效益。”

1992年11月3日，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办公室（92）首规办规字第157号文，签发了《关于〈房山区良乡卫星城总体规划方案〉的批复》。原则同意良乡卫星城的土地使用规划、道路交通布局及市政方案，批准规划城镇用地34.36平方公里，预测2010年卫星城总人口20至25万人。

根据批复中要求继续制定详细规划的要求，在开发建设同时，房山区规划局组织技术力量用4年时间又陆续完成了良乡卫星城各村建设改造规划；完成了总长216公里46条主次干道路网的定线，建立了路网坐标控制系统；完成了卫星城竖向规划；完成了行政办公区、拱辰大街、长虹路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在制定详规同时，于1994年6月完成良乡卫星城地名总体规划方案的编制，为良乡卫星城的开发建设和管理打下良好基础，加速了区址迁移的进程。

建管并举 水到渠成

区址迁移涉及经济、社会环境、政治、文化诸多因素，确实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为实现这一战略决策，区委区政府带领全区人民做了大量工作，良乡卫星城的老百姓面对建设初期的征地拆迁资金不足，做出了很大牺牲。

为了加强区址迁移的领导，区委区政府决定成立良乡卫星城开发建设领导小组，全面管理新区址的开发建设工作。1992年10月19日召开了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庆余任组长，常务副组长李炳田，副组长翟鸿儒，顾问张成基，办公室主任翟鸿儒（兼），办公室副主任张玉纯、段书棣，小组成员为区政府各有关委、办、局的一把手（1993年4月原区域规划办公室与领导小组办公室合并）。明确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是总体规划的实施，建设项目的立项审查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领导小组从1992年成立到1997年成立良乡卫星城建设管理委员会之前，一直由区长任组长，直接参与各项建设和管理的决策。

为了搞好卫星城建设，领导小组集思广益认真研究建设项目，认真解决出现的每一个问题，仅1993年就召开了九次全体会议。为了借鉴城市建设经验，还先后到大兴、怀柔、密云、昌平等郊区和山东省潍坊、烟台、威海、荣城、乳山、青州，河北唐山、辽宁锦州、兴城、葫芦岛等地考察取经。

在领导小组和卫星城建管委领导下，举全区之力开发建设新区址取得了突

飞猛进的成绩。从 1992 年 10 月 22 日西潞园居住小区开工建设起步，北潞园、行宫园、长虹、月华、苏庄、吴店小区共 90 多万平方米的住宅工程陆续开工并投入使用，新型的商业大街——西潞大街的建设和西护城河改造项目的率先完成，月华大街、良乡东西大街和拱辰大街的扩建改造，东、南、北护城河改造，刺猬河的修浚和绿化等各项工程的完工，迅速地改变了良乡面貌，向现代化的城市迈出了一大步。京石高速路西侧排水沟的建成和城市排水系统的改造则提高了良乡地区的防洪抗涝能力。京周路南北两部分自来水管网联网的实现和上万水源地开发，使良乡的供水得到很好地解决。10 万门程控电话大楼建成后使良乡的有线通讯能力大大提高。近十万平方米的商业和服务设施使良乡的市场繁荣起来。随着 917 路、616 路和 922 路等市区公交汽车和连接全区各地的小公共汽车线路的开通，良乡成为全区的公共交通枢纽和出行最便捷的地区。

道路交通和市政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建设的优惠政策给区直机关和不少企事业单位的搬迁创造了条件。一大批单位积极筹措资金，或向上级伸手，或集资合作，或资产置换，陆续开工建设了新的办公楼，完成了包括行政办公、科教文卫等 90 多项 42 万平方米的单项建设工程。良乡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六年期间，良乡地区各项城市建设累计开复工面积 162 万平方米，竣工 123 万平方米，完成投资 19.94 亿元，城市建设区由 4 平方公里扩大到 12.5 平方公里，城市人口增至 8 万多人。先后完成了 56 项基础设施工程，使京广铁路西侧的城市道路、排水、供电、电信、绿化系统的主框架基本形成。良乡工业区入区企业达到 70 余个，1998 年技工贸收入达 8.5 亿元，良乡地区和良乡工业区税收总额达到 6256 万元，占全区地方财政收入的 21.09%，超过了 1984 年房山县的财政总收入。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龙调头”效果已经凸显出来。

北京市市委市政府和主要领导也非常关心房山区区址迁移和良乡卫星城建设工作。1993 年 4 月 21 日常务副市长张百发，副市长陆宇澄到良乡召开现场办公会，同意良乡卫星城的建设只要符合总体规划报请市有关部门同意可以边办手续边建设。这对以后良乡卫星城的开发建设起了关键的促进作用。这之后，1996 年 7 月市长李其炎，1998 年 5 月，市委书记、市长贾庆林也到良乡视察指导工作。

经过努力建设和积极运作，房山区区址迁移问题终于提到了市委市政府议事日程。1996 年 9 月 5 日，市长李其炎在其主持召开的第 89 次市政府常务

会议上，“根据房山区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的需要，鉴于良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在该区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会议原则同意房山区政府关于区政府迁移良乡的方案。考虑到房山区委、人大、政协一同迁址，将此方案报市委常委会审定”。1996年9月26日，中共北京市委京常字〔1996〕49号文通知房山区委：“现将1996年9月18日市委常委会议纪要中有关议定事项通知如下：会议听取并同意房山区委、区政府迁移良乡的请示，会议强调，此事要向民政部报告，并注意做好相关工作。”

至此，房山区区址迁移获得正式批准。当时，在良乡具有办公条件或正在建设的区直机关已达32个。

1996年12月31日，由北京有色金属设计研究院设计由韩建集团承建的，总建筑面积27500平方米的区五大部门办公大楼在纷纷瑞雪中奠基，区址迁移工作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

经过近两年的紧张施工，区府大楼及配套工程胜利完工，1998年11月18日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庆祝区府大楼落成和区府正式迁移良乡，为全区人民期盼多年的区府东移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后 记

区址迁移，同时也揭开了房山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篇章。展望未来任重道远。区址东迁时，城市框架已经形成，但城市景观却未形成。区址迁移后，房山区委区政府对良乡卫星城的开发建设管理力度丝毫不减。为了落实市长贾庆林要把良乡建成首都卫星城精品的指示，首先于1998年配合市规划院完成了良乡卫星城总体规划修订工作，又于年底制定了《良乡卫星城中心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进入21世纪以来，新区址所在地良乡已建设成为具有一定水平的北京市现代化新兴城市，成为名副其实的房山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在北京城市建设发展新形势下，《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于2005年1月12日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提出了“到2020年左右，力争全面实现现代化，确立具有鲜明特色的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地位”。2005年5月30日北京市委、市政府下发了《关于区县功能定位及评价指标的指导意见》，同时确定了房山区为“城市发展新区”，良乡组团和燕房组团是房山新城的核心区域。2005年年底清华大学和市规划院共同完成了《房山新城规划（2005—2020年）》的编制工作，提出到2020年左右，基本完成产

业结构调整，进一步优化新城内部结构，形成具有鲜明特色人口达到 55 万规模的现代化新城；到 2050 年全面建设成为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新城，成为促进北京与京津冀区域协作的重要增长点，勾画出一幅 21 世纪发展的美好蓝图。历史上的京南名镇良乡，将随着房山新城的现代化建设，放出更加璀璨的光彩。

良乡老干部活动站的建立

白玉

离休干部，是国内革命战争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实行供给制度下，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的特殊群体。他们阅历深，见识广，经验多，政治上成熟，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关心老干部，发挥老干部的作用，让他们把全部的智慧、能量释放出来，发光发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继续做出新的贡献。为此，根据党和政府有关规定，凡是在1949年9月30日之前参加革命，享受供给制待遇的都可以享受离休待遇。1979年国务院下发了104号文件，这时房山县委组织部设立了老干部组。1982年4月，国务院又下发了放宽离休干部条件的文件，房山县委又在组织部下边建立了老干部处。

1982年房山的离休干部已经有171人，但居住的特别分散。有的在山区，有的在平原，有的在房山，有的在良乡。为此，1982年，县委决定，在房山和良乡两地建立老干部活动站。以大石河为界（指居住在农村的），大石河以西的老干部，归房山活动站管理，大石河以东的老干部，归良乡活动站管理。组织部选派有活动能力的干部来活动站工作，管理活动站和为老干部服务。

良乡老干部活动站，在原来良乡北大街（现在南大街）路西36号院内，也就是后来的良乡老干部活动中心。建委的张治和、工业局党校的郭祖兰来活动站工作。

这所院子，是原来的良乡第二小学，有西房三间，在它的后面还有东西长约六十米，南北宽二十余米的活动空间，（原来学生的小操场）有北房七间，东房三间。当时在良乡的离休干部有五、六十人，在这儿活动是没问题的。组织部从党费中，拿出1万元，让活动站的张治和、郭祖兰二人，找人把原来的房子粉刷一新，又在老干部处的帮助下，购买电视机、活动用的桌椅，活动器械及办公用品，还订了些报刊杂志等。经过细心地准备工作，于1982年7月1日，活动站正式开始了活动（事前已通知单位和个人），当天来了四十多人。从此，凡是在良乡居住的离休干部，都可以到站活动。由于工作人员少，组织部和老干部处的领导研究，召开了老干部会，和老干部们商量，组建了老干部

管理委员会。他们的分工是，管委主任 2 人，学习委员 1 人，文体委员 2 人，青少年教育委员 2 人，协助工作人员管理老干部的活动。管委会建成之后，首先是建立老干部学习制度，每周二学习一次，学习文件或报纸有关社论，并组织老干部分组讨论来提高认识。还建立了学习考勤制度，每次学习都点名，看老干部们的上站率。其次，是建立老干部的值班制度，家里能离开的老干部，轮流到活动站值夜班，不计报酬，老干部毫无怨言。一共安排 12 人，轮到谁来值班，坚持了一年多。他们即是活动成员，又是不计报酬的工作人员。当时的三间西屋是阅览室，订有《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大参考报》、《法制日报》，刊物有《红旗》、《前线》、《时事宣传手册》等。四间北屋是棋牌室、值班休息室，四间大东屋是学习室。老干部们根据自己的爱好兴趣，有选择地参加活动。老干部活动站与海军装备论证中心、良乡医院还经常开展共建活动。良乡医院每到老干部学习日，就派一名医生来到活动站，给老干部看病，量血压，开处方等。给了老干部很大的方便。老干部活动室，都是原来的教室，门窗封闭得不太好。到了冬天，各活动室虽生上二号铁炉子，门口挂上棉门帘，屋内仍然很冷。1989 年初，花二十万元，开始建一座单列式三层小楼。建有锅炉房，实现了冬季热水循环供暖。小楼建筑面积 805 平米，使用面积约 570 平米。县委还专门为老干部，配发一套处级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北京市委的《北京工作》等，区委文件，老干部可以在此借阅。1984 年 3 月，开始使用新楼房活动。老干部看到新楼房、新桌椅，都很高兴。

1985 年 1 月，市委老干部局召开了各区县老干部活动站长汇报会议，房山老干部处指定良乡老干部活动站汇报：突显了房山县委领导非常重视老干部工作，多方筹集资金，为老干部活动站建起了新楼房，这在当时的郊区县是独一无二的。二是活动站建起了老干部自管组织管理委员会，在老干部中开展了评四好活动。三是活动的多样性，即有内部活动，又有外出参观，大大丰富了老干部的生活等。在这次会上，因良乡活动站工作上有创新精神，多方面的活动内容，被市委老干部局评为先进活动站。奖给良乡活动站一辆 212 汽车，脚踏自行车，电动按摩椅等五种健身器材。北京广播电台在会后对良乡活动的内容和作法进行了报导，2 月 2 日中央台在联播节目中也进行播报。各区县老干部局的同志，北大清华的同志，还有南京、郑州、济南、太原、石家庄、天津、承德、沈阳等十几个省市老干部局的同志，到良乡老干部活动站参观。

从上世纪 90 年代，老干部活动站建起了老干部荣誉室，展示了老干部的革命史，展示出 131 人的光荣革命斗争史。抗日时期老干部 38 人，解放战争

时期的老干部 75 人，解放初期的 28 人。这些人当中局级的 6 人，处级的 82 人，科级的 21 人。其中有抗日时期河北游击军的参谋闫爱众（良中老校长），有全国战斗英雄王文治等。为此，老干部活动站就成了良乡一小、二小、二中和职工干部学校挂牌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几年下来，老干部讲课约 120 余次，受教育的学生有 3500 余人次。

为了支持良乡旧城改造，于 2003 年 6 月，活动站拆除了。活动站在这里活动了二十余年，给每个老干部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唐代侨治于幽州良乡县的几个羁縻州

张东升

古代幽州之地，一般指今天的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北部、辽宁省大部分地区。作为行政建置，幽州的历史可上溯至三皇五帝时期。《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帝颛顼高阳者，……北至于幽陵。”幽陵是我国古代对东北方的称呼，后世多以为幽陵和幽都即幽州。

到了唐代，幽州已经成为北方最重要的军事重镇之一。唐初，置幽州总管府，后改为都督府、大都督府，天宝元年（724）改称范阳郡，均治蓟城。据史家考证，蓟城位置在今北京广安门一带。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上曾有过多次民族融合，而唐代又是我国北方少有的民族大融合时期，是自北而南民族大融合的鼎盛时期。

自北朝以来，我国北方民族融合的程度逐渐加快和深入。北方民族南下，不仅是在经济和文化上要汲取中原地区的先进成分，反映在政治上，北方民族一方面随着自身的崛起和强大，要在统一的中央政权中彰显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则以咄咄逼人的气势，直接觊觎中原地区的中央政权，妄图一举取而代之。因此，中原地区和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有时是战，有时是和，或战或和，随着朝代的更迭或政权的易手交替出现。以战争而言，有时是中原和北方少数民族之间，有时是各少数民族之间，政治上或军事上强大的一方，总是力图使较弱的一方处于臣服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北方军事重镇幽州，自然成为北方民族南下的必争的战略要地。而地处中原的中央政权，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也必然以幽州为屏障，以阻挡北方少数民族南下。

当时，活跃在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以契丹、突厥、奚、靺鞨等势力较强。

突厥族是个古老的民族，公元6世纪时，曾游牧于阿尔泰山以南一带，后来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两个汗国。若沿着历史的纵轴追溯，突厥族先世即是战国至秦汉时的“丁零”。魏晋以来称敕勒、高车，其后称铁勒。突厥最早与中原王朝发生关系，当在西魏时期。据史书记载，当其时，突厥会于每岁冬季踏冰过河，由西北犯掠西魏边境。尔后，突厥又愿意和中国通好，

双方互派使者往来，促进了经济交往。隋代，又实行“和亲”和“安抚”政策，以交好突厥。

唐初，李渊集团因内部尖锐的政治矛盾，出现了“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棋高一筹，掌控了政权，接着出现了贞观之治，开创了盛唐基业。隋末，因朝势衰微，东突厥则日渐强盛，并不时侵扰中原，势力直达雁门关一带。李世民当皇帝后，为解除东突厥威胁，曾积极训练军队，待时机成熟，命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都督，率众击东突厥。贞观四年（630）正月，颉利可汗被俘，东突厥灭亡，所俘十万余众被安置在河套以南地区。

至唐高宗李治执政，原归附于唐朝的东突厥余部羽翼丰满，乘势又起。到武则天建国号“周”，突厥问题仍未解决。终武周之世，突厥之乱不绝。

北方另一少数民族契丹，祖属东胡，原游牧于辽河上游。隋代，契丹各部落已有一定联合。到了唐初，契丹形成部落联盟。贞观二十二年（648），契丹首领窟哥上表诚请，唐皇帝赐其“李”姓，在其地设松漠都督，领十州，以窟哥为都督。

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不堪忍受营州（治今辽宁朝阳）刺史赵文翽欺凌，起兵反，占据松漠。窟哥之孙李尽忠号称“无上可汗”，以孙万荣为将军，一举攻陷营州。之后，李尽忠兵至数万，一直进围檀州（今北京密云），威逼幽州。唐军出击契丹，败。次年三月，契丹犯幽州，攻陷城邑，剽掠吏民。后契丹内乱，受契丹驱使的奚人一部与唐军配合，契丹兵败。至此，营州契丹之乱方得平息。

武则天当政时期幽州发生的政治和军事上的一些变化，直接造成在幽州出现大量羁縻州县，形成各民族杂居的新局面。“羁縻”一词，直接解释为“笼络牵制”之意。我国唐宋两代出现的羁縻州县，属设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设置，一般唐代称羁縻府州，宋代称羁縻州县。明代，只在边疆设羁縻卫所，建置规模远不如唐宋。总之，羁縻州县的设置，明显有笼络和牵制藩属之意。

武则天时期，中原和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已交好并有一定融合。如武则天长安二年（702），以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为检校幽州都督。李多祚是靺鞨族人世代为靺鞨酋长，以军功任羽林卫大将军，是有唐以来非汉族人士出任主官的第一人。可见，自武则天时期起，北方民族的融合不仅体现在经济和文化上，而且深入到政治领域。

各少数民族聚集地所设的羁縻州县，原本在边地，因李尽忠起兵反唐，不仅占据了营州，而且一度攻陷幽州，致使一些羁縻州县不得不南迁，相继迁到

了河北、山东等地。从河北、山东北还时，幽州又成了主要寄居之地，而幽州良乡县又是羁縻州县主要寄治地之一，先后有几个羁縻州县侨治于良乡县。

武则天当政前后，幽州行政建置曾几度变化。唐高祖武德时期，幽州只领蓟、良乡、涿、雍奴、安次、昌平六县。到唐太宗贞观年间，幽州政区有所扩大，领蓟、良乡、涿、雍奴、安次、昌平、渔阳、潞、固安、归义十县。武则天时期，领县变成十三个，唐玄宗时又变成十个，但无论怎样变化，良乡始终是幽州属县之一。查幽州各县所设羁縻州县，据唐玄宗天宝初统计，总共设有十九州一府，而良县一县侨治的羁縻州县，就占了三分之一，足见良乡县在幽州位置的重要。

当时，相继侨治于幽州良乡县的羁縻州县有：瑞州及所领来远县，归义州及所领归义县，威州及所领威化县，夷宾州及所领来苏县，黎州及所领新黎县，慎州及所领逢龙县，师州及所领师阳县。

威州 始称辽州，唐武德二年（619）以契丹内稽部落置，原治在燕支城。贞观元年（627）改称威州，隶属于幽州大都督，领威化县。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78），契丹李尽忠反，占据营州，威州及所领威化县于是南迁，徙治于幽州良乡县石堡窟（一说为今天的佛子庄村）。

慎州 为靺鞨州。靺鞨是古代居住在东北长白山、黑龙江、松花江一带的少数民族，女真族祖先。唐武德二年，以粟末靺鞨乌素固部落置。后因契丹李尽忠反，于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79）迁于淄州、青州地，唐中宗神龙（705—706）初北还，寄治于良乡县都乡城（即长沟西乡故城），领一县为逢龙县。

黎州 武则天载初二年（690）自慎州析地而置，为靺鞨州，以安置夫余靺鞨乌素固部落，隶营州都督。因兵乱于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迁于宋州，神龙初北还，改隶幽州都督，寄治于良乡县都乡城与慎州同治。领新黎县。

瑞州 始称威州，唐贞观十年（636）以突厥乌突汗达部落置，隶营州都督。咸亨中（670—674）改称瑞州。后因契丹李尽忠反，侨迁于宋州，神龙初北还，寄治于幽州良乡县广阳城。领来远县。

夷宾州 为靺鞨愁思岭部落聚集州，唐乾封（666—668）中于营州界内置，隶营州都督。后李尽忠作乱，迁于徐州。神龙初北还，寄治于良乡县广阳城，改隶幽州都督，与瑞州同治。领来苏县。

归义州 唐高宗总章（668—670）以所俘新罗民户置，领归义县，后侨治于幽州良乡县之广阳城，与瑞州、夷宾州同治。领归义县。

师州 据《北京通史》记载，师州为契丹州，唐太宗贞观三年（629）

以契丹、室韦部落置，隶营州都督。后因李尽忠反而迁于青州，中宗神龙（705—707）北还，寄治于幽州良乡县东闾城（今房山区境内），隶幽州都督。领师阳县。

侨治于幽州良乡县的几个羁縻州究竟是何时废弃的呢？有的史书用“后废”两个字一笔带过，这是因具体时间难以考证而通常采用的“模糊”叙事办法。《北京通史》对寄治幽州的羁縻州有大致的叙述。总括来看，用来安置突厥、契丹、奚、靺鞨等部落的羁縻州，大多原在营州界内（今辽宁等地）。各羁縻州设置时间有早有晚，以曾寄治幽州良乡县的几个羁縻州为例，最早的设于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即慎州和威州。此后，太宗和高宗时均有设置。最晚的设于武则天载初二年（690），即黎州。最早设置的和最晚设置的前后相差约七十年。

诸多羁縻州的南迁，皆因契丹李尽忠反。李尽忠占据营州在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幽州陷落在万岁通天二年，即697年。为避兵祸，诸羁縻州南迁河北和山东等地。后李尽忠兵败，契丹平定。后武则天从侄武懿宗受命“安抚”河北，武懿宗将被契丹掠走的百姓一律视为反叛，“先取其胆，然后杀之，残忍之极。”后名臣狄仁杰被任命为幽州都督，百姓生活才稍安。到唐中宗神龙（705—707）初，各羁縻州北还，在幽州安置。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调集范阳（天宝元年改幽州大都督府置）平卢、河东三大节镇兵将，并驱集契丹、奚、室韦等少数民族军队，举兵进犯长安，诸羁縻州县之名遂不复存在。由此推断，唐幽州良乡县所寄治之羁縻州县，存在时间大约五十年。

唐武则天当政时期，到李隆基当皇帝的开元、天宝年间，幽州所寄治之羁縻州县存在时间虽短，但却是幽州各民族大融合的一个关键时期，自然也是良乡地区民族融合的关键时期。西汉之初，今房山区地设有良乡、西乡、广阳及利乡诸县（国），其他县后来相继省并，只有良乡县一直延续下来。唐良乡县县城遗址，即窦店土城遗址。广阳、西乡等县，建置虽不存在，但城郭还在，寄治的各羁縻州县，多落脚广阳和西乡县故城。其中寄治广阳的有瑞州及所领来远县、夷宾州及所领来苏县、归义州及所领归义县。寄治西乡县故城（都乡）的有慎州及所领逢龙县、黎州及所领新黎县。

由于有诸多羁縻州寄治，当其时，幽州良乡县境内，除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原原住民外，又有突厥、契丹、靺鞨、奚、室韦、新罗等北方少数民族栖居，形成多民族杂居的局面，成为各民族融合的前提。以幽州地区而言，没有民族的大融合，就没有幽州地区的扩大与发展。唐代民族的大融合，总的趋势是自

北向南逐步深入和发展，而幽州地区，又处于扼控东北疆土的要地和枢纽位置。

幽州良乡县所寄治的羁縻州县，史书中偶有所见。如曾寄治广阳的归义州，《旧唐书·地理志》载：“归义，在良乡之古广阳城，州所治也。”其“归义”条云：“总章中置，处海外新罗，隶幽州都督，领归义县，户一九五，口六二四。”另有史书记载：唐总章（668—670）中，以所俘新罗户置归义州，领归义县，侨治于良乡县广阳城。可见，归义州及所领归义县，是为安置所俘新罗人所设的羁縻州县。这里所说的“所俘新罗户”当指总章及总章之前的征新罗之役所俘的民户。唐高宗乾封元年（666），高丽王盖苏文卒，其子泉南生继位，为兄弟所逐，困守国内城池。其子献诚向唐朝求援，高宗决定借此机会击灭高丽。先遣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率兵接应，并以献诚为向导，破高丽兵。十二月，义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都督。乾封二年，李勣军渡辽水。总章元年（668）九月，攻陷平壤，高丽悉平。所俘新罗户，先于营州界内设归义州归义县，后因兵乱侨迁于幽州良乡县广阳城。

又有史书记载：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以礼部尚书、信安王李祎为行军副大总管，率幽州节度使赵含章等出塞击契丹、奚，大破之。奚族首领李诗琐高率五千帐降附。唐赐李诗琐高为归义王，充归义都督，复置于广阳城。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归义州民户不仅有新罗人，而且有奚人，且奚人人数要远超于新罗人。按时序分析，归义州先是为安置所俘新罗人所置，后来又有奚人李诗琐高率五千帐降附唐朝，唐将其划并归义州，并任李诗琐高为归义王。由此又可看出唐时幽州良乡县在幽州民族大融合以及东亚文化和经济交流中所处的地位。

华北抗战的中流砥柱

——纪念平西抗日根据地建立七十周年

刘文江

2008年3月，是平西抗日根据地创建七十周年。

1938年2月，晋察冀军区派邓华支队挺进平西，开辟了平西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创建平西抗日根据地，开始了华北抗战的新阶段。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斗争，不怕牺牲，同仇敌忾，前仆后继，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

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

1937年8月22日，八路军一一五师由陕西的三原地区东进，开赴敌后抗日。取得平型关大捷后，聂荣臻奉中共中央命令，以五台山为中心，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7年10月27日，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成立，统一了晋察冀军区的军事指挥，为开辟、建立和巩固平西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可靠的后方。

开辟和建立平西抗日根据地。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共河北省委、北平市委和东北特支即与平西地区党的地下组织相配合，开展了抗日活动。1938春，根据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创建冀热察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晋察冀军区先后派出邓华支队、宋时轮支队进入平西，建立抗日政权，组织抗日武装。1938年2月，邓华奉命率独立师三团从涞源出发，挺进平西。3月，在涞水县马水村成立了房（山）涞（水）涿（县）联合县政府，在涿鹿县谢家堡村成立了宣（化）涿（鹿）怀（来）联合县政府，在宛平县东斋堂村成立了宛平县政府，分别任命了县（工）委书记、县长和游击支队长。1938年5月，宋时轮支队、邓华支队合编，组成第四纵队。1938年6月，三县干部随第四纵队开赴冀东。1938年4月底，晋察冀军区派五支队接防平西，为整顿和健全平西地方政权，五支队分别向三县调配了干部，并在房山县长操村建立了房

(山)良(乡)联合县政府。为加强党的领导，根据晋察冀边区党委指示，成立了宛平中心县委。平西的抗日斗争得到全面开展。1940年，发生“紫石口”事件，房涑涑联合县政府在紫石口被原民防头子袭击。关键时刻，五支队司令员赵侗动摇，离队投靠国民党。1938年8月，晋察冀军区派一支队司令员杨成武率部到平西，不幸发生“王家台”惨案。五支队、一支队合编，各县游击支队改编，调往晋察冀第一军分区。1938年9月28日，侵华日军大举进攻平西，地方部队转移，县委、县政府随部队转移到涑源地区，平西抗日根据地遭受挫折。

恢复、发展和巩固平西抗日根据地。1938年10月，第四纵队由冀东回师平西，恢复宛平根据地，消灭紫石口、王家台反动民团，4个联合县政府恢复工作，建立区、村党组织和抗日政权组织，扩大地方武装，扩编主力部队。1939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冀热察区委员会，辖平西、平北、冀东三个地区。1939年2月7日，组建冀热察挺进军，成立冀热察军政委员会。1939年3月7日，建立冀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简称“平西公署”，5月，建立中共冀热察区平西委员会，简称“平西地委”。1939年9月，肖克在冀热察区党委和冀热察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提出了“三位一体”的战略任务，即“巩固平西抗日根据地，坚持冀东游击战争，开辟平北新的游击根据地”，统一了三个地区党政军民的思想。为实现“三位一体”的战略任务，1939年11月，整顿了主力部队，组建冀热察挺进军第六、第七、第九团，总兵力达到12000余人；加强地方武装，建立和扩大县、区游击队，建立民兵组织和村游击小组，开展人民战争；加强地方党组织建设，建立区、村抗日民主政权。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得到迅速进展，平西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扩大。

粉碎“扫荡”、“蚕食”，保卫和巩固平西抗日根据地。抗日根据地的日益发展壮大，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日军对平西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大扫荡。1939年2月至6月，平西抗日根据地军民坚决回击了侵华日军对平西抗日根据地的三次“扫荡”。日军实施“总力战”和“囚笼政策”，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在占领区，强化保甲制度；对游击区，制造无人区；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封锁，反复进行军事“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妄图摧毁抗日根据地。1940年日军对平西抗日根据地先后实行了春季大扫荡和秋季大扫荡，曾一度进入平西腹地涑水县的板城、三坡，房良县的霞云岭、十渡，昌宛县的史家营，占领大片抗日根据地。1941年，日军对平西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和军事封锁，以重兵于8月对平西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扫荡”。我军

虽然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但由于主力部队调入外线作战，敌强我弱，平西抗日根据地人力、财力、物力受到很大损失，平西根据地不断缩小，如房涑涿抗日根据地由300多个村庄缩小到20多个村庄，再加上1941年和1942年的干旱，根据地陷入极端困难时期，严重缺粮、缺药、缺衣被、缺食盐。为巩固抗日根据，平西地委召开了“平峪会议”，提出，在军事上，开展反“蚕食”、反“扫荡”、反“清乡”斗争，在根据地贯彻中央减租减息政策，开展大生产运动。经过平西党政军民艰苦卓绝的斗争，平西抗日根据地度过了最残酷、最艰难的时期，并坚持和巩固了平西抗日根据地。

发展扩大平西抗日根据地。经过平西党政军民艰苦卓绝的斗争，1943年春，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形势开始好转。1943年3月，随着根据地扩大，新建立了怀（来）涿（鹿）、蔚（县）阳（原）、蔚（县）涿（鹿）宣（化）三个联合县工委和办事处，各县、区游击队越过封锁沟深入平原地区作战，平西抗日根据地严重缺粮、缺药、缺衣被、缺食盐问题开始解决。1944年，八路军和游击队转入反攻，不断攻克日伪据点，根据地不断扩大。1945年4月以后，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开始向日伪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先后解放了斋堂川，怀涿的将军庙等地，肃清桑干河敌军，深入平郊作战，根据地进一步扩大。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地位

没有巩固的平西，就没有巩固的平北、冀东和冀西。平西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直接威胁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北平，威胁日军控制的平汉、平绥两条铁路，同时，也是八路军向冀东、热河、察哈尔、辽宁挺进的前沿阵地。平西抗日根据地是晋察冀边区的东北屏障，对于坚持华北的长期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1940年初，肖克在《挺进军的三位一体任务》中阐述了建立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意义，指出：第一，平西位于华北敌人统治中心——北平、天津、张家口的肘腋之下，直接威胁敌人占领的交通要道和大城市。第二，平西是晋察冀边区在东北方面强有力的“卫星”。因为它位置的重要，所以经常牵着敌人许多兵力。敌人进攻晋察冀军区和冀中时，都可以直接配合。平西的存在，加强了边区的巩固。第三，平西是在华北的最前线，是华北军队向热河、察哈尔、冀东的前进阵地。第四，平西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正规军，培养了广泛的

地方武装，政权工作和民众运动，都打下了基础，他已经具备了根据地的条件，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战略支点之一。第五，平西是冀东游击战争的直接支援者。平西的巩固，是直接配合冀东斗争的，平西与冀东在地域上容易联系，可以得到干部的调节，得到精神上的鼓励，得到军事上、政治上的直接援助。

抗日战争时曾任中共平西地委书记李德仲在总结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地位时指出：“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它的存在，直接威胁着侵华日军在华北的指挥中心——北平、天津以及伪蒙疆自治政府首府张家口，巩固的平西抗日根据地，这片绵延无尽的高山峻岭，又是后来坚持冀东、开展平北两块根据地的前进阵地和后方，它又是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可靠后方基地。它是晋察冀与东北联系的重要通道，它还是平、津爱国志士、青年学生及国际友人进入抗日根据地的必经之路。无数后方紧缺的物资曾经通过这里进入根据地。它是整个晋察冀抗日模范根据地的东北屏障。”

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地位，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东北屏障。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是我党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华北的北平、天津、张家口则是侵华日军在华北的统治中心。平西抗日根据地则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卫星”，是抗击华北日本侵略者的前沿阵地，是保卫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第一道防线。巩固平西抗日根据地，才有冀察冀抗日根据地巩固的东北屏障。

是华北敌人统治中心肘腋下的一把尖刀。1937年平津失陷后，日本侵略者实行了残暴的殖民统治，培植伪政权，镇压中国人民，疯狂经济掠夺，北平、天津、张家口则成为侵华日军在华北的大本营。平西抗日根据地是随时刺向华北侵华日军的一把钢刀，时刻威慑着侵华日军在华北的殖民统治。

是坚持冀东、开展平北两块根据地的前进阵地和后方。平西抗日根据地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前沿，是我党开辟冀东抗日根据地和平北抗日根据地的前进阵地。只有建立巩固的平西抗日根据地，我党我军才可以此为立脚点，进军开发冀东抗日根据地和平北抗日根据地，扩大华北抗日根据地。

是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后方基地。冀中抗日根据地，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冀中抗日根据地地处平原，平西抗日根据地是冀中部队军事修整、干部培训、武器制造、军工生产、伤病员治疗的重要后方基地。

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和中共中央通向华北、东北的交通要道。平西抗日根据地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和中共中央向华北、东北派出干部，我党华北、东北干部和抗日爱国人士进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重要交通要

道，有了巩固的平西抗日根据地，才有畅通的交通。

正是由于平西抗日根据地重要的战略地位，侵华日军把平西抗日根据地视为“心腹之患”，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频繁进行所谓“强化治安”、“肃正作战”和残酷的“军事扫荡”，在抗日根据地实行野蛮残酷的“三光政策”。

平西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历史意义

我们党非常重视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平西抗日军民，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八路军总部和聂荣臻同志的指示，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不断加强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发展抗日根据地经济，开展生产自救，开展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平西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建设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建立和领导的平西抗日民主政权，胜利领导了平西抗日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和建设。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我们党通过建立和组织平西抗日民主政权，成功领导了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抗战期间，平西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房（山）涞（水）涿（县）联合县、宣（化）涿（鹿）怀（来）联合县、宛平县、昌（平）宛（平）联和县、房（山）良（乡）联和县、怀（来）涿（鹿）联合县、蔚（县）阳（原）联合县、蔚（县）涿（鹿）宣（化）联合县、涞（水）涿（县）联和县等 23 个抗日民主政权。我们党领导的平西抗日民主政权，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创造和实行了体现抗日民主政权性质的政权结构和民主制度，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武装建设，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游击区政策，坚持为民众谋利益，领导人民抗击日寇侵略，“树立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良好模型，在与强大敌人进行的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复杂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平西抗日斗争史料选编》），成功领导了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和建设，巩固了平西抗日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建立的人民武装，有效牵制和打击了华北侵华日军，保卫了抗日根据地。从卢沟桥事变开始，平西各级党组织，不断加强人民武装建设，形成了正规军与地方军相结合、游击队与民兵相结合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人民武装力量的壮大，使华北侵华日军昼夜不安，一次次纠集其主要兵力，对平西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扫荡”，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和长期的军事封锁。平西抗日根据地先后多次粉碎了侵华日军对根据地大规模的

“军事扫荡”“蚕食”和“军事封锁”，保卫了平西抗日根据地，保卫了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有效牵制和沉重打击了华北侵华日军主力，消灭了华北侵华日军的有生力量，巩固发展了平西抗日民主政权。

巩固的平西抗日根据地，发挥了冀中、平北抗日根据地可靠的后方基地作用，是夺取华北抗日斗争胜利的重要保障。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建立以后，首先开辟了冀中、平西抗日根据地，形成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与华北侵华日军在北平西面、南面的对峙。冀中抗日根据地地处华北平原，南、东、北三面受敌，敌我军事力量相差悬殊，冀中抗日根据地，主要依据平西抗日根据地作为后方。平西抗日根据地建立以后，成为开辟平北抗日根据地和冀东抗日根据地，实现中共中央、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对华北侵华日军实施敌后进攻战略意图的坚强阵地，为开辟平北、冀东抗日根据地，提供了重要的军事、干部、物资支持，为巩固冀中抗日根据地，开辟和巩固平北抗日根据地和冀东抗日根据地，发挥了很好的后方阵地作用，是巩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重要保障。

巩固的平西抗日根据地，保证了中共中央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与华东北抗日交通的畅通。“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侵华日军以北平、天津、张家口为中心，推行了残酷的殖民统治。开展华北的抗日斗争，开展东北的抗日斗争，打破侵华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封锁，必须建立和保障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与华北、东北抗日组织之间交通的畅通。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永定河谷、拒马河谷则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沟通北平、华北、东北党的组织、抗日进步组织、抗日爱国民主人士的交通要道。我们党派出的一批又一批干部通过平西抗日根据地进入北平、华北和东北，北平、华北和东北的干部、抗日爱国民主人士、进步青年学生通过平西进入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抗日根据地需要的许多物资，也是通过平西运送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平西抗日根据地也是外界了解抗日根据地的窗口，著名爱国人士李济深曾到平西考察抗日高小，形成了对抗日根据地的新认识。

巩固的平西抗日根据地，成为解放战争抗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前沿阵地和坚强后方基地。日本侵略者投降以后，国民党反动军队立即占领了平西的平原地区，疯狂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大量收编、纠集日本汉奸、特务和敌伪人员，组织还乡团，搜查村政权和人民政权干部、党员和积极分子，残酷迫害和屠杀革命干部、革命群众，组织反动武装力量，封锁老解放区，对解放区发动频繁进攻。平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全民动员，开展人民战争，保卫人民

胜利果实，保卫解放区，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的疯狂进攻。平西解放区党政军民团结一心，加强人民政权建设，开展生产运动，发展解放区经济，巩固了平西老解放区，成为抗击华北国民党反动派的前沿阵地，成为人民解放军全线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坚强后方，大批的青年参军上前线，大批的农民抬担架、送公粮，积极支援前线，大批的伤病员在解放区养伤治病。平西老解放区为人民解放军全面反攻国民党反动派提供了有力的人力、物力支援。

平西抗日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和建设锻炼和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成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有生力量。平西抗日根据地就是一所革命大学校。从平西抗日根据地到平西解放区前后近 12 年的时间里，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前线和敌占区的军队干部、地方干部抽调到平西地区，参加各种培训，提高政治、军事、文化素质。二是党组织派到平西的大批军事干部、地方干部，在领导平西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生产建设实践中，领导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一大批同志成长为党的优秀领导人才。三是大批平西本地干部，在党领导的平西革命斗争中，接受党的教育，参加革命斗争实践的，成长为党的基层、中层和高级领导干部，一大批同志随军南下，走入各地党政军企领导岗位。四是平西广大革命青年，踊跃参军上前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平西抗日根据地的革命斗争精神和经验，是我们党和我们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财富。平西抗日根据地人民政权建设和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经验，党领导平西根据地开展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经济斗争、文化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宝贵经验，平西抗日根据地形成的革命斗争精神，是平西抗日根据地革命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不便为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加强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国防建设实践中提供强大的鼓舞和激励，也必将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谐社会建设实践中，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建设实践中，提供强大的精神鼓舞和激励。我们要学习平西抗日根据地革命斗争精神，弘扬平西抗日根据地革命斗争精神，让平西抗日根据地革命斗争精神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不断发扬光大。

房山县入城接管时形势纪实

王绍清

1948年12月14日，冀中七纵队五十八、五十九团，攻克房山城后，五十八团团团长李德财奉命撤离宿营码头任营村，全团进行战评、休整，待命配合野战军攻占北平。二十旅副旅长刘洪涛协助入城工作队完成接管任务后，留守官兵全部撤离。房山县人民政府从张坊迁入房山城内，安全保卫由县大队及民兵负责，县委、县政府及公安局约有干部百余人。当时主要任务是：布告安民，召开各界座谈会，宣传党的政策，协助入城接管工作队清理军火及物资。

中共房山县委召开会议，听取入城工作队及敌工、城工、社会部的汇报后，对当时社会治安形势进行了分析。

当时河北省房山县伪保安旅副旅长张德祥率残部逃到丰台太平庄躲在一户人家白菜窖内，将菜吃光，走投无路，被刚投诚的周文龙发现，劝其投诚，于1948年12月19日收编到解放军五纵队某团后潜逃，下落不明。拒绝收编的伪七团团团长马德福潜逃涿县马踏营村，勾结新城保安团团团长王风刚，准备组成“九路军”、“河北人民自卫军”，近期流窜到房山，串联潜伏人员及党政军警特残余势力，进行路劫、纵火抢劫枪支，破坏新生村政权，暗杀村干部。伪二十团团团长陈亚林、伪三十二团团团长尤茂智均无下落。警察局局长雷振芝严重近视，没有潜逃，据说隐藏在南关，已派人监视，房山县国民党书记长、保安旅旅长兼县长常玉据说潜伏在长辛店，马静波在南苑机场均未登上飞机，前往青岛乘船去南京，同行者××系南关人，不具备上船条件而返房。伪政府科长及军警特重要人物均躲藏在农村，待东山再起。为稳定民心，以上敌情对外不作宣传，但时刻警惕残余武装卷土重来。

黄山店、圣水峪、三流水村叛变的逃亡户达80多户，大部居住在南关村，这些人自投靠张德祥后，多次随还乡团（七大队、十二大队、十五大队）返乡，对贫下中农及农会干部进行报复，受害者达170多人，这些逃亡户现已成了惊弓之鸟，但也有落网之鱼，根据南关有人反映，圣水峪臧某不敢返乡，以串门为名，进行造谣，梦想变天，一次查户口碰见此人，对其进行了教育。

被国民党黑杀团及退乡团杀害的人员家属，已知房山城解放，但逃亡户均未返乡，有的村干部和民兵进城寻找凶手，为死者报仇，随时有流血事件发生。

城北几个村庄群众反映，从北平跑下来的逃兵，到老乡家要吃、要喝、要便服，不给就骂，有的人在小铺买香烟还用国民党票，不卖拿起就走。一次从北平跑下来的一名逃兵，走到了丁家洼村，走不动了，偷张家一头毛驴，骑到南关南庙岔道口，被发现带到刚成立的民兵队部，经审问此人是国民党“暂三军”某团一个班长，将其交到派出所，被偷的毛驴归还了原主。

1948年底或1949年1月初，国民党残余组成所谓“反共救国军”流窜到县城，夜间散发传单，南关南永祥药铺，荣福祥杂货铺和村干部家门口发现反动传单20多份。南关村东柳子王某报告，有十几个国民党人员，腰里插着枪，在其家要吃要喝呆到鸡叫，天刚蒙蒙亮离去。此情及时报告派出所。县武装部、公安局要求民兵和主要村干部夜间一定集中北庙（今百信鞋城）。没过几天冒着小雨查完户口后，将民兵练习用的一支三八大枪交给罗青海值班（民兵中队尚未正式发枪），其他人员因劳动一天累了躺在木桌子上睡着，罗青海见有人从北庙北墙跳进院内，罗立即放了一枪，将睡着的人员全部惊醒，正要出门追捕，残匪向院内打了两枪，人员尚未受伤。听到南门城墙上县大队长张德库喊话，不要追以免受敌。

入城接管工作队进城后，主要工作要靠保公所完成，房山城内当时有九保一百零四甲，五个保公所，保公所内设有联保主任、文书、勤务员。开始保长不敢露面，仅靠跑腿的来应付。

当时北平尚未解放，急需组成担架队、运输队，支援前线任务繁重，依靠保公所难以完成重任，急需建立村政权。县委从各单位抽调干部，加强城关区公所力量，立即组成工作队，深入四街两关，扎根串联，选好农民代表，建立新生政权，接受保公所。在此期间秘密发展党员，南关农民多数租种城内地主的土地，贫下中农较多，所以工作队以南关为主，各项工作先行一步，指导四街及北关。工作队赵松年入村后，物色8名农民代表作为候选人。

1948年底的一天，在南大庙召开村民大会，赵松年首先讲解了建立村政权重大意义，并提出了8名候选人，坐在两殿中间院内，每个候选人背后放一个碗，参加会议的村民同意谁，就在谁的碗里放一个玉米豆，最后谁的玉米豆多谁当选。最后有7人当选。随即作了分工，向保甲长及联保主任宣布从即日起，由农民代表正式接劳保公所，宣布南关街公所成立（后为村政府），从此南关农民有了自己的政权。当天晚上，登上警察分局的炮楼进行屋顶广播，广

播内容大致是“老乡们，注意了，今天由大家选举的农民代表，正式接管了保公所，改名为南关街公所，在北庙原警察分局北屋办公，农民代表是为咱们老乡亲服务的，不挣工资，每天有人值班，如果北庙没人，可到家去找。”天气虽冷，老乡们都到院中伶耳静听。屋顶广播后次日晨，街公所门前集结了几十位农民，议论纷纷，有的说：“真没想到有今天，咱们穷人有说理的地方了”，又有人说：“过去给你弄进局子里，花钱托保才能出去，而今咱们也能大大方方的进去坐一会”。此时几个人提议，咱们也写个牌子挂上，沈木匠跑回家，拿来了刨子，将房山警察分局那块牌子给刮了刮，写上了“房山县城关区南关街公所”，挂在北庙大门口北侧。村政权的建立，对组建农会、进行土地改革、建立党支部、扩建民兵中队和治安管理、维护城内秩序、清剿残匪等工作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中共房山县委工作的回顾

罗玉源

今天的房山区，是由原河北省良乡县、房山县和北京市京西矿区周口店、坨里、南窖等 12 个乡镇组成的。1958 年 4 月，北京市郊区范围扩大后，合并建立了周口店区，1960 年后改称房山县，县址在房山城关。

建国初期的十几年，在河北省委和北京市委的领导下，房山县干部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业绩，到 1965 年，工农业总产值、粮食产量在北京远郊县成绩都是名列前茅。

现在静下心来想一想，那时的房山为什么能够出现蒸蒸日上的大好局面呢？我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有一个能够统领全局的领导班子。1958 年春，房、良两县合并划入北京市后，经市委批准，李明任县委书记，刘永国、张令德、曹庶民、张革夫任副书记。这些同志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在当地工作。李明 1952 年在房山任县长，1954 年任县委书记，后调通县地委任常委、农村部长。刘永国原任房山县委书记，张令德原任良乡县委书记，曹庶民原任良乡县长，张革夫原在河北省公安厅工作。五人都是两县干部群众熟悉的同志，在他们的领导下工作，大家都觉得心里踏实。1962 年李明患了重病，由谁来接替，大家都非常关注。这时市委派来了霍梁。他是本地南窖村人，建国后任良乡县首任县委书记，后调通县地委任组织部长、副书记，到北京市后在冶金局工作。他的到来，也给房山的干部群众吃了一颗定心丸。那个时候的领导班子，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无论什么工作，只要县委一声令下，真是说干就干，决不讨价还价。

第二，有一支素质过硬的干部队伍。在二级班子的领导成员中，多是来自西部山区的老干部。在抗日战争中，党在平西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建国前夕成立了房山、良乡两个县政府。房、良两座县城解放后，良乡县政府从佛子庄村、房山县政府从平峪村分别迁入了两个县城。建国后虽在两地办公，但彼此间都是非常熟悉的。两县合并后，县委、县人委(政府)领导班子变动很大，二级班子变动更大，这次变动没有升迁只有下调。各局局长有的任原职，有的任副职，

也有个别同志因年龄、文化等原因未予安排。这些同志的职务虽然有了变动，但在情绪上却没有受影响，他们心中只有党的事业，决没有个人得失。在这些同志的带领下，各级干部团结一致，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各项工作很快有了新的起色。

在农村基层干部队伍中，山区干部多是从抗战时期走过来的，在平原地区则是从土地改革、合作化时期走过来的。平原地区实行土改后，广大贫下中农翻了身当家做了主人。但是，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情况下，相当一部分贫下中农一无劳力，二无工具，没有实力把地种好，他们认定只有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才是农村唯一出路。他们带领农民继互助组、合作社之后，又走上了人民公社道路。以后虽然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但是他们并没有被吓倒，而是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战胜了灾害。

第三，区委领导坚持“抓先进、树典型；抓后进、促平衡”，扎扎实实的把各项工作推向高潮。1958年，农村进入了合作化的第四个年头，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联村社日趋稳定。这一年8月，中央发出了成立人民公社的决议。1961年，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缩小了人民公社的规模，房山县由7个公社划成32个公社，按“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要求，改为以生产队核算。在这一系列的变革中，公社以下的干部需要重新安排，核算方式需要彻底改变。其工作量之大，矛盾之多，没有参与过的人是难以想象的。面对各种需要安排的工作，县委采取了一竿子插到底的方法，集中了全县干部深入到村进行具体指导。那个时候，广大干部都在农村与群众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在一个村住上半年一年是司空见惯的事。

1963年，南韩继粮食亩产达到851斤，产量第一年过了“长江”，县委对这一批先进典型采取了具体办法进行帮助。王德兴（退休前任科委副主任）、王书元（退休前任人大财委主任），就是当时驻南韩继村工作组的成员。其他先进典型也都由县委政府领导成员挂帅，进行具体指导。经过帮助，先进单位更加先进，在此基础上树立起了十二面红旗单位，供全县各行各业学习。在红旗单位中，南韩继村、富合村成了全市乃至全国瞩目的村子，每天都要接待成百上千的人前来参观。山西大寨的陈永贵和郭风莲在1966年的春天也曾来到南韩继学习。在黄山店供销社由王砚香带头创建的背篓商店、在河北镇邮局由任成水领头走出来的“红色邮路”也成了举国上下共同学习的先进典型。北京电影制片厂还以他们的先进事迹为素材拍出了电影《红色邮路》和《红色背篓》在全国放映。对相对后进的单位，也组织了扶贫帮困工作组，进行具体帮扶，

让他们一步一步地往上赶。经过三年的努力，到1965年，全县粮食亩产第一次过了“黄河”，达到了400.5斤。

1966年3月，市委在党校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房山县在红榜上名列第一，这是全县干部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在这次会议上，彭真曾讲道：“对干部要知人善任，霍梁同志原在市里工作，去房山以后，各项工作开展的轰轰烈烈，热火朝天。毛主席说过，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市县委都要认真研究干部的使用问题，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都有用好一个人，带起一大片的典型例子，干部用好了，工作就上去了。”

第四，有丰富的矿产和土地资源。当时房山县的工农业总产值较高，与资源丰富也有直接关系。建国初期，资金不足，科技也不发达，很难搞出科技含量较高的企业。房山县的资源在当时发挥了显著的优势。一是煤，煤的储藏在在北京地区，除了门头沟就是房山。二是灰，从青龙湖到城关，到周口店，再往里走到河北，到黄山店，到处都有烧石灰的石料，烧出的白灰是当时重要的建筑材料。三是砖，建国后，北京城要建设大规模的建筑，地质专家探测北京周围所有的地质，最后认定大高舍村北黄土层最好，在那里建立了北京市窦店砖瓦厂。随后，阎村镇、窦店镇、石楼镇等地相继也建起了许多砖厂。四是沙石料，拒马河、大石河、水定河从房山县境内流过，千百年的冲刷，从西部山区带来了大量的沙石料。最深的沙石料层有几米厚，是必不可少的建筑材料。1958年北京城的十大建筑及以后的建筑，从房山县拉走了多少沙石料，至今也难以估算。五是水果。梨、柿子、核桃、栗子等干鲜果品，年产量近五千万斤，这不但保证了城市的供应，也调剂了房山人民的生活，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第五，国有大中型企业和驻军的支持，为房山县的发展也做出了很大贡献。由于房山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国有大中型企业也就相继在我县建立起来了。建国后建厂的有良乡修造厂、良乡电力设备厂、电力工程处、原子能研究院、房山矿山机械厂，窦店砖瓦厂、周口店灰石厂，还有老企业琉璃河水泥厂。这些企业在建厂过程中，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持，这就拓宽了农村劳力以及各种资源的出路。建厂过程中，房山县也给予了方方面面的支持和帮助。由于房山县地形复杂，丘陵山区多，适合备战，解放军在驻地的选择上，对房山也倍加瞩目，先后在良乡、房山城关、窦店、青龙湖、坨里、周口店、岳各庄、大石窝等地建起了多个团以上驻军营地。这些营地的建设也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支持。驻军后，每年秋收，解放军也派人派车支持当地的秋收。最明显的还有公路建设，在解放军驻地周围，条条公路都修得很好，也从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地

方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方便了群众的生活。1957年，良乡地区受了水灾。当时的良乡，只有北京至周口店的公路是柏油路，通往各乡的路都是土路。通讯条件就更差了，大水一来，线杆大部分被冲倒，电话也不通了。在紧急情况下，解放军急地方所急，良乡机场驻军派出了飞机。张令德书记和县委领导一班人，坐飞机察看了良乡、涿州、固安以及白洋淀地区的灾情，回来以后，立即把情况报告给了河北省防汛指挥部，并及时采取具体措施排涝泄洪。

房山县的发展，是中央和市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更是当地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如今，我已年过八旬，每当想起在良乡、房山工作过的日日夜夜，心情还是难以平静。

房山城关公社的建立与初期情况

李桂清

在区档案馆的一份“北京房山人民公社调查”的资料上，记载着有关房山人民公社建立及初期的一些情况。这些资料是 20 世纪 50 年代记录的，对于后人了解那段历史，提供了一些背景资料。更为重要的是，现在回味这段历史时，我们能够理性地进行思考，对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现实意义，仍具有鉴戒作用。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公布和 1957 年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坚定了全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激起了进一步发展生产、根本改变贫困面貌的强烈愿望。人民迫切要求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清除十年九旱、遇雨成灾的自然障碍。1957 年冬，房山县的羊头岗社和八十亩地社一起开凿水渠，使大石河水流到了羊头岗。羊头岗社的麦苗由于受到冻水的滋润，第一次比南邻各社的麦苗都长得好。于是，南邻各社纷纷要求羊头岗社允许他们引渠水灌溉。但要满足这些愿望，不仅要大大延长和展宽渠道，而且要修一个小型水库来补充春季大石河水的不足。要修水库，最好的地点是在丁家洼村，因为那里是天然盆地，又离渠首较近，便于建设和使用，而且可以通过修水库使那里的居民摆脱洪水的威胁。可是要在丁家洼修水库，就必须另建新村来安置那里的 130 多户居民。这一系列问题，显然不是一个高级社所能单独解决的，需要打破社和乡的界限。

为解决这些问题，房山县城关镇党委发动全镇 19 个高级社共同承担了兴建丁家洼水库的任务。1958 年 3 月，丁家洼水库动工兴建，组织了 3000 名高级社的社员投入建设。附近 5 个邻乡的社员，也打破乡界，带着大批车马、材料前来支援。他们克服沙地修渠的困难，用 13 天时间修通了长 6800 米、宽 10 米的干渠和 1488 条、总长 25000 米的支斗毛渠。1958 年 11 月，房山县修建的第一座小型水库——丁家洼水库竣工，大石河水从羊头岗途经 9 个村流到二十里外的辛庄村。

1958 年 5 月，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公布。6 月和 8 月，中共中央相

继发布《关于把小型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和《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社员们要加速改变贫困面貌的心情更加急切。各高级社除了发展农业生产外，都努力向多种经营的方向发展，办起农具修配、制土化肥、烧灰、采煤和粮食加工等 85 个小厂矿。同时，为适应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需要，各高级社兴办了 191 个公共食堂、168 个托儿所和 36 个缝纫组。信用社和农业社也实行了合并。高级社的内部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单一的农业生产组织。

但是，究竟如何办这样大的社，这样大的社又将办成什么样子，谁心里也没底。恰在这时，“还是人民公社好”，这句话就像灯塔一样，适时地给社员们指出了办社的方向。正如社员自己所说：“毛主席给我们口渴的人送来了水。”各个村庄顿时沸腾起来。办人民公社的要求迅即汇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

当时有个乡镇一夜之间就贴出了 17000 多张要求迅速建立人民公社的大字报。其中一张写道：“公社人多力量大，天大困难都不怕。区、乡党委来领导，我们坚决听党话。搬山治水是行家，建设楼房立新家，为了实现大跃进，集体由小必到大。”于是，1958 年 9 月 1 日至 5 日，仅用 5 天时间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周口店区的 330 个高级社合并为 8 个人民公社，其中城关人民公社于 9 月 4 日成立。

公社刚成立，就遇上了三项紧急而又繁重的任务。一是必须在一个半月之内，完成 12 万亩收秋、27000 亩深翻种麦和 40000 亩秋耕任务；二是马上大搞炼铁和生产建筑材料；三是立即抽 2200 名劳动力，支援兴建密云水库。此外，还要继续修建丁家洼水库、新村和其它水利工程。这几项工作估计共需劳动力 28377 个。但当时公社除去炊事员、饲养员、保育员等固定劳动力和病号，只有劳动力 18850 名。为此，有些人主张除必须支援密云水库外，只能“单打一”，舍炼铁而抢“三秋”，不然就会“两头都抓瞎”。城关公社党委认为，可以统一安排全社的劳动力和物资，组织大协作。由 6300 名妇女组成的劳动力，是一支不可轻视的生力军。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因此，公社党委认为在保证支援密云水库的同时，实现工农业并举是完全可能的。

公社党委一方面筹划实行部分供给制，另一方面采取工农业生产大兵团作战的方法，把 3900 名壮劳动力组成公社直属的农业和工业两个兵团，开展急抢“三秋”和大搞炼铁。抢“三秋”，是采取 2100 人的大兵团和小部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的。各管理区和生产队都根据劳动力的强弱，以生产小队为单位，

组成收秋、深翻和种麦等专业队做本队的农活。农业兵团主要承担深翻任务，哪里任务重就到哪里去支援。

公社在农业生产上的做法主要是：在保证城市副食品供应的指导下，扩大花生和蔬菜的播种面积，把大部分不适宜种植农作物的山岗和山坡开辟成果林区和畜牧区，增植了果树，发展了养猪养羊业；继续扩大水利建设，开展水土保持，平整土地；普遍实行了深翻、合理密植和间作，采用优良品种，增种高产作物，加强田间管理；实行生产队包工包产、超产奖励和专业队与大协作相结合等办法。

在公社党委提出“在保证农业继续大跃进的同时，大办工业，实现工农业双丰收”的生产方针指导下，在4个月的时间里，全社先后兴办和扩建具有不同规模的厂矿197个，后来又被合并成为中、小型厂矿158个。其中，6个投资大、用人多、技术性较高的厂矿由公社直接经营，45个厂矿由管理区经营，107个小型厂矿由生产队经营。在公社经营和一部分管理区、生产队经营厂矿中确定了2300多名固定工人，其它工、副业则仍采取“农闲大搞，农忙小搞”的办法，不固定生产人员。

1959年底，有9个较大的厂矿采用了机器生产。如：由1座小土窑、3间篱笆房、公社投资1600元建立的耐火材料厂，到有了3座土洋结合的大型砖窑和电动粉碎机、电碾、电筛等一套设备，由最初日产耐火砖300块提高到日产10000块，1959年的产值达120万元。公社经营的农具修造厂，制造各种小农具61871件。公社有拖拉机7台，联合收割机1台，农业用电动机、柴油机和锅驼机等82台。

1958年冬，公社党委发动了一次“万人上山”大搞一个月的工、副业生产的突击运动。生产工业原料、建筑材料、药材、山草和荆条，公社用获得的118万元偿还原来各高级社历年拖欠下来的到期的全部国家贷款，发放社员工资，建成具有3座楼房和198间平房的丁家洼新村，添加了农业机械和其它机器设备、电讯器材。

1959年10月下旬，公社党委抽调7000名社员，大搞水利运动。2000名社员用12天时间延长了大石河渠道16400米，修整和新挖小型渠道104条。11月12日开始兴建蓄水1500万方的牛口峪水库。1959年冬至1960年春，兴建4处电力扬水站。

1959年底，城关人民公社共有33个基本核算单位（其中3个是管理区，30个是分属于3个管理区的生产队）。根据1958年的决算分配，社员每人全

年平均收入 43 元到 55 元的单位 12 个(简称穷队),56 元到 70 元的 14 个(一般队), 71 元到 110 元的 7 个(富队)。为消灭各基本核算单位之间收入水平的差别,公社党委以生产搞得好的南韩继生产队为“标兵”,在全公社开展了“学南韩继、赶南韩继”的运动。收入比较少的杨驸马庄生产队,社员们的口号是“一定努力搞生产,超过南韩继”。

1960 年,城关公社党委又提出了新的计划:“大干苦干六十年,大地变成园田化,山坡建起花果园,粮食总产增一倍,蔬菜总产翻一番,林、牧、副、渔齐发展,工业倍增赶上前。”

长阳中柬友好人民公社命名始末

王硕儒

1971年11月7日，国务院宣布：北京市房县长阳人民公社命名为“房县长阳中柬友好人民公社”。

事情得从1970年3月柬埔寨国内发生政变后的形势说起。

1970年以前的柬埔寨是一个封建君主制的国家。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发生政变，政变者夺取了政权，推翻了以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柬埔寨王国政府。西哈努克为了恢复自己的政府，在国际上到处寻求支持与帮助，但遭到了冷遇。随后西哈努克来到北京，中国对西哈努克仍然一如既往，热情欢迎。在中国政府的支持援助下，西哈努克于1970年5月5日在北京成立了流亡政府——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同时，中国政府命名长阳人民公社（长阳农场）为“长阳中柬友好人民公社”，以象征中柬人民友谊长存。

“长阳中柬友好人民公社”的命名仪式在房县长阳人民公社（今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举行。出席命名仪式的有长阳公社的全体社员和干部，房山县的部分市、县干部和代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李先念陪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及夫人、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亲王及夫人出席了仪式。

11月7日上午10时许，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以及西哈努克亲王、宾努首相等来到长阳公社，受到热烈欢迎。在举行命名仪式会场（公社）的大门前，来宾为房县长阳中柬友好人民公社命名剪彩。

在命名仪式上，周恩来总理郑重宣布：房县长阳人民公社命名为“房县长阳中柬友好人民公社”。

房山县颁发“房县长阳中柬友好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印章一枚，从即日起启用。

西哈努克亲王在仪式上发表讲话，对中国政府给予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的支持，对建立中柬友好人民公社表示感谢。并表示中柬友好人民公社建立后，要经常派人深入到公社，共同把中柬友好人民公社建设好。

长阳中柬友好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吕镒在仪式上汇报了工作，介绍了

全社的经济情况，特别是农业、畜牧业的生产形势。对建设友好公社后的工作表示一定要规划好、建设好。

仪式中，周总理一行在公社院内、大门口影壁前栽植下五株冬夏常青树，以象征中柬两国人民友谊长存。

命名仪式结束后，在公社所在地院内和长阳村分两地举行了庆祝活动，公社文艺宣传队演出了文艺节目。

友好公社建立后，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官员曾多次视察，特别是以宾努首相为主，多次带队到长阳公社果园参加劳动。

房山县的红卫兵接待站

魏志华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北京和外地红卫兵，揭开了红卫兵来京“大串连”的序幕。

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规定来京师生可免费乘火车，生活补贴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开支。这样，外地大专院校和中学师生纷纷涌向北京。尽管中央和市属单位、街道最大限度地腾出房子，大多数机关停止办公，全力以赴，承担接待任务，但仍难以应付当时的局面，解决不了吃住问题。因此，北京市委决定，近郊和房山、大兴、通县、昌平等几个区县建立红卫兵接待站，以减轻首都接待工作的压力。

市委决定后，房山县委立即进行研究，从县直机关各单位抽调20多人，组成房山县红卫兵接待站。带队领导是当时的副县长奚元亮。接待站设有办公室、宣传组、后勤组、保卫组、卫生组，地点设在原良乡公社的西院。接待站的后勤工作由房山县负责，工作上受北京外地师生接待委员会领导。接待委员会由国务院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解放军总后勤部和北京市有关部门组成。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任主任，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吕鸿、解放军有关方面负责人以及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任副主任。

1966年10月初，接待站投入了紧张的工作。首先召开良乡地区中央、市属、县属和公社各单位的负责人会议，传达市、县指示精神。明确提出，接待外地师生是政治任务，必须克服困难，把接待工作搞好，各单位主要领导要亲自抓。

会后，大单位都成立了专门的接待组织，由单位一名领导负责，设立了专门的食堂。小的单位只安排住宿，来人可到大单位食堂去吃饭。经过一周准备，便开始了接待工作。当时共建立食堂20多个，包括良乡中学、良乡电业中学、电力技校、修造厂、长阳农场、马场农校等。此外，南尚乐、长沟、琉璃河、窦店等几个公社也建立了接待组织。

接待工作最大的问题是住宿。尽管各单位以及良乡附近各村各户腾出不少

房子，但来的人多，根本安排不了。当时良乡附近几个中学、技校都已停课，便把教室利用起来。有的铺上铺板，有的地上垫上花秸稻草，上边铺上席，解决了上千人的住宿问题。

另一个大的问题是被子问题。当时各单位没有客被，开始时都是从职工、干部、居民个人家里借的，一说是政治任务，大家都很积极。但来的人越来越多，到10月中旬已经达到2000来人，实在没法解决，而且天气越来越冷，还要保证外地师生身体不出问题。我们几次找首都接待委员会的领导，请求购买1000套被褥，1000条绒毯。市里批准后，我们组织有关部门立即行动。商场组织人昼夜量布，做成被面、褥面；从战备库购买棉花，组织30多台缝纫机赶制被褥，几天的时间就全部完成任务。随着冬天来临，又买了100多个铁炉，外地师生的住处都按上了火炉。一些南方的学生，已离家一两个月，还穿着单衣，穿着凉鞋，我们马上给他们发了绒衣、棉鞋。

为确保不出问题，接待站的同志经常去各接待点去检查，查住房情况，看望学生，征求他们的意见。夜里还经常检查炉火，防止煤气中毒。医务组经常到接待点去检查学生卫生状况。就在我们一边准备，一边接待的时候，10月上旬，首都接待委员会又召开了一次全体接待人员动员会，周恩来总理亲自作了动员，要求各单位一定要认真做好接待工作。10月中旬，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还到良乡来检查接待工作。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那一段工作非常紧张，市里经常各集紧急会议，而当时县里车很少，只是县委、县人委各一辆小车。因此，市里又给房山接待站派来一辆小轿车。

房山正式参加毛主席接见共两次。第一次是10月中旬，也就是毛主席的第七次接见。这一次是从良乡坐火车。那一天早晨四点多钟，我们就到良乡火车站去安排发的“专列”。近2000人的外地师生住的很分散，长阳和马场农技校离良乡有8里地。7点多钟才发车。那时车上秩序非常乱，车箱里挤满了人，一上车学生在车箱里又是唱歌、念语录，又是喊口号，说话根本听不见。后来列车员就把列车上的播音室借给我们，我们利用广播反复宣传参加毛主席接见时的纪律和注意事项。8点多钟，我们在永定门车站下车。按编队由工作人员带领，步行经天安门到西单。房山的指定地点在北京电报大楼对面的六部口。中午开始戒严，一直等到两点多钟才开始接见。接见的路线是从天安门广场经西长安街到西郊机场。三点多钟，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接待。当中央领导的车经过我们那里的时候，大

家的情绪非常激动，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都想多看一眼毛主席，接待车队走的很远，大家还在高喊口号。晚上，我们坐火车回到良乡。

第二次参加毛主席接见是在 11 月 26 日，即毛主席的第八次接见。有了第一次接见的经验，这一次做的比较细致。根据中央、市委的指示，从部队给我们派来 60 多名同志，大部分干部由师部的同志带队，帮助我们对红卫兵、学生进行集训。按居住点划分为营、连、排，每天进行几小时的训练。当时规定，凡不参加训练的一律不准参加接见。除进行政治学习外，主要是讲纪律和军事操练。接见那天，部队的同志和接待站的同志分到各个单位担任领导。首都接待委员会从首都汽车公司派来 20 多辆大轿车。从良乡上车，上午 9 点左右集中出发。10 点到北京。汽车停在军事博物馆的院里，我们步行到指定地点。这次集中的地点是木樨地，离军事博物馆很近。下午三点左右，中央首长的车队经过我们那里，车开的很慢，离我们只有 10 多米，这一次我们看得特别清楚。毛主席满面红光，精神焕发，身体非常健康，他不断的挥手向大家致意。接见结束后，我们乘车安全返回。

毛泽东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和外地师生以后，中央决定停止接见，接待站的任务也告一段落。12 月初，全体参加接待工作的人员参加了中央在首都工人体育馆召开的接见工作总结大会。周总理在会上并讲了话，使大家很受鼓舞。

随后，房山接待站的工作告一段落，但接待站没有撤销，剩下我和团县委的刘金绶等 7 人，由我负责。这一段的工作主要是继续接待外地串连的学生，同时做好各接待点的物资、账目清理和登记造册等善后工作。

整个接待工作结束时，中央文革发给房山 1000 多枚毛主席纪念章。参加接待工作的人员（包括粮食、商业、电信等接待人员）每人一枚。纪念章虽然不是太大，但是在纪念章的背面铸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纪念”，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就显得非常珍贵了。从其他途径是买不到的，我们都感到非常荣幸。

接待站工作于 1966 年 9 月开始，至 1967 年 4 月中旬结束。经过全体接待工作人员的努力，顺利完成了任务。全部接待工作共用 20 多万斤粮食，开支 30 多万元。

京西供销社建撤纪实

刘树霖

1980年10月，市委、市政府决定，将原房山县所属的重点产煤山区乡镇（当时称公社）的河北、南窖、大安山、班各庄、黄山店五个乡镇所属的57个村和周口店镇的山口、车厂、良各庄、西庄、官地五个村，以及史家营乡的金鸡台共63个村划归北京矿务局管辖。这一地区供销部门也从房山划出，归新成立的矿务局工农区供销社管理。

十三年后，由于形势的发展变化，1993年6月市委、市政府又决定将上述地区划回房山区领导。这一地区的供销社却并未立即划回原划出单位房山供销联社，而是成立了一个与区供销社并立的供销部门——京西供销社。直到1998年3月才被撤销，与区供销联社合并成立区供销总社。

—

1993年，正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快速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时期，相当多的按计划经济体制设立的企业因一时间不适应这种转变而陷入困境。区供销联社就正是这种情况，从全盛滑向了低谷，包袱沉重、经营困难。而小矿区供销社由于管理体制不顺，煤炭资源枯竭，重点煤矿关闭，购买力下降等多种原因产生更大的困难。当时，区委、区政府组织人力和市供销社一起对矿务局供销社进行了调查和财务审计，发现该单位问题相当严重。

一是亏损严重，历史包袱沉重。经调查和审计确认，累计亏损913万元，资产负债率达133%，15个核算单位中有13个单位亏损。企业自有资金和社员股金全部被亏损和历史包袱占压，没有启动经营的资金，大部分企业购销业务陷于停顿半停顿状态。

二是网点破旧，经营萎缩。企业大部分生产经营用房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甚至五十年代建造的，建成以来只是修修补补，房屋破旧不堪，而且相当多部分建在偏僻地带，大部分网点勉强维持，生产经营困难重重，无力与迅速崛起

的私人个体和集体商业竞争。

三是企业管理体制不顺。由于划归小矿区后管理体制不顺，小矿区回归后又未及时回归以及其它原因，企业管理问题较多，规章制度流于形式。同时人才缺乏，队伍老化。当时企业共有职工 400 多人，其中机关 30 多人，离退休职工 90 多人，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 1700 元，多数职工难于维持正常生活，有三分之二的中层干部和职工要求调离。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小矿区供销社立即与区供销联社合并到一起，既不利于供销联社的发展，也不利于小矿区供销社的脱困。针对这种情况，1995 年 3 月，在原矿务局供销社的基础上成立一个新的与区联社并立的供销社——京西供销社，组成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加强对这一地区供销社的领导。

二

京西供销社成立后，首先对全系统 15 个核算单位进行清产核资。根据清产核资结果，对各单位已确认的各项亏损，统一归入亏损帐户，做有关帐目处理，不许再增加新的亏损。对清理出的残损变质商品，按类按质进行处理，变死物为活钱；对债权进行清理，责成专人进行催讨，并借助法律手段进行讨要；对内外债务在核实确认的基础上，根据轻重缓急和财力状况，进行妥善处理，树立企业诚信形象。

在稳定队伍方面，一是采取多种形式妥善解决下岗职工问题，其中办理病退 18 人，按照政策办理失业 94 人，安排场地个人或合伙租赁经营 81 人，停薪留职 48 人；二是解决好离退休职工生活问题，筹集资金补发和发放他们的工资；三是对有实际困难的离岗职工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帮助解决。一系列措施稳定了职工队伍。

抓大放小，搞活经营。对 5 个大的经营单位实行目标管理，进行严格考核，建立激励机制和奖惩制度；对 43 个基层门店，实行固定资产和场地租赁经营，现有商品作价卖给承租人按期收回；根据地处煤炭主产区的特点，发展煤炭和矿山物资的经营与生产加工维修，在原有一个煤场的基础上增加 2 个销煤点。推广班各庄供销社经验，扩大矿山物资经营。

抓好改革，提高管理水平。建立了财务管理等 9 项制度。在财务管理上，在全系统开展会计达标活动，建立严格的季度和年度审计制度，堵塞财务漏洞，提高资金利用水平。在劳动制度方面，干部实行聘任制，职工实行劳动合同制，

240 余名职工签订了劳动合同，把工资分为岗位工资、效益工资和奖励工资，做到奖惩分明，提高管理和经营水平。

同时，按照精简、效能原则，将机关由原来的 5 科 1 室合并为 2 科 1 室，人员由 30 人精简为 15 人，后来又减为 10 人。一人多职，各负其责，提高了机关效能。自建立京西供销社以后，两年多时间共计减少挂帐损失和偿还旧债近百万元，盘活资产 400 万元，新增固定资产 80 万元，累计减亏近 50 万元，全系统资产负债率由原来的 133%降为 95.7%，职工年收入由原来的 1700 元增加到 4000 元。一个原来资不抵债，濒于倒闭的企业重又焕发了生机。

扎实的工作引起区领导的重视，区委、区政府采纳了当时区商委关于深化商业改革把全区商业部门改组为商业、供销、粮食三大体系的意见，决定撤销京西供销社和区供销联社，合并成立房山区供销合作社总社。1998 年 3 月 2 日，区供销总社正式成立，全区两个供销社并立的局面结束。

三

区供销总社成立后，根据供销总社按经济区建社的精神，京西供销社成了供销总社的基层企业，并派原班各庄供销社主任栗桂君担任主任和书记，组成新的领导班子。他们在企业原有历史遗留亏损 700 多万元，众多在计划体制下建立的基层门店因不适应市场变化而难于维持，当地经济支柱的大量煤窑关闭，险村险户外迁，购买力萎缩等诸多困难情况下，将众多难以维持的基层门店以租赁、变卖等形式处理掉，收回资金，在河北镇中心地带停产多年的原食品加工厂拆掉旧房，面向 108 国道建起上下两层共 71 间门面房；在河北村西 108 复线边原河北供销社猪场，拆掉旧房建起 30 多间新房，把地处偏僻的班各庄供销社搬过来，与当地煤矿和农民协商，共同出资办起主营矿山物资的联农专业合作社，受到当地众多煤矿和农民的欢迎。

一项项出色的工作使这个供销社焕发出勃勃生机，年年被评为市、区的先进单位，还被全国供销总社评为全国供销系统示范专业合作社百强之一。

2006 年 3 月，由于京西供销社名称已不符合当地实际的情况，将其改名京西河北供销社。

房山区国合商业改革历程的回忆

李 耀

房山区的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商业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国家整体改革的大趋势推动下，不断学习、探索、深化的过程中稳步发展的。从过去国合商业的独家经营到现在的民营和股份制商业企业的大发展是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发展过程的。今天回顾这段艰辛的改革之路还是有其重要意义的。

商业改革初期的探索

房山商业改革最初的探索是比较早的。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时任阎村饭店经理的马世杰，在当时旧的传统观念和各项规章制度严重束缚下，大胆推行了“承包销售和利润指标，超额按比例分成”的分配办法，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有效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这一简单的改革措施，在当时却开创了全市乃至全国商业改革的先河。商业部和北京市体改委曾派人总结经验，阎村饭店也为此成为全市商业改革的先进典型。

1984 年 12 月，房山县委曾在县直商业企业机关探索干部管理制度的改革。决定把粮食局、副食品公司做为改革的试点。领导班子由过去的任命制改为选聘制。对单位的一把手采取“招标竞聘，民主评议，自主组合，领导批准”的办法，打破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在这次改革试点中，粮食局的陈忠鸣和副食品公司的赵连泉分别竞聘成功，并由他们俩人自主选聘，分别组成了新的领导班子，报经县委领导批准后走上了领导岗位。

阎村饭店关于分配制度的改革和县委关于干部管理制度的改革试点，在当时是比较超前的，也是一项大胆而有益的探索，但未能广泛推开，其原因是很复杂的。从以后的商业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看，国合商业的改革远比农村体制改革复杂、深刻的多。由于当时改革的主客观环境和条件尚不具备，许多旧的传统观念和陈规戒律仍然禁锢着商业改革的发展，没有全面、整体改革的大气候，光靠商业自身的改革是很困难的。

商业改革的快速发展

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以后，在全国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这就为商业改革创造了很好的外部环境。1988年3月25日，区委、区政府作出了《关于在区乡村企业实行公开招标承包的意见》的决定，要求立即在区乡村企业中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向社会公开招标，坚持“公开、民主、平等、择优”的原则，不拘一格选拔人材，迅速落实企业的资产经营责任制。

由于区委、区政府把经济体制改革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这就使国合商业的改革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国合商业改革落实资产经营责任制，首先从层层落实企业经营承包人入手。通过招标竞聘，把那些懂经营、会管理的优秀人材选聘到领导岗位上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区商委在推动这一改革中是比较慎重的。在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的情况下，采取了层层搞点、稳步推进的办法。在全系统的不同行业中，确定了商业大楼、药材公司、奉先居饭店、副食采购批发站做为改革试点，并聘请财政、税务、工商、物价、劳动、银行等有关部门人员参加，组成招标评议领导小组。采取领导小组评议与职工测评相结合的方法，决定企业承包人。这次试点通过招标竞聘，最后商业大楼由安春祥中标，药材公司由王世奎中标，奉先居饭店由张德田中标，副食采购批发站由牛天福中标，并由中标人自主组合新的领导班子。在试点中，尽管也曾遇到投标人政治、业务素质参差不齐，在职工评议时拉选票和代写选票等问题，但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在商委抓了试点以后，商口各企业主管部门也先确定了试点，先行一步取得实际经验后再全面推开。由于层层搞点，稳步推进，商口的改革是比较顺利的，并很快形成了改革的高潮。在落实企业经营承包人后，在企业内部立即狠抓了柜组、门店的基层承包责任制的落实。柜组、门店的职工也引入了竞争机制，采取“竞争上岗、无岗培训”的办法，选定组员。凡落聘的职工列入待岗，由企业集中培训，待岗培训期间停发奖金。通过培训，大部分职工都提高了竞争意识和危机感，增强了责任心，受到了聘任；少数落聘的职工，企业也尽量采取多种办法给予安置。随后，商业改革立即进行职工最关心的分配制度的改革。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工种，分别采取了“百元销售工资含量”“两保一挂”（保销售、保利税、与工资奖金挂钩）等分配办法，在商办工业实行计件工资和计时工资等分配形式，贯彻“多劳多得”的原则，有效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

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对那些规模小、分布散、效益低、管理难的基层商业网点，特别是农村的小门店，采取“抓大放小”，推行租赁、拍卖的办法，交由个人自主经营。租赁就是把现有商品合理作价，由经营者个人出资全部买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公有房屋设施核定租金，由经营者按时交纳。对于地处偏僻分散的小门店采取拍卖的办法，原有商品和房屋设施合理作价卖给个人经营。区供销社的基层网点大多分布在农村，在改革中拍卖给了个人，既减轻了管理上的负担，也调动了经营者个人的积极性。

随着商业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特别是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层层落实，在改革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一是企业要求自主用工与国家劳动管理制度的矛盾。企业特别是柜组、门店落实承包责任制后，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要解决人浮于事、精简职工问题。但国家规定落聘待岗的职工，企业不能辞退，当时的说法是“谁的孩子谁抱着”，不允许推向社会。待岗人员的工资还得由企业承担，这就直接影响了在岗职工的收入分配，因此，在改革中企业要求自主用工权是很强烈的。二是企业分配制度的改革与国家对企业工资总额控制的矛盾。企业落实责任制后，相应制定了一系列的鼓励职工积极性的分配办法，把销售、利税与分配挂钩，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承包指标大都能超额完成。但劳动部门核定的工资总额的额度是严格控制的，并由银行监督管理，超过限额银行拒付。这就使企业在分配制度改革上不能实行“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改革的发展。三是企业要求商品自主定价与国家物价管理的矛盾。改革初期商品定价权严格掌握在物价部门，但企业经营商品种类繁多，市场需求变化很快，特别是鲜活商品价格更需灵活调整。由于价格管理过死，且报批的手续繁琐，影响企业的灵活经营。以上在改革中遇到的几个问题，制约了商业改革的发展，也说明了商业自身的改革如果没有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全面配套改革的支持是不行的。1992年重庆市商业系统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率先打破改革中的禁区，实行“经营、价格、用工、分配”四放开，解决了禁锢商业改革的难题，这一大胆的措施，震动了全国。区委立即决定派政策研究室、商委、工商、物价、劳动等有关部门的领导亲赴重庆参观学习，在区委的大力支持下，商业改革迅速掀起了新的高潮。

商业改革中的不平衡发展

商委系统归口的10个单位，由于管理体制和政策性经营等多种原因，在

改革中发展是不同步的，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是人事劳资、财务归属地管理，且非政策性经营的供销社、工业品、副食品、饮食服务三个公司。由于制约因素少，因此改革发展比较快。二是属于政策性经营的粮食局、食品公司、蔬菜公司，改革发展相对较慢，这是由于其经营商品的特殊性所决定的。这些单位经营的粮、油、肉、蛋、菜等群众生活的必需品，国家每年要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所以在销售、价格等方面管理严格，企业经营受到制约，前期改革发展较慢。

1992年12月1日，国家决定价格放开。从1993年开始，取消财政补贴，把企业全面推向市场，国家这一政策的调整，使这些企业立即陷入了困境，但客观上也促进了这些企业加快了改革的步伐，积极探索新的生存发展之路。经商工委研究报请区委批准，由饮食服务公司兼并了蔬菜公司，做到了优势互补，取得了双赢。粮食局在取消财政补贴后，也加快了改革的步伐，通过精简合并、关闭转产、联营以及承包租赁等多种形式深化改革，并于2002年组建了粮油贸易总公司，由过去的经营管理型，真正走上了企业化道路。食品公司在国家财政补贴政策调整后，虽然经过努力，但由于过去经营单一，基础薄弱，长期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因食品公司人事劳资、财务都隶属于市公司管辖，区里没有决策权，因此，时至今日，仍在等待市公司的改革方案。三是人事劳资、财务归市公司管理的石油公司、药材公司和糖烟酒公司，由于管理权限的制约，改革都不同步，但后期都相继参与了市公司的体制改革，以上三个公司在改革中通过兼并、重组等形式都予以撤销，完成了历史使命。

商业改革在不断深化中发展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商业企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国营商业原来一场一店的分散经营已不适应变化的新形势，走规模化、连锁化经营之路，才能在竞争中继续生存和发展。为此，国营商业于1998年继续深化改革，走集团化之路，把企业做大做强。经区委区政府批准，国营商业打破行业、隶属关系的界限，实行企业重组。撤销了原有的工业品、副食品、饮食服务三个公司，和实行计划单列的商业大楼，组建了商贸集团。集团成立后，依照现代企业制度，大胆进行了深层次改革。

一是大力精简机构、压缩管理人员。集团成立后，立即撤销了原有的三个区直管理公司。机关由原三个公司的80人减到25人，机关管理费支出，也

由原每年 300 万元减至 120 万元。基层企业管理人员由原来的 180 人减至 40 人，每年节约开支近百万元。

二是统筹规划，资产合理重组，资源优化配置，经济效益显著。通过打破行业、地域界限，大刀阔斧进行了经营结构、商品结构和组织结构的调整，扩大了营业面积 3 万平方米，涉及资产金额 5300 多万元。通过调剂、利用和处置大量闲置资产，很好地解决了企业在发展中的资金和场地的困难，有力地促进了企业的发展。

三是推动了企业的规模化、连锁化。集团通过调整企业结构，以华冠商贸公司、房山饭店、惠宾楼饭庄和商业大楼为龙头，实现连锁化，规模化，很快成为了房山区商业流通领域的骨干企业。此外在房地产，旅游等行业也有了新的拓展。

四是按着现代企业制度，加强了管理上的规范化，制度化。集团建立后，加强了各项制度的建设。先后建立和完善了行政管理、人事劳资、财务、审计、统计和廉政自律等多项管理制度，使企业管理水平有了新的提高。

商贸集团通过三年的改革，企业发展迅速，效益显著，但现行的产权制度，在经营运作，资金筹集等方面还不能完全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不能真正成为自主经营的主体。为此，区委区政府于 2001 年 7 月 10 日决定对商贸集团进行产权制度的改革，打破国营的单一模式，实行股份制。通过清产核资，审计评估，确认总资产为 21384.7 万元，负债 17829.6 万元，国有净资产为 3555.10 万元。经批准后于 2001 年 12 月 25 日，房山商贸集团正式改制为房山商贸股份有限公司。在整体改制的基础上，分别出资成立了华冠商贸有限公司，北京功德福餐饮有限公司，惠宾楼餐饮有限公司，作为独立法人的子公司，其他企业为独资控股的分公司。国有资本占总股本的 25%，经营者资本占 12.5%，职工资本占 62.5%，吸纳社会资本 1769 万元。于 2002 年 7 月，又经区委区政府批准，原 25% 的国有股权全部转让给企业职工持有，国有资本全部退出企业。与此同时，总公司又对分公司的管理体制进行了调整，组建了永生堂医药有限公司，撤销了所有分公司的法人资格，实行统一核算，进一步加强了监督管理。通过产权制度的改革，使企业彻底摆脱原有体制的约束，真正实现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竞争主体。国合商业通过多年的改革创新，不断发展壮大，现在已成为房山区名副其实的龙头企业，为房山区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良乡县五区武装部工作的回顾

罗玉源

1945年，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之后，我的家乡解放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起了村政权和党的各级组织，我担任了村青年主任兼民兵指导员，于1946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五区武装大队干事（享受脱产干部待遇），负责以南窑为中心的8个行政村的民兵工作。

1947年，我被调到良乡五区武装部任教导员，当时武装部长是张九清。同年，张九清调县武装部工作，由顾宪图任部长，栗树茂、孙玉堂任副部长。为了体现党领导武装的原则，组成了以区委书记张令德、区长吕永珍为首的区武装委员会，张令德为主任，吕永珍为副主任。当时区公所设在黑龙关村，良乡县委、县政府在佛子庄村，与五区邻近。

五区当时的工作特点：一是工作范围广，共管辖28个行政村，其中300户以上的大村8个，而且都是山区，相距又比较远，干部下乡要翻山越岭，没有交通工具，只能靠步行。到村里工作都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武装部共有四名同志，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将28个行政村分成4个片：上片以长操为中心5个村，中片以佛子庄为中心9个村，下片以陈家台为中心6个村，南片以南窑村为中心8个村。平时各自在分管的片上工作，有分有合，定期集中研究工作。二是任务重，情况复杂。当时全区可分为解放区、游击区、敌占区三类情况。解放区属于日本侵略者投降后的村庄，经过党的思想教育和组织建设，特别是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政策，使贫苦农民翻身得解放，生活水平和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青年人积极参军、参政，出现了妻送郎、父母送子女参军，群众支援前线，除奸防特，站岗放哨，保卫解放区安全的大好形势。广大人民群众欢天喜地搞生产、闹革命，希望过上安定祥和的日子。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国民党和当地的敌伪军、“还乡团”经常进犯解放区，对人民实行阶级报复。我五区武装部在全区范围内动员和组织民兵队伍，与之开展机动灵活、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他们的进攻，保卫了胜利果实。

在五区边境是游击区。因南窑等几个村与四区相连，当时房山县城、周口店都是敌占区，所以我武装部便组织民兵从南、东大岭，通过长沟峪、车场、坟山等村，前往房山城及周口店外围开展征粮和宣传，对敌人进行干扰与震慑，阻止敌人进犯解放区。

1947年，我民兵连在南窑村驻防时，房山城、周口店的敌伪军、“还乡团”大股部队向南、北窑村进犯，我民兵连得到信息后埋伏在猫耳山一带实施阻击战，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民兵连的胜利狠杀了敌人的威风，大长了人民的志气，得到良乡县政府的表扬。同时，针对北峪村和陈家台村与门头沟相连的特点，武装部便在两地结合部组织民兵设防，严防敌人钻空子偷袭解放区。英水村、北窑村一带也特别重要，因为房山、良乡两城的敌人经常从车场村、长沟峪和小楼村一带向解放区进攻，必须高度重视，采取相应的对策。在确保本区范围内社会治安的同时，在县武装部的统一指挥下，我们还与三区武装部的同志协同作战，去坨里、良乡县城、南岗洼、长辛店一带进行游击活动，有时还配合正规部队作战，支援前线，破坏敌人的交通线路。

1945年至1948年，五区武装部先后组织解放区人民及民兵参加了解放坨里、周口店、房山县城、良乡县城的战斗任务，比较好的完成了上级党组织交给的光荣任务，从一个侧面实践了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

日军在华北实施的五次强化治安运动

王绍清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地下党和北方分局派出苏梅刘杰创建以百花山为中心的平西抗日根据地。邓华率八路军独立师三团至平西，与宋时伦支队合编为第四纵队，驻房山霞云岭、下石堡一带，肖克挺进军驻平西及十渡一带。房良抗日政府在长操成立，军民一心，同仇敌忾。

房、良两县恰处抗日前沿，霞云岭、十渡是通往晋察冀边区要地。日军强征民工与物力，沿房良山区与平原交界处，分段修筑封锁壕。封锁壕以房山县城为中枢，北起周口店，蜿蜒南伸，经娄子水村西，过北正至张坊村西，壕长70华里。壕内重点地带日军设岗哨30多处。壕沟筑成后，在其统治区内开展了五次强化治安运动，给抗日根据地军民造成严重困难。五次强化治安在房良地区具体情况是：

1941年3月至4月，日军在其占领区开展第一次强化治安运动。其口号是“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其内容有三：

一是强化伪军，反共自卫。首先在房、良两县建立自卫队。房山伪县长唐祖熙亲任总队长，孔宪江为副队长。良乡县伪县长陈中和担任总队长，高定甫为副队长。两县总队编制是：总队下设三个大队，每个大队下设三个中队，每个中队下设三个小队，每县有日伪军千人。分别驻防周口店、长沟、张坊、坨里、河北、窦店、琉璃河等地。另外在各村组织防共自卫团，又叫保甲自卫团。民众称为联庄会棍团。年满十五周岁至四十周岁的男丁，统一编入该团，手持木棍，由敌教官进行军训。

二是推行保甲制度，强化殖民统治。据1938年有关史料记载：良乡县为河北省新民实验县，取消区公所，成立93个乡，每5户为一邻，每5邻为一间，共编为759间，1899邻。邻间各设邻间长1人，协助乡长办理邻间自治事宜（此制度未全面实行）。房山县共编35个乡，村内设保，十甲为一保，十户为一甲，一村有两保以上者可设联保主任，实行联保互相监视。

三是建立门牌，颁发“良民证”。强制青少年参加新民会、兴亚会，强制

接受奴隶化教育。

1941年7月至10月末，日军进行第二次强化治安运动。其中心是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隔绝各根据地的联络。是年8月13日，日军对北岳区和平西抗日根据地进行秋季大扫荡，由华北敌酋冈村宁次亲自指挥。调集华北六个精锐师团及伪军十万余人，采取“铁壁合围”战术，分十三路向晋察冀地区及平西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企图把八路军主力聚歼于长城两侧。由于日军多次扫荡与蚕食，平西抗日根据地逐步缩小。十渡、平峪村除驻平西党政机关外，还驻有冀中十分区和兵工厂和医院，是日军主要进攻目标。是年8月24日，日军沿拒马河谷进犯六渡、十渡，到28日进犯到河北省涞水蓬头地区，一路扑空。日军仍不甘心，又从蓬头返回，边走边搜山，沿路各村烧杀抢掠，杀死手无寸铁的百姓13人，烧毁十渡、马安等地房屋1200多间，并在王老铺、西庄村安上据点，妄图长期在此盘踞。

1941年11月1日至12月25日，日本展开第三次强化治安运动。中心是统治物资，进行粮食组合，实行配给制度，完全控制人民生活必需品。按保甲户口人数配给食盐，每人每月1两，每户最多不准超过2市斤，火柴每户2盒，煤油每月一户1两。当时有货配给，无货等待，基本是两三个月配给一次。是年秋粮上市，房良两县新民合作社在集市大量抢购粮食囤积。房山县在城隍庙戏楼前空场内囤积粮食数万斤，由日军守护。良乡县威逼强购土地建仓库，囤积物资。1942年春大旱无雨。河套沟土地贫瘠连年缺粮，主要靠输出山货、煤炭、石板等换回粮食，该年有市无粮。据史料记载：民众缺粮，病饿而死达600余人。当时死尸暴陈荒野，出现了“无村不戴孝，处处闻哭声”的悲惨景象。

1942年3月30日至6月5日，日军开展第四次强化治安运动。这次在华北地区划分为三类地区：治安区、准治安区、非治安区。对这三类地区分别采取不同的办法统治：对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对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对非治安区以扫荡为主。对房、涞、涿抗日根据地即采取蚕食与扫荡并举的办法。通过扫荡缩小八路军根据地、大力发展新民合作社、建立配给机构、强购山货及粮棉物资，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

1942年10月，日军展开第五次强化治安运动。目标是完成其大东亚新秩序企图，扩大发展县、乡、新民合作社，破坏八路军地下商品运输渠道。实行困笼政策，妄图把八路军困在山上。房良两县警察所编成谍报班，除刺探情报、暗杀与八路军通商人员外。还对物资实行批示运行，弹药等第一类物资绝对禁

止流动，金属、建材、机械等第二类物资经县长以上行政长官批发许可证，方可流通。皮革制品、棉麻制品等第三类物资严格规定携带数量，只限一人徒手携带，需经县长以上行政长官许可通行。运送粮食必须到警察所提出申请，由县公署批准方可运行，否则以偷运罪论处。

经过日军开展的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对平西抗日根据地所需粮食，布匹，食盐，油，医药用品造成严重困难。对山区土特产不能即时输出，一度军民生活实属困难。但在共产党领导下，军民齐心协力，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冲破了日军的经济封锁，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土改工作的回忆

李志国

1947年6月的一天下午，有三个人踩着英水沟的卵石路向下英水村走来，走在前边的两个人，个子不高，中等身材，后边的是大个子，肩上扛着支三八大盖长枪、每个人都背着打的方方正正的背包，腰间系着皮带，绑腿都是灰色的，脚上穿着黑色元口布鞋，左肩上挎着挎包，别着两颗手榴弹，看上去显得特别精神。见到路边锄地的人们，不时还停下脚步很和气的打招呼，看苗情长势，问生产生活的事儿。

这三个人就是来下英水村进行土改工作的同志：工作组组长张德信是涑水县人，杨天茂是门头沟上清水村人，杨天凯是房山水峪村人。进村以后，他们找来了栗友、马向山等村干部，开了个简短的会议，相互介绍了情况，把工作组安排住在我们院西屋徐财主家。工作组轮流到贫下中农家吃派饭，与贫下中农实行同吃、同劳动，挑水，扫院子，缸满院净。访贫问苦，宣传群众，白天劳动，晚上开会，对老百姓和气亲切。

下英水村地处深山区，依山就势居住分散，百余户人家从南到北，上坡下坡约有二里路远。后来村干部考虑，经与工作组商量同意，决定在我家吃饭。当村干部与我爷奶一说，两位老人很是高兴，爷爷感慨地说：“从前小鬼子逼着我给他们在岗楼搭炉子，胳膊烫满了泡，几个月才好。解放那天深夜，一伙日本兵还闯入我们院抢东西不说，还硬说我家老二是‘毛猴子’，挨了两枪托，非要抓走他。今天，土改干部为咱老百姓办事来了，说话和气，亲如家人，一定把他们照顾好！”

工作组白天参加劳动，组织发动生产，运送粮草，支援前线，“坚壁清野”，指导民兵习武，防备敌人向解放区进攻，各项工作很紧张。晚上开会常常开到深夜一两点钟，枕戈待旦，时刻防备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爷爷奶奶每天目睹工作组干部们日夜忙碌的情形，生怕他们累垮了身体，想尽办法为他们改善伙食。那时，山区土地都是些梯田坡地，很少种小麦，白面很缺，驻坨里的敌人又严密封锁，甭说吃白面，连吃盐都很困难。奶奶把自家仅有的百十斤小麦，

磨成面粉，自家人舍不得吃，专留着给他们做烙饼。精心粗粮细做，吃“珍珠米饭”（去皮的整粒玉米）、轧饹饹、小米干饭等。菜园子里种的黄瓜、豆角等也尽量留着给他们吃。“好东西给别人吃了传名，自家人吃了填粪坑”，这是奶奶常说的一句口头禅。土改运动的三个多月里，工作组一直在我家吃饭，尽管工作很忙，很累，但他们起早贪黑，抽时间帮我家干活，亲如家人，水乳交融。

为搞好土改运动，发展农村革命政权，经过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本着公开、公正、公平、民主的原则，经过群众大会，投玉米豆儿选举，选出王全为村农民协会主席，李文月、韩佃雨为副主席。选举那天，敲锣打鼓，打“霸王鞭”，扭秧歌，唱《选举歌》，全村男女老少，喜气洋洋。

农民协会成立后，在工作队的领导下，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对地主恶霸和富农进行了清算和斗争。

当时的口号是：“有仇的报仇，有冤的伸冤，杀人的偿命，欠债的还钱。”广大群众群情激愤，纷纷在诉苦大会上控诉了地主阶级的剥削罪行。每次斗争大会都设在进村路口处。这次土改，下英水村（包括中英水村）共清算和斗争了13家。

没收的银元、元宝，全部收归政府所有。在土改运动中，有两名党员因帮助逃往京城的财主向部分贫下中农要玉米钱被开除党籍。

诉苦大会后，把有钱人家里浮财全部搬走，集中在村九神庙，由贫下中农推选出诚实、可靠、责任心强的人日夜看管全村的胜利果实。

10月初，贫农协会和工作组共同把所有集中起来的胜利果实，按物值所值，明码标价。再按全村贫下中农的贫穷程度的不同，人口多少，分成四个等级，以人计分，抓阄儿排序，凭分挑选胜利果实。土地、园田亦按等级及参考受哪家地富的压迫剥削大小，进行分配。因父亲忙于农会工作，我去排队抓阄儿，抓了个二等，全家六口人，按分值挑选了1只羊、6口水缸、1套罐子、1件长衫、6亩土地，1分园田，4间房屋。从此，我家和广大贫下中农一样结束了租地种、租房住的历史。

土地改革运动，是共产党领导农民打倒地主阶级，废除几千年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土地所有制的一次革命运动。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人民无不欢欣鼓舞。翻身后的广大解放区人民，对共产党、对政府、对工作组更加热爱。解放区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热情大为提高。农民决心发展农牧业生产，多打粮食，支援前线。青年人踊跃报名参军参战，全村先后有十多人参军。六十多岁的范老太太的三子范朝臣在战场刚牺牲不久，她又把小儿子范朝

明送到佛子庄政府参加了解放军。青年隗有田正准备结婚，毅然推迟婚期，报名参军。

村里的男人们一方面积极在变工大队参加生产劳动，一方面抬担架、运粮草、破敌人交通线，配合解放军消灭敌人；妇女们多养猪、做军鞋。我们儿童团写黑板报、屋顶广播、打“霸王鞭”、扭秧歌、搞宣传、组织站岗放哨、捉奸防特。解放区的各项工作，都开展的热火朝天，呈现一派生气勃勃的新景象。

土改工作干部们，一心一意为百姓谋利益的好思想，好作风，好传统，一直铭记在下英水村百姓的心中，我更聆听他们为我讲述的不少革命道理，教我学会了《选举歌》、《王二小放牛》、《夫妻识字》等多首革命歌曲，至今耳熟能详。每当我唱起那时学的革命歌曲时，工作组的身影就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很怀念他们。

回首算来，工作组的三位同志离开我村已经 62 个年头了。后来张德信随解放大军南下了。1952 年，他回家探亲还特意绕道看望我爷奶。上世纪 50 年代我在房山工作时，每见到杨天凯，他都要问一问我爷奶情况，王春茂走后一直没有信息。离休后，不知他们都在何处休养。我在这里衷心祝愿他们身体健康，晚年幸福！

接管北平干部在良乡培训纪事（续）

许冬梅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暨北平和平解放60周年，为此，笔者曾经写过一篇《接管北平干部在良乡培训纪事》，介绍了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在良乡培训接管干部的内容，重点介绍了培训学习情况。本文侧重反映培训期间，有关组织、生活方面的内容。

1949年1月6日，中共北平市委在良乡成立干部训练班，负责培训接管北平干部。干训班办公室设在县城罗府街39号。据档案记载，干训班在北平市委学委的领导下，成立了学委分会，学委分会下设组织、教育、供给、管理4股。为了便于学习领导，以三个区的工作组编为一个队，由三个区的支书组成队部，建立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制。伙食单位由各队自行决定，以不妨碍学习为原则，一切供给关系以队为单位，由队部与供给股直接发生关系。

从1948年12月上旬到1949年1月下旬，中央及各地调派到良乡的干部已达2800多人，他们分别被安排住在纸房村、夏庄村、苏庄村等村。干训班成立后，各项工作按部就班的开展起来。

关于组织工作

1月10日晚6时，干训班办公室召开各队部支部组织委员联席会议，汇报各支部、学员思想情绪动态，干部团结情形等，并讨论今后如何进行组织工作，以作进城前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1月14日传达组织部指示，主要内容有三项。一是干训班所属各支部均须建立正常的组织生活，所有党员编入党小组，每五天至七天召开一次党小组会或支部大会，严格进行思想学习及工作检讨，并研究如何团结非党干部，如何团结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等有关组织工作的问题。如有必要时，可吸收或邀请一部分或全体非党同志参加。二是各支部中的团员及地下党的基干组织（如民联、民青等）成员亦须成立团小组，由支部领导过组织生活，如关系不

明或未转至支部者，请支部负责同志于一、二日内报告干训班，以便查明。又民青、民联等基干组织，暂不转团，但与团员共同成立小组，政治上与团员同样看待，转团手续待以后处理。三是团小组中最好有党员（有团员或民青等身份的党员）参加，以便起骨干作用，团小组长可由团员互相推选，但须经支部批准。

1月18日，组织部指示，市郊区工委会下设秘书处1人，管理生活行政，收发文件，整理材料等。今晨发下的通知中，应以讨论王部长的报告为重点，在讨论叶剑英同志的报告时，要联系毛主席对时局的声明，并针对蒋介石元旦的和平建议进行研究。

1月21日，向全体干部传达叶剑英同志20日在中学礼堂的报告并进行讨论，着重使干部认识和平接管的可能性及其实质，让全体干部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做好准备。

1月30日，继续进行学习，学习内容仍为：形势问题；约法八章；对地下组织党员的关系态度问题，在形势部分讨论中可参考26、27两日“每日新闻”的几篇文章和通讯（包括谈话声明等）。

关于后勤工作

1月9日，根据总的供给标准，干训班暂定出以下供给原则。如供给部有新的规定时，再另行通知。

关于粮食菜金：每人每日小米一斤十二两，细粮大灶10%，中灶50%，小灶80%；菜金大灶每人每日油五钱、盐五钱、肉五钱、粗菜一斤、柴二斤。中灶每人每日油五钱，盐六钱，肉二两，粗菜一斤，柴三斤。小灶每人每日油五钱，盐六钱，肉六两，粗菜一斤，柴四斤，鸡蛋二个，调料费；重病员按中灶待遇报销，不能超过百分之三人数。

关于办公费：灯油每人每晚以一钱计，各队部办公一个灯，每晚以六钱计，（除每人应领一钱者外，超过数另行报销）；墨水每单位（30人计）十天可以报销冀钞一千元自购；纸张（以十天计）每队部办公十五张，每小组记录纸四张，每人学习纸五张，均以小张计；书签暂定每两人发一个。三、烤火费：每人每日规定发炭一斤半，各队队部因办公，定一个炉子，每日计炭八斤，除按每人应领一斤半外，超过者另行报销（三人者补三斤半，四人者补二斤）。以上一、三两项价格暂仍按12月规定（菜金每人511元计炭每斤55元计）。

同日，供给部通知：关于木柴问题，政府很难以解决，因要全力支援前线，保证前方供给，因此，对我们做饭用的木柴比较困难。各单位接通知后立即将烧柴之锅灶改为炉灶烧炭大锅无炉条由各党委自行向各区镇、公所交涉借用，如炉条借不到，可以自行购买，以后报销；供给部在城关镇北大街门牌 63 号设有供给商店，有白酒、猪油、香烟，各单位可去购买；各单位自 11 日起，自己可以不要买炭，全由供给部供给，可派人来办理手续去领；各队再调查，现在还有多少人确实未领服装，或真正没有者，请将其原部别，现在单位、姓名，未领或没有原因，详细填明送交干训班供给股，以便转供给股核发（服装包括棉衣、棉被、棉鞋、棉袜）。

1 月 27 日，干训班通知，凡在北平城外过年的，每人发麦子 2 斤 10 两。

2 月 2 日，供给部通知，凡在北平城外的，再发一次细粮，中小灶每人半个月，大灶每人一顿，计小灶每人发小麦 29 斤，中灶每人发小麦 19 斤，大灶每人发大米 14 两。2 月份烤火费再发半个月。

2 月 4 日，又通知，准备明日下午全体干部进城，（北平）各区支书于明日早饭前，到干训班参加会议，商讨入城前各项准备工作。各区干粮已准备好的，妥为保存，未准备好的，必须于明日上午 12 时以前准备齐备。

同日通知，2 月 5 日中午 12 点乘火车赴北平，各单位务于明晨 10 时前，吃完早饭，以支部为单位整队到车站集合。出发前应做的工作：清理群众手续，打扫清洁卫生，征询群众对我们的意见，进行解释。清查文件，不得遗失，不必要的可以烧掉。出发前臂章符号佩带好，臂章佩带于左臂肘上十寸地（相当于一拳距离）符号佩带于左胸小口袋上方。各单位出发（到车站）时，派一人到楸树街干训班联络。

关于吃饭问题，一时尚无法解决，规定今晚明晨吃自带干粮可购买咸菜。开水由旅馆供给。我们刚到此地，各方情况尚不够了解，兹规定以下纪律，望全体同志切实遵守。为保持一定秘密，暂时不准会亲友（不准外出或叫来），不准用电话联络私人亲友。根据了解，此地敌特尚在活跃，我们要特别提高警惕，无事不准任意外出。干训班现住西河沿光明饭店楼上 31 号，有事可来联络。少用电话。

通知要求，第二天早晨 8 点钟各区全体人员到组织部开会，7 点半钟整队到车站前广场集合。早饭每人发给人民券 35 元，自行购买食物（在开会前发给各小组处理），此款暂由各区伙食单位垫支，以后向供给部报销。开会时务将各人所有东西带好，以便会后即分发工作。

2009年3月9日《北京晚报》曾刊发了题为《叶帅重要报告确保接管顺利——访北平接管干部曾任彭真同志秘书马句》的文章，马句在文中介绍讲道：

当时我被分配到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工作，在良乡一个多月，每天都能看到土改后的农民组成的送粮队，给平津前线送军粮。由于村里的青壮年都参军去了，所以送粮队都是由老人和妇女组成。一辆胶皮车，姑娘在前头用一根绳子拉，后面老人努力地推，这场景让我更加感受到人民战争的伟大力量。

在庆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建台65周年活动中，康普写了一篇《进城前后的广播电台》回忆文章中，讲述了准备接管北平广播电台的工作组，在良乡的工作生活情况：

那时的生活日程非常简单，每天练播音、学文件、读报纸，其余时间就是唱歌和说笑。有时也排起队来走上三五里路到文工团的驻地看排练或演出，这是最使人高兴的文化娱乐。伙食基本上是小米饭和青菜，每周一两次改善伙食，也不过是在小米里加上些红豆、白薯块和小红枣，蔬菜里加几块肉。虽是粗茶淡饭，但因小米对妇女有特殊的营养价值，有的女同学吃了几个月小米饭，苍白的脸也变得红扑扑的，那些原来肤色就比较好的同学，变得又红又胖，脸像个苹果。穿上宽松肥大的棉军装，腰间再扎上一根带子，从侧面看去，活像一个滚圆的葫芦。每个月相当5斤小米的零用费，除了买牙膏、肥皂之外，逢五逢十还想逛逛庙会。柿子本是这里最便宜的土产，但因我们口袋里不够殷实，大家相约不可多买，以便使零用钱细水长流。

上面所引的两段回忆性文字，对读者了解良乡培训接管干部的学习情况也提供了一些参考，连同本文或许能让我们如何感悟那个时代有所启发。

我参加了新中国首批援越政治顾问团

李振斌 口述 苏维斌 整理

整理者注：1958年，李振斌同志从外交部调至房山时，我就与他认识了，之后很多年里我们也没断来往。一次，我到他家做客，他对我谈起了在我国驻越政治顾问团时的一些往事，我听后很感兴趣，觉得他的这段经历有必要整理出来供大家一同回味。

我的祖籍河北省曲阳县元道乡北留营村，1924年8月出生，14岁参加八路军，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贺龙元帅领导的120师三五八旅任卫生员，参加过1940年的“百团大战”。由于作战勇敢，表现机警，上级派我任三五八旅政委罗贵波的警卫员，此后在警卫队又做了多年的政治工作和保卫工作。曾护送中共七大代表到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护送八路军代表穿越日军封锁线与阎锡山的军队进行谈判，后因工作需要调到军委办公厅进驻中南海。

1950年初，罗贵波的秘书刘丰找到我说：“根据工作需要，决定让你参加第一批援越政治顾问团，你的主要任务是负责行政事务和与越方的对外联络等工作。要抓紧时间，做好出国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我当即表示同意，参加了新中国首批援越政治顾问团。

顾问团的组成

1950年1月，应胡志明和越共中央的要求，中共中央决定以罗贵波为首组成援越政治顾问团，罗贵波（首任我驻越南民主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后任外交部副部长）为团长；顾问团成员有秘书李云杨、机要员张思智、警卫员武怀德、成员王玉利和我。我当时主要负责顾问团的行政事务和联络等方面工作。

为了保持与中央及时快速的沟通联系，中央专门为顾问团配备了一部电台。电台组组长谷秘云，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与上海地下党电台负责

人李白（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中男主人公原型）对机发报，拥有很强的工作经验和能力，离休前是哈尔滨市长途电讯局副局长。电台组成员包括报务员薛培芝以及李班（后任越南外贸部长）、阮德瑞、刘德福等三名越南同志。

刘少奇亲自交代任务

1950年1月上旬，顾问团成员确定后，通知我们立即到军委办公厅报到。这时，罗贵波团长刚从中南海带回了刘少奇同志写给越南政府的亲笔介绍信。因当时毛泽东主席出访苏联，周恩来总理陪同出访，刘少奇便亲自向罗贵波交代了任务。罗贵波简要向我们介绍了目前越南的情况，并指出：“我们这次的任务主要内容有三项：一是我们这次去是为感谢越南同志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支持；二是沟通中越两党的关系；三是了解越南的有关情况，以便中央及时做出对越援助的方针和计划”。

同时，罗贵波还要求我们抓紧时间做好出国前的准备。于是，我们每个人领取了旧币五十万元（折合人民币50元），作为出国费用。并到旧衣店为每个人购置了一件美式夹克，因为越南的天气湿热、蚊虫较多，穿上这种紧式的衣服生活起来比较方便、安全，除了身上穿的夹克外，每个人只携带了几件换洗的衣物、雨具和药品就出发了。

经武汉、桂林到南宁

1950年1月16日，在罗贵波团长的带领下，我们一行乘火车离京南下。经过40多个小时的颠簸到达了武汉，在那里，我们见到了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林彪。因林事先接到了少奇同志的电报，对我们此行非常重视。特别对越南的三位同志很客气，并在汉口设宴为顾问团送行。中南局的同志看我们的电台太小，又无备用机，就为我们配备了一部四灯收报机和一部15瓦发射机。

我们在汉口停留了三天，便继续南下，车到衡阳的时候已经是2月中旬了。为使顾问团能尽快到达越南，当地领导决定派一辆火车头送我们前往桂林。火车头走走停停，遇到被破坏的铁路，当地政府便组织抢修，修好一段往前走一段，就这样又行进了两天两夜才到达桂林。顾问团一行十多个人与司机、司炉挤在一个火车头里，可见当时条件的艰苦，但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都非常饱满，面

对艰苦的环境毫无怨言。

离开桂林之后，走了四天才到达南宁。此时已临近春节，广西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张云逸，军区司令员李天佑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为顾问团赴越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为了让顾问团过好春节，他们还特别准备了饺子招待越南客人和顾问团的同志们，但越南同志不习惯吃饺子，又给他们安排了米饭。

中越战友同舟共济

由于当时的广西刚刚解放不久，国民党的残余部队依托边境多山的特点，勾结当地土匪，在边界一带继续流窜，气焰十分嚣张。

为了将顾问团安全地护送出国界，地方领导做了许多准备工作。1950年2月21日（农历正月初五），我们在一个加强连的护送下，分乘5辆卡车离开南宁到达了天保（今德保地区）。这一段全部都是土路，还要过一条河，渡口上停靠着1条拖船，每次只能拖走2辆卡车，每趟约20分钟。

当时的情形十分危机，我们要一面防备土匪的袭击，一面实行强渡。过了天保前面的路是条石铺路，这条路宽度仅有三至五米，隐蔽条件也不好，我们都端着枪，连眼睛都不敢眨。车过摩天岭时如过鬼门关一样，全部是山路，一上一下约40公里，非常难走。而且土匪就在对面的山顶上“哇啦、哇啦”的叫个不停，但是一进入射程，他们就躲了起来不敢交火。这摩天岭真是名不虚传，山峰直插云霄，云雾蔽日，高不见顶，我们一个跟随一个不敢掉队。在我们之前有两辆客车遭到了土匪的抢劫，待我们赶到后驱散了土匪，救出了四个女学生，夺回了被抢走的财物。

2月23日，我们走到了广西省的边境城市靖西县，县委书记给我们介绍了中越边境的情况，随行的阮德瑞先过境向越南方面汇报，然后越方派吴廷营（越南主席府典礼务长）到靖西迎接我们。2月26日，顾问团一行10人终于进入了越南境内。

毛泽东主席长了“胡子”

在中越国境线上，几位越南的同志笑容可掬地前来迎接我们。他们中间包括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兼越南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黄文泰，越南人民军第五联区司令员洪水等。他们为我们每个人都配备

了一匹快马，顾问团全体同志照了一张合影之后，又继续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踏进了越南就是走近了战争。当时越南和法国侵略者的战争正如火如荼，越南人民军在丛林中打游击战，几天便换一个地方，住的都是非常简陋的毛竹房子。我们在越南同志的引导，每天约走五十华里的山路，一到宿营地第一时间便架设好天线和中央联络。由于这里全是山地，电台架设到高处，山高上不去，架设到山下也发射不出去，所以架



胡志明主席（左一）与顾问团同志在一起

线非常困难，但无论有多大的困难我们总能想出办法来保证每天与中央沟通一次。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又走了半个月，于3月中旬到达太原省群山之中的印支共中央临时所在地。中央政治局委员长征，顾问阮志清、黎文良、阮良朋等同志在驻地欢迎我们并陪同我们去见胡志明主席。

胡志明主席住在大山腹地的密林深处，这里有一条清澈的小河淙淙淌过，我们沿着一条羊肠小道来到山口弯弯曲曲的小河边，登上竹筏过到对岸，穿过竹林，便见到了胡志明的“公馆”——一间茅草顶的高脚屋。满面笑容的胡志明主席见到我们到来，便从屋里迎了出来。简陋的小竹棚里，床上有一席一毯，桌上摆着一架打字机，柱子上挂着一块怀表，一个背包里面是一套换洗的衣服和几本书，这大概就是胡主席的全部家当吧。就连过惯了艰苦的军旅生涯的罗贵波团长也被胡主席简朴的生活感动了，激动的说：“胡主席真是太简朴了，可敬！可敬！”胡主席听后当即吟咏了两句汉诗：“乱石山中高士卧，茂密林里英雄来。”

当时胡志明主席刚刚访问完苏联和我国回到越南，他对我国的情况非常了解，曾参加过我国革命战争，汉语说得非常流利。对我们十分热情，犹如见到了自己的家人一样，倍感亲切。欢迎大会就在小竹林前面的一块平地举行，因为地方不大，我们都在看越南同志布置会场。主席台上挂着两张人物画像，一张是胡志明主席像，一张是毛泽东主席像。因为画像的人没有见过毛主席，只是听胡主席访问我国的随员谈起过毛主席的相貌，他以为既然胡主席留着胡子，那么毛主席就一定留着胡子，于是将毛主席的画像画上了胡子。大家看过

之后都大笑起来，胡主席见到之后说：“怎么几天没见，他就长了这么长的胡子了？”后来，在他的指点下画师把画像摘了下来去掉了胡子，加上了嘴唇下的痞子，又重新挂了上去。

胡志明主席盖上了我们的被子

待顾问团安顿好了之后，我们便立即投入到工作中去。罗贵波团长非常忙，白天参加会议，晚上研究越方提出的各项求援方案，会后还要调查研究分析形势，特别是对援越物资如何平安运输到越南境内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分析。罗贵波认为：必须将法军封锁的中越边境线打开一个缺口，开辟出一条中国至越南的运输线，才能顺利的将物资运抵越南。



李振斌（后排左二）与越南同志在一起

当务之急是需要一支作战经验丰富的军事顾问团和大批物资，我们立即将这一情况及时通过电台报告给中共中央。

电台联络一直是在夜间进行的，因为罗贵波的建议大多在深夜成熟，然后才能向中央汇报。亚热带地区的深夜最难熬，我们北方人一到越南就感觉酷暑难耐，特别是在密不透风的密林中，热气蒸人，蚊虫大起。我们不得不赤膊上阵，用蚊帐罩着电台，点燃一盏油灯收发电文，每天工作至深夜。虽然十分辛苦，但是我们身在邻国支援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用亲身行动践行国际主义精神，感到虽苦尤荣。特别是在长期的并肩战斗中，与越南人民结下的深厚友谊是永远不能忘怀的。

胡志明主席是“中国通”，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们都觉得他是位慈祥而和善的长者，他也经常来到我们的驻地询问工作和生活情况。有一次，我们正在院子里打球，胡主席来了，对一个战友打着手势说：“掏五块钱。”我们都感到莫名其妙，原来这个同志的裤口小扣没有系上，胡志明主席说：“在香港，像你这样就得罚你5块钱。”还有一次，胡志明与罗贵波研究工作太晚了，准备住在我们这里。罗贵波团长问我们：“谁有干净的被子？”我们面面相觑，都没有吱声，这时谷密云说：“我的被子昨天刚刚洗过，还没有用。”团长说：“行，赶快给胡主席送去吧！”就这样，胡主席在我们的驻地

过了夜，第二天临走时还特地向我们致谢。

不久，中共中央回电同意了政治顾问团的建议，派遣韦国清、陈赓等同志率领军事顾问团前往越南。半年后，装备精良的越南人民军 308 师对法军展开了全面的大反攻，越南人民在胡志明和越共的领导下把法国侵略者彻底赶回了老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2004 年，越南驻我国大使馆特邀请顾问团的同志参加庆祝奠边府大捷 50 周年活动，带队的是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并请我们吃了饭，还赠送给我们庆祝奠边府战役大捷光盘和纪念奠边府大捷 50 周年与中国前顾问团部分成员聚会合影以作纪念，这时我的心情由衷地感到欣慰！

忆国庆十周年游行

张广文

2009年10月1日，是共和国60年华诞。新中国经过60年的风风雨雨，日益强大，欣欣向荣。房山区也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县变成初具规模的京郊新城。如今，全区各地直达市区的公交汽车有十多条线路，区内公交车则实现了“村村通”。从房山到市区办公、购物只需一个小时便可到达。现在的年轻人哪能想像得到，1959年房山地区群众参加建国十年大庆游行，却要经过一整夜的辛苦奔波才能到达天安门广场呢？

建国十周年的房山交通状况

1958年5月，原属河北省的房山县和良乡县划归北京市，合并成立周口店区，区府设在房山县城。通市区的公交汽车也是这一年才有的，每天4至5次班车，可载客100多人，从房山东关开往天桥车站，只有京周路一条线路。京周公路是房山境内第一条柏油路，1955年通车，是当时全国第一条机械化施工程度达到90%以上的公路。这样一条全国著名的公路，路基宽度才8.5米，油面宽度仅为5.5米，大约相当于现今京周公路良乡月华大街的十分之一宽度，和自行车道的宽度差不多。虽然只有四五十公里的路程，却要走三四个小时，甚至走多半天才能到天桥。除此之外，还可以从周口店火车站乘市郊车经永定门火车站到市区。但房山到周口店没有公交车，要步行十多里，而且每天只有上午开一班车，同样要三四个小时才能到市里。因此，那时的老百姓把去一趟北京城当成一件大事，看成是出远门，就像现在去外省市出差旅游一样。

除了以上两种出行方式，就没办法去市里了。因为直到1958年底，全周口店区才有机动车14辆，驾驶员18名。

1959年是第一次建国大庆，又是房山、良乡两县刚划归北京市，全区人民欢欣鼓舞。周口店区委、区人委还专门发文件对庆祝活动做出部署。要求房山、良乡、琉璃河、长沟等城镇举行庆祝大会。同时，组织520人的群众队伍

参加 10 月 1 日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游行。游行队伍要与全市几十万人的队伍准时到指定地点汇合。因此，保证按时汇合就成了大问题。

游行队伍的一夜一天

周口店区参加天安门游行的队伍由三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房山的群众，一部分是良乡的群众，一部分是参加天安门广场活动的少先队员。那时，参加国庆游行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对每一名参加者都是一种荣耀。因为能够见到毛主席，能够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是一件无尚光荣的事。所以要求参加者必须政治可靠，工作先进，学习好，要经过单位的严格挑选和选拔。即使是少先队员代表，也是从各学区选拔的品学兼优的好学生。1959 年，我正在房山中学读高中二年级，当知道我有幸参加国庆游行以后，一直兴奋了好几天。

这一年，周口店区文化局的李荣光为郊区农民游行队伍设计了一辆名为“聚宝麦丰”的彩车。经过区领导的多次审查修改，通过游行指挥部最后审定，参加了国庆游行。这辆彩车由一辆大卡车改造而成。上面平台上是一个象征性的聚宝盆模型，里面装满硕大的麦穗模型，彩车的两侧是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一边是“土肥水种”，一边是“密保工管”。聚宝盆的四角各站立一名代表农民形象的女青年，肩扛一捆麦穗，目视前方，象征美好前景。四个女青年的扮演者也是房山中学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她们是杨惠珍、杨惠芳、娄庚辰、崔淑敏。9 月 30 日下午，彩车经过最后检查，并在区委门前留影，就直接开往东单北大街去集中了。

参加游行的人，一方面要接受有关培训，一方面要自己准备服装。男的是白上衣蓝裤子，女的是白上衣花裙子。周口店区除彩车参加农民方队游行、少先队员参加广场方阵外，其余都参加群众游行队伍。成员来自全区各乡镇，因为条件有限，大会指挥部是管送不管接，自己想办法去。于是区里决定所有参加游行的人都要在 9 月 30 日晚上在房山、良乡两个地方集中，乘火车去市区。房山的人大约晚上 10 点左右集合，12 点左右沿京周路步行去周口店火车站。虽然有十多里路，大家精神振奋，有说有笑，一个小时左右就到了车站。火车到良乡队伍汇合后还有不少空车厢，原来长辛店、丰台两地都要上人。

10 月 1 日凌晨 3 点左右，火车开到永定门车站，全体人员步行向天安门

方向进发。到前门大街时，还在路东的一个浴池休息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前行到南河沿大街指定集结点。进行途中，我看到满街都是参加游行的队伍，到了路口有人指挥，有条不紊地向各自集结地点开进。天色渐渐亮起来，到了南河沿大街已经6点多钟了。也就是说，从9月30日吃完晚饭到集合完毕已经过去十多个小时了，但是，大家都不觉得累，看着望不到头的游行大军，兴奋地说说笑笑。8点多钟，开始吃早餐，每人一个面包两个煮鸡蛋，渴了就用手捧着喝路边的自来水，就这样一顿饭坚持了一天。

我们正在说笑间，忽然天空传来一阵轰鸣声，一队队喷气式战斗机从天空呼啸而过，才知道天安门广场已经开始阅兵了。又过了一个多小时，游行队伍开始经东长安街向天安门广场前进。到达天安门广场时，我看到了广场已是人山人海，花团锦簇了。喇叭里播送着欢快的乐曲，在震天的口号声中，我们终于来到了金水桥前。仰望天安门城楼，我终于见到了日夜想念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只见他身穿灰色制服，站在城楼中央，频频向游行人群挥手。我和同伴们用力地挥动手中的花束，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因为大家都想多看一眼，原来走得很整齐的队伍到这里都乱了，前边不愿走，后边往前拥，急得路旁的标兵队一个劲催我们往前走，跟上队。虽然过了观礼台，我还是一步三回头望着逐渐远去的天安门城楼，心潮激荡。当时的想法：是毛主席领导人民翻了身过上好日子，是共产党让我这样一个贫苦农民的孩子上了学，今后我一定更加努力学习，以优异的成绩报答党和毛主席的恩情！

在天安门广场南侧聚集了10万人的队伍，他们用鲜花组成国庆节的各种图案。其中有周口店区的70名少先队员代表，一些山区的孩子要身背干粮步行几十里山路，在9月30日下午到周口店小学报到，然后由周口店小学的一些家长把孩子们领回家里暂时休息，吃了晚饭送回学校，等待与全区的游行队伍一起乘火车去市区。这些队员在10月1日早7点以前就进入天安门广场指定位置，南北向一行35个人，队前队后各有一名带队老师。孩子们手持花束，从游行开始到结束不能随便走动，同样很辛苦。当游行队伍全部通过观礼台以后，一声号令，广场十万人以少先队为先导，一齐涌向天安门金水桥前，向毛主席和城楼上的领导人欢呼致敬。当毛主席走向城楼的东南角和西南角向欢呼的人群招手时，“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一浪超过一浪，参加庆典的少先队员都忘记疲劳，欢呼雀跃，兴奋异常。虽然他们比其他游行人群回去得更晚、更辛苦，但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会更深地留下对祖国、对领袖的爱，并且终生难忘。

队伍通过天安门广场后一直沿西长安街走去，两旁有不少受阅的部队正在休息，汽车、大炮、坦克车整齐地停在路边接受我们的“检阅”。队伍到达复兴门后转向南礼士路，大约在下午 2 点多钟登上大卡车，一直到下午 5 点多钟才回到房山，结束了这次终生难忘的国庆游行。

良乡县人民银行反右运动的回忆

李 耀

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的反右派运动，是在党内整风的过程中开展起来的，并且成为党内整风中一个重要的阶段。为什么党内整风会与反右运动联系起来呢？这是因为反右派运动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

党内整风出现了不和谐的因素

1957 年，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国内，我们党由于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对工业、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犯有急躁冒进的错误，使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有些地区出现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农村出现了农民闹缺粮、闹退社的风潮。而面对政治、经济领域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许多党员和干部在所有制发生变革的转折时期缺乏思想准备，工作陷于被动。在执行工作上有的软弱无力，有的则用简单粗暴的办法处理问题，使党群、干群关系趋于紧张，一些党组织和政府不能适应发展了的新形势。

在国际上，特别是在当时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波兰、匈牙利在 1956 年相继发生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和严重的社会骚乱，这些也为我们敲了警钟，为了提高全党的执政水平，改进作风，防止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克服官僚主义，中央决定全党开展整风运动。

1957 年 4 月 27 日，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明确提出在全党普遍深入地开展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形式，进行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

在整风运动中，中央和各省部级单位、高等院校先行一步。党内外干部群众积极响应号召，帮助党整风，对党和政府工作、党政干部的思想和工作作风提出了大量的批评和建议。但在帮助党整风的过程中，有极少数人借机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他们强烈要求采取“大鸣、大放、大民主”的方式参与整风。

于是大字报迅速蔓延，把矛头直指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他们把共产党的领导攻击为“党天下”，公然提出共产党要退出机关、学校和企业，要求要“轮流坐庄”，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绩，进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人民民主专政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这一系列的言论，显然已超出帮助党整风的目的和要求。

在中央和省部级单位，高等院校“大鸣、大放”已形成高潮之时，良乡县银行作为县属单位，党内整风在县委的统一部署下，于1957年5月中旬开始。在学习动员阶段，主要是要求学好中央指定的有关整风的文件，如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央《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等，6月下旬转入联系实际阶段。通过小组座谈，贴大、小字报等形式发表批评建议。但由于当时中央和省部级单位、高等院校的“大鸣、大放”的内容通过广播、报刊的广泛传播，对基层的整风运动中的“大鸣、大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银行职工反应也很热烈，甚至曾有过半日营业、半日搞运动的局面。鸣放的内容也大大超出了银行内部有关领导作风、生活福利、党群干群关系等内容，而涉及到社会上有关农业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等方针政策。根据县委的统一部署，银行抽出专人及时摘抄和整理大鸣大放内容的资料，为整风运动后期的整改阶段做好资料的准备。

错误判断政治形势导致反右扩大化

群众性的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批评和建议，就绝大多数特别是基层单位的同志所提出的批评建议是善意的，还是想真诚地帮助党整风，以便改进作风，纠正错误。而那些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想通过帮助党整风，否定党的领导，抵毁社会主义制度，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本可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开展批评教育的办法加以解决。然而党由于过去长期进行阶级斗争形成的政治经验和习惯作法，对在整党中出现的新情况，进行了错误的判断，把私有制改造的历史转变时期出现的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成了阶级矛盾，并把当时的形势估计的过于严重。为此，中央于6月上旬发出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从而把反右派运动作为党内整风的一个重要阶段。原反右派运动只是在中央省部级单位和高等院校中进行，8月，中央又把这一反右派运动推向了全国基层机关、学校、厂矿、企事业单位，从而一场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这就使反右派运动进一步扩大化。

9月中旬，在良乡县委的统一部署下，良乡银行的反右派运动也随之掀起了高潮。原在“大鸣、大放”阶段整理的资料，也就成了批判和定性的依据了。在这场反右派运动中，良乡银行共有7人经县委研究并报地委批准被定为右派分子，带上了右派分子帽子，接受群众的批判。不过反右派运动中的批判与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对所谓“走资派”的批判还有所不同，那时的批判，不允许体罚，不准谩骂，但精神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良乡银行的反右派运动，于1958年3月初基本结束。被定为右派分子的这些同志，有的被下放农村，有的被遣送原籍接受劳动改造，承受了精神上、身体上、经济上等多方面的巨大压力，也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以后虽然都陆续摘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但在政治上并未完全得到解放，也未能及时恢复工作。直到1978年才全面落实了政策，得到了妥善的安置。有些同志还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

1958年3月，由于区划变动，经国务院批准，房、良两县由河北省划归北京市，撤县设区，合并后的银行改名为周口店区办事处，良乡银行部分同志于3月28日去了房山，原良乡银行的党内整风运动也随之结束。

回忆这段不幸的历史，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它也更好地警示了后人。所以胡锦涛总书记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严肃地提出在今后的改革和建设中，要一心一意谋发展，踏踏实实搞建设，不要再折腾，这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精辟总结，有着深远而重要的历史意义。

到房山参加锻炼的外交部首批下放干部

苏维斌

1957年，外交部领导为落实中央关于中直机关干部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提高政治思想觉悟的指示精神，决定分期分批的抽调部分干部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增强实际工作本领，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第一批被下放到京郊周边农村地区锻炼的干部共400人，其中分配到房山地区的有80人。

当时的外交部长由时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兼任，主持外交部工作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为了使这些干部能够放下包袱、安心在农村参加劳动锻炼，外交部特别召开了动员大会，周总理和中组部副部长帅孟奇到会，并做出了重要讲话，对参加劳动锻炼的干部提出了要求。

房山县委高度重视这一任务，及时召开了有关部门参加的会议，对此项工作进行研究部署，最后确定由县委组织部负责，根据领导的安排部署，具体工作由我来负责。同时，外交部还派出李举卿、周舟、田遗华三名干部驻县委，负责下放干部的管理工作。遇到问题我们共同商量解决，互通情况，经常交换意见，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60年，我出差住到外交部招待所，他们对我非常热情，吃的很好，住的甲等房间，晚上去公安部礼堂看文艺节目，这段往事至今令我念念不忘。

县委为把这一工作做得更好，引起广大干部群众的高度重视，在大礼堂召开了县直机关干部参加的欢迎大会，县委副书记张革夫发表了欢迎讲话。他说：“外交部干部来房山参加劳动锻炼，我们非常高兴。并表示热烈欢迎！”他在讲话中还介绍了房山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工业、农业、林业等概况。要求他们下去后要搞好干群关系，虚心向群众学习，遵守党的纪律，给群众做出好的榜样。下放干部代表也在会上表示：“下去后一定要放下架子，做到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决不辜负领导的关怀。”这个会开得隆重热烈，群众反应很好，对房山的广大干部群众也是一个很大的震动。

经过研究认为将这批干部下放到交通方便，各方面条件较好的地方较为合

适。因此下放地点定在了城关、石楼、长沟和石窝等几个乡镇，每个点上十多个人，每组设组长 1 人。杨兴国被安排到城关镇任副镇长，暨负责部分行政工作，也抓下放干部的管理工作。这样对工作有力，对他自己也是一个锻炼的好机会。还要求乡、镇领导也要有人负责安排好他们的吃、住、劳动等方面的工作。长沟镇在下放干部到达时组织群众、学生夹道欢迎，西长沟村的一位老人，别人都称她为“麻老太太”的妇女，还到几里以外去迎接，还有人说“中央一级干部”来了，我们欢迎他们去。这充分表现出了群众的极大的热情，也鼓舞了下放干部的工作热情。分到石窝乡的干部还是我送他们去的，与乡领导研究决定后将他们安排到了老百姓的家住，吃在供销社食堂。

这批干部下去后，做到了放下架子，脱掉了西服、皮鞋，换上了普通服装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不怕脏、不怕累。安法鲁下放到了东长沟村和群众一起推粪、修水库、搞夜战，队长方文增看他又饿又累，就邀请他到自己家吃夜饭。由于他处处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两次被评为小组先进工作者。多数同志通过下放锻炼提高了对劳动锻炼意义的认识，增强了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张延庆深有体会的说：“这次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虽然环境艰苦，干起活来又脏又累，但是锻炼了我的革命意志，学到了很多农业知识，学到了好的作风，好的优良传统，缺了的课这次补上了，是非常值得的。”

县委为掌握他们的劳动情况，思想变化和遇到的问题，两个月后召开了一次下放干部组长汇报会，县委书记李明亲自听取汇报，肯定了他们的劳动成绩，指出了今后要注意的事项。

原决定这批干部下放 2 年，但由于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半年后，部分同志被陆续调回去了，多数同志回到了外交部，个别同志去了其他单位。如李举卿先回到外交部后，又被任命为我国驻蒙古共和国使馆大使。周舟回外交部招待所任支部书记，田遗华去我国驻朝鲜大使馆工作。

1958 年 3 月，房山划归为北京市管辖，中共周口店区委因工作需要与外交部领导商定拟留下一部分人分配到区直机关工作。并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年轻；二是工资较低（当时区财政较为困难）；三是表现好的。外交部领导经过研究后，同意了这些意见，人事司副司长田屏同志专门与区委领导共同决定了这些问题。当时也征求了留下的人的同意，实际留下了 20 多人，根据他们的个人具体情况，如经历、表现、特长等分配到区直机关和乡镇工作，多数同志都安排了相应的领导职务。如章文先后担任了房山中学党支部书记、教育局局长等职务，边玉庆安排到长沟大公社武装部任部长。

留在房山的干部总的是工作积极，认真负责，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能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给房山的干部做出了榜样，补充了干部队伍的新鲜血液，对房山的各项建设，对改变房山的面貌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也说明区委领导当时做出此项决定确实是具有远见卓识的。

毛驴“下放”

姜玉卉

“下放”，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最常见的事。各阶层的人群在不同背景下，面向基层，走向工厂，奔向广袤艰苦的农村。其目的意义也不尽雷同，是怨是喜，只有被下放的人心知肚明。总之，下放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这里不想赘述。毛驴作为当时农村生产队的生产工具之一，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也有过下放的经历，这不是无稽之谈，而是事实，但鲜为人知。

1958年，农村成立人民公社，体制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每个生产队都饲养几“把”儿（6头为一“把”儿）毛驴。当时社员烧煤、送肥、运水果等多数靠毛驴运输。甚至社员到外村接媳妇，也用队里的毛驴接送。可见，毛驴的作用举足轻重。当时每个生产队有专门饲养场，专职饲养员昼夜伺候着。毛驴棚是用石泥砌墙，青石板瓦顶的永固棚圈，防风防雨雪。国家也奖励耕畜发展，大牲畜都有饲料口粮（大部分是玉米，少量的豆饼和黑豆）。那时的毛驴个个膘肥体壮，毛色发亮。有的饲养员爱牲口跟伺候自己孩子似的。

那时集体的牲畜备受宠爱。说句有人不信的话，大牲口比人值钱。举三个例子可以证明：一辆挂斗的运输汽车压死我村三队一个8岁的小姑娘，按当时赔偿政策，付给赔偿金800元。不久，又压死七队的一匹马车辕骡，赔了4000元；接着撞伤了八队的一头耕牛，给了700元，还花了30元治伤。一周后耕牛死去，社员含泪吃了牛肉。为什么牲口比人贵？当时队干部与汽车所属单位交涉，说生产队是集体所有，穷，没有大牲口种不了地，我们怎么活？你汽车场是全民所有制，国家不能忘了我们农民。我们到口外买一头辕骡要三、四千元，来往住店，人吃马喂，容易吗？这是我亲眼所见。

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毛驴的运输力、效率显得差了。因为修了田间路，马车的优势突显出来。每个生产队都置办了两三辆马车。毛驴的活计很少了。卖没人买，又不允许宰杀。自然淘汰，死的少，生的多。每个生产队都有大小二、三十头毛驴，再加上骡马耕牛，每天打饲草就占了三、四个强壮劳力。毛驴没活干，就让辍学的半大小子天天赶到荒坡上去放，两个打草的壮

劳力去从事田间劳作。

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的口粮极其紧张。即便好年景时，山区群众生产的粮食都不够吃。三年连续大旱，土地歉收，只好凭国家发的粮证到粮店买返销粮——东北玉米。口粮不够，瓜菜代。甚至石灰水煮棒子皮，煮烂沉淀成粉，捏窝头吃，难以下咽，不好消化，出现便秘。眼看大人孩子消瘦。老人为了让孙子吃饱，节食病倒后，几天后去世。做为村支部书记的父亲急在心里，就和其他村干部绞尽脑汁想办法，保人命，少死人。其中一项决定：毛驴“下放”到社员家，牲口口粮不带，留给集体补贴人吃。这时没有和谐可言，人从牲畜口中夺粮，特殊情况，没商量，也不用商量，谁叫驴子是低级动物呢？它们不会反抗。另一个意义，腾出打草的劳力，减轻集体负担。

可是毛驴下放到社员各户，没有多大用处，也就是拉碾子推磨，往自留地送送粪。活计不多，又多一张嘴。增加社员负担。对勤快人负担不算大，单干时大多家庭养过牲口。父亲带头牵回家一头毛驴。俗话说：干部带了头，啥事不发愁。很快全村毛驴下放到社员户。

当时，我正读初二。本来家务活就够累的了。父亲整天为村里的事忙乎，自留地的活计，种菜都是我早晚干。弟弟妹妹们很小，帮不上忙。喂养毛驴的事，也自然由我承担。每天午后上学带上篓子镰刀，放在教室后面，放学到后边山上割饲草。

累极了，有时就狠命地打毛驴来发泄，对驴骂道：多了你这张嘴，累得我跑折了腿。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在苦的背后也有庆幸的时候。其一，毛驴拉碾子省了人力推，我最怕推碾子，推上几圈就头晕了，吐又吐不出心里难受。有时母亲叫我推碾子，我发脾气，宁愿不吃也不推。其二，自留地的粪由毛驴驮，减轻我的负担。手拿小棍，在驴后边，边赶边轻轻地哼着小曲，或背几句《回延安》。短暂的快乐也是幸福，苦中也抓点机会乐呵一下吧！

1963年，国家经济有所好转，毛驴又回归生产队，我初中毕业考上了中专。9月1日，在村东河边，父老乡亲们送我过河，到通县师范念书去。三年后当了人民教师，实现了我的愿望。随着社会的发展，毛驴等大牲畜在京郊成稀罕物了，现在的孩子们只能从影视上见到了。

“跑片”小记

姜玉卉

每当我看到穿流在乡村、社区，印有“数码电影放映流动车”字样的崭新的电影放映车时，不禁赞叹祖国电影事业的飞速发展。

这种流动性的异地放映，与电影院相比，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跑片”。但和我在“文革”初期经历的“跑片”，不能同日而语。

1966年，我在通县师范学校读二年级。5个月的实习工作结束，回到学校待分配。此时，“文革”开始，一切正常的秩序被打乱，毕业分配无期，师生停课，都参加到“文革”运动之中。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八次接见全国来的红卫兵之后，中央文革小组指示将其拍成大型彩色记录片，在全国迅速放映。通县领到一部拷贝，要在三天内组织5万人进城观看。三个场、院共放45场电影。采取“跑片”形式，一部拷贝几乎同时三个场、院放映。

通县造反派总部从通县师范学校找三个学生骑自行车跑片，其中有我。负责人对我们说：这是重要的政治任务，找的都是根红苗正，政治上可靠的人。每天中、晚免费供应每人6两牛肉包子，一瓶汽水。这对于我们连三分钱一根小豆冰棍都舍不得买的穷师范生来说，这伙食水平，简直就是奢侈了。

负责人从邮局找来三辆绿色自行车，车后架上挎一个装邮件的绿色布袋，用来装片盒。我跑的路线是从工人俱乐部电影院到海子公园里的电影院。第二个同学从海子公园电影院到通县剧场。第三人同学从通县剧场到工人俱乐部电影院。每人都是骑10分钟的路程。每个放映点每天上、下午各两场，晚上一场。

“跑片”首先从工人俱乐部电影院开始。当第一合片子放完后，放映员用3分钟将片子倒回，交给我装进邮袋中，我马上骑7分钟送到西海子公园电影院，依次类推，循环传递。

情况是复杂多变的，其中插曲也不少。当我在新华大街向东骑三百米是一个丁字街，有个安全岛，太阳伞下站下交通警。按规则，我应绕过安全岛，向左去西海子公园西门。我为了省力省时间，见没有什么车辆，没绕安全岛，双

脚紧蹬几下，拐向北街。交警大声喊我，见他没追来，不理他，快速骑进西海子公园。海子公园西岸连接东岸是一条多米长、2米宽的水泥板桥，两侧没有栏杆。桥面窄，加上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无法骑车过桥。只好下车推着前进。我推车一路小跑，边跑边手按车铃，嘴上还一个劲地喊：“劳驾，让让！很多人用惊异的眼光看着我。我想，你哪里知道我心急火燎的心情，一点差错影响全局。

当我回返路过安全岛，交警拦我，我忙说明情况。他说，越急越要遵守交通规则，不然会出更大乱子。

跑夜场，过丁字路口时，因自行车没有车灯，交警拦住，要求安装车灯。我和负责人讲了，他找来三个手电筒，每人一个，用绳子捆好挎在腰上，骑到安全岛按亮手电筒。交警让你顺利通行。因为我们三个师范生有强烈的责任心，顺利地完成了三天跑片任务。

1967年11月，中央提出复课闹革命，我们通师66、67两届学生一起分配。我回到自己的家乡——房山县东班各庄公社，在东班各庄中学任教。1971年10月初的一天，公社武装部长告诉我，今天村里演电影，是彩色戏剧片《智取威虎山》。并说早点去看，今夜在东班各庄村、佛子庄村、北窖村连续演三场。政治任务，宣传样板戏。我一听，无独有偶，这与在通县跑片大同小异。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我们的电影事业那些年没有什么发展。农村文化生活匮乏。

晚饭后，我携妻抱女随村民到电影场。突然见到佛子庄村老家的弟弟，我说怎么不在家等着看二场。往返跑16里地不嫌累？他说等不及了，太想看了。

电影散场后，放映员姜玉册、刘存贤立刻将电影设备装入佛子庄村提前来的马车。一个小时后，第二场在佛子庄村小学操场准时上映。弟弟在本村看完第二场后，又去8里地外的北窖村去看第三场，回来天已大亮，连累再困晕头涨脑。

如今，文化生活异彩纷呈。房山区打造文化强区、文化强镇，正在稳步发展。每年近300场的文化广场演出遍布城乡。再加上周末数码电影放映专用流动车，将中外电影大餐呈献给人民。而“跑片”，这一特定历史产物，也就成为记忆了。

我在坨里公社工作的一段经历

高永来

我是中共中央发出文化大革命“五一六”通知后调坨里公社工作的。“文革”的左倾错误，给坨里地区造成的损失是严重的。为使后人汲取教训，我回忆几件事情，说明当时情况。

“拔黑旗”

1966年6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新胜利》。社论说：北京市委的领导贯穿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前北京市委的主要负责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修正主义者。11月28日，江青在首都文艺界大会讲话中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工作取得的成就，把所谓旧中宣部、旧文化部与旧北京市委连在一起加以攻击。

在这样的形势下，坨里公社由于受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影响造反组织纷纷建立起来。他们说：这里的先进单位和个人都是黑旗帜，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模范，必须把黑旗拔掉。这时候，有一些造反组开展了“拔黑旗”活动。坨里公社是受国务院表彰的先进单位。造反派说坨里公社党委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下走资派的堡垒。这个公社有两名北京市全国劳动模范。上万大队党支部书记宋希儒是全国劳模、人大代表。在拔黑旗的运动中，带着严重的肝炎病被打倒两年，大会批斗数次。坨里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华也是全国劳模、政协委员，在运动中含冤去世。在这场所谓的拔黑旗活动中，混淆敌我，混淆是非。给干部群众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削弱了干群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影响生产力发展，使这个地区工、农业生产下降，给广大社员生活带来严重影响。

“全面夺权”

1967年1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

社论说，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从少数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把被篡夺的各种权利统统夺回来，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勇敢的承担起来的战斗任务。

1967年1月28日，房山县农工商联和总部向县委、县政府宣布夺权。2月初，坨里公社造反派大联合夺了公社党、政、财、文大权。随后各大队、企事业单位、商店、学校也都被夺权。各级干部大部分被宣布靠边站，等待接受批判和斗争。当时公社书记、副书记三人中两人被批斗，一人支派去了。主任、副主任四人都被夺权打倒，接受批斗。全社12个村，大部分被夺权。党支部书记、大队长24人中有23人被批斗。当时造反派的口号是：“踢开党委闹革命”。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从此，基层组织受到严重破坏，行政指挥机构严重瘫痪。

斗争“走资派”

1966年12月27日，首都红卫兵造反总部第三司令部在工人体育场召开10万人参加的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大会。1967年7月初，房山县在河南中学召开了批判副市长吴晗、县长曹庶民大会。1967年9月初，房山造反有理总部在东关大操场召开了批判彭真、刘仁、赵凡大会。

在这种形势影响下，1967年9月上旬，坨里地区在在中学操场召开了斗争霍良、曹庶民、张革夫大会，拉开了坨里斗争走资派的序幕。从此斗争会村村开，天天开。公社被打倒的干部今天这村揪走，明天那村批斗，每天多则三场，少则一场。

我当时30岁，任坨里公社主任。因年龄小，家里成份又是贫农出身，就被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给我宣布夺权不罢官，有事要跟造反派商量，不准参加党委会。晚上挂牌挨斗游街，白天摘牌上班工作。当时各村领导班子瘫痪，只能靠基层贫协组织开展工作，工作非常难干。批判我的“问题”主要有四方面：一是批判我唯生产力论。主要表现是天天向生产大队要进度表和按件计酬方法。二是批判我腐蚀贫下中农。其原因是二队队长韩忠家庭人口多，生活困难。11月份，检查生产时，我发现他只穿一条单裤，过几天我从供销社给他买了一条粗布棉裤，送给他穿上，当时他很感谢。造反派知道后，把我揪去开批斗会，叫我交待为什么腐蚀贫下中农。三是我叫坨里四队卖余粮。发言人说：别的队吃反销量，为什么叫我们队卖八千斤余粮，你们不安好心想迫

害我们贫下中农。四是在辛开口村由大联合开批斗会，主要是因为年终决算时，按政策要预留下年生产费。有的村的造反派主张吃光分净，不顾下年春耕生产。公社贫协委员会主席也支持按政策办事，因此把我和贫协主席张玉揪到辛开口村开批斗大会。

“斗、批、改”

《十六条》中提出的斗批改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当时也叫“一斗、二批、三改”。

大批判在坨里公社有几个主要专题：一是批阶级斗争熄灭论，对跟随毛主席搞民主革命和建国后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都说成走资派。两派认识不一致，引起了激烈的两派的派性斗争。二是批“唯生产力论”。只要突出政治积极造反就要计满分。大苑大队组织打草压绿肥按斤计分，多打多计分，少打少计分。有的造反派说：这就是用生产压革命，因此大小队干部被批判多次。三是批入党做官论。坨里公社有 51 个生产队，每年有少数的生产队长撂挑子，当春耕生产到来之前，工作组到个大队扶班子一两个月。他们说：我们春天是红人，夏天是忙人，冬天是罪人。四是在农村大批“小生产”，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取缔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农村经济遭到破坏，农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

成立“革命委员会”

1967 年《红旗杂志》第 5 期传达毛泽东主席“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必须实行革命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

1967 年 10 月 7 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的重要指示》说：“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绝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只要不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解放一批干部，让他们站出来。”

坨里公社干部群众（包括造反派）在学习毛主席指示中，被打倒的大批干部得到解放。个别少数干部经过解放军办学习班，也都恢复工作。1968 年 2 月 13 日，房山县成立革命委员会。2 月 15 日，坨里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不

到一个月时间各大队、单位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也都建立起来。从此坨里公社各级革命委员会，在一边肃清派性影响。一边进行了抓革命促生产等各项工作。

抓革命、促生产

早在1966年12月9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由于“四人帮”干扰夺权和领导干部靠边站，这个规定根本没有执行。

1967年2月末，北京市“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成立。北京卫戍区的刘少文、张益三主持工作。3月25日，市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召开生产会议。会议要各地依靠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坚决贯彻“抓革命、促生产”方针，在农业生产上打好几个战役。这次会后，1967年2月上旬房山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成立。这个小组任务明确是研究安排，工农业生产和解决生产中出现的問題。

在房山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要求下，1967年4月15日坨里公社“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成立。10月19日，《人民日报》传达毛主席指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备战。12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今冬明春农村基层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中说：生产队一般不搞夺权。广大基层干部、群众，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精神。坨里公社文化大革命中顶着压力和干扰办了几件事。

一是发展沙窝、大苑、马家沟三个村粮食产区，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平地、打井、建设高产农田。确定坨里三、五队为重点，发展蔬菜基地。保证房山矿、水峪化工厂、工人及家属用蔬菜供应。在半山区上万、北车营等大队发展果树。上万村以苹果、扁桃为主；北车营以京白梨、小枣等为主，保证北京的市场供应，几年后已成规模。

二是由于计划经济当时社员烧煤困难。不少人到房山矿拾煤。每年都有人被砸伤，时常与矿上发生矛盾。为解决百姓之难，用一年时间，生产队调人集资，建成南观煤矿，缓解了烧煤紧张。

三是努力解决边远山村用电问题，重点是北大洼通电的问题。这个生产队距离北车营大队有十多里山路不通马车。所有架电设备都要靠人抬上山。通过全村人的努力，在北京化工厂帮助下一个半月完成任务。北大洼人历史第一次见

到电灯时，不禁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四是修筑一条山地公路，解决了北车营村历史出行难的问题。这个村主产水果京白梨，运输量很大。出行只能走河滩。大雨而后涨水，人畜不能出行。大队长刘振带队修出一条北车营到辛开口的山地公路，长达十里之余，给这个大队发展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

人民的胜利

1975年5月29日，邓小平提出要与左倾错误作斗争。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果断措施，粉碎了江青反党集团。消息传开，举国欢腾。

1976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社论说：“粉碎这个反党集团，为党锄奸，为国除害，为民平愤，党心大快，军心大快，民心大快。”

总结文化大革命血的教训，我从正反面受到很大教育，使我终身难忘。我的体会是：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过程中会犯错，自身能认识错误，能改正错误。人民真正是历史的创造者，无论什么困难、多大的困难在共产党领导下都能战胜。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坚持法制，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

1983年“严打”斗争琐忆

宋 湘

—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十年内乱”的后遗症之一就是滋生了一大批打砸抢分子、抢劫犯、杀人犯、盗窃犯和流氓团伙。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各条战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在的大好形势下，社会治安状况却异常严峻。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全国连续发生许多影响极坏的恶性案件。

1979年9月9日，上海市控灌路江浦路口，值勤交警在制止一青年抢夺一农民出售的螃蟹时，引起群众围观。一些人乘机兴风作浪，攻击民警，阻拦汽车，砸自行车，向公共汽车投掷石块，阻拦、推翻农民的菜车，抢掠过路群众的手表、皮包。情况失控达5个半小时。

1980年10月29日下午，北京火车站二楼南走廊突然发生爆炸，当场死1人，伤89人，抢救中又陆续死9人。

1982年1月10日，北京某出租汽车公司女司机姚锦云，驾车闯入天安门广场，在人群中横冲直撞，最后冲向天安门前的金水桥，当场撞死5人，撞伤19人，撞坏金水桥栏板。

1983年2月，杀人越货的王宗玮兄弟二人，从东北抢枪、抢劫、杀人后窜到南方骚扰，成为当时震惊全国的“二王事件”。

许多地方公共场所秩序混乱，妇女上下夜班要有人接送，父母时刻牵挂在外的儿女，广大群众失去安全感。

房山县也不例外。当时连续多年每逢重大节日特别是春节前都发生杀人案。群众愤慨地说：“不杀人过不了年，这成了什么世道！”全国社会治安出现了“坏人神气，好人受气，干警憋气”的局面，严重扰乱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二

党和政府一直十分关注社会治安状况。针对社会转型初期出现的犯罪高峰，1979年11月22日至26日，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彭真召开了全国城市治安会议，首次提出对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爆炸和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罪犯（即“六类”案件）实行依法从重从快打击，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思路。1981年5月，彭真又召开了北京、上海等5大城市治安座谈会，再次提出“对恶性案件现行犯，必须依法从重从快处理”的意见。

但是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长的势头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1983年7月19日，邓小平同彭真谈话说：“主要是下不了手，对犯罪分子打击不严，不快，判得很轻。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我们说过不搞运动，但集中打击刑事犯罪活动还必须发动群众。”当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传达讨论了邓小平讲话。

1983年8月初，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了邓小平同志讲话精神。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由此，严厉打击社会治安领域犯罪活动的斗争（简称“严打”）在全国启动，全国由此进入以“严打”作为对社会治安进行法律控制和政治控制的重要时期。

三

笔者当时任房山县人民法院副院长，亲历了房山县1983年开始的“严打”斗争。

1983年7月20日下午和7月26日下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先后召开各区（县）法院院长、副院长及市院庭、处长会议和各区（县）法院刑庭助理审判员以上干部会议，传达邓小平同志讲话及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会议精神，要求迅速行动，认真贯彻落实。

8月4日晚，房山县委召开政法四机关（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司法局）副职以上干部会议，部署了县委党委会议关于开展“严打”行动方案：

成立县委“严打”领导小组。组长：县委书记李永芳；副组长：县委副书记

记、政法委书记王俊起。成员：县委常委、武装部长何培康，县委顾问、原县委副书记姜永刚，副县长高海量，人大主任张成基，政法委副书记宿廷增，公安局长李芳，检察长梁志芳，法院院长李忠孝，司法局长范永权。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即县委政法委），宿廷增兼办公室主任。此后，随着人员的调动，领导小组成员也不断进行调整。

初步确定三年内打三次战役，从现在起至春节前为第一战役第一仗。

8月6日晚，统一行动，撒第一网，要抓紧准备，确保初战获胜。第一网的对象确定抓“十种人”：（1）流氓团伙头子；（2）流窜作案分子；（3）杀人犯、放火犯、爆炸犯、投毒犯、强奸犯、抢劫犯和重大盗窃犯等七类严重现行犯；（4）为非作歹，横行霸道，欺压群众，为害一方，新的“东霸天”、“西霸天”；（5）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携带凶器，行凶杀人，污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严重破坏公共秩序，情节严重的犯罪分子；（6）拐卖妇女、儿童的人贩子，组织卖淫团伙的首犯和骨干分子，制造、贩卖、组织、传播淫秽物品的首要犯罪分子；（7）有现行活动的反动会道门的骨干分子；（8）逃跑的劳改犯、劳教人员，重新犯罪的劳改释放分子和解除劳教人员，以及其他通缉在案的人员；（9）制造、抢夺、盗窃枪支弹药的犯罪分子；（10）书写反革命标语、传单、挂勾信、匿名信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包括有现行破坏活动的林彪、“四人帮”残余分子。

据县公安局初步摸底，当时全县有犯罪团体73个，320多人，加上个人单独作案的100多人，列入视线的约500多人。8月底、9月初，县委连续两次召开县直机关及乡（镇）领导干部动员大会，部署“严打”工作。党委领导下的群众性的“严打”斗争由此在全县轰轰烈烈地展开。

四

房山县人民法院紧急动员起来，投入“严打”斗争。

首先组织全体干警认真学习、领会中央关于“严打”的指示，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

组织上采取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做法。随着公安撒网抓捕、预审，检察院审查起诉，大量案件涌向法院。9月初和12月初，法院两次调整力量（86人），直接投入“严打”，支撑民庭、经济庭、各法庭民事审判工作的只剩十几个人。行政后勤人员在完成本职工作同时，也分担了一定数量的刑事案件

的审判任务。

鉴于“严打”任务繁重，干警力量不足，县委出面向驻县中央、市属单位及部队请求支援政法机关，先后给法院抽调来 26 位同志参与“严打”，7 个中央、市属单位轮流派车辆到法院值班。

全体干警发扬艰苦奋斗，连续作战的作风。较长时间里大家自觉放弃星期天，节假日，加班加点，常常是通宵达旦地工作。

政法机关既各司其职，又联合办案。“三员”（预审员、检察员、审判员）联合，分案对口。对于重大案件，检察员、审判员提前介入，在公安局预审阶段即提前阅卷，共同研究，及时补充证据，避免起诉后再退回补充侦查而延误时间。案件起诉到法院后，法院立即依照法定程序迅速审判。如 9 月 4 日晚，县菜蔬公司职工张××将本单位女工蔡××杀死，9 月 5 日公安局破案，将张犯抓获。法院院长闻讯立即带领审判人员查看现场，到公安局阅卷，了解案情。9 月 9 日检察院起诉时，法院已做好开庭审判的准备工作，当天即向被告人送达起诉书，9 月 10 日就开庭审理，当庭宣判死刑，上报市院审批。

专门机关与广大群众相结合，是政法工作的根本路线；“严打”是一场群众斗争，必须深入群众，依靠群众。7 月 21 日，石××兄弟三人因无故伤害一名群众被公安机关传讯，石××兄弟三人抗拒拘传，妨害公务。石××更用镰刀当场行凶，杀伤公安干警。案件起诉到法院后，法院由一名副院长带领审判人员 11 人深入到村，发动群众检举揭发，调查群众 128 人次，取得证据材料 382 页，终于查清：石××之父石×，依仗村治保主任职权，父子 4 人横行乡里，欺压群众，先后毒打无辜群众十余人，作恶多端，群众称之为该村的“一霸三害”。公安机关立即逮捕了石×，将父子 4 人并案起诉。审理后判处石××死刑（上报市院审批），判处石×20 年徒刑，石家另两兄弟也被判处了长期徒刑。

广泛深入开展法制宣传，造成“严打”的强大声势和震慑力量。从 8 月 6 日到国庆节，公安机关两次撒网共抓获 433 人，其中打掉团伙 27 个，团伙成员 132 人，加上看守所原已羁押人员，在押犯已达 570 多人，看守所已经爆满。经协商，借用燕山分局看守所代押几十人。这两次撒网在社会上引起强烈震动，受到广大群众热烈拥护。春节前“消化”掉这几百案件成了法院工作的中心。

经过紧张准备，10 月 22 日和 1984 年 1 月 7 日，先后两次在城关和良乡召开了全县规模的宣判大会，参加大会群众 5 万多人，共宣判了 14 案 26 犯，其中执行死刑 8 人。从 8 月至年底，还组织中小型宣判会 34 次，宣判 60 案

85 犯，参加宣判会群众 54000 多人。

1983 年 8 月开始的“严打”斗争，对改善社会治安状况产生了明显效果。从全县看，治安秩序初步好转，改变了政法机关软弱无力的形象，广大群众扬眉吐气，拍手称快。1984 年 1 月 7 日良乡宣判大会上，一位村干部当场赋诗：“扫邪风，除恶魔，申张正义；砍敌头，破贼胆，大快人心”。坨里村一位干部说：“每年大秋我们昼夜巡逻都不行，今年大秋我们连护秋的都派，也没发生盗窃等刑事案件”。

五

早在 1981 年，中央就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思路，而“严打”是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1983 年 8 月至 1984 年 7 月，1984 年 8 月至 1985 年 12 月，1986 年 4 月至 1986 年 10 月，是上世纪 80 年代第一次“严打”的三大战役。

1996 年 4 月至 1997 年 2 月，全国进行了第二次“严打”，打击重点为杀人、抢劫、强奸等严重暴力犯罪、流氓犯罪、涉抢犯罪、毒品犯罪、流氓恶势力犯罪及黑社会性质的犯罪。

2001 年 4 月至 2002 年底，全国开展了以“打黑除恶”为龙头的第三次“严打”。“严打”斗争意义深远，就其指导思想、气势、规模、效果等方面来说，是继 1950 年至 1952 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又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

改革开放初期的区总工会

区总工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点，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使中国从此走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上来，三中全会的召开从此也掀开了工会工作的新篇章。回顾房山区总工会从改革开放之初到现在充满创新和挑战的三十年发展历程，在房山区委和北京市总工会的领导下，工会工作一直同本地区的整个改革和建设事业紧密结合，并随着不断发展而前进。

本地区工会组织是在1958年4月房山县、良乡县合并为周口店区后而建立周口店区总工会。1960年1月周口店区更名为房山县后改称房山县总工会。1966年5月“文革”开始，工会组织瘫痪，直至1984年3月房山县第四次职工代表大会召开，工会组织完全恢复正常工作。1987年房山县改区后成立房山区总工会至今，期间召开了四次职工代表大会。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本地区工会组织在坚持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主线的基础上，根据党在各重要时期的方针、政策的调整，以及社会发展形势和时代变化的新要求，主要经历了拨乱反正，组织恢复；全面履职，深化改革；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落实科学发展观，迎接新挑战四个重要发展阶段。本文重点记述一下前两个阶段（1978年—1992年），即改革开放初期区总工会的发展历史。

拨乱反正 恢复组织

文革开始后，本地区的工会组织同全国工会组织一样遭受了一场空前浩劫，工会工作基本停止。1973年4月，召开了房山县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但工会组织没有得到彻底恢复，只是重新建立了工会组织，工会工作也未能真正充分履行。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1979年10月全国

工会（以下称“全总”）九届执委第二次（扩大）会议的召开为本地区工会组织的恢复，工会工作的正常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也是工会工作拨乱反正的开始。截至1984年3月，本地区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工会组织、工会干部配备、工会工作的开展才开始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肃清流毒，统一思想。在全总九大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发表了致词，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破坏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罪行，指明了中国工人阶级新的历史使命，本地区工会干部和企事业单位职工群众，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认真学习党的有关文件，学习邓小平同志在工会“九大”上的致词，回顾工会工作和工人运动的光辉历史，进一步认清林彪、四人帮破坏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实质，使干部职工分清是非，增强团结，提高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端正工会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而把工会干部和职工的思想统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上来。

邓小平同志在全总九大致词中指出：“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是我国工人阶级新的伟大历史使命和新时期工人运动的主要任务”。在全总“十大”上确定的工会工作方针也明确要求：以四化建设为中心……建设一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职工队伍，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主力军作用。由于受文革的严重影响，本地区职工的综合素质急需得到提高，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职工投身于四化建设当中去，真正肩负起主力军的责任，各级工会组织同企事业单位的党政组织密切配合，在职工中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教育；开展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活动。针对职工的思想实质，加强了日常的政治思想工作，比如：工交财贸系统开展的“工人阶级历史使命”、“团结一致干四化”的教育、“社会主义商业道德教育”；文教卫生系统开展的“师德教育”、“庆教龄活动”、“医德教育”等；还在广大职工中普遍开展了“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各企事业单位根据本行业的特点，把共产主义的理想、道德同职业责任、职业道德、职业纪律结合起来，理论联系实际，把各项活动的开展变成自我教育的过程，极大的激发了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使得各条战线面貌一新，生产形势明显好转，服务质量日益提高，各行各业呈现出文明生产、积极工作、团结一致，大干四化的新景象。

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全总九届二次执委扩大会明确提出：“工会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进一步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以高产、优质、多品种、低消耗和安全生产为主要内容的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本地区各级工会组织按

照这一要求，广泛发动职工群众，发扬工人阶级主人翁精神，积极参加企业整顿和经济体制改革，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以“五好企业”、“六好职工”为内容的比、学、赶、帮、超的劳动竞赛活动，并把劳动竞赛同提高经济效益密切联系起来。工交战线的职工以“小指标，百分赛”、“提高质量素质”为竞赛内容，努力降低消耗，增加花色品种，多产优质产品；财贸战线的职工，根据行业多，网点分散的特点，开展了“对口赛”、“对手赛”，以文明经商，优质服务为目标，利民便民，促进城乡物资交流，保障供应，繁荣本地区的经济；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系统的职工，在培育四化建设人才，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活跃职工群众文化生活，增强人民体质等方面做出了优异的成绩。

关心职工生活。全总“九大”结束后，维护职工的切身利益，解决职工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而又能解决的问题是工会组织在恢复工作后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主要有：一是开展各企业之间的职工食堂竞赛通过检查评比，选树标兵，炊具革新，技术表演，使职工食堂在卫生环境、服务态度及饭菜质量、花样各方面都有了明显改善。二是会同有关部门进行安全生产大检查，宣传有关劳动保护政策和各项法规，普及安全生产和工业卫生科技知识，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三是积极组织开展职工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在企业内部，企业与企业之间举办各种体育比赛，文艺演出活动极大的丰富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由于各级工会组织在关心职工群众生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从而密切了党群关系和工会与职工的关系，使工会组织成为职工信任的组织，有力的推动了本地区经济的发展。

取得的主要成绩。一是工会组织得到发展，会员队伍得到扩大。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全总“九大”、“十大”的召开，工会组织得到恢复，本地区的工会组织在党政的领导和支持下也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恢复，1979年，本地区的教育、卫生两大系统恢复了工会组织，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使广大教师和医务工作者又回到工人阶级队伍中来，使工会组织得到发展壮大，截至1983年底，基层工会组织发展到259个，会员28121人。二是职工思想得到统一，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初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根本转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深入人心，有本地区党的正确领导和政府的支持，有北京市总工会（以下称“市总”）的正确指导，有各级工会组织的努力工作，有各企事业单位和广大职工的积极配合，职工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了希望，调动起了职工的满腔热情，立足岗位比贡献，以1983年为例，全县职工创造的产值，占全县总产值的54.2%，

显示了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三是职工权益得到重视，民主管理得到提倡。1981年，国务院转发《国营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得到了本地区各级党委的高度重视，各级工会组织按照要求制定实施细则，规划具体方案，截至1982年，本地区应建制的141个企业单位全部建立了职工代表大会，受到职工的热烈拥护。

坚持改革开放，深化改革

随着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和1988年10月全总十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工会拨乱反正的全面完成，工会工作进入正确发展阶段。1987年房山县改区后，于11月召开了区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听取了题为《全区职工团结起来，发挥工人阶级主人翁精神，为深化改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房山而奋斗》的报告，确立了工会工作总的指导思想：以党的十三大和全总十一大精神为指导，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立足全局，促进全面深化改革，动员和组织全区广大职工为本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精神文明建设做贡献。使工会组织的社会影响力逐步扩大，工会地位明显提高，工会作用得到较好的发挥。

工会组织的影响力得到提高。1989年12月，中央下发了《关于加强和改善对工会、共青团、妇联工作的通知》，全总也下发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善对工会、共青团、妇联工作的通知》的意见，对新时期工会的性质、地位、作用和任务作了深刻的阐述，明确了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是我国重要的社会政治团体的性质。区委主要领导高度重视，组织区委常委和有关负责人认真学习讨论，结合本地区的实际下发了具体的实施意见，各委局、公司也相继制定了贯彻落实的办法，因此，有力的推动了工会工作的开展。

一是工会社会地位明显提高。区委自1987年以来，针对工会组织的建设下发了一系列文件，对工会干部的政治、经济待遇、任免审批，管理等做了明确规定，1991年根据市委组织部8号文件精神区委调配了同级党政副职级待遇的干部担任工会主席，区委常委会每年定期研究工会工作和听取工会工作汇报。区人大、区政协也都加强了对工会工作的支持，有关会议都邀请工会参加并发表意见和建议。区政府确定一名副区长负责联系区工会工作。

二是职工的政治觉悟得到提高。由于广大职工的国家主人翁地位得到尊

重，合法权益得到了相应的维护，极大的激发了他们的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增强了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显现了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在 1989 年春夏之交发生在北京动乱期间，广大职工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守岗位，坚持生产。1991 年我国南方部分地区遭受特大洪灾，职工们积极响应号召，自愿捐款捐物，其中捐款 73.9 万元，粮票 3.7 万斤。充分体现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情和政治思想觉悟。

三是工会组织作用得到较好发挥。全总十一大明确提出了工会组织的四项职能：“维护、建设、参与、教育”。工会工作领域进一步拓宽，内容更加丰富，通过对职工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和业务技术培训，使工会在维护本地区社会稳定、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维护职工权益，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开展爱国立功竞赛活动。全总十一大的召开，工会组织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要从长期习惯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工会工作，转变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工会工作，工会组织就必须团结广大职工肩负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使命。为吸引职工群众参加改革，努力完成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任务，不辱使命，本区工会积极动员和组织职工开展了多种形式爱国立功竞赛活动，从 1988 年起先后开展了“夺回损失”、“迎亚运，创一流，增效益”、“革新，献计，创效益”等活动。到 1991 年底，全区职工共提合理化建议 14561 条，技术革新 140 项，共创效益 1800 余万元，先后涌现出市级标兵 392 人次，市级班组 20 个，有 10 人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1 人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3 人获得首都劳动奖章。

民主管理得到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增强企业活力，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按照市总的要求，本区工会组织要支持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承包制，保证厂长（经理）行使指挥生产和经营管理的职权，同时必须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各项民主管理制度，充分发挥工会组织和职工代表在审议企业重要决策、监督行政领导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等方面的权利和作用，确保企业领导者的权威与职工主人翁地位的统一，这样就加大了工会特别是企业工会的责任，本区工会不断加强宣传力度，组织干部深入企业具体指导，使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在各企事业单位得到全面推行。截至 1991 年底，全区有 315 个基层企事业单位建立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占应建制单位总数的 78.75%，自 1987 年之 1991 年共召开职代会 1642 次。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不断建立健全，使职代会各项职权基本形成程序化、制度化，形成了职工代表

积极主动参与企业民主管理，为企业的发展见言献策，在职工心中牢牢树立起“厂兴我容、厂衰我耻”的观念，职工代表及职工的建议和意见逐步成为企业决策的基础和依据。在此期间，各企业共提出经职代会审议的各种议案有 2924 件，经职代会审议或决议的议案有 2269 件，被职代会审议后，否决或建议撤销的有 482 件。同时各企业也做到了向职工“四个交底”：把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向职工交底；把企业的发展方向向职工交低；把企业的经营目标向职工交底；把企业面临的困难向职工交底。

工会事业的发展。一是各级工会以增强基础活力为重点，提高工会整体工作水平。通过建立“职工之家”活动，使工会组织与职工的联系进一步紧密，增强了工会组织活力。截至 1992 年底，本区有 69.5% 的基层工会建成“合格职工之家”，其中先进职工之家 47 个，模范职工之家 2 个。二是建立工人俱乐部，活跃职工业余文化生活。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引导、教育职工开展健康向上的活动，树立起正确地人生观、价值观，以饱满的精神，昂扬的斗志投入到生产建设当中，本区工会在市总、区委、区政府及各委局公司的大力支持下于 1988 年建成了房山工人俱乐部，为职工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搭建起了一个平台。三是女职工保护工作有了组织保障。女职工是工人阶级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保护女职工的各项特殊权益历来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颁发了《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工会组织为了更好的维护其权益，按照市总的要求于 1992 年区工会成立了女职工委员会，使女职工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娘家”。四是本区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1992 年 3 月，本区工会第二届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以刘国连为主席的第二届工会委员会，明确了在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全区工会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工作任务即：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认真履行工会组织的四项社会职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好的表达和维护职工的合法利益，稳定大局，为实现房山各项经济指标努力工作。

用鲜血和生命捍卫“钢铁走廊”

李振斌 口述 苏维斌 整理

1942年12月，中央军委、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调罗贵波同志去晋西北第八分区任司令员，主持晋西北的全面工作，我也随他到了八分区。该分区在晋绥边区，是处在日伪军四面包围、封锁的一块根据地。它包括三大地区：一是山区根据地，二是边山游击区，三是晋中平川敌占区。山区根据地地广人稀，经济和文化落后，交通不便，人民生活非常困难，但是群众基础很好。边山游击区各方面条件稍好，但不如平川。平川敌占区同蒲铁路、太汾公路、汾河由北向南横贯晋中，是我党中央从延安通往各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要道和必经之路。作为战略要地，日伪军驻有重兵，据点林立，我们开展工作的难度很大。

当时，对敌斗争的环境异常艰苦。党中央派往晋、冀、鲁、豫、华东、华中等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各解放区的领导干部、党的“七大”代表要去参加党的“七大”，参加党的整风运动，汇报工作等都要经过八分区，因而接送干部就成了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出色完成任务，我分区的党政军民、交通员认真负责，精心安排，密切配合，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筑起了一道“钢铁走廊”。

因敌人早已发现了我们这条交通线，他们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破坏、包围封锁。特别是在1941年开始的“蚕食”和“三光”政策，致使我区财政经济非常困难。但是不管困难有多大，我们也要把党交给的接送任务完成好。当敌人得知我们要通过时，他们的警戒搜查的就更严了。路口被封、必经之路设下埋伏，经常发生意想不到的情况。迫使我们不得不改变行动计划，有时候还必须在敌占区隐蔽住宿。全程一百四五十里的接送路程，有七八十里路处在敌占区，而且全是步行，要绕过障碍，走过崎岖的小路。护送延安过来的同志通常从临县出发，夜间通过封锁线，进到八分区的边山停留几天，等到摸清平川敌情与东山接应人联络好，夜间通过封锁线。每次都需要一整夜的急行军，还必须行动迅速秘密，避开敌人的巡逻队及其设置的埋伏，躲过探照灯，爬过封锁线，拂晓前到达东山。去延安的一般从东山过来，通常在黄昏前后到达太汾公路以西接应。有时候经双方商量也在汾河两岸交接。在接送中，我们想出了很

多好方法，使敌人难以捉摸，尽量不被敌人发现或是发现后已经晚了，有时发现了也阻挡不住，有时我们迂回穿插在据点与据点中间，碉堡与碉堡之间，成千上百次地成功通过。

根据当时沿线的敌我情况，接送方式也根据具体情况而灵活多变。一是公开的武装接送。二是秘密化装接送，主要以夜间通过为主，由交通队负责，重要任务就派主力部队。每条交通线都有二三十人组成的交通队，队员全配有长短枪。这些同志都是政治可靠、机智勇敢、身强力壮、工作积极负责、熟悉周边敌情和地理、群众关系好的同志。在每条交通线上都有我们的地下党设置的秘密交通站，他们主要任务是了解敌情变化，为过往干部提供食宿，帮助隐蔽和办理“合法手续”。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接送，都离不开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的积极协助。他们协助制订接送计划，侦察敌情，充当向导，没有他们的大力协助和密切配合，要完成领导交给我们的接送任务是相当困难的。

1942年11月，刘少奇同志从华中地区返回延安，经过太丘区，由洪、赵支队武装接送到平介县。时至晚秋，没有青纱帐的掩护，只得夜间赶路，但是一夜又过不去，必须在敌占区停留一天。平介县虽然处于敌占区，但是群众基础很好，因此改由交通队秘密护送。平介县委事先检查了沿途的情报站和宿营地的安全，在同蒲铁路和汾河渡口安排了接送人员，沿途布置了群众和武装监视敌情，在朦胧的夜色中，护送少奇同志躲开敌人的巡逻队，到达文水县徐家镇的汾河渡口。渡口不大，是我们的一个交通站，因这里早已引起敌人的注意，一到黑夜敌人就把船只拉走了。为了完成这一任务，群众借过河给敌人“送粮”骗来了船只，送少奇同志顺利地渡过了汾河，在河东任庄住下。任庄四周全是敌人的据点，天亮后各据点的敌人都接到群众送来的“平安无事”的情报。而地方党委和群众早已在门前、屋顶布上了岗哨，有的扛上了农具伪装下地干活，有的装成放羊，一旦发现敌情，农夫就用铲子扬土，牧羊人就高唱山歌，放哨的就高喊自己小孩的名字或追鸡打狗用以报告敌情。为封锁消息，群众们主动不出村，探亲的也主动在任庄住下。少奇同志在任庄安全地住了一宿，傍晚时刻继续向文水边山进发，走到苏家堡时，不见与接应部队联系的交通员归来，就在一座荒凉的古庙旁等候。突然，侦察员报告前方上贤村一带似有敌人埋伏，护送人员犹豫了，用寻问的眼光看着少奇同志。他沉着而又诙谐地说：“我不早就说了嘛，完全听从你们地安排。既然没有与接应部队联系上，我看可以返回任庄再住上一天，那里的群众基础好。”第二天傍晚，这一行人又从任庄出发，轻装上阵，不走大路，顺着敌据点的田间小路步行了六十多里，越过太汾

公路，到达了文水县崖头村，由三分区接送经兴县前往延安。

我们还利用“合法”的身份化装后，白天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但事先必须考虑到中途会遇到什么问题，如何去应对以防万一。1944年2月，接应陈毅同志去延安的时候，原定的路线发生敌情，必须绕道群众基础较好的云周西村住宿一夜。不料水城下曲镇的敌人出动了，目标像是来这一带进行扫荡。这样的话，我们必须在天黑前敌军赶到这里之前出发，陈毅同志同护送队员一见面就说：“从现在开始，我该由你们负责了。”此时他一改从前的绅士打扮，脱掉了长衫，换上了山西农民经常穿的一件旧棉袄，头上包了一块羊肚毛巾，躺在马车上面装作病人，云周西村的党支部书记装成陈毅同志的儿子，对外称送父亲到城里面看病。警卫员也扮作农民模样坐在车上，交通员们化整为零分散在车的前后保护。为应急，陈毅同志还学了一阵子的山西话，但是怎么学也不像，最后只能装睡，遇上敌人盘问就哼哼呀呀装哑吧。就这样，一行人过了太汾公路，到达了下沙石兵站后，罗贵波司令员率部前往迎接，把他接到了关头村停留三天。这时，司令员考虑到陈毅路过我们这里，应当好好地招待一下，可又没有什么好吃的，就让我通知管理科到老百姓的家中买只鸡。由于日寇经常扫荡，把鸡鸭什么的都抢光了，怎么也买不到，最后经过多方联系终于买到了一只，可这时陈毅同志已经走了，也没有吃上这顿鸡肉。对此，罗贵波非常遗憾，后来又把这只鸡退给了老百姓。

陈毅在这里停留时，曾作七律一首：

《过汾河平原》

饮马汾河蜀客忙，悠悠河水诉兴亡。
霸图衰歇三分晋，块土开基一统唐。
屡沦夷狄空形胜，豪夺人民腐稻粱。
丘貉古今同一慨，曳兵弃甲暗投降。

1943年9月，彭德怀、刘伯承等领导同志一行二十多人到延安，由我八分区和二分区两家交通队共同接送。在清源县长头汾河渡口，当地党组织和群众早已经为他们准备了仅有的一条能载七八个人的小木船，掩护首长乘船。他们从清源和枣元头两据点之间下固驿村通过太汾公路，一口气走了六七十里路的夜路，拂晓到达清源边山。正准备休息的时候，忽听到西边山坳里响起了枪声，而且越来越密。不久，得到报告说，清源城有四、五百敌人正向我方向开来。这一下，护送人员们非常紧张，刘伯承笑着说：“莫来头，不要那么紧张嘛？打不赢就走之嘛。”彭总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后说，看来敌人不是朝着我们来的。

果然不出所料，前来接应的游击队四大队汇报说：“刚才这股草庄头据点的敌人，是刚刚被我们挤掉后，企图前来报复的，在途中与我们交上了火，已经被我们击退了。”沿途，彭总和刘帅询问了草庄头的战斗情况，八分区部队的情况，开展对敌斗争如何“挤掉”敌人的情况以及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情况等。当晚住在下沙石兵站。军分区副参谋长吕怀忠率部迎接并将刚才发生战斗的过程向领导作了汇报。彭总当场表扬了作战部队并说：“你们战前准备工作做得很好，经过了精心的组织计划，集中了优势兵力对付敌人，部署的也很好。”刘帅补充说：“还有一条就是里应外合”。

到了兴县，彭德怀指示晋绥军区把“挤掉”敌人的草庄头战斗作为典型战例通报全军。鉴于八分区部队少、战斗任务和接送任务重，他又建议中央军委增派部队。不久，中央军委指示晋绥军区从冀中过来的部队中抽调两个团到八分区，这项举措大大的加强了我区的军事力量，对今后开展更有力的对敌斗争打下了基础。再一个是化装后利用“合法”的身份接送。并通过内线关系搞到了一批敌占区的居民身份证，为此仿造了钢印模子和制作身份证的照相器材等。有个“合法”的证件，就可以更好地对付敌人了。如有的打扮成商人、农民、学者模样，有的打扮成敌伪组织的雇员、公务员等。化装后，由交通员护送，买票上车。通常等火车开走后，任务才算完成，特殊情况派人护送到目的地。“七大”闭幕后，我们委托太原日本宪兵队任职的我地下交通员护送由延安到东北的夫妇二人，在太古赶火车时受到日本宪兵的盘查。他机智地把敌人应付了过去，雇了一辆轿车将他们送上了火车并陪送到北平市，确认他们安全到达东北之后，交通员才返回山西。

公开地武装接送规模有大有小。接应彭真、聂荣臻、程子华去延安和送延安抗大总校、陕公、鲁艺的师生去华北、苏北、山东等地时候，就是采用地大规模公开武装接送。而给 120 师部队护送弹药物资的时候，更是一次较大规模地武装接送。这几次都是通过平川敌占区从北丘区接过来或是送往北丘区的。

规模最大的一次是武装接送八路军总部炮兵团。1941 年春，蒋介石调集胡宗南十万大军包围我陕甘宁边区，战斗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炮兵团奉命调回陕甘宁边区。太行派出两个团，罗贵波率领三个团，此外还有交、清、太等县的游击大队配合负责接应。这天炮兵团在团长武亭（曾参加过我国革命战争和红军长征的一位朝鲜同志）率领下，从辽县出发，经榆次、太古边山进入晋中平原。在当晚冒着春寒通过同蒲铁路，拂晓前后涉过了汾河，这一支威武雄壮的队伍，在行军中不见首尾，上百匹骡马驮着数十门大炮和大量辎重，宛如

一条从天而降的巨龙，撞开了敌人的封锁线，穿过了敌占区。

由接送双方事先均派出侦察部队，对行军路线、沿途敌情变化进行周密侦察，派出预伏部队，对据点敌人施行封锁性警告，部队行动秘密迅速，直到天亮我军越过太汾公路，敌人才发觉。他们在震惊之余，一时又摸不清我军意图，不敢轻举妄动。后来，虽然数次出来阻截，都遭到了我预伏部队地坚决打击。

炮兵团到达清、太、徐边山后，由 120 师特务团护送经交城、方山、临县西渡黄河，胜利地回到了陕甘宁边区。

我们开辟的这条“钢铁走廊”共安全接送了数以万计的干部（不包括成建制的部队），七、八年来，平均每月完成接送任务十几至二十多次。成功接送的党中央高级领导有：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刘伯承、陈毅、罗荣桓、徐向前、彭真、杨尚昆、罗瑞卿、陈赓、薄一波、陆定一、程子华、蔡畅、徐特立等，还接送了一大批抗日团体，联大、抗大、陕公、鲁艺等校师生，朝鲜独立同盟、美军联络组、日军工农校等国际友好团体及民主人士。除此以外，还接送了大量重要文件、枪炮弹药、医疗器械、电讯器材等军需物品。

在捍卫这条“钢铁走廊”的过程中，我们的地下交通员、八路军和游击队的指战员，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常年风餐露宿，跋山涉水，年复一年，不辞辛劳，不怕牺牲。在日军搜查时，一位群众把我们的干部作为“儿子”送到了儿媳房中蒙骗敌人。敌人搜不到就滥施淫威，这名群众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宁死不屈。太原县南马林村村长王亚斋为了掩护一批新四军干部，遭到日伪军拘捕毒打，家里的六间房子全部被烧毁。马二则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宁死也不说出干部的隐藏地点。清太徐游击四大队二连副连长贾续同与一个班的战士在阻击敌人时候，光荣牺牲，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这条“钢铁走廊”。

戳穿国民党反动派的谎言

李振斌 口述 苏维斌 整理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进行了第二次合作，从此抗日统一战线形成。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在“二曲线救国”和“攘外必先安内”错误政策地指导下，经常挑起事端，制造摩擦，国民党军队面对日本强敌手足无措，节节败退，甚至望风溃逃。我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抗击着百分之五十的日军和百分之九十五的伪军，在这样艰苦复杂的形势下，由于我党正确领导和我全体军民奋起反抗，同仇敌忾，抗日战争总的形势是比较好的，并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我抗日根据地一天天扩大。

1944年，我正在晋绥军区第八分区跟随三五八旅司令员罗贵波做保卫工作。这一年是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侵华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向我解放区继续大举进攻。这时的国民党政府在大后方施行新闻封锁，掩盖事实真相，蒙蔽全中国、全世界人民的眼睛，使很多同胞和外国人根本不知道实情。他们听到的全是“共产党不抗日”、“八路军游而不击”等欺骗性宣传。

当时，驻重庆的一些中外记者虽然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获得了一些真实情况，也是将信将疑。他们想到我抗日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获得第一手材料。因此，他们多次向国民党当局提出采访要求，但都遭到了拒绝。后来国民党当局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同意这些记者要求，指派员组成二十一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我抗日根据地参观采访。他们从重庆启程，先到西安和山西吉县克难坡阎锡山的驻地采访，在那里听到的还是造谣欺骗。6月9日，采访团抵达延安，开始了为期两个多月地采访，受到了毛主席地接见和边区军民的热烈欢迎。8月20日，参观团部分成员来到我晋绥边区党政机关所在地——山西兴县。为满足他们想亲眼看看我根据地军民实地作战的要求，晋绥分局、晋绥军区把这一个任务交给八分区。接到这个重要任务后，从领导到一般干部一致表示不管遇到多大困难、一定要把这个任务完成好。9月6日，《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以及《同盟劳动新闻》的记者爱泼斯坦，合众社、《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多伦多《明星周刊》、巴尔第摩《太阳

报》记者武道，美国军事观察组军医卡斯堡少校，国民党中宣部的张湖生等，在王世英、贺彪等同志地陪同下，从兴县出发，经第三分区，夜间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达交城县关头村。

我们在一座古庙里热情友好地接待了他们，并简单地介绍了我根据地军民同敌人斗争的情况，让他们参观了地雷保护下的战地医院和设备极其简陋的游击兵工厂。他们看到在深山丛林里的土窑洞和草丛中的医院感到十分惊讶。卡斯堡双手一摊，不住耸肩摇头说：“我的上帝，这哪里称得上是医院？”他们看到铸有“抗战”、“胜利”等字样的手榴弹、地雷后连连称赞，每人还带走一个手榴弹壳留作纪念。在俘虏营里，他们对日军俘虏进行了询问，但对这点还是不够满足，一心想到前线参观采访。当我们提出前线十分危险后，他们说：“我们不怕。”分区马上将他们的这一请求向晋绥分局做了汇报。

9月14日清晨，司令员亲自带领记者团，从关头村出发，每人骑着一匹马，穿过幽静的山谷，沿着落叶覆盖的山间小路，前往汾阳观看我军对敌作战。一路上，二十多匹骡马浩浩荡荡，顺着崎岖的山路翻过两座大山，他们看到沿途村民遭到日军“扫荡”后的凄凉景象，都对日军表示了极大的愤恨。这时我们已经走出六十多里山路了。按照计划要到前面不远的代家庄宿营。这时侦察员忽报发现有四百余名日军向我方向开来。司令员立即命令队伍暂停前进，原地待命。记者们听到有敌情之后，也非常紧张，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司令员。司令员这时非常镇定，对侦察员说：“东北、西北、峪口方向有无敌情？”回答说：“尚未发现！”这时他果断下令队伍继续前进，按照原计划在代家庄宿营。他判断敌人未发现我们的行踪，而只是路过这里，只要我们做到严密警戒，封锁消息，不暴露目标，监视敌人的行动，就不会发生遭遇战。

傍晚，我们到达了代家庄。司令员召集当地县委、县政府领导以及军区负责人、情报站和延安领队的王世英等同志商议。先由交西县领导将当天敌我情况做了汇报。大家分析认为，敌人可能在千年里宿营，明日拂晓沿中、西川到横尖地区进行“扫荡”，而后经峪口、大武返回离石城。还有一个可能是，向我们发起攻击，敌有四百余人，而我不足二百人，况且多是非战斗人员，还有二十多匹骡马及笨重的行李，要做好以防万一的准备，如果真地发生了战斗将对我不利。因此决定，民兵加强巡逻，游击队加强警戒，我主力部队按照预定方案于拂晓前进入阵地，严阵以待。随行的人员都要把一切行装安在了马鞍上待命，并要求全体人员服从命令、听从安排，保持镇定，坚守岗位，做好防范应战的准备。

一切安排就绪后，司令员将所获得的敌情和我方部署简单地告诉了记者团和王世英、贺彪等人。随后，他让大家不要太过紧张，要好好休息，明天继续向汾阳进发。但记者们仍然惴惴不安，都和衣而卧，没有一个人能睡着。我看见司令员和参谋长张希钦这一夜都没有合眼，只是在屋里踱来踱去，思考着应对措施，我们这些随行人员也都在紧张地通宵工作，这真是一个不寻常的夜晚啊！尽管一切行动都安排得有条不紊，但是今晚的代家庄依然笼罩在紧张的氛围当中。

拂晓时，侦察员报告：“日军从千年里向我方向来犯。”我们立即行动起来，首先做好掩护记者团的准备。就在这时，突然传来了日军的马蹄和皮鞋声，而这声音由远及近，不一会儿又由近及远，很快就消失了。原来日军没有发现我们，压在大家心头上的一块石头落地了。早饭后，继续向汾阳进发。一路上，他们谈笑不停，有时骑马，有时步行，向我们问长问短，感到这里的生活非常新鲜，有如到了另一个世界。

9月15日，我们到达了汾阳县的向阳镇，这里是个丘陵地区，用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到赵庄据点的日本旗，是日军在晋中的一个重要据点，驻有日军的旅团部。当天晚上，记者们登上坡头村的制高点观看我军作战。不一会儿，汾阳方向出现了时隐时现的火光，伴随着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硝烟弥漫，烈火映天。这是我分区部队正在袭击敌人的大营盘、火柴厂、电灯公司、火车站等。一直看到战斗结束，记者们问司令员：“你们有无捉到日军俘虏和缴获到物资弹药？”看来他们对参观这样的战斗还不过瘾，对我们还没有完全佩服，说明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污蔑还未彻底被戳穿。

我见司令员一夜没有睡觉，他是在考虑下一步工作怎么安排。第二天，他请来六支队队长、政委以及汾阳县委书记、县长、游击队长、情报站长等人，把记者们反映的问题通报给大家，并提出能否再打一个仗？大家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热烈地讨论，把各方面的情况做了比较，经过分析研究，确定了攻打协和堡的作战方案。协和堡位于汾阳城东北约七华里，是汾阳城外围的一个重要据点，碉堡、暗堡分布四周，深沟高壑、易守难攻，驻有日军二三十人，伪军数十人，是我山区根据地通往县城和平川的交通要道。它的两翼还有赵庄、红寺等据点相互策应。汾阳城内驻有日军旅团部，有日军一个大队，伪军数百人。打肯定是要打的，关键是怎么个打法？如果强攻硬打，势必困难很多，况且我军刚刚袭击了汾阳县城外的据点，敌人肯定会加强戒备。最后决定采取夜间突袭、里应外合、速战速决的方法。对每个作战环节都做了充分地考虑，不容有

半点含糊。还必须通知离石、文水、交城各县，要求他们严密监视敌人，配合这次战斗行动，重点打击协和堡的援敌。

一切部署好后，部队开始行动。司令员又带领记者到坡头村一个制高点观战。夜深了，协和堡据点周围一片寂静。担任主攻任务的六支队和汾阳县游击队、民兵遵照命令进到指定位置。参谋长李更生和侦查员赵德富在内线关系地协助下，做通了保管钥匙的看门人工作，要他不要把堡门锁死。姓张的内线也把所带的班次换到晚上 12 点，并通知了打更的哨兵，共同行动。李更生、赵德富分别潜藏在据点内保存麦秸的库房和厨房里。午夜 12 点，三颗红色闪亮的信号弹划破了漆黑的夜空。我军犹如神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堡内，日军、伪军在睡梦中猝不及防，一时慌了阵脚，没有还手之力。屋里、房上、院子中的敌人拒不投降，负隅顽抗。我军战士个个奋勇杀敌，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敌人全部被歼灭。战斗结束后，侦察员前来报捷，记者们对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而感到非常惊讶，发出一阵唏嘘的感慨声。司令员说：“离天亮还有几个小时，大家先好好休息休息，天亮后再看俘虏和战利品。”

清晨，记者们只见我军战士、游击队员、民兵们押着日伪军俘虏抬着缴获的战利品来到现场，附近的乡亲们也都结伴而来，霎时间，欢呼声、口号声震荡着这欢乐的山谷，热情的群众们提着鸡蛋、月饼、葡萄和茶水前来慰问凯旋的子弟兵。有战士向乡亲们讲述着战斗中的惊险场面，有的战士模仿表演着什么，记者们纷纷钻进人群里，捕捉着他们想要拍摄的镜头。比划着问这问那，翻看老乡送来的慰问品和战利品，不时地在小本子上快速记录。战士们还挑选了日本的太阳旗、军服、肩章、领章、护身符、烟酒和罐头等送给中外记者。司令员还把缴来的一把指挥刀和一支手枪送给了记者团作为纪念品。这场面也忙坏了我们的翻译，卡斯堡少校还以一个医生的身份主动同我战地医护人员为负伤的战士和日伪军俘虏伤员治伤。

在司令员提议下，记者们给大家讲了话，热情友好地称赞了我军的英勇善战、军民互相配合的精神。卡斯堡少校说：“我参加过的北非、欧洲战场最激烈的战斗也不过如此。”爱泼斯坦慷慨激昂地说：“一切污蔑八路军的谎言终于被彻底揭穿了，我要把亲眼看到的实际情况向全世界宣布。”记者们被这激动的场面感动了，他们也与我们一同振臂高呼，对我们如此迅速地攻下协和堡据点更是惊叹不已。不时地向我军战士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你们没有飞机大炮，就凭步枪、机枪和手榴弹，怎么就这么快攻下了敌人设的堡垒呢？”“你

们是如何捉到俘虏的？”。战士们打着手势，自豪地回答说：“是我们司令员指挥的好，是我军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精神，是我们军民配合的好。”说完又滑稽的模仿日本太君的口吻向记者们补充了一句：“你们的明白不明白？”记者在哄笑声中连说：“明白，明白。”记者们依旧沉浸在和我们一起的欢呼声中，分享着胜利的喜悦。这时只有国民党中宣部的张湖生显得异常尴尬，因为他一路上总是寻找机会贬低我们，为国民党反动派降日反共进行辩解，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竟被这欢腾的场面羞得面红耳赤，不知如何是好。协和堡战斗规模虽小，但政治意义重大，它戳穿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党我军地造谣污蔑，使得中外记者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是坚持抗日的。

9月22日，军分区在关头村的河滩上举行了祝捷大会，群众们像过新年一样，兴高采烈地穿上新的衣服前来参加大会。爱泼斯坦说：“我看到的一切完全证实了延安和分区领导所说的话都千真万确的，八路军是真正和人民结合的部队！”福尔曼说：“我到延安之前，听到西安某高级官员说共产党六年不抗日，今天那些话已经被事实揭穿了，我看到八路军在英勇地作战，还看到了大批的日伪军俘虏。”武道也意味深长的说：“八路军在敌后与人民亲密合作的事实不但能影响中国其他地方，也会使其他民主国家以八路军为榜样。”

9月25日，记者团又参加了我军攻打娄烦镇据点的战斗。娄烦镇是静乐县的户个重镇，是日军深入我根据地内的一个据点，三个碉堡驻守着一个日军加强中队和一个伪军中队。为把敌人“挤出去”，二支队在娄烦武工队、民兵和附近煤矿工人地大力协助下，很快挖通了一条百余米长的地道，并将炸药通过地道安放到碉堡底下。这时我们带着记者团来到二支队设在半山坡的指挥所，察看作战情况。当晚，敌人的碉堡在轰隆一声巨响中被炸毁。我突击队以闪电般的速度冲进据点，经过一小时激战，碉堡内的敌人全部被消灭。另外两个碉堡内的敌军早已被我军民包围，无法出来救援。记者们看到这壮观的景象，连连称赞说：“你们的游击战和攻坚战打得都很漂亮。”并对我军凭借“土办法”进行坑道作业爆破敌军碉堡的战法深表赞赏。

记者团采访结束回到重庆后，先后在中国和欧美报刊上发表了几十篇报道。其中，许多都是头版消息，福尔曼在《中国边区报告》一书中，记载了我抗日根据地的见闻和八路军英勇作战的事迹，并从自己拍摄的大量照片中挑选出最好的六十幅作品作为插图。史沫特莱在美国《新共和国周刊》上撰文，对《中国边区报告》一书做了高度评价，他说：“该书可以说是斯诺《西行漫记》的续篇，可以当作史料丰富的读本来阅读。”爱泼斯坦在美、英、澳大利亚等

国颇具影响力的报刊上发表了二十多篇出色的通讯，并于 1941 年出版了《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作为国民党中宣部顾问的武道在重庆《大美晚报》发表了《我从陕北回来》一文，从八个方面记录了他的所见所闻，他写道：“我看到了战斗，关于十八集团军是否与日军作战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在晋西北看到这样的战斗，看到负伤和阵亡的中国士兵，而且和被俘日军谈过话，我看见一大批从敌人那里缴获过来的战利品，我还用日本火柴点燃了日本香烟，喝了日本的果子露，吃了日本的饼干和罐头。”由于他一向被认为是倾向于国民党的，所以这篇报道引起了重庆各方面的极大关注。

由于这些记者亲自参加了我军对日作战，坚信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人民群众英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真相，扩大了我党我军在全中国、全世界的政治影响，戳穿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谎言，用事实抨击了他们对我党我军的污蔑。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指出：“在 1944 年，中外记者团来到中国解放区之前，许多人对解放区什么也不知道，国民党政府非常害怕解放区的真实情况泄露出去，所以在 1944 年的记者团回去之后，立即将大门堵上，不让一个新闻记者再到解放区采访。对于国民党统治区的真相，国民党也是同样加以封锁、控制，结果这一别有用心的封锁、歪曲、谎言和污蔑，都掩盖不住，也抹杀不了事实的真相。”

北京市扩大行政区划的一个小插曲

苏维斌

1958年初，河北省委将省直机关以及地、市、县主要领导干部集中到省委所在地保定市的河北饭店开展反右斗争。正在这时，政务院为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切实改变首都大城市小郊区的不适应状况，满足首都市民对副食品供应的需要。因此，政务院决定：扩大首都管辖范围，撤销河北省通州地区的建制。将平谷、密云、顺义、大兴、良乡、房山、怀柔七县及通州市划归北京市管辖。其余三河、香河、大厂、蓟县、固安五县划归廊坊地区管辖。

这个决定虽已作出但还未行文，尚没有公开，只有少数领导干部知道这个消息。此时中共保定地委向河北省委写了一个报告，要求将张坊以东、长沟以西共66个村（今张坊、大石窝、长沟三镇范围）留下由保定地委管辖。原因是因该地区有拒马河、高庄、甘池等几条水系，若今后发生上、下游用水矛盾时不好解决。报告中还附了一份平面图，图中明确标出了村庄、道路、河流。并得到了时任中共中央委员、河北省委书记林铁“请与刘仁同志商量”的批示（刘仁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

房山县领导接到这个报告后，认为这是一件大事，立即进行了研究，一致认为这个报告对我房山影响太大，他们提出的留下的理由不够充分合理，保定地委从未管辖过房山。因此考虑必须抓紧向北京市委有关领导反映，提出我们的意见和理由。于是由时任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的郑玉森起草报告。理由是：如发生上、下游用水矛盾可以通过互谅互让协商解决，况且当时还有华北局直属的“房涿涿渠道管理委员会”专责解决该地区的水利开发、用水矛盾问题，而且他们的工作做的很有成绩。再者，房山县委必然要考虑到该地区历来系房山管辖，领导与这个地区的干部群众关系很密切，感情深厚，政务院决定将房山划归北京市管辖是广大干部群众最高兴的事。并且有拒马河、高庄、甘池几条水系，水利资源非常丰富，灌溉条件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盛产玉米、小麦、水稻。特别是高庄出产的“御塘贡米”是很著名的。此外，张坊的磨盘柿，南尚乐的红果也很有名。该地区素有房山的“乌克兰”之称。在矿产方面：

品种多、储量大、质量好。如大石窝盛产的“汉白玉”闻名中外，历代王朝特别在京建都的王朝，他们的宫殿、陵寝、寺庙、牌坊、桥梁等大型建筑所用的“汉白玉”大多是大石窝所产的。更有云居寺的石经，被称为“国之重宝”、“北京的敦煌”。报告写好后，领导让我连夜坐火车返回房山，把报告交给临时主持全面工作的副县长王奎玉。让他递交给原任通州地区专员，现已调到北京市委工作的王宪。

因我当时在房山县委组织部工作，领导派我去保定给参加会议的领导送材料，正赶上研究此事，对此有所了解。事隔几十年了，感觉仍有一定意义，这也算是当时北京市扩大行政区划的一个小插曲吧。

一次干部下放的经历

李 耀

光阴荏苒，岁月流逝，许多亲身经历的往事，大多在记忆中逐渐淡忘，然而在 50 年前的一次干部下放的经历却使我记忆犹新。

1960 年 8 月初，房山县委根据市委的统一部署，抽调 260 多名干部下放到各管理区（当时全县共七个公社，公社下设管理区）和重点大队。这次干部下放不只是参加劳动，体验生活，更重要的是到基层担任实职，直接参与对农村基层工作的领导。抽调下去的各委办局的领导干部都担任管理区的副职，科级以下干部到大队担任副职（副书记或副大队长），下放时间为一年零三个月，到第二年收秋种麦结束后返回单位。

这次干部下放的具体任务，县委明确三条：一是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参与大队的领导，组织好农村生产和群众生活。二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帮助农村干部提高管理水平，改进作风。三是加强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稳定社会秩序，改变农村面貌。市、县委对这次干部下放工作十分重视，其决心之大、人数之多、时间之长、任务之重是历次干部下放从未有过的。当时我所在的县委财贸部共有七名干部，抽出二人下乡，副部长赵福林被分到原城关公社丁家洼管理区任副书记，我被派到饶乐府大队任副书记。饶乐府大队与县委机关近在咫尺，但为严格遵守县委提出“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要求，我坚持吃在农民食堂，住在村大队部。条件虽然比较艰苦，但对我这个机关青年干部来说，则是一次很好的锻炼。市、县委当时为什么下这么大决心，抽调这么多干部下放到农村，而且担任实职去帮助工作呢？这是根据当时农村实际情况作出的正确决策。事实证明效果是好的。

时代背景

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道路上，为了尽快改变贫穷落后的农村面貌，倾注了极大的精力，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在 1960 年干部下放的前几

年中，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教训是深刻的，损失也是巨大的。早在1956年的农业合作化，就是在干部的领导水平和群众的思想觉悟尚未成熟的情况下，通过深刻批判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浪潮中完成的，因此在取得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

1958年，在“整风反右”运动结束后，党在农村工作上左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发展，决心以更快的速度推进农村建设的进程，于是在广大农村继续运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广泛深入地开展群众性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和“拔白旗、插红旗”的评比活动。并凭主观意志，不切实际地提出各行各业放“卫星”，全面实现“大跃进”的要求。这种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给广大干部群众造成了极大的思想压力。因此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迅速推向高潮。随之，强迫命令、瞎指挥风以及“一平二调”共产风，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浮夸风和干部特殊化等一系列左倾错误严重泛滥起来。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又一次开展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这一左倾错误的产物不仅没有纠正，反而得到充分的肯定和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由于党在农村工作中指导思想的不间断失误，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遭到了极大地破坏，加之连续遭受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受到严重损失，群众的生活更加艰难。由于这种天灾人祸的双重影响，群众的思想情绪很大，党群、干群关系比较紧张，社会秩序也不够稳定。到1960年下半年，党在严重的困难和挫折面前，原有的狂热、盲目空想的思想情绪趋于冷静，对于犯的左倾错误，开始有了新的认识和反思，为了总结教训，修正错误，改善党群、干群关系，稳定社会秩序，保护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市县委决定抽调大批干部下放到农村，帮助工作，并且担任实职参与领导，这次干部下放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的。

在实践中学习和锻炼

这次干部下放，在进村前公社进行了简短的学习与培训，并对有关各村的情况，作了简要的介绍。据介绍，我了解到要去的饶乐府大队主要是领导班子不够协调，工作不够有力。使我对进村后可能遇到的困难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并对进村后重点抓什么也提前有了一些考虑。进村后工作千头万绪，大到党的方针政策地贯彻落实，小到邻里吵架地调解都要涉及。工作中，我重点抓了四件事。

一是协助支部抓好作风和制度建设，促进领导班子的团结。进村后，我把加强领导班子的团结作为首要任务来抓。在村里我虽然担任副职，但因为是县委派来的下放干部，在工作上大家还是比较支持和尊重的。通过一些时间的实际接触，对班子的情况有了比较真实具体地了解。在主要干部之间确有不够协调、配合的不够默契的问题，但我认为这些干部工作积极热情，基本素质是比较好的，干部之间产生的矛盾主要是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上的问题引发的。如有的干部工作方法简单，性子急，民主作风差；有的是干部分工不够明确，责任制不落实；有的是有些制度不够健全或有制度不能认真坚持，在思想上和工作上缺乏及时沟通等等。经与干部沟通思想，交换意见，取得认识上的一致以后，支部专门抽出时间，大家从总结工作入手，联系实际，主动找差距，心平气和的互相交心，增强了班子的团结。为了巩固这一成果，进一步健全了领导班子地学习、生活和定期交流汇报等项制度，通过实践，效果是比较好的，各项工作也有了新的起色。

二是抓农民食堂的管理和整顿工作。1958年，公社在农村强力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大兵团作战的生产劳动方式中兴办了农民食堂。它打破了群众千百年的生活方式和传统习惯，因此在群众思想和食堂的管理上都带来很多新问题，特别是在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后，群众缺粮少菜，生活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办好农民食堂是群众最关心的事，也是农村矛盾的一个最大热点。当时农民生活十分艰苦，劳动一天，食堂只能供应“两稀一干”，早晚两顿稀粥，以瓜菜、薯叶为主，中午供应一顿干的，也有数量限制，实际也是吃不饱。在当时，办好农民食堂不仅关系到群众的健康，也是稳定社会秩序的一个重要问题。我进村后不久，县委于9月下旬下发了《关于安排好人民生活的意见》的通知，要求要进一步加强粮食管理，实现节约用粮，大搞野菜和代食品，管好农民食堂。根据县委这一部署，支部具体研究了食堂的管理和整顿工作。为了解除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疑虑，我作为县里派来的干部，就主动承担了这项既复杂又得罪人的工作。因为在那极其艰苦的年代，能到每天吃饱肚子的食堂去工作，那是人人都想往的事。整顿食堂会牵涉一些人的切身利益，得罪人是难免的。在整顿的过程中，广泛地听取了群众的意见，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食堂内部的整顿，制定了整改方案。经支部研究后，调整了食堂的管理人员和部分炊事人员。建立健全了食堂的各项管理制度，堵塞了漏洞，使食堂工作有了一定的改善，群众原有的不满情绪有些缓解。但那时全国兴起的大办农民食堂，并不是广大农民群众的意愿，严重的脱离了农村生产和群众生活的实

际，限制了群众养猪养鸡的家庭副业的发展，是一项错误的举措。因此，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1961年在全国都陆续停办了农民食堂。

三是参加劳动实践，积极参与搞好农业生产。8月正值农业生产的后期管理的关键时期。我进村后，与村干部一起起早贪黑抓好生产，期间有两件事至今难忘：一是随着秋季作物逐渐成熟，偷秋现象日益严重。当时农民生活十分艰苦，每天食不果腹，偷一点充饥也是难免的。但如果放松管理，就可能形成偷盗成风，后果又不堪设想。因此需要选派一名有威慑力又没有私心的人去担当护秋的任务。对人选的问题十分慎重，要求护秋人员一要过“人情关”，得敢抓敢管，不怕得罪人。二要过“时间关”，护秋没有上下工时间，特别是夜间更要加强巡逻，因此身体要好。基于这些条件，我想到了孤身一人的贾疯子，没有牵挂，也没有家务拖累，虽然精神有些不够正常，但从不打人骂人，是个可以考虑的人选。于是我找他谈话，讲明任务要求，他欣然接受。自接受任务后，他每天扛着扎枪，脖子上挂个马蹄表，昼夜巡逻。自他负责护秋以后，丢失被盗现象明显减少，这个过去到处乱跑无所事事的疯癫老人，给他安排护秋任务以后，很有责任感和荣誉感，精神状态也有很大变化，过去一直需要大队照顾的人变成能为集体做贡献的人了。自此以后，他对我也非常友好，虽然他嘴上不会说什么恭维的话，但我有时会发现在我住的炕上放几粒花生，我猜这是他在地里拾到的花生趁我不在时放的，一个精神不太正常的人也能有如此的感情表达，这件事对我印象很深。

另一件事就是搞大白菜的实验田。根据县委关于发动群众大搞实验田的指示精神，在研究和落实村里的蔬菜、小麦等农业实验项目外，我自己也开辟了一块大白菜试验田，从种到收具体学习和体验种菜的全过程。现在想起来那不应该叫实验田，因为并没有好的科学技术做实验，只是我在老农的指导下，从整地、育秧、移栽到管理、亲自体验了生产的全过程。由于精心管理，获得了丰收。在收获时还给县委机关食堂送去了两大车，在那缺粮少菜的瓜菜代年代，这两车白菜也为县委机关食堂解决了一定的困难，并受到了表扬。

四是抓好农村的宣传教育，增强群众克服困难的信心。50年前，广大农村没有更现代化的宣传工具，主要是村里大喇叭广播、黑板报和田间地头学习宣传等形式。当时农村的机械化程度很低，农民的劳动时间长，强度大。宣传教育工作必须根据农村的特点，采取“农闲多学，农忙少学，农闲晚上集中学，农忙田间地头学”，并运用农村广播、墙报等多种形式，传达会议精神和国家的方针政策。那时凡是大、麦两秋，中小学就要放假，由学校组织学生参加劳

动。当年我所在的大队，就有房山师范学校张世学校长和房山中学范守智老师分别带领部分学生参加生产劳动。我们就充分地发挥了这一支重要的宣传力量。学生热情很高，田间地头宣传、读报有声有色，村中墙报常换常新，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收秋和种麦完成以后，进入农闲季节，县委下发了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重点是整顿干部作风，纠正“一平二调”共产风，整顿农民食堂，落实下一年度的生产计划。按照县委的统一部署，支部及时做了研究，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这项工作。

11月，在广大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同时，县委根据市委的部署，在县社两级机关、事业单位下达了精简机构、压缩人员、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的通知。随之，全县机关事业单位和厂矿全面开展了精兵简政工作，撤并机构，精简人员，大力压缩非农业人口。这项工作更为艰巨复杂，财贸系统单位多，干部职工队伍大，精简的任务重，时间紧，部里人员严重不足，经县委批准，我于年底调回机关，又投入了这项新的工作。我这次下放，虽然时间仅5个月，但却是实实在在的“沉”在农村，并担任实职，参与了基层工作的领导，既体验了农村的生活，又在实践中得到了锻炼，这一段人生的经历是我终生难忘的。

在备战的日子里

姜玉卉

1967年11月，我到班各庄中学参加教育工作。1969年，学校党支部吸收我为新党员。除了两个班的语文教学任务，还兼任团总支书记，负责教师的政治学习及全校的宣传工作。同年3月，中苏两国关系公开破裂，双方都开动宣传机器，唇枪舌战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苏方军队在珍宝岛频频向我边防开火挑衅。我方多次警告无效，忍无可忍，给入侵者迎头痛击，胜利地捍卫了我国神圣领土。8月，毛泽东主席洞察世界形势，深谋远虑，从战略需要出发，向全党、全军、全民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

一夜之间，最新指示传遍祖国各地。“备战、备荒、为人民”成为当时压倒一切工作的首要任务。“深挖洞”运动自上而下，紧锣密鼓地大干起来。看这运动的声势，真有点大战马上就要降临的感觉。学校是人口最密集的场所，被列入防空的重要单位，挖防空沟是必然的了。

班各庄中学与公社毗邻，两个院落有一个敞开的大门相连。校园和操场又是东班各庄村人和车辆往来的通道。实际上，是校园，又是街道，挖防空沟有一定困难。我们请来公社武装部长殷茂祥和公社技术员，帮助测定防空沟的位置。要求既保证师生安全、迅速进入防空沟，又方便社员、车辆畅通无阻。很快公社技术员和学校物理老师任景才测好方位，用白灰划好线。校务会上向各教学班分配了任务，非班主任分别下到各班级，配合班主任组织学生劳动。每天上午按课表上课，下午挖防空沟。工具由学生自带，班主任布置本班学生分别带一定数量的镐、锹、耙子、叉筐等，落实到人。

校领导给我的任务是负责挖防空沟的宣传工作。抽出政治老师张淑芳和初二、初三、高中团支部的宣传委员组成宣传组，每班安排两个宣传员。利用劳动间歇，宣传员手拿电池喇叭播送各班来稿。还把各班、办公室的小黑板收集起来，写好毛主席语录，分别放在防空沟两旁，作为鼓舞、鞭策师生的精神力量。教室外山墙上的两块板报，一块张贴师生的决心书、好人好事稿件；一块画上图表，公示每天各班出席人数，挖沟进度，挖沟进度由学校会计贾万里和

物理老师任景才测量，并填写板报。

挖土方劳动是硬体力活，两天下来，师生就有些疲劳。为了给大家鼓劲，学校组织高一团支部的文艺骨干，在语文老师的指导下，编了快板书、“三句半”等小节目，在间歇时演出。各班比赛唱革命歌曲。虽然身体累，但个个精神愉快，干劲很足。

30 公分的表土层比较好挖，可下面的鹅卵石和沙石层就难挖了，学生人小力单，有了畏难情绪。我琢磨着怎样帮助师生克服这种情绪，激发起攻艰的决心，突然想到父亲曾在我们佛子庄村的忆苦思甜群众大会上，讲述过 1939 年日本鬼子轰炸佛子庄村制造惨案的事，何不让父亲来校给师生作个报告？我父亲是解放前的老党员，“文革”前一直任村干部，有文化，会组织语言。我把这个想法对校党支部书记于春友一说，得到他的许可，说机会难得，让我赶紧安排。从于书记屋里出来，我就找到父亲，说明来意，父亲爽快答应。因为父亲给佛子庄中学的师生也讲过，内容形式都驾轻就熟。

第三天上午，学校组织师生来到公社礼堂，听父亲讲述了 30 年前的往事

1939 年腊月十八，在平西抗日根据地，我八路军九团决定攻打北窖村日本的高线站。日本利用高线索道，疯狂地掠夺山区的煤炭。高线站的重要动力设备是蒸汽锅炉。如果炸毁锅炉，整个高线索道就完全瘫痪，停止运转。九团集中主要兵力攻打北窖高线站，炸锅炉，抽出二营在佛子庄村东设伏，打从河北岗楼来增援的日伪军。

果然，北窖战斗一打响，河北岗楼两辆汽车的日伪军倾巢而出，速来增援北窖。当行驶到佛子庄村东河滩路上，一阵机枪猛扫、手榴弹爆炸，打得日伪军人仰车翻。战斗结束，八路军迅速撤离战场，只有一个日本翻译装死，回到河北岗楼汇报情况。三天后，日军开始报复，派飞机疯狂轰炸佛子庄村，炸死 52 口人，伤 60 多人，炸毁房屋 200 多间，制造了震惊平西骇人听闻的惨案。

讲到这里，师生们个个悲愤填膺，父亲乘机语重心长地说：“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欠下的血债。同学们要牢记历史，搞好现在的备战工作，有备无患。现在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少死人。”师生代表上台发言，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并决心多流汗，多出力挖好防空沟。一位初三的学生发言说：“我要学好数理化，当工程师，造最先进的飞机，如果日本还敢侵略，不等他们来到陆地，在空中就把他们击落到大海里！”会场上立刻响起热烈的掌声，接着是阵阵高昂的口号声……

报告会后，师生们受到教育，挖防空沟更加卖力气了，一个星期就挖了一米深。到周日，集体放假回家休息。没想到夜里下了一场雨，星期一回校一看，沟里灌满雨水和泥土，湿漉漉的没法下脚。校领导临时决定下午上课，组织没课的老师穿上雨鞋，用铁锹铲泥，把烂泥清出来。经过一夜风干了，第二天师生又照计划干起来。

沟越深，越难挖。里边几百公斤重的大石头搬不动。有的学生回家向家长讲了，家长怕孩子出事，对村干部讲了。村校关系一直很好，村领导马上派来了十几个民兵，带着工具把师生搬不动的大石头滚出防空沟，帮我们解决了难题。我请示了于春友书记，以学校全体师生的名义，用大红纸写了感谢信送到东班各庄村大队，村校关系更加密切。

我还把学校后勤人员动员起来。王师傅除了按时给老师开饭，还把开水送到师生面前。50多岁的贾德石工友，是一位老党员、老八路，过去在平西独立团任连部司务长，复员到地方做学校后勤工作。他平常负责从村井担水，给师生提供饮用和洗漱用水。

上级领导指示：工作越忙，越要坚持政治学习，挖防空沟期间也不能减少学习时间。于是学校安排每周一、三、五晚上8点进行政治学习，周二、四备课。政治学习雷打不动。每次学习，先总结工作，然后由我念《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上的重要文章及最新最高指示，还有上级发的两本书：《反杜林论》、《法兰西内战》。

经过三个星期苦干，我们完成了挖沟任务，教室前的防空沟长80米，深1.7米；操场的防空沟长60米，深1.7米。加起来可容纳全校师生，公社领导验收合格，在公社汇报会上肯定了我们学校的组织、宣传经验，然后就部署防空演习。安排学校要搞两次演习，以便总结经验，找出问题，加以改进。在此基础上，9月底全公社将统一进行演练。

校务会上对演习进行了布置。教室前的防空沟容纳初一、初二4个班；操场的防空沟安排初三年级和一个高中班共3个班。师生从教室前后门跑出教室，边出教室边排成一列队形。教室秩序班主任还要细致安排，要求安全、快捷、安静。一个星期四下午第三节课快要下课时，我站在高一班教室前的台阶上，手拿电池喇叭高喊：“防空演习开始——”各班按要求有序地进入了预定地点。当最后一个老师进入防空沟时，我看了一下表，用了3分16秒。总结会上，我提出了很多问题：一是听到警报后，学生起身离开座位时很混乱；教室的两个门开后有反弹现象；学生在防空沟入口处互相拥挤；有的学生没有闭

眼、张嘴、用双手捂耳朵；总的进沟时间太长等等。经研究，决定增加入口。每班一个入口，教室前的防空沟增加两个木梯入口，操场的防空沟增加一个入口。公社给了点板材，木工很快做好三个宽踏脚的木梯，顺便把教室门也修理好。各班统一规定：南边靠窗户三列学生从前门走出，由授课教师去开门；北边靠后墙的三列起立向后转，从后门走出，由第四列最后一个学生去开门。又向学生提出从实战出发，加强政治性、严肃性的要求。我还特意让伙房的王师傅也参加防空演习。要他听到警报后，把火上的锅端下来，用火盖压上火口，如果是实战，要用水把火浇灭，防止火灾，然后再掩蔽。经过调整，进行第二次演习时只用了1分36秒，而且井然有序。

学校演习完成后，公社准备搞一次大的演习，在紧邻我校的一排房脊上，搭了一个木架，上边放了一个手摇报警器。9月30日上午11点，两位武装部工作人员摇响防空报警器。当时，正是上第四节课的时候。听到报警后，我马上抄起电池喇叭冲出屋门，督促师生快速进防空沟。我刚跑到操场南边，只见操场入口一辆马车向场中央飞驰而来。我马上迎过去，用电池喇叭喊：“拽紧辕骡的缰绳，向左墙跟拐。”因为右边是防空沟，马车绝不能过去。拉长套的骡子一见前面有人拦，头往回一扭，长套松下来，车把式手疾眼快，拉紧了手刹，马车停下来。原来是东班各庄村二队的马车去粮站拉饲料，刚出粮站大门口，警报器突然响起，牲口受惊吓撒腿狂奔起来，所幸没出事。

以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与日本、美国建交，备战口号在村里渐渐提得少了。后来按上级指示，学校把防空沟填平，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一张老照片的回忆

魏志华

最近找到一张 50 多年前的老照片，引起我对往事的回忆。

1955 年，房山县召开了第五次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全县团代表共计 200 多人。其中，县直机关代表 9 人（包括县委机关 2 人，政府 3 人，县供销社 1 人，银行 1 人，公安局 1 人，粮食局 1 人）。我当时在县委办公室工作，兼任县直机关团总支宣传委员、县委机关团支部书记，被选为团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县委机关另一名团代表是县委财贸部的王魁仲。

这次会议共开了 5 天。团县委书记霍占山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代表们进行了热烈地讨论。选举了新一届的团县委委员和出席河北省的团代表，并有几位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介绍了他们的经验和先进事迹。

通县团地委（当时房山属河北省通县专区）、中共房山县委的领导对这次团代会都很重视。团地委书记隗永忠（房山解放后的第一任团县委书记），房山县委书记张拓夫，副书记、县长穆林山，县委副书记吕永珍以及县委组织部副长都参加了会议。隗永忠、张拓夫在大会上讲了话，对代表们提出了要求和希望。并和各代表团的代表合影留念。

参加这次团代表大会的机关代表，当时都是 20 出头的小伙子，年轻力壮，朝气蓬勃，干劲十足。虽然当时待遇很低，生活很艰苦，实行供给制，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经常下乡。当时山区没有公路，背着背包步行，但大家的情绪都很高，没有任何怨言。

不仅如此，这些当团代表又都是机关团支部的负责人，团的工作搞的也很



1955 年，房山县第五次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部分代表合影

活跃。组织机关的团员、青年学习宣传，积极开展文体活动。当时各单位都有篮球队、乒乓球队，各单位经常进行比赛。每年机关团总支还组织一次文娱晚会，唱歌，跳舞，表演各种文娱节目，大家的情绪都很高。当年这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如今都已离休、退休，而且大部分同志已离开了人世。每当看到这张照片，引起我对几位老领导、老朋友的思念，引起我对往事的回忆。

中央团校在良乡培训纪事

许冬梅

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7月19日晚8时40分，部分中共地下党员和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会员（地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后来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共21人，北上到中央团校学习。其中包括工厂企业19人、新安旅行团2人。他们怀着兴奋又激动的心情，经过三天三夜的奔波，冒着被国民党飞机轰炸的危险，一路走走停停，于7月22日9时17分到达北平。随后，又乘火车辗转到了中央团校所在地时属河北省的良乡县。

1948年9月中央团校成立于河北省平山县，是一所培养青年干部的学校，主要学习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党对团校非常重视，要为全国解放培养大批干部。中央团校按连队编制，第一期有10个班，共708人，1949年7月14日毕业。1949年5月校址迁至良乡县。第二期按顺序编班，设11至19共9个班，1200多人。学校下设三个部，其中11、12两个班是地方干部部，简称地干部。13、14两个班是工人部，15至18四个班是学生部。后因工人班中有一部分学员文化程度较低，从班中分出部分学员编为19班。各班下设组。

8月初，陆陆续续到达良乡县的学员，还未洗去路途疲劳，就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

当时的良乡县已于1948年12月14日解放。县城距北平市中心20公里，交通便利。在北平解放前夕，中共北平市委、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都曾暂驻这里。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干部训练班，在1948年12月至次年2月5日，对接管北平的2800多名干部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培训。良乡，这座有着1000余年历史的古镇，在新中国成立前的特殊时期，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政治理论学习

8月20日，中央团校第二期开学典礼在良乡县城的城隍庙露天广场隆重举行。校长是原团中央书记冯文彬，教育长是张凡，副教育长是宋养初。1200

多名学员整齐地坐在砖上或小凳上，聚精会神地聆听。烈日的照耀，并没有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他们深知，接受党的教育，是为了新中国的建设。

22日，开始正式上课。教学内容主要围绕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学习的课程主要有：社会发展史、辩证法唯物论、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党史党建、青年运动史、团建以及各种专题报告等。

由于良乡刚刚解放，城镇的基础建设正在筹划当中，条件比较艰苦。中央团校说是“校”，却没有校园，没有校牌，没有教室，没有校舍，也没有课桌椅。白天在广场上听课要坐三个多小时小板凳或砖头，有时还晒着太阳。晚上听课时，灯光引来大批蚊子和小飞虫。学习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凑，每天学习三个单元，从早到晚没有空闲。

团校的老师都是中央各部门的领导、专家。除了校长冯文彬来讲课，其他如陈家康、安子文、肖华、杨述、廖承志、蒋南翔、荣高棠、李昌、谢觉哉、薛暮桥、彭真、钱俊瑞、陈绍禹（王明）、师哲、孙定国等都来讲过课。

在第一单元学习中，何礼讲授了“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世界”；杨述等同志讲授了“五种社会形态，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孙定国讲授了“阶级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等。

在第二单元学习时，著名哲学家艾思奇讲授了“辩证法唯物论”，虽然有些深奥，但是第一次让学员们懂得了如何看世界、看问题的方法，开阔了视野，收获很大。两个单元学习结束后，校部组织了统一考试。

毛泽东主席的秘书田家英也在团校作过四次报告，包括两次“中国近代史”，两次“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他一边滔滔不绝地讲课，一边不停地抽烟，还经常伴随着咳嗽。田家英水平很高，尤其是讲授研究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时，其渊博的知识和严谨的态度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少同学与他建立起师生友谊，有的写信给他，向他请教问题，田家英都回信给予解答。通过他的讲课，学员们了解到共产党发展成长历经磨难，艰辛曲折，从而更坚定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懂得了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深刻含义，从而更坚定了学员们的革命意志和永远跟党走的决心。

学习期间，内务部长谢觉哉讲授了“国体政体知识”；蒋南翔讲授了“共同纲领”；张凡讲授了“人民政协”；薛暮桥讲授了“工商业政策、目前财政经济工作”；聂真讲授了“土地改革”；李之华讲授了“文化艺术工作”；钱俊瑞

讲授了“文教政策”，王明讲授了中国第一部《婚姻法》。使学员们对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的大政方针有了全面的了解。

关于党史知识，廖承志作了专门党史报告，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作了党建问题解答，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作了民主集中制报告，刘子久讲了工人运动，邓颖超同志讲了妇女运动。冯文彬、蒋南翔、廖承志、荣高棠、李昌、陆平、陈家康等团中央的领导讲授了青年运动史、青年团的建设。

中央团校不仅仅给学员们传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同时也对学员们进行了思想改造。大家通过写自传，分析自己出身历史和优缺点，第一次较客观全面地认识了自己。班部和班党支部组织写得好的同志典型发言，启发带动大家。有些发言生动深刻，如一位新青联同志，揭露了资产阶级家庭的腐朽和丑恶，暴露了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剖析自己，给同学们以很深的教育。平时中央团校的小组民主生活会也都是与人为善的，同志间坦诚相见，互相热情帮助。自觉地进行着自我思想改造，思想觉悟有了明显提高。

校园生活

对于生活在上海的学员来讲，良乡是一个很小的县城。南北东西二条街，转一圈只要半小时。有城墙，走一圈也只要半小时。镇上全是土房、土墙、土路。1200多名学员分男女生住在农民家中。

到中央团校后，每人都分到了一套新的灰色的干部制服。于是，不大的县城到处是穿着灰色干部制服的同学，引得老乡好奇地问“你们是哪儿的？”“我们是中央团校的。”“那你们都是团长喽！”学员们听了都笑了。

由于没有教室，几个人住在一户农民家的土炕上，土炕就是学习场地。看书、整理笔记、小组讨论都在农民家中。上课前，先到饮马井集合，然后到城隍庙前的露天广场上听课。学员们带着后来在县上买的小折椅或叠两三块砖当凳子坐着。

团校的伙食非常俭朴，主食是窝窝头和小米稀饭，菜有炒茄子或豆角。吃饭在伙房外的空地上，一个小组十人分成两部分，各围着一个铝制盛菜的小面盆吃，菜盆放在地上。大家蹲着或站着吃饭，有时一阵风刮来，菜里就撒上了“胡椒面”。遇到下雨，各组就派人到伙房去打饭菜到住处去吃。假日、节日可以“打牙祭”。虽然一天只吃两顿，但有米饭、红烧肉或肉包子吃，大家可开心了。南方来的学员开始吃不惯，有的便秘，有的拉肚子，后来才慢慢适应。

中央团校生活虽然比较艰苦，但是大家有着共同的理想信念，所以不论年龄大小（大的二十五、六岁，最小的十四、五岁），也不论原来出身名门富绅，还是贫寒家庭，大家都不以苦为苦，互相照顾，融洽无间。大家还很会苦中作乐，发现很多有趣的事情。例如当时因卫生条件差，有同学身上长了虱子，大家互相取笑又互相帮忙抓虱子。良乡下雨时，道路又黏又滑，有位女同学走上去就仰天滑一跤，换干净衣服再走又滑一跤，这样一连滑三跤，引起大家一片笑声。

中央团校是个革命大家庭。虽然条件差，但遇到病号必开小灶，吃鸡蛋面条。有同学生病住院，班部、校部会组织同学轮流值班护理，让人感到家的温暖。校部很关心少数民族同志，专门为回族同学安排了清真伙食。

课外活动

紧张的学习时间过得很快，闷热的夏天过后，随之而来的是凉爽的秋天。这一年，庄稼长得非常好，刚刚获得新生的农民们迎来了粮食的大丰收，心里的喜悦化作了无穷的力量，粗壮有力的双手挥舞着镰刀，在田间忙碌着。团校的同学们也放下书本，投入到火热的劳动当中。这些学员大多来自大城市，不会干农活儿。农民就手把手地教他们，他们也在干活儿中，认识了农具，了解了北方的粮食作物。劳作间歇，他们高唱革命歌曲，田间一派热烈的场面。

为了缓解紧张的学习气氛，团校每月都有节假日，这对学员们来讲是个难得的放松时机。学员们有的到图书室看书、有的到昊天塔游玩。工人班的同学还组织起来到卢沟桥、宛平城去游览。学习之余，团校开展了丰富多采的文体活动，组织学员唱歌、扭秧歌、开联欢会和运动会、看电影等。

让学员们记忆最深刻的是1949年9月4日国际青年节。这一天，校部组织全校在饮马井的大操场上，开展了一场体育表演会。各班都精心准备了节目。有的班同学用身体排出一面党旗造型；有的班用人体搭建成五角星图案，中间是人搭成的三层灯塔，最上面还站着一名挥红旗的同志。无论是构思创意还是人体造型，都是最完美的展示，赢得了场内雷鸣般的掌声，大家激动地高唱《你是灯塔》等革命歌曲。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是当时中央团校的校训，也是抗大的校训，学员们就是在这种半军事化的环境里学习生活。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11月5日，中央团校迁到北平，第

二期学员们也随即离开熟悉而热爱的良乡县。

1950年4月26日，中央团校第二期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毕业典礼。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接见了全体同学，朱总司令代表党中央致词。之后，学员们奔赴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

忆原子能院八十年代的改革转型

孙祖训

2010 年是我院建院六十周年。在这喜庆的日子里，看到快堆和新堆的建成，看到我院欣欣向荣，各项工作蓬勃开展，事业后继有人，感到额外的高兴和欣慰。

我院在前 30 年，是一个主要从事军工任务的综合性核科研基地，在钱三强、王淦昌等老一辈科学家的带领下，为“两弹一艇”作出过重要贡献，先后分出十多个科研单位，培养造就了大量优秀人才，被誉为我国核事业的“摇篮”和“老母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核工业的战略转变，按照“科学技术必须面向国民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我院开始对科研方向进行调整，从“以军为主”转变为“保军转民”和“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由于长期习惯于指令性任务，当时全院不同程度地存在“等、靠、要”的思想，怕转民影响科研水平，对转民认识不足。战毅军同志 1980 年春调来院后，首先在党内统一了思想，认识到“保军转民”不仅关系到我院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地位，而且影响到我院的生存和发展。1982 年、1983 年后，转民工作初见成效，除同位素外，还涌现出火灾报警器、单晶硅中子掺杂、微型反应堆等一批项目，既发挥了我院的技术优势，也产生了经济效益。

1985 年 3 月，党中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我院改革转型的任务更加迫切。我虽然是从事核物理基础研究的，但也一直在思考科研如何面向经济建设、在新形势下我院如何定位和转型、基础研究和开发应用的关系、转民与科研的关系、转民中核与非核的关系等问题。1985 年 9 月，我在担任院长后，在院“保军转民”工作成绩的基础上，在充分听取老领导、老专家和各方面意见之后，我在由院科技委主任汪德熙主持的 35 周年院庆报告会上提出，“在‘保军转民’的方针指导下，以核能和核技术应用为重点，形成两个拳头；少而精地开展基础研究；以核为主，多种经营，充分发挥多学科综合性优势，推进科技体制改革，把我院办成一个方向对、贡献大、水平高、环境美的核科研基地，为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为核工业第二次

创业作出新贡献”的业务方针，先后得到以战书记和李福恒书记为首的院党委的支持。在 11 年的院长任内，我对这一业务方针始终不渝、坚持初衷，直到 1996 年 6 月，我在辞去院长职务时，才体会到持之以恒、必有成效的道理。

为适应新的形势，需进一步推动我院转型。1986 年，在院党委领导下，经核工业部批准，对院科研组织体制进行了改革和调整，打破了单纯以学科划分的组织体制，成立了 5 所 2 部。特别是将电物理、电子学、应用核物理等结合起来，成立了核技术应用研究所，按项目划分研究室，面向经济建设，承担项目的研发。核技术应用所所长由知识面宽、协调能力强、待人宽厚、热心核技术应用的孙汉城担任；堆工所所长由事业心和责任感强、做事果断、业务经验丰富和善于团结同志的陈叔平担任；核物理所所长由学术造诣深、学风严谨、办事公正的王乃彦担任；放射化学所所长由学术水平高、工作认真扎实、领导协调能力强的林漳基担任；同位素所所长由业务经验丰富、开拓能力强、有经营能力、敢承担责任的王翌善担任；安全防护部主任由业务水平精深、不顾个人安危愿为事业献身的张永兴担任；计算机技术部主任由实践经验丰富、任劳任怨的曲风山担任。这些同志上任后都不负众望，作出了杰出贡献。记得核技术所孙汉城所长上任不久就提出了辐照改性、核测井、中子活化和小型加速器应用等“四把伞”的设想，计划将核技术通过伞形辐射方式应用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后来这些项目大都取得了优秀的成果。

为深化改革，院成立了以我和李福恒书记任正、副组长的院改革领导小组。为落实分类管理并引入激励机制，院实行了“四保一挂”的责任目标承包制，并制订了配套方案。这些改革措施通过实践不断改进和完善，证明是较成功的，是符合我院实际的。任大明副院长和李福恒书记先后主持这些制度和有关政策的制定和详细核算；在我任内先后主管计划的副院长严叔衡、杨天禄和李路明以及冯百川、贾雅傲、唐祖梅等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我院以分类管理和责任目标承包制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随着事业费的不断削减（1988 年起，事业费削减了一半），形势更加严峻。堆工所人员最多，虽有核安全评审和秦山核电站燃料元件考验等任务，但业务方向不明，缺乏长期任务安排。陈叔平所长非常着急，积极奔走。想挤进核电，但所谓“三国四方”不包括我们；计划将戴传曾院长开启的核电安全研究作为堆工所业务方向，并争取成为核安全局的长期技术支持单位也未成功。正在这时，出现了两个横向机遇。一是 871 等对外工程，历时数年，不仅结合专业、提升水平、培养人才，而且获得了较大的经济效益。在我任内先后主管工程的

副院长张正华、田亚民、李玉嵩、康日新，堆工所领导陈叔平等，以曹宜铮、许汉铭和核技术所的李公攀为代表的一批专家以及对外工程处孙鸿照和董秀明等，为工程的成功作出了卓越贡献，为我国争得了荣誉。二是“863”计划快堆项目的启动，历经曲折坎坷，最终成为我院的一个主要业务方向。

快堆项目的立项过程一波三折，几度起死回生，令人难以忘怀。记得1986年秋，部科技核电局王传英局长专程来院，谈及王老等发起的“863”计划，小平同志已批准，责成国家科委正式组织实施。“863”计划包含能源领域，该领域有2个主题：燃煤磁流体发电和先进反应堆。中央文件对先进反应堆主题的要求是：要从快中子增殖堆、高温气冷堆、聚变裂变混合堆这三个堆中确定一个安全性和经济性好、并能增殖核燃料的堆型，即所谓“三取一”。王传英局长非常看好“863”计划，确定让我与陈叔平参加能源领域专家委员会。1987年初，能源领域专家委员会成立，由清华大学王大中任首席专家，委员7名，排序为王大中、孙祖训、杨昌琪、霍裕平、徐益谦、舒宗勋、陈叔平。一年后杨昌琪因病去世，由严陆光继任。专家委员会成立后，在先进反应堆主题下成立了四个专题。除了三个堆分别设有专家组外，还专门成立了论证三个堆型的第四专题组。在1987年，部年度工作会议期间，刘书林、周平副部长和王传英局长还对此听取了汇报并作了指示。由于首届专家委员会的专家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都希望本单位能取得更多经费，几个项目互不相让，最初意见分歧较大，在国家科委领导的协调下，经过专家委员会和专家组组织全国有关专家，对不同专题召开了多达数十次的论证会，对科学可行性、工程可行性、经济性和安全性等方面进行了长达数年的认证。为了充分论证中国建造快堆的必要性和现实性，在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对我国能源结构、发展前景、铀资源等进行了非常科学的调研和预测。通过论证，普遍认为：快堆由于能够增殖核燃料，大幅度地提高核燃料的利用率，科学可行性、工程可行性、经济性和安全性等方面总体上比其他两个堆型优越，对我国核能利用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个结论由专家委员会讨论通过。在论证工作中，徐銜、许汉铭、濮继龙、马大园、石永康、陈逸少等同志做了大量工作。国家科委对快堆项目十分重视，宋健主任、朱丽兰主任多次听取汇报，主管工作的高新司石定寰司长和颜一匡、耿战修处长，我部主管科技的黄齐陶副部长、主管计划的陈肇博副部长、科技委主任钱皋韵等和科技司以及核电局的历届领导等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在1992年还成立了以黄副部长为首的领导小组。在国家科委领导下，能源领域明确以快堆项目为重点，由国家科委牵头，国家6个部委会

签，最后决定快中子增殖堆占总经费 65%，高温气冷堆占 20%，聚变裂变混合堆占 15%。

由于国家“863”计划的经费支持，使快堆项目有了初步着落，部核电局决定：四川一院三所原来承担快堆研发的人员，只要夫妻一方有北京户口，都可以调回我院。在马福邦局长协调和一院任和院长等领导的大力支持下，1987年6月，我与李福恒书记、陈叔平所长一起到一院去动员组织这次调动。绝大部分有北京户口的同志，包括徐鏖、陈逸少、马大园等骨干一百多位同志顺利调回我院。陈叔平还特别要求我设法将已调到其他单位的李蔚芳、肖勋泽等技术骨干调回我院。为这次调动，院里克服了户口指标和住房等巨大困难。这些同志调回后构成了我院快堆工程项目启动的骨干力量。

“863”计划确定快堆项目后，为了显示搞快堆的决心，部拨款 2700 万元（当时部拨款最高限额为 3000 万元）建设快堆研究中心。为此，我院与四院合作，由四院承担了快堆研究中心大楼以及钠工艺、钠热工水力和燃料组件试验三座实验大楼的土建设计。1990年11月，由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主持进行了快堆研究中心的破土奠基仪式。这些建筑为开展快堆研发创造了良好条件。

1990年前后，我们抓住机遇，不失时机地开展了与俄罗斯在快堆领域的技术合作，对掌握国际上先进快堆技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还抓住意大利核能下马的机会，以很小的代价取得两条大钠回路和一大批可用于建造中国实验快堆的器材设备，节省了大量投资。

快堆项目由国家科技部主管，国防科工委和中核总都承担了一定份额的经费，是国家“863”计划中预算最大的项目。由于中核总黄齐陶副部长调任国家科委任职，继任的个别领导对快堆项目有不同看法，认为“863”计划是“不管儿子（先进压水堆），先管孙子（快堆）”，又认为“聚变堆在几十年内会成功，与压水堆可接上，不需要快堆”以及“国外快堆都已停建”等，因此，所承担经费迟迟不能落实，在向国务委员邹家华主持的 6 部委协调汇报会上以及在与俄罗斯技术合作等方面都持保留意见，使快堆项目几度难以为继，濒临下马。几经周折后，1995年3月，由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召集 6 部委协调，并经中央领导批准，经费问题才最后圆满解决，核能界也进一步明确，我国核能利用必须走压水堆→快堆→聚变堆的发展战略。好事多磨，中国实验快堆历经 24 年，终于在各方努力下基本建成。

“836”计划快堆项目从立项、起步到建成，对我国核能发展、对我院都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原子能院在中核总的领导下，不仅应看到“今天”，还应看到“明天”。核电作为低碳经济，当前发展势头迅猛，热堆装机容量很大，几十年后核燃料终成问题。将快堆及其核燃料后处理的研发作为我院发展的一个主要业务方向，是一重大战略决策，使我院成为该领域自主创新和人才培养的基地，成为引进俄罗斯 80 万千瓦快堆示范电站的技术后盾。实现快中子核燃料增殖和铀钚循环，将能使核电可持续地发展，将能在较长时期内解决我国的能源之忧，使我院能再一次有机会为国家，为民族立新功、立大功，像“两弹一艇”一样彪炳史册。

在快堆的立项工作中，我院王淦昌、戴传曾、汪德熙、李寿枏、王方定、王乃彦、阮可强、周永茂等老科学家多次参与可行性论证，并给予了大力支持。协助我、并任我院快堆工程领导小组副组长的杨天禄、康日新副院长，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在“863”计划快堆立项的长期共事中，我对陈叔平所长的高度事业心和责任感，善于发现、培养、使用和提拔人才以及卓越的专业能力和组织能力；对徐铄等一批老科技骨干对快堆事业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献身精神和精益求精的科学态度；对李中平等主题办公室和工程指挥部成员长期不畏辛苦、顽强拼搏和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在任内，另一件使我难以忘怀的项目是 30 MeV 强流质子回旋加速器和生产中短寿命放射性同位素装置项目的建设。

1984 年，我院第一台回旋加速器停止运行，光荣退役。1986 年，核技术应用所成立后，加速器室的回旋加速器如何发展成为问题。我院是以“一堆一器”起家的，回旋加速器退役时，技术已落后世界水平二十年，队伍也已萎缩。在引进串列加速器时，李寿枏副所长曾提出“一买二造”的设想，“二造”即自建一台回旋加速器。如能引进世界先进技术自建一台，升级换代，以此重建我院回旋加速器技术队伍，并能在日后生根发芽，将是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好事，对转民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1987 年，加速器室副主任张兴治向我汇报与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回旋加速器研究中心技术交流的情况，并提到国家科委与比利时签订的技术合作协定有“回旋加速器的医学应用”项目。由于当时比方开发的用于生产放射性同位素的“旋流”型 30 MeV 小型强流质子回旋加速器已达到当时国际最先进的水平，被美国权威杂志评入当年世界 100 项新产品清单。当张兴治提出从比方引进技术、合作建造一台“旋流”型回旋加速器的可能性时，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

1987年12月，我邀请比利时鲁汶大学该加速器研发者 Y. Jongen 博士来华讨论合作问题，通过谈判签署了合作意向备忘录。1988年2月，我国驻比利时大使馆发文给中核总外事局并我院提出“关于加强与比利时医用回旋加速器合作的建议”，使合作升温。3月初，我召开院务会议，汇报在我院建造一台强流质子回旋加速器和生产中短寿命放射性同位素装置的建议，得到了院务会议的确认，同意向国家计委申报和自筹部分经费。3月底，我去国家计委科技司向秦声涛副司长汇报了建造回旋加速器生产同位素装置的计划。秦司长表示，计委“七五”计划有该项目，因故延期到“八五”。对我院的计划，表示要与领导商量，认真考虑；并提出要我院自筹一半以上的经费。4月初，向王淦昌老院长汇报后，得到他的大力帮助。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以及司长蔡大烈、副司长秦声涛亲自到王老家中听取了我的汇报，并基本认可，但国家计委只能投入500万元，含80万美元额度，按计划我院还要自筹800万元。另外，要求我立军令状，保证专款专用，完成任务，我表态如批准，愿立军令状。

经院务会议再次确认后，院正式向国家计委申报。8月，国家计委下达“关于建造生产中短寿命同位素装置”及有关我院引进回旋加速器技术和设备的批复。在赴比利时商谈技术引进合同前，我与张兴治和王翌善等制订了完整的计划，对回旋加速器和生产中短寿命同位素装置所有子项目进行分解，确定了自造部分和采购部分的清单。划分自造或采购的原则是：凡国内具备条件造的，就引进技术自己造；凡国内短时间造不出或自造费用过高的就采购。我记得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实事求是，绝不蛮干。1988年10月23日，比利时驻华大使和商务参赞在大使馆接见我和张兴治。经过双方协商，我和原子能公司商务代表何永云代表中方在合作备忘录上签字。1988年12月20日至25日，我带领我院代表团张兴治、王翌善等6人，应比利时 IBA 公司的邀请访问比利时，继续就合同的详细条款讨论并达成一致意见。12月25日，双方正式签订合作建造回旋加速器的合同，决定引进离子源、PLC 控制系统、轴向注入系统等部分部件和引进全套技术图纸、资料和磁铁设计的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软件，自建主磁铁磁轭、线圈和液压举升系统、真空室系统、高频系统、束流输运管道及其他装置等。合同总计约80万美元，其中20万美元购买全套技术图纸、资料和磁铁设计的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软件（规定只能建造一台）。后又考虑到高束流强度靶的结构很复杂，短期造不出会影响放射性同位素生产，遂改为从比利时购买。

1989年1月15日，院成立以我和李公攀、王翌善为正副组长的工程领

导小组。下设回旋加速器工程组，由张兴治任组长，李振国、樊明武任副组长；张兴治负责工程全面工作；樊明武负责磁铁磁场计算和束流动力学；李振国、罗炳坤负责控制系统和电源系统；赵振鲁负责高频系统；贾弘道组（核技术所 49 室）负责承包真空、水冷系统；另调同位素所陈荣范负责机械设计和加工，以比利时的图纸为基础，重新设计结合中国国情和机加工工艺的图纸；张天爵、陈勇负责结合我国实际加工条件修改 CAD 软件，进行对磁场垫补测量值和利用数控机床对镶条加工修改量的计算，以保证磁场达到等时性的设计指标；陶启俊、呼岩负责磁场自动化测量仪等。同位素组由同位素所的李大康任组长，周正和任副组长。4 月 30 日，国家计委、财政部联合发文给核工业总公司，为加速器拨款补助费用 500 万元（含 80 万美元额度）。随后，我院即派出樊明武、毛皋翔、陈荣范等到 IBA 公司接收技术转让图纸和资料及磁铁设计的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软件。7 月 5 日，收到比利时 IBA 公司寄到的技术转让图纸和资料共 67 本。樊明武还按有偿服务赴比利时为 IBA 公司“旋流”型回旋加速器进行了三维磁场计算。

5 月，召开回旋加速器厂房施工会议，决定由基建处归口领导，由范晓路负责。厂房于 1991 年 10 月建成。但 1990 年至 1991 年，由航天部二院外协制造的真空室出现严重质量问题，北京重型机器厂外协制造的主磁铁磁轭在加工中发现精度要求太高而提出毁约的问题。这些单位都是大国企，当时改革还未到位，对外协很不负责任。我当时非常忧虑。特别是主磁铁磁轭已成半成品，扔在车间里既无遮盖也无人管，工人随意拖动，极易损坏，有可能成为废品。一旦报废，我们已无巨资重新冶炼铁料，工程已濒临失败边缘。想到已立下的军令状，我当机立断决定，真空室由院实验工厂重做；主磁铁磁轭半成品从北重拉回，借他们的巨型导轨摇臂钻设备，由陈荣范负责并调实验工厂焦传荣、马明武、刘景文三位技师继续完成要求精度很高的磁铁盖板钻孔，并在实验工厂完成对扇形磁极的精加工。在我向张昌明厂长调人时，他们正加班加点、忙于赶活，但他顾全大局，给予了积极配合。陈荣范等同志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千方百计想办法，在 201 室检修大厅，克服了吊车负荷不足等困难，渡过了这次危机，使我感到他们真是没有完不成的任务。在加速器主体总装中，由于对 8 块扇形磁极的尺寸和定位精度要求很高，为使磁场达到设计要求，需对磁场做精密测量，通过 CAD 计算，对镶条修改加工垫补和再测磁场，如此要反复数次。工程组为此自己设计制造了磁场自动化测量仪和数据获取系统，还设计制造了制作主磁铁线圈用的自动绕线机，扇形磁极角度测量仪等测量工具和工

装设备，终于出色地完成了加速器的加工和主体总安装及磁场测量和垫补任务，使精度达到了要求。与此同时，同位素所在王翌善的领导下，克服种种困难，按计划完成了项目的进度要求。周正和等配合基建处建成了生产车间，李大康、赵贵植等完成了制备中短寿命放射性同位素的工艺流程，并通过挖潜改造，建立了生产设施。1994年2月，主机运入同位素所厂房，加速器进入全面安装阶段。7月，完成安装进入调束流阶段。11月，在IBA公司工程师的帮助下，完成加速器15 MeV、22 MeV、30 MeV三个能量的调束，在同位素靶上束流达到372微安。1995年3月，生产出 ^{111}In 、 ^{67}Ga 、 ^{201}Tl 、 ^{57}Co 四种同位素，达到了国家的药典标准。1996年5月，通过国家计委验收。该项目含厂房全部总投资1350万元，仅相当于上海同期引进同一型号装置投资的约五分之一。在运行后产生了较大的经济效益，并促进了医用正电子发射成像仪（PET）在我国的推广应用，使我院成为全国唯一一家同时具有反应堆和加速器生产放射性同位素能力的单位。它的建成，为我院培养造就了一批技术骨干，使我国回旋加速器研制技术通过跨越式发展逐步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缩短了与先进国家的巨大差距，为我院随后设计制造用于“串列升级工程”的100 MeV强流质子回旋加速器和用于生产中短寿命放射性同位素的10 MeV小型回旋加速器研制奠定了技术基础。

我院改革转型中的这些往事已过去很多年了，回想起一同打拼过的那些老同事和他们无私奉献顽强拼搏的精神，历历在目，感触良多。新一代已完全成长起来，他们在过去的基础上做出了更加骄人的业绩。我们的事业已经后继有人，我深信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他们将会攀上我们曾梦想而未达到的新的科学高峰。

难忘的三次核试验

杨承杰

1964年参加第一次原子弹试验

1964年6月的一天，13室主任刘书林交给我一项任务——到新疆21基地参加我国第一次原子弹试验测量工作。

接受这项任务，我心情非常激动，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完成这项工作。接到通知后，我与基地来的三队主任陆祖荫和房士良同志立即动身。经过5天5夜的旅程，到达了中转站吐鲁番。第二天早晨天未亮，又改乘卡车出发了。汽车在高低不平的道路上行驶，颠簸得五脏六腑都要出来了，特别是汽车翻过天山山脉时，那弯弯曲曲的盘山道，使飞奔的汽车像悬在半空中似的。大概是高山反应吧，头晕恶心，什么声音也听不见。傍晚我们到达了基地司令部马兰，第二天早晨又从那里出发，直奔试验现场。夕阳西下时，我们终于在汽车上看到了实验场地那116m安放试验原子弹的铁塔。

场区生活比较艰苦，最困难的是喝水，这里的生活用水，都是用汽车从百里外的孔雀河运来的。水质相当差，又咸又涩，做菜做汤不放盐还觉得咸，白开水更不能喝，就是放茶叶也难以进口。用这种水洗头，擦了肥皂揉，头发像浆糊一样黏在一起，很难洗净。这些困难都还好对付，最让人没有办法的是刚来这里的人喝了这种水就拉肚子，拉得四肢无力，只有经过一段时间才能适应。即便是这样的水，大家仍感到非常珍贵。

在戈壁滩上，我们10个人住的小帐篷，白天经过太阳照射和地面反射，中午钻进去后就像进了高温烤箱一样，睡到帆布床上和睡在热水袋上差不多。中午过后，帐篷内温度一般在40℃以上，帐篷外温度更高了。但早晚睡觉还是要盖被子的，正如新疆民谣中说的：早穿皮袄午穿纱，晚上围着火炉吃西瓜。那时候我们外出工作都要带上3件宝：草帽、墨镜、水壶，我们就是靠这3件宝和恶劣的气候作斗争的。

到达试验场地的第二天，征尘未洗，我接受了三队副主任吕敏同志交给的

任务：对 703（距铁塔 50 m）、704（距铁塔 500 m）、两个地下工号中 8 台 SB-12 测试设备（其中 16 台高级相机）等进行全面检查。经过 3 个多月辛勤工作，我和基地的同志一起，终于完成全部设备的检查、测试、校正、标定和总控制站的联试工作等，消除了设备中的各种隐患，并培训了一些同志，使两个工号内的全部设备处于稳定可靠的工作状态，随时可以执行测试任务。

1964 年 10 月 15 日凌晨 4 点多钟，一道紧急集合命令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大家迅速地穿好衣服，冲出帐篷集合。部队首长作了简单的动员以后，发布命令：拆除全部帐篷，迁移至安全地带待命，执行第一次核试验中最后的一次全场联试后，各工号测试设备应处在“零时”待命状态，封闭 703、704 工号，全体工作人员天亮前撤离试验场地。

我被任命为 704 工号的技术负责人，组织上还替我配备了助手，具体负责 SB-12 示波器等各种测试设备的最后检验。我们最后一次进工号以后，立即进入紧张的工作。思想必须高度集中，动作必须正确无误，对待每一个数据都必须一问一答认真复核，然后再做下一项工作。在全部任务完成以后，我作为 704 工号技术负责人在文件上签了字，承担技术上的全部责任。然后，我们用沙袋封好了二道铁门，开始撤退到 50 公里外的宿营地。

几小时以后，我们又接到通知：去白云山观看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虽然大家一夜没有睡觉，却一点儿也不感到疲劳，一路上兴高采烈，爬过一座座山，最后爬上了白云山的最高点。山头上有一块很大的平地，可以容纳很多人，参加这次核试验的全体工作人员都已集结在这里。

山头上，每人有一幅高度衰减倍数的墨镜，大家面向核试验铁塔，面对着蓝天，心旷神怡，有说不出的高兴。主席台上，无数面红旗迎风招展，扩音器中播放着雄壮的进行曲，台上专线直接和北京联系，随时向中央报告和听取周总理的指示。

全国人民盼望的时刻就要来了，扩音器中传来了命令：我国原子弹试验就要开始了，请观看的同志做好准备。接着扩音器又传来了总控制站的声音：“十、九、八……三、二、一、起爆”的命令。我们参观的同志屏住呼吸，心跳得厉害。当主席台上通知看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朝核试验铁塔方向看去。铁塔上空腾起一团巨大的烟柱，随后又迅速升起蘑菇烟云直冲天空。顿时，白云山上沸腾了，同志们相互拥抱、跳跃，把帽子扔向天空，高呼我们成功了！当时每个人的心情都无法用语言来表达，那个壮观的场面，如果不是身临其境，也是无法领会的。这时主席台上的首长向守候在电话机旁的周总理报告了这一喜讯。

蘑菇云越升越高，随高空风向漂去。从三队同志那里了解到，总控制站从 703、704 两个工号的反馈说明全部设备工作正常。这时我心中一块石头总算落下了，我完成了领导交给的任务，回到了司令部马兰。

就在爆炸第二天，组织上又交给我一项重要任务：对靠近铁塔 703、704 两个工号内回收的 16 卷胶卷进行冲洗。当时爆炸后铁塔的周围放射性是很强的，一颗小石子就是一个放射源。防化兵战士冒着生命危险，从两个工号内把胶卷装在铅罐内，运回马兰，亲手把 16 盒胶卷交给我和 2 位助手，这时我心里热乎乎的，觉得解放军战士真伟大。在平时这是一件普通工作，但在这时，却是一项责任重大的关键工作。几年来，党和国家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几乎动员了全国的力量来研究和试验核武器，这试验后的重要测量数据，对今后进一步研究、改进核武器性能将有重要的意义。认识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一定要把这项工作万无一失地干好。开始准备工作，按标准建立暗室，配备用具和化学试剂，制定各种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岗位责任制。接着我们开始了战斗，经过一个通宵的奋战，两个工号 16 盒胶卷全部冲洗出来，底片清晰，反差合适，核试验“入”值曲线非常清晰，效果很好。面对冲洗出来的胶片，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又成功了！部队首长看后也很高兴，热情地表扬了我们。

在这次核试验中，我本人获得国防科委授予的三等功。据三队同志讲，703、704 两个工号荣获集体二等功。SB-12 示波器获全国科技大会奖和郭沫若同志签发的科学院奖状。21 基地称 SB-12 示波器为“功勋示波器”，它在近 20 年 20 多次的核试验中，为核武器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重要数据。

1969 年参加第一次地下核试验

“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时军管会领导召集 15、13、2 室等部分同志开会并宣布：部里下达给我所一项机密任务，这项任务由 5 人承担，15 室一位同志任负责人，到新疆参加地下核试验。

该项目大约用一年时间准备，分 3 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进行物理设计和方案讨论；第二阶段材料、器材准备；第三阶段把材料和器材运往新疆执行任务。

开始执行这个计划困难是很大的，如封装 ^{232}Th ，简单的工作场地都没有，更不用说防护通风设备，在器材处后院一小房内进行操作封装。后到包头 221 厂（厂内空无一人）把砖头大小特别重的金属 ^{238}U 运到厂外一个闷罐子 50

吨车皮内。因为“文化大革命”，特别乱，车皮内有粪便，很脏，没人管，我们把车内打扫干净，车皮一头放 238U 和 232Th（放射性极毒物质）；车皮另一头，放了草垫子，以便晚上休息。我们有 7 位同志跟车武装押运，我院 4 位，另 3 位是解放军，1 个连长 2 位战士。一路上车停停靠靠，到吐鲁番车站不知走了多少天。因为它不是专列，只能有车经过的时候挂在别的车后面。一路上车一停，我们就下车找水，找吃的。这还算可以对付，最困难的是列车在快速运行时，车内空气由前向后流通，一些灰尘和放射性物质会被人吸入体内，但是为了核试验，大家对自己考虑不多，一心想完成任务。车到甘肃境内，车皮又停住了，刚好有一军列要到试验场，我们请求车挂在专列后面，他们不同意，为此，在车站与北京军区联系，亦没有结果。从包头到吐鲁番用了多少天，大家也不知道了。到了吐鲁番以后，部队用卡车把我们的材料安放在司机座后面，运往洞口。后来别人告诉我们，经剂量监督检查，司机座剂量大大超过允许的标准。在洞口，我们把东西运到另一个很大很高的洞穴内存放。之后我们便开始休息了，为第二天工作做准备。当晚半夜，我们被惊醒，司令部的同志命令我们到司令部去，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到了司令部后问了我们带的放射性物质的情况，然后到安放材料的地方检查，结果地面均无放射性污染，很干净，洞内局部通道上方空气中，有大面积的放射性物质污染，但不是我们的材料泄漏所致。最后查明放射性物质是由洞内岩缝中泄放的氡气所致，泄漏的氡气加上通道上方通风不畅，通道内氡气越聚越多，所以发生了这种意外的情况。

为了在“零时”以前完成计划，第二天我们就开始工作。我们的工作是把金属 238U 和 232Th 按物理设计安放在不锈钢外壳墙体外最近的位置，把元件放在洞穴内由管道把大量中子引入。到这里，我们完成了全部任务。我们离开洞穴的时候，到出洞口做放射性剂量测量，口罩上放射性物质剂量超标，仪表指针打到头，污染严重。但我们回到住处后，听到好消息，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了！这次核试验我们虽然吃了很多苦，但也是对核试验的一份贡献。

为我国氢弹试验研制行波示波器

1964 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1967 年爆炸了氢弹。从原子弹到研究氢弹成功，我国用了 2 年零 8 个月，美国人用了 7 年零 4 个月，苏联用了 4 年，法国用了 8 年零 6 个月，我国是速度最快的。但是，随着核试验的发展，它对主要核测试设备的精度要求越来越高。例如，SB-12 示波器频宽 500MC，速度

51 ns/cm，瞬间控制电路能捕捉到原子弹裂变信号后再捕捉到氢弹爆炸聚变信号等一些精细测量技术要进一步提高。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国外有法国 OZ-100、美国 519 等示波器，它们性能频宽 1000 MC，有比较高的灵敏度和记录速度，国内在这方面是一个空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研究行波示管，于 1969 年提供我所合格管子后，21 基地正式提出：要求 1970 年 10 月提供一台行波示波器为氢弹核试验使用。为此，所领导和 13 室非常重视，专门成立了大的题目组，由 9 人组成。全题目组同志发扬齐心协力、严谨求实的精神，加班加点，完成方案设计和电路实验及机械设计等，1970 年 10 月按时把仪器交给了 21 基地使用。

这之后，21 基地反馈使用情况时说，在这一次核试验中，当量非常大，很多现场测试点未取得的数据都被我们这台设备获取，发挥了重要作用。1983 年 8 月 23 日，21 基地来公函对设备进行了评价：“原子能所为我们研制了一台行波示波器，该仪器灵敏度高、频带宽，在使用中圆满获取了数据，为核试验作出了贡献。”

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初建琐忆

刘树霖

我是阎村镇吴庄人，村子距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不到一公里。1955年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初建时我十五六岁，不少所干所见所闻至今仍有深刻印象。

人力钻探

1955年时，我们国家刚解放不久，还处于经济恢复期，各方面条件有限。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开始建设时不少设备相当简陋。地质勘探主要靠人力。钻探时先立起井架，安装好钻杆钻头必要设备，然后在井架顶上安上滑轮接上大麻绳。钻探时每眼钻井需一二十人，由一人喊号子，大家一起拉住大绳用力把钻杆钻头拉起来再撒手放下。这样一下一下把钻头往地下蹶，把地下岩层蹶到钻头里提上来。一根钻杆够不着了，再由钻井工人接上一根钻杆，继续往下蹶，直到把需要了解的地质情况了解清楚，再转移到一个新的地方。当时人们把这种办法叫拉绳钻探，把干这种活就叫“拉绳”。那个领着喊号子的要选脑子好会编词又负责任的。号子词都是现编现喊。大家随着号子一拉一放，反复进行。只在换钻杆钻头时才休息一会。拉绳的都是附近村子的农民。

当时，我才十五岁，高小毕业后没考上中学，因个子不小就冒充壮劳力去拉绳挣钱。工作是一天24小时三班倒，一天工资是1.5元。在当时算不低的收入了。我去拉绳是平生第一次挣到现金。当第一次发工资时，我可高兴了。

“拉绳”工作虽然简单，但回想起来，还是很艰苦的。当时钻探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区，处于北坊村以北、沙窝村以南，东到良坨铁路，西到大石河的大片空地。拉绳钻探全是在露天地里干，夏天要忍受烈日暴晒，冬天要忍受天寒地冻，夏天太阳把人晒的脱了皮，冬天冷风把棉衣打透，冻得手脚开裂，不住打哆嗦。民工是如此，正式钻井工的防护设备也很简单，夏天顶着太阳挥汗如雨，冬天顶风冒雪，钻头钻杆冰凉，戴的手套常结着冰。工作虽然艰苦，但大家并不觉着太苦，因为当时条件就是那样。

互信洗衣

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刚建设时，工作人员不少是从北京等城市来的，当时居住条件简单，有的住工棚，有的住在附近村子的老乡家。其中不少人洗衣服是一个问题。有的工作人员就花钱找当地妇女给他们洗衣服。开始时这种情况还比较少，后来越来越多，一些比较开通的妇女就到工人常住或常经过的地方去收衣服，回家洗好晾干，再按约定把衣服送去。工作人员收到洗好的衣服付给洗衣钱。当时，经常看到我村的一些妇女去干这种活，她们每天到固定的地方去收衣服，回家洗干净晾干，再送回去，把钱收回来。当时的工人和农民有着一种很朴实的互信风气，工人把衣服让收衣服的人取走去洗，不怕衣服不送来。洗衣的农村妇女也会按约定办事，洗好按时送回。有时工人的衣服里也会有些小物件如手帕、钢笔、纸币之类，洗衣的妇女都会把这些东西原物送回。要知道，当时手帕、钢笔在农村也算是比较重要的物件了。不少农村男女找对象给块手帕或一只钢笔要算比较贵重的礼物了。而洗衣的妇女会把这些东西原物送回体现了当时社会纯厚的互信之风，现在回想起来还不免有些心动。

露天影剧院

上世纪 50 年代，农村的文化生活还是很贫乏的，电影还非常少见。但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开始建设不久，就经常演电影。演电影的地点是在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区北墙外良坨铁路西不远的地方。当时，那里是一片空地，电影就在露天挂起银幕让人们观看。看电影的人可多了，不仅附近村子的人去看，离那里十来里的人也去看。每演电影都是人山人海，不少家庭都是一人看家全家出动，一些小脚老太太也不管天黑路难走颤巍巍地跑去看。到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看露天电影成为当地的一件盛事。

随着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建设，各种条件也逐步改善。大约是 1956 年，在南区建起一座露天影剧院，舞台带顶，设备在当时来说也比较先进，但观众还必须在露天里看，四周有围墙，电影票是五分钱，每星期演一两场，不仅工人，附近农村也有不少人去看，门票虽然便宜，不少孩子和年青人也不愿意花，办法是从影剧院的西南角爬墙进去，我自己就曾不少次这样去看电影。在这里不仅按时演电影，有时也有很知名的戏剧演出。那时我对戏剧还不太懂，只知道知名京剧演员李万春、李慧芳等都曾在这里演出过。我印象最深的是 1958 年

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建成时，在中秋八月十五那天，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在那里演了“贵妃醉酒”，为了让更多的人观看，演出地点是在现在的原子能博物馆的北面，当时的一个足球场，在那里现搭了一个舞台。看戏的人非常多，轰动一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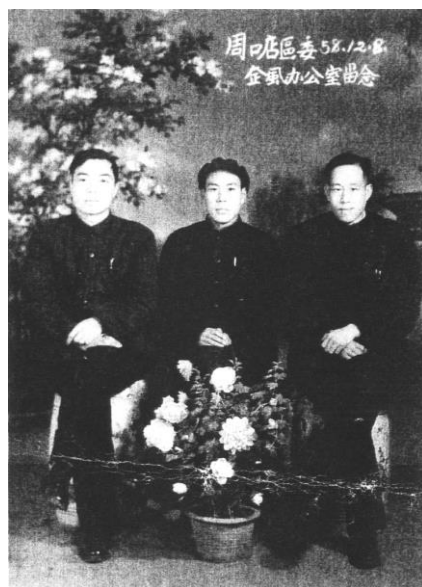
有偿占地

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开始建设时，土地改革刚进行没几年，初级农业社才刚刚开始，大多数农民还是自己种地。开始时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占地是有偿的，占谁家的地给谁家钱。价格大约是每亩地 50 块钱，在当时来说是不低的价格了。如公主坟村我岳父家，土改时在现在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商店附近分了十亩地，全被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占用了，给了 500 元钱，公主坟、南坊、北坊、吴庄等村，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开始占地时都是这么办的。

房山县整风运动的回顾

王绍清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报告中，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西方国家趁机掀起反对共产主义的浪潮，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对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不够妥当，如波兰、匈牙利出现骚乱；国际共产主义的动荡波及到中国，引起一些人员思想上混乱。加之当时国内社会主义改造有些急躁，粮棉油实行统购统销后，生活资料有些短缺，在商品分配上有些不均现象，社会矛盾突出起来。当时又处在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时期，出现了大量人民内部矛盾，个别干部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有强迫命令的恶劣作风，引起群众不满，个别地区甚至出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闹退社的现象。



周口店区委整风办公室部分同志合影

房、良两县当时尚无“两罢”之事，但农民闹退社时有发生。有的社员将入社时的毛驴牵回家，因“四评”（评土地，评劳力，评农具，评牲畜）意见分歧，集体生产搞不起来，故此进行整社。房山县有33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转为互助组，加之个体农民连同退社户达1345户，并清除101户地主富农出社。良乡县47户退社，清除154户出社。1957年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制止了退社现象。

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中，国内出现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如不妥善处理就会严重脱离群众，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系统阐述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and 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主要根源是“官僚主义”，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产生原因和表现作了分析：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

革命意志有些衰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减少了，而闹地位，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了起来，有些干部见群众一句好话没有，有的还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这样下去势必破坏党的优良作风以及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官僚主义不仅渗透到国家机关而且渗透到党内，如不及时加以整顿，及时纠正，会严重脱离群众。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进行整风运动的通知，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中共房山县委按照河北省委指示及中共通县地委整风会议的部署，于1957年5月召开县直机关干部大会，传达中共房山县委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具体意见，要求各单位组织学习好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联系实际对党的各项工作，特别对县委政府以及本系统、本单位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

由于毛泽东同志在各地多次讲话，想通过此次整风消除官僚主义以缓和人民内部矛盾，但要消除官僚主义仅靠党内整风还不够，必须有来自外部的批评，提倡党外整风，当时中央和省部级单位高等院校大鸣大放已推向高潮。房山县的整风延伸到下属企事业单位和学校，影响到乡镇农村生产队，掀起了群众性的整风运动。

1957年5月底，财贸清理及肃反工作基本告一段落。中共河北省委指示：要求各县本着严肃谨慎的原则，进行二次甄别复查。我当时正在供销总社组导科工作，县委组织部电话通知我马上到部里开会。

原来，根据地委指示，要求各县立即成立整风办公室，房山县整风办公室共设5人。由部长负责办公室全面工作。一位县委办公室干事负责整风办公室资料工作及上报下达，并作县委研究整风会议的记录。一位组织部干事负责掌握各单位整风情况。我负责收集群众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改造方面，特别对商业改造中群众提出的意见，要下去调查核实，待县委整改时备用。党的关系转到县委后，成立整风办公室党小组，共6人，我当选为党小组组长。分工后，马上清理南大屋（原孔庙后院），并通知电话局安装电话。

1957年6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社论后，房山县各机关整风正处在大鸣大放大字报高潮时期。中共河北省委下发了关于反击右派进攻的文件，入秋，地委召开会议要求对右派言行进行批判，县委召开县直机关主要领导人员会议，传达省地委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进攻的指示，要求对各单

位在批判右派言行时领导要认真负责，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可以通过大字报、小组会进行批判。对点名批判的，县委指出“三不准”：一不准体罚，二不准丑化，三不准打骂。在反右派高潮时，地委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划分右派及处分的指示，简称“六条标准”。文件规定，定为右派要经群众讨论，基层党组织要按照组织部门干部管理规定逐级审批方可定为右派，按其言行分别给予处分，处分分为五项：劳教、监督劳动、撤职降级、降职降级降薪、免于处分。房、良两县受一类二类处分的很少。截止到1958年3月，房山县共划分右派36名，反社会主义分子6名，良乡县划右派34名，反社会主义分子2名。房、良两县定的右派均由通县地委同意批准，其中有三名是向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备案的。

1958年4月，房、良两县合并划归北京市，改为周口店区。反右派斗争继续进行，定性右派的要经中共北京市委文教部、统战部批准。在职工中不再划反社会主义分子。房、良两县属于北京市，矿区领导的大队机关学校商店，1958年4月全部划归周口店区领导。到整风结束，全区共有右派201名，有关史料登载的245名右派，包括外交部西城区以及外省市遣送还乡的，这些人逐步调回原单位。据有关史料记载在全国共划右派55万人，北京市共划右派11780人。1978年至1980年先后复查改正了11698人，未改正的82名。

整风反右基本结束，各单位将右派全部下放农村劳动，在管理上不一，有的归派出所管理，有的由农村生产队按“五类分子”管理，有的由大公社管理。大部分生产队只管干活不管其它，右派家中有事请假无人敢批，吃住自理，有的自下放劳动几个月没回过家，劳动干活与社员在一起。

1959年春，周口店区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公社干部向区委请示对下放农村劳动的右派怎么管理，区委责成下放干部办公室进行调查，并决定采取集中管理措施，成立房山县石子厂，厂址设在西坟村，由工业局出资5000元，购置了部分生产、生活工具。工业局派干部3名，职工4名，警卫1名，负责生产业务。为加强右派思想政治工作，建立改造右派工作管理办公室，设干部四名。我任办公室主任兼石子厂党支部书记。

当时办公室以及集中的部分人员，办公和居住主要是租赁民房，生产以筛石子为主。筛石子是重体力劳动，年老体弱体质差的不适应，人员思想有些波动。为加强人员思想改造，经办公室几次分析人员状况，决定开发大石河几百亩荒地，一部分人由筛石子转入农业。将人员重新划队，编为四个队：一、二队以筛石子为主；三队为农业队，下设田园、畜牧、果树三个组；四队为后勤

队，下设会计室、医务室、基建、小卖部、伙房五个组。每月有一至两天学习，宿舍有小组学习园地，人员思想比较稳定，有利于思想改造。

据记载，当时共开荒种地 240 亩，其中种苹果树、桃树、葡萄、玫瑰花嫁接毛子杨等 6 万株。园田 10 亩，产菜自食，放假休息每人限购 5 至 10 斤鲜菜带回家。养猪 50 头，牛羊 50 只，海狸鼠 100 只，鸡 200 只。自己烧灰建房 45 间。办公室工作人员每天到生产一线，晚上听取各组汇报生产及人员思想状况，次日在工地作思想工作，因生产基本转入了农业，工业局派的 4 人撤回，生产业务思想教育由办公室统一管理，“文革”后期此地转为“五七”干校。

1959 年秋，中共北京市委“关于给右派摘帽”会议后，当年有 20 名右派摘掉了帽子，占右派总数的 7.1%。1960 年秋，有 35 名右派摘掉了帽子，占右派总数的 18%。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以及北京市副市长乐松生多次来房山考察工作。市委在召开大专院校、市直属机关及区县委书记参加的统战工作会议时，对房山县的右派改造工作给予表扬。

1961 年秋，有 57 名右派摘掉了帽子，占百分之 21.5%，在石子厂劳动人员家属有的写信，有的家属亲自到办公室对他爱人在生活上给予照顾表示感谢。

1962 年，有 45 名右派摘掉了帽子，有的还安排了工作。这年，县委统战部安排我去华北统战干部学校学习。学习期间，我还就关于右派改造工作作了发言。

1963 年，有 44 名右派摘掉了帽子。1964 年，1965 年石子厂劳动人员减少，有的安排工作，有的还乡，1966 年 4 月，经研究我被分配到产粮区窦店公社任主任职务。正准备上任时，“文革”开始了。有的机关单位农村生产队到石子厂乱揪乱斗，造成人员思想紧张，有的准备逃跑。我因此没有到窦店公社任职，仍留在石子厂。没隔几天，某村贫下中农造反兵团的四五个人开着拖拉机冲进石子厂，要把该村的右派拉回村批斗。我答复：不能跟你们走，办公室有条文规定，机关厂矿和农村大队，需要带回批斗的，要经办公室研究后，由办公室人员将被批斗对象送到单位，批斗会结束把人带回。

当时支左办公室了解石子厂管理情况时，被揪回单位及家乡批斗的人员中尚未发生重大事故，认为石子厂这种做法是可行的。

“五七”整风运动距今有五十多年了，关于右派管理与摘帽工作文字记载很少，现将房山县委改造右派工作作些简要回顾，以供后人参考。

长沟公社“四清”亲历回眸

李 耀

1963年10月，根据市委的统一部署，县委决定在全县所属的公社，分期分批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确定第一批进行的有石楼、窦店、琉璃河、南召四个公社。县委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工作队，派驻各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作为县委派驻石楼公社的联络员，负责该公社社教运动的联络工作。因此在运动开展的过程中，我有机会巡视各村运动的情况，及时了解运动的进度和问题，以便完成联络任务。

第一批开展社教运动的四个公社，是按照中央制定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和《关于目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两个文件精神进行的。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重点放在了经济领域方面，其主要目的是通过这次群众性运动，使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提高觉悟，改进思想和工作作风，加强财务管理，增强阶级斗争观念，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段的社教运动，总的看还是比较和缓的，也起到了一定的教育作用。

1965年8月初，在市委直接领导的通县“四清”大会战结束后，为了贯彻中央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的精神，决定立即在全市农村全面铺开社教运动，由于这次社教运动从内容、方法和重点对象都与前一段运动有些不同，故明确以后的运动不再称谓为社教运动，而统称为“四清”运动了。这次运动规模空前、声势浩大。在中央和市委的直接领导下，从中央机关、部队、学校、市县各级机关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队，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法，深入农村开展“四清”运动。在县“四清”总团的领导下，各公社都组建了“四清”分团。我作为长沟公社“四清”分团办公室的一员，直接参与了该公社“四清”运动的全过程。

四十多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记忆犹深。回顾这一段历史，则会使我们更深刻的认识到坚持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性，也会使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团结和谐、幸福美满的生活。

“四清”的由来

“四清”运动的开展，是长期以来党在农村工作中所犯的“左”倾错误的必然结果。这一运动的形成和发展与当时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是紧密联系。由于对形势判断的失误，“四清”运动在开展的过程中，也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

从国际形势看，上个世纪 60 年代中前期，正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孤立和封锁。特别是中苏关系十分紧张，已由意识形态的分歧与争论，发展到国与国之间严重对立。当时党的“九评”的发表，就是把这场论战提高到所谓坚持和捍卫马列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高度来进行的，并以此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毛泽东当时认为苏联党已蜕变成修正主义，并认为这种修正主义思潮已严重影响到党内，中国也已出现了修正主义。当时中央有关部委领导，针对国际政治环境和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亟待恢复和发展生产，尽快摆脱困难局面的实际情况，向中央提出调整国际关系的斗争策略和对外经济援助的方针，并提出鼓励群众发展生产的一些措施。然而这些合理的建议，不但没有被接受，反而被当成修正主义的纲领和中国党内已出现修正主义的佐证。为了所谓反修防修，教育全党，当时就把这些合理的建议，概括为“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要和，对各国人民革命支援要少）和“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给予无限上纲，在全国掀起一场大批判。使得一些领导干部受到了严厉的批判，甚至撤了职。也使得一些能有效调动群众积极性，发展生产的好措施受到了遏制，延缓了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从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看，国家正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群众的生活十分艰苦，思想也不够稳定。在这一重要的历史时期，有一些干部和群众经不起困难的考验，出现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多吃多占等腐败问题。在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封建迷信活动和刑事犯罪等丑恶现象。对这种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和一定范围内出现的现象，缺乏清醒和冷静的分析，而习惯于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毛泽东同志，认为在党内和社会上已出现了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此，决定要在全中国范围内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广大农村从“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入手，侧重于从经济领域清除资本主义的影响。这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来即被称为“小四清”。

随着社教运动深入发展，中央和各省市的工作队在试点的过程中，由于带着阶级斗争的框框开展工作，纷纷总结出所谓阶级敌人篡夺领导权和干部“和平演变”的典型材料，进一步渲染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因此，也就使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形式内容和重点对象上都有了重大的调整 and 变化。中央决定运动的重点从过去的“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转化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夺权斗争了，矛头直指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际上指向了各级领导干部。因此，这场以夺权为特征的“四清”运动，就在各地疾风暴雨般地开展起来了。

长沟公社“四清”概述

长沟公社的“四清”运动，从1965年8月中旬开始，于1966年6月中旬结束，整整进行了10个月。

长沟公社“四清”分团共有工作队员263人，是由新华社、北京市交通运输局、北京工业大学部分师生和县直机关抽调的干部组成。其中以新华社的干部人数最多，还有部分社会青年参加了“四清”的实践活动。

分团的正副团长，分别由市交通运输局的刘楦和新华社内参部的汪钦担任。分团下设办公室和政治处。全公社18个大队和县属的基层企业、学校和公社机关都派驻了工作队。我做为分团办公室的一员，参与了公社“四清”运动的全过程。长沟公社的“四清”运动，分为五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工作队主要任务是集中精力抓好农业生产。因为“四清”运动是一场夺权斗争，因此工作队进村后，就取代了村党支部和大队的领导，也就承担了“四清”和农业生产的双重领导责任。8月份正值秋田管理的关键时期，因此这一阶段的工作重点就是集中精力抓好农业生产，争取有个好的收成。

这一阶段在工作队内部，主要是深入学习中央制定的“二十三条”和中央下发的一些“四清”的典型材料，听取和讨论王光美关于“桃园”四清工作经验的录音报告，通过学习提高对所谓阶级斗争严重性的认识，为下一步开展“四清”运动做好思想上的准备。

第二阶段要求工作队深入群众，依靠贫下中农，组织好积极分子队伍，为下一步夺权斗争做好组织准备。在这一阶段，工作队根据通县“四清”大会战的经验，采取解放初期进行土改的工作方法，要求工作队员深入群众，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特别强调依靠贫下中农，初步摸清干部和群众中的政治和经济

问题，并进行疏理和排队，初步确定运动的重点人和重点事，为下一步群众性的大揭发，开展夺权斗争奠定基础。

第三阶段，工作队充分发动群众，特别是要依靠广大积极分子揭发检举，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在这一阶段通过揭发检举，对农村大队历届领导干部 964 人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在审查的过程中，为了解放大多数，号召干部自查自纠，召开宽严处理大会，使 320 多名干部说清了问题，很快得到了解放。使工作队能够集中精力抓好对重点人和重点事的清查。同时分团党委还抽调力量，亲自带队，分赴三个打不开局面的大队，帮助工作队开展攻坚战，推动运动的开展。这一阶段是“四清”运动最激烈的。虽然查出了一些问题，但也使一些干部在审查的过程中，在思想和精神上受到了伤害。

第四阶段，是在揭发检举告一段落的基础上，重点转入后期的组织处理。根据运动后期的统计，犯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多吃多占等经济问题的有 548 人，共退赔现金 46470 元，退还粮食 129100 斤。

在清理阶级队伍和组织处理的过程中，有 32 人分别戴上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历史反革命和地主分子等帽子，给予了监督管制，还有 1 人被逮捕判刑。在党的组织处理中，有 68 名党员分别给予了开除党籍或劝退的处理。

第五阶段，是抓好组织发展和领导班子建设。在这一阶段，一是抓新党员的发展，壮大党的队伍。对在运动中表现积极，经受考验的 235 名积极分子发展入党。二是认真抓好大队党支部和大队行政领导班子的建设，组建一支不走的“工作队”。在组建的过程中，“四清”工作队对干部的思想品德、工作能力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审查，慎重推荐，通过选举，组建了新的领导班子。这一届领导班子在“四清”后、“文革”开始前的短暂时间里，带领群众学大寨，平整土地、兴修水利等农田基本建设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好景不长，“文革”爆发，一场更为激烈的阶级斗争风暴开始了，广大农村又一次陷入了动乱之中。

回顾长沟公社“四清”运动的历史，尽管执行了一条“左”倾错误的路线，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但从客观上讲，在一定程度上对改进干部作风，加强农村的经济管理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对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以及社会上的封建迷信和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等起到了一定的震慑和警示作用。但由于这场“四清”运动，是在严重的左倾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运动的重点错误地指向了党内各级领导干部，使不少干部和群众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同时在运动中还以坚持和维护社会主义集体经

济为由，把有利于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符合生产力发展的一些有效措施，当作资本主义倾向或“资本主义尾巴”予以严厉的批判，极大地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群众生活的改善和提高。与此同时，由于在“四清”运动中，要依靠贫下中农，挑选和组织积极分子队伍，就使一部分人得到信任，而使另一部分人受到了冷落，这在客观上影响了群众之间的团结。就长沟公社而言，在“四清”后不久掀起的“文革”运动来看，在群众中很快形成对立的两派，虽然都打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旗号，但两派的基本力量，就是“四清”后上台的干部和“四清”时的积极分子为一方与“四清”下台干部和一部分群众为另一方，在所谓的“革”与“保”的斗争中博弈，这一历史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三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充分证明，只有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形势，坚持科学发展，增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加快经济发展、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才是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的正确选择。温故而知新，历史的教训是不能忘记的。

回忆破拆高线架

李志国

1947年，我京西解放区为使兵工厂多造枪炮，支援解放军转入外线作战，“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就组织群众拆掉原光绪三十三年修筑的“坨红线”之前山至红煤厂段的高线铁架子，以解决兵工厂造武器的需要。

前山站至红煤厂的高线架，途经下英水村、中英水村，共有六座高线架。即石板坡山顶隧道内一座，高约15米；石板坡西支脉半山腰一座，高约150米；东港沟李成果三角地一座，高150米以上；石安岭山下一座，高百米以上；原马家地梯田高地一座，高15米左右；驴驹鞍山北侧一座，高约15米。

翻身后的下英水村广大干部和群众，听说要拆高线架，用于生产枪炮打击敌人，都积极响应，踊跃报名参加。此项工作，由时任村长王全和、副村长李文悦负责组织实施，很快挑选了年富力强、善吃苦的李宗福、赵景树、马向山、李文秀、李成祥、李久长、刘玉祥、范朝亮、王兴原等人组成拆高线架小组。

人员组织起来之后，干部们考虑到尽管大家决心大，热情高，但拆高线架，毕竟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更何况又是冬季，任务艰巨，且有危险，心里没有底。于是组织大家反复讨论，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大家表示：“我们早日把铁架拆完，运到兵工厂，生产枪炮，供给子弟兵在前方打仗，战士就少流血，我们吃点苦算个啥？”、“战士在前方流血牺牲，保卫我们和平幸福生活，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我们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完成任务！”异口同声的表态，让干部们的信心更足了，决心更大了。于是决定先从石板坡半山腰那个大架子开始，并很快备齐了拆架工具。

11月上旬的一天，拆架组的人员，带上干粮，背上工具出发了。到目的地后，选择了山脚下一块较平又背风的地方，拉开了阵势，摆开了战场。点燃了烘炉，拉动了风箱，锻造剃子冲子。然后挎上大绳，带上铁榔头、剃子等工具，上了山。到地方后，先把几根大粗麻绳子结在一起，由一人将一头系在身上，另一头甩在地上，爬上了铁架顶端拴牢后下来。其他人分为四组，两人一组，各在铁架底部的四个水泥墩角铁铆钉处，开始破拆。一人双手把住剃子，

另一人用榔头敲击剁子上端冲剁铁架子底部的铆钉，使用榔头的人，要特别小心，稍一走神，榔头打偏跑了锤，就会砸到把剁子人的手。铆钉实在难以冲掉，就把架底部的角铁剁断。敲击剁子的“叮当”声，震响了寂静的山谷，在山谷回荡。剁子用秃了，再回炉重新打刃，反复多次，直至剁子太短不能用为止。当架底部的四个角剁冲的差不多了，人们开始撤到较安全的地方，大家一起用力拉动地上那段大绳，齐喊“一二三”的口号，反复晃动铁架。这样反复多次，才把铁架子拉倒。架子倒地后，先剁靠地那些角铁，然后用大撬扛把铁架撬翻到人能工作的安全地带，再进行剁。在山上剁的角铁，大都是些联结的大件，因山坡陡峭，难度较大，只好由几个人，把大件用肩抬或用撬扛翻滚下山。抬铁架时，荆棘缠绕，枯草溜滑，人们只能小心翼翼地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着脚窝，一手扶肩上角铁架，一手抓住那些荆稍枝茎、野草，艰难地把角铁抬下山。稍不小心就有滑下山坡的可能。把较大段的角铁抬翻到山下后，再截成两米左右的段，人们再用背篓背到离村二里路远的路边，交政府统一用毛驴驮运到解放区的曹家坊兵工厂。

下英水村的高线架，大都在山上，地形复杂，坡陡无路，风大寒冷，无现代化的工具，完全靠自制的土工具，很是困难。在拆高线架两个多月的日子里，每个人穿的棉袄都被汗水湿透了，晚上回家，用火炉烤干，每人的棉袄都板结变硬了，第二天照穿不误。

参加拆高线架的干部和群众，在时间紧，任务重，困难多，劳动强度大的情况下，发扬了吃大苦，耐大劳的革命精神，圆满地完成了政府交给的任务，支援了军工生产，为解放华北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次惊险的遭遇

张树才 口述 张启华 整理

1946年农历五月初，国民党二〇八师住长辛店的三千多人在坦克、装甲车和山炮的配合下，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当天上午10多钟就占领了坨里等大部村庄。我解放区军队人员少，武器差，挡不住敌人猛烈攻击，从坨里以外平原地带撤到磁家务村以里的山区地带。各村的民兵也随部队转移到山区。

这天下午2点多钟，敌人占领了磁家务村，由敌二〇八师的一个加强连和日本时期被改编的皇协军张德祥的一个大队四百多人驻守。

三天后，敌人就向辛开口村、漫水河村、口头村、磁家务等村要民夫，到牛山上修建炮楼。如果这个炮楼建成，能看到半壁店村、三福村、黄土坡村的全景。对我解放区军民进出磁家务村到敌占区开辟工作非常不利。

在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良乡县三区区委书记兼区长李兴民召集常委会议，参加人有副书记吴怀聪、武装部长张凤田等研究怎么对付敌人在牛山建炮楼这个问题。经研究决定：由张凤田带领各村的基干民兵，每天去大北岭、安口山一带监视、干扰敌人建炮楼的进程，拖延建炮楼时间。同时向县委报告，请示北岳军区派大部队，拔掉磁家务这个据点。

一天拂晓，张凤田带领民兵来到安口山。经观察发现，敌人每天早晨七点多钟，都押着民夫赶到建炮楼工地。张凤田就让民兵放枪干扰，吓得建炮楼的敌人监工和民夫不敢起身。

七天后，张凤田带着河东村、东庄子村民兵张玉福、魏天魁、张玉友、付文、张树才、付森、李景珍等于拂晓前来到安口山继续监视敌人动向，并派张玉福、付文二人去马仙洞的小道上检查埋的地雷。张、付二人刚要走，被敌人发现，用机枪向安口山民兵的阵地射击。

张凤田命令赶快往西大北岭撤。刚撤到三鸡洼，发现有一个排的敌人从黄土坡村向大北岭方向冲来。民兵们急速地向敌群掷了几颗手榴弹，用排子枪射击敌人。抵挡了两三分钟，敌人的火力太猛，实在难以打退敌人攻击，张部长见机行事，果敢命令民兵赶快往西岭子方向撤，他和张树才掩护。张玉友、魏

天魁、张玉福、付文、付森等撤走后，张凤田和张树才边打边向三鸡洼山顶上撤退，他们俩刚到山顶，就听到马仙洞山上的敌人大喊：“就剩下俩人了，捉活的！”

张凤田见再也无处退了，北面是悬崖峭壁。大声跟张树才说：“你赶快从桥子石小道撤走，我掩护你。”树才说：“我不走，咱俩跟敌人拼了。”张凤田部长说：“不行！这是命令，你快点走，别耽误时间了！”

张树才撤走后，十几个敌人端着上刺刀的步枪，向张部长步步紧逼。有个敌人喊：“不要开枪！要抓活的！”这时张凤田已退到峭壁的边沿了，再也没地方退了。张凤田高喊：“共产党万岁！同志们永别了！”就纵身跳下了悬崖。

张凤田跳下悬崖后，正巧落在一米多见方的长着许多灌木的土台子上，只是腿脚被划破了，负了轻伤。他在小台子上抱着枪一直蹲到天黑。

民兵们都陆续安全的撤回到河北村三区政府，把经过向李兴民书记作了汇报。李书记推测张凤田可能牺牲了。到后半夜三点多种，李兴民找到副书记吴怀聪，对他说：“你带人到三鸡洼山一带去找张部长，现在就出发。”吴怀聪、张树才二人带人分两路奔向三鸡洼山，一路从西岭子向东，一路从桥子石小道上去。先后来到三鸡洼山顶，查看周围，没看见有拼杀的痕迹。张树才、张玉福就轻声喊：“张部长，我们救你来了！”张凤田听到有人喊他，仔细辨别声音后，知道是自己人，才答话：“我在这儿呢。”于是大家用裹腿布把张凤田救了上来，经历了一场惊险的遭遇。

隗朝水与庚戌之变

杨亦武

庚戌之变始末

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因与明朝的贸易要求得不到满足而发动战争。该年为干支纪年庚戌年，所以史称“庚戌之变”。

当时，除俺答汗外，蒙古还有一个强大的部落瓦剌部，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在今河北怀来东的土木堡打败几十万明军，将明英宗俘掳的，就是瓦剌大军。这个事件，史称“土木之变”。作为土默特部首领和右翼三万户盟主，俺答汗为对付瓦剌，更好地统率各部，迫切要求与明贸易，明朝的农业与手工业产品，在数量与品种上都难以满足以畜牧为生的土默特部的需要。俺答汗向明称臣纳贡，希望扩大和增加交易。但明廷害怕土木之变重演，加以拒绝，并杀来使。于是，俺答发动大规模的战争。

嘉靖二十九年六月，俺答率军犯大同，总兵官张达、副总兵林椿皆战死。大同总兵的仇鸾惶惧无策，以重金贿赂俺答，使移寇他塞，勿犯大同。八月，俺答移兵东去，十四日，入古北口，杀掠怀柔、顺义吏民无数，明军一触即溃，俺答长驱入内地，营于通州潞河东二十里之孤山、汝口等处，京师震恐。时京师兵籍皆虚数，禁军只四五万，半为老弱，半为内外提督大臣之家役使。又缺少战具甲仗，战斗力很差。明世宗朱厚熜急集兵民及四方应举武生守城，并飞檄召诸镇兵勤王。十八日，大同、保定、延绥、河间、宣府、山西、辽阳七镇兵先后至。明援军虽五万余人，但皆惶怯不敢战，又缺少粮秣。严嵩也要求诸将坚壁勿战，听凭俺答兵在城外掳掠。此时，俺答兵自白河渡潞河西北行。十九日至东直门。二十一日德胜、安定门北民居皆被毁。二十二日，由昌平巩华城攻诸帝陵寝，转掠西山、良乡以西，保定皆震。此前，俺答于十八日引兵夺延庆西南的白羊口，以西走塞外，而留余众于京城外，以为疑兵。但白羊守将扼险防御，俺答不得出，乃复东向南。至昌平北，败仇鸾之军，长驱至天寿山，循潮河川而上，仍由古北口出塞，京师解严。九

月初一日，蒙古兵全部撤退。

身赴国难的魏朝水

在这场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制造的庚戌浩劫中，房山先民曾响应王命，奋起抗敌，这个人就是魏朝水。据民国二年《魏家老坟重立碑碣记》记载：“明世嘉靖二十九年，鞑寇如林，起人而无敌。又起山后芦子水黎民魏朝水，统领兵卒前去征伐，将鞑寇征退，然后归而封官加职。”十三年后的嘉靖四十二年五月，魏朝水之子魏忠仓重整魏氏祖茔，立下墓碑，将魏朝水的抗敌功绩记载下来。民国二年《魏家老坟重立碑碣记》所记，便是根据魏忠仓嘉靖四十二年碑，所以所载魏朝水事迹真实可信。

碑文所载与庚戌之变的史实相吻合。嘉靖二十九年（1550）八月十四日，俺答大军攻入古北口，一路杀至今通州区东北孤山、汝口时。明世宗朱厚熜飞檄召诸镇兵勤王，又急集兵民及四方应举武生守城。魏朝水应是此时率山后子弟兵入明都北京守城拒敌的。当年的八月二十二日，俺答大军侵至西山、良乡以西，烽火燃及魏朝水的家乡房山县。魏朝水亦或率子弟兵守土抗敌。当年九月初一，俺答兵退走，魏朝水得以归乡。根据墓碑的记载，魏朝水归里后，因战功被明廷赐了官职。具体什么官职无从考证。

《魏氏姓名大全》之二迁徙分布，关于魏朝水，有这样一段明事汉说，张冠李戴的记载：

东汉时期，魏姓最有名的人物要算魏嚣了，魏嚣是东汉天水人，王莽时期被当地豪强拥立，管辖的地方有今天甘肃的天水，武都一带。魏嚣后来归附汉朝，不久又自称西州上将军，与东汉朝廷开战，但多次被汉军打败，最后忧愤而死。在山南海北招收的士兵当中，都是魏氏姓氏的人，外姓一般不招，这样经过两年的训练以后，军队非常强大起来了，当时，朝廷命官严嵩，就参了魏朝水一本，说他招收的父子兵，有谋反朝廷之意，皇帝就听信了谗言。将其革职罢官，贬为庶民，同时下诏，告知天下，今后，魏姓不许做大官。

这段记载，谬误之处显而易见：一、魏朝水抗敌事在明朝，不在汉朝，与魏嚣万万搭不上关系。二、魏朝水作为临时征集的民兵首领，当年八月十四日出征，至九月初一俺答退兵后，即当解兵归里，前后不过十八日，和明朝的重臣严嵩更搭不上关系，严嵩无从给魏朝水参本。从“将鞑寇征退，然后归而封官加职。”的记载看，皇帝就听信了严嵩谗言，“革职罢官，贬为庶民。”纯属

无稽之谈。至于“同时下诏，告知天下，今后，隗姓不许做大官。”更是子虚乌有。族谱是严肃的家学，不同世俗小说，所以祖先的事迹，应该正本清源，如果被人为编造得似事而非，会遗误后世。

赵锦与隗朝水

当年，除隗朝水之外，在房山人中还有一个参与了庚戌之变，这个人就是赵锦。和隗朝水不同的是，赵锦是以兵尚书的官职参与指挥明庭军机的。

赵锦，字文卿，号守朴，明良乡县人，其故里在今良乡城内的太平庄。他在正德十二年（1517）登进士第，曾任过温州府知府、浙江按察使、甘肃巡抚的官职。嘉靖二十九年（1550）庚戌之变，赵锦正免官居家，世宗起用在良乡赋闲的赵锦为兵部尚书，赵锦临危受命，即赴前线，调兵选将，从容应敌，数月以后，人心遂定。

赵锦的家乡西面，隔着大房山，包括隗朝水的家乡芦子水在内的西部山区，自古号称山后。山后之民历来以彪悍骁勇著称。对这片深山乡土，赵锦并不陌生，赵锦赋闲在家里，多曾到西部山区郊游，他曾到过上方山，云居寺，并留下诗作。对山民的情况，自在掌握之中。隗氏自明高祖时隗支全至此定居，传至隗朝水已经六代，宗族日盛，已是举足轻重的世族大家，隗朝水应该是山后的豪杰之士。身为兵部尚书的赵锦，在明世宗征集民兵守城之际，是战争的主要操盘手。此时，很可能是他想到山后的隗朝水。在国家危难之际，隗朝水率山后子弟勤王赴敌，从情理上推断，或与赵锦这个兵部尚书的举荐相关。退一步而言，即使隗朝水出山与赵锦无关，作为战争操盘手的赵锦，在战争过程中，不会不知道隗朝水这支家乡山后子弟兵，缓急之际，正可赖之御敌。由于缺乏文献记载，在此仅做推断，不成定论。

窑上伏击战

唐占忠

窑上伏击战是1938年底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朱占奎部队在窑上村对日寇进行的一次殊死搏斗。

窑上村今属房山区琉璃河镇，解放前归河北省良乡县管辖。地处永定河右岸金门闸北3华里大堤脚下，该村南1.5里处有一座大沙丘，占地面积约1300亩，上边长满了柳树和杨树，虬枝参差，茂密丛生，是涿、良、宛三县交界点。历史上是土匪出没，军阀争夺地带。

窑上伏击战得从日寇炮轰驻官庄村陈东来带领的“抗日复仇军”说起。1937年农历10月，家住五间房的陈东来因亲人遭受日寇杀害，便在家乡窑上一带组织地方武装便衣队打击小股日军。他的抗日旗帜打出后，人员与日俱增，曾移住张坊、周口店一带，不断打击日寇。日寇对其恨之入骨，轮番进山围剿。后因给养接济不上，陈东来于1938年秋率队回官庄村驻扎，养精蓄锐，待机而发。中秋节前一天，驻涿县码头镇警察总局的汉奸洪远到官庄陈的住处做客游说，商定八月十九日陈投降日寇，实际是想消灭陈的部队。为稳住陈，中秋节那天日军还给陈送来一批过节食品。8月19日清晨，一架飞机在官庄上空盘旋两圈侦察情况，飞机飞走不久从码头来了日军，众炮齐发向官庄轰击起来。陈东来见势不好，带领队伍顺小清河往北逃离官庄村，日军进村挨家挨户搜查，烧杀抢掠折腾了一天才败兴而去。

日寇炮轰官庄诱杀陈东来的消息，被中共冀中军区得知后对其极为关注，为壮大抗日武装力量，早日改编陈东来的队伍，决定派部队深入敌后打击日寇嚣张气焰，发动并鼓舞民众抗日。1938年农历11月13日，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命令朱占奎率领两个独立团，从定兴、新城县一带出发，经固安县以北进入永定河套北上，晚9点左右到达并悄悄驻进窑上、万里、肖场三个村。战士们分散在老百姓的草垛、滑秸垛、草棚、车棚里休息。用自带的土布棉被遮体御寒，吃的是干粮袋里冻得硬梆梆的玉米面饼子。老百姓发现战士们如此艰苦，让他们进屋住，他们不肯，给他们做熟食，烧开水，他们不吃不喝并且说：

“这就打扰老乡啦，感谢您们关心和支持……”。14日天刚蒙蒙亮，八路军队伍悄然离开村庄潜入窑上村南大沙丘。沙丘中间有一条窑上通往宽河、鲍庄、五间房等村的大道，两丘间似峡谷。八路军设两个营兵力分别埋伏大道两侧制高点，安排迫击炮4门，重机枪6挺，水压机关枪4挺等重型武器封锁大道，整个沙丘都布满了战壕以待伏击日寇。

第二天上午9点有7辆卡车满载日军从码头来到村东，下车就架炮向窑上村轰击，几炮后觉得没啥动静，认为“抗日复仇军”不堪一击又跑了，于是放松了戒备，步兵端着枪慢悠悠地顺着大道走来。日军进入伏击圈后，八路军居高临下枪炮齐发射向敌群，日军未及还击顷刻间便死尸旷野，这时日寇才发觉遇上正规八路军了，慌乱中组织兵力继续战斗。又急忙向上级发报请求增援。中午，从码头、官村又来了一股日军，刚到沙丘便开始猛攻，敌我双方展开了激战。日军几次冲锋都被八路军打退，日军伤亡残重急得嗷嗷叫就是冲不上沙丘。下午4点从固安县又来了8卡车日军增援，刚到鲍庄村东气急败坏地就架起炮向沙丘发射，随后步兵拥向沙丘。八路军在沙丘上加快射击，各种武器密集地射向来犯敌人。只见日军一次次涌上来又一批批被击退，这样残酷的战斗持续三个多小时。后来，由于八路军的水压机关枪缺水，枪管烧红而子弹卡壳，其他武器子弹即将打尽，残余日军又冲上来时，八路军的一位连长高喊：“誓死保卫窑上，冲呀，杀呀！”战士们如同猛虎下山，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冲下沙丘与日军展开了肉搏战。一个年轻的战士腰插几颗手榴弹蹦上日军汽车拉了弦，“轰”的一声巨响，炸得汽车七零八落，日军血肉横飞，战势相当惨烈。这时天近黄昏，朱占奎审时度势，命令部队边打边撤离沙丘，迅速跨进永定河堤里，顺着河套隐蔽地离开了窑上。而日军惨败至极象丧家之犬也离开了战场。第二天清晨日军用5辆卡车将死尸拉走，在码头大清河边烧了，我八路军牺牲的指战员都是由窑上村老百姓一一掩埋的，使其长眠于沙丘上。

窑上伏击战后，活动在长沟，南北白岱的“抗日复仇军”司令陈东来与副司令周及龙议定和吕正操领导的八路军结为盟军，共同对日军作战报仇。这次伏击战打出了八路军的军威，同时激发了革命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共同抗日的信心和决心。

永不能忘日军的侵略罪行

栗颖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日本鬼子的侵略铁蹄就闯进了河套沟。先后在河南村、红煤厂村和北窖村建起了据点，修了炮楼，妄图长期久占。

鬼子建成据点后，到各村抢粮、抢物、要花姑娘，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使百姓无法生活，只好卖儿卖女，离乡背亲，外出讨饭，苦不堪言。现在虽然时间过去了70多年，但鬼子在我家和我们村犯下的罪行，却一清二楚，永记在心。

1938年冬，大批中央军撤退到三英水村，驻防我们村的中央军，向老百姓要门板，要被褥，要粮、要猪、牛、羊、鸡等。准备在此与日本鬼子打一仗，老百姓听说打鬼子，也都支持，有什么出什么。中央军在我村二里路远的石安岭最高峰修了工事。可没几天，中央军就悄悄地扔下工事，向西撤走了，伪村公所所长让老百姓到山上认领各自的东西搬回家。中央军前脚撤走，后脚日军飞机在农历腊月二十八日（1939年2月16日）下午2点多钟，就对三英水村进行狂轰滥炸。下英水村李宗芝和范占元的房屋被炸塌。李宗芝夫妇和一岁多女孩当场被炸死。范占元和母亲、祖父、堂兄范朝旺及教书先生崔化宣被炸的头破血流。此次日军飞机轰炸，下英水村死3人，伤10人，炸塌房屋8间。惨案发生后，李家大女儿半个月后离开人世，两个男孩无家可归，一个外出讨饭，一个被好心人隗永山收养。日军飞机轰炸后，闹得百姓提心吊胆，人心惶惶，家家户户都在家里和地里挖防空洞，以防日军飞机再次轰炸。

鬼子还经常到各村抢花姑娘，一次，红煤厂据点的十几个鬼子与伪保长一起闯入我村一理姓孤女寡母家里，强拉硬拽把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抢到据点。十几天后，鬼子又在其他村抢了花姑娘后，才把她送回家。送回后，当场向她母女声嘶力竭地喊道：“一不准嫁人，二不准逃跑，三随叫随到。否则，母女二人都要死啦死了地”。试想，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年代，一个老太婆，一个弱女子，只能任凭鬼子的宰割。她一直被红煤厂据点的鬼子蹂躏了好几年，在精

神和肉体上受到了很大的摧残。八路军打跑鬼子后，她才得到了解放。

1942年7月的一天，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天气特别闷热，让人喘不过气来，我父亲正赶着羊下了山，在小河边让羊喝完了水，把羊赶回院子里圈好，刚要进屋坐下，突然从大门口进来一伙日伪军（约20多人），一部分人拿着上了刺刀的枪堵在屋门口，两个伪军进屋横眉竖眼地对我父亲说：“你的羊全部孝敬皇军，我们马上赶走。”此时，院子那部分日伪军，已经用棍子从羊圈把20多只羊全赶走了。父亲一听肺都要气炸了说：“这些羊，不是我家的，是檀木港亲戚的，你们赶走，我怎么向亲戚交待呀？你们行行好，可别这样呀，”父亲的话音还没落，一个伪军抬脚凶猛地照我父亲肚子就踢了一脚，转身就走，父亲就要往出跑追他的羊，可是门口几个日伪军用大枪刺刀给拦住了。此时，羊已经被日伪军赶走老远了，父亲哭着喊着说：“你们不能这样呀，这让我怎么办呀！……”。哭呀，喊呀，大约半个时辰后，把门的日伪军才撤走。父亲气的又捶胸、又拍头、放声大哭起来。晚上全家人谁也没有心思喝水吃饭，都哭着劝父亲，左邻右舍的乡亲们也都跑来相劝，父亲才不哭了，但仍哽咽着。这一夜，大人们都在思索着怎么办。

第二天，父亲的精神就有些反常，眼睛直勾勾的，看谁都不顺眼，喊着要把我卖到口外去，并拿出家里的杀猪刀子，见人就刺，闹得家里谁也不敢呆。妈妈和大嫂赶紧拉着我去一里多外的赵景贤家躲了起来。晚上，天快黑了，妈妈先回家看看情况，父亲的杀猪刀已经放在门外的台阶上，妈妈把刀藏起来。父亲一天一夜没吃没喝，已经筋疲力尽，躺在了炕上，妈妈才把我和大嫂叫回去，把我锁在小北屋，赶紧烧火给父亲做点吃的，怎么叫他吃，他也不吃了。从此，父亲卧床不起，又没钱给他看病，几个哥哥都在外给人打工，没几天，父亲就含恨离开了人世。妈妈打发人把三个哥哥都叫回来，给父亲办了丧事，全家人都悲痛不已。大哥、二哥、三哥，仍外出打工，妈妈和大嫂、四哥侍弄着家里的二亩山坡地，生活极为艰苦，第二年，大嫂生了第一个女孩，因没吃的，生下来几天就饿死了。不久，二哥栗才，带着家仇国恨，悄悄的参加了八路军，上前线，打鬼子，要为父亲报仇。

1945年，农历6月5日（7月13日）夜，鸡叫时分，北窖据点撤退的日伪军砸开了我村李瑞林家的大门，进院要吃、要喝、要洗脸，翻箱倒柜，砸东西，把木仓上摆着的蓝瓷花罐子砸坏了，里面装的玉米撒了一地，拿走了抽屉里的钱。在李家折腾了近两个小时，临走时还要把李瑞林的二儿子李文秀带走。硬说他是八路军的探子，全家人跪着说好话，后来翻译官，跟日军讲情说：“是

良民、是良民，家有妻老，就开恩吧……”，小鬼子才未把人带走。天蒙蒙亮时，鬼子才离开李家。

午饭后，我村鱼脊顶山梁上传来了枪声，约2点钟许，八路军从山上传下话来，让当时地下党员李生林，（当时党员未公开）在街道准备了些水，八路军路过时喝。老百姓听说八路军来了，都在各自门前准备好了水，欢迎大军的到来。约3点钟许，有两个穿黑色衣服手握着短枪，腰间带着手榴弹的人，快步进了村庄，满头大汗，在李家南院门前，每人喝了点水，又急速向村北石安岭最高峰跑去。到山上后，晃了晃什么东西之后，约4点钟许，鱼脊顶梁上八路军七团约二三百人，穿的是灰色服装，没有进村，跑步从村西的西沟子沿英水河西岸，直奔石安岭，朝陈家台村方向去了。后来听说，当天晚上，七团的战士就把河南村据点的日伪军给消灭了。

晚上，常来我村做地下工作的张成英同志来到下英水村，在村南小学校召开了地下党员和基本群众参加的会议，张成英在会上讲了话，宣布：“我们这里解放了，小鬼子完蛋了！……”。大家都怀着喜悦的心情，拍手称快。解放后，我村广大贫下中农无不欢欣鼓舞，踊跃报名参军，保卫解放区，保卫红色政权。1946年，我三哥栗忠参加了解放军。1947年，我四哥又参加了解放军。

写到此，我爹被气死，乡亲们被炸死，炸伤，善良姑娘被日本鬼子任意强暴等情景一古脑儿涌向心头。我已按捺不住自己的感情，我呐喊：“不要因为时间的流逝，就把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忘却了。希望炎黄子孙，永远不要忘记日本鬼子在中国的土地上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房山县城的第一个党支部

王绍清

1948年，麦穗刚黄梢，传来驻防在涿州、琉璃河、良乡的国民党正规军撤守到北平城内丰台、长辛店，还有部分军队留守的消息。此时，解放军冀晋军区五分区独立团，房良独立团，良乡县佐公署民兵计2000人攻打国民党坨里据点，房山县保安团大队长尤茂之受伤而逃，副队长武德功被击毙，残兵狼狽溃逃到房山城内。坨里的解放打开了大石河谷平西解放区通向平原的要道。

随着对敌斗争的发展，房山县委决定在以军事为后盾的基础上，深入开展对敌“外线与政治工作”，首先从霞云岭、张坊、塔照三个区小队武工队抽调部分人员，组成民兵大队，由县武装部王兴元领导实行劳武结合，活跃在游击区，消灭伪政权残余武装，扩大解放区。在全国解放战争中，为防止傅作义部队增援其它战场，房良两县动员2000多名民兵夜间“翻铁道”，“挖公路”，经过20多天的破交高潮，将平汉铁路与公路多处破坏，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战场。在军事取得胜利的同时，对敌人开展“政治攻势”。距房山县城附近的洪寺、顾册、瓜市、东瓜地、北庄等村，召集伪保甲长，向他们讲明形势，指明出路，并给顽伪人员家属寄信，由保长送到伪军家属手中。对国民党在农村被利用的人员暂不捕、不杀，给其立功之机，还释放俘虏，散发传单等。通过上述工作，当时出现母劝儿，妻劝夫，儿劝爹，不要再给国民党卖命，早日投诚，保着性命免得全家牵挂的情景。这样动摇了军心、瓦解了敌人。国民党房山县委、政、军、警、特感到形势吃紧，人心涣散、朝不保夕。河北省保安司令部为鼓舞官兵士气，将保安团提升为旅。旅长张德祥人称青头楞老天爷活闫王。为保住国民党的统治，对城防、军警、商民的活动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控制。

1、1948年秋，张德祥首先对城防进行了调整，山顶庙、小山坡、西北关、齐家坡四个外围据点，由夏村等四个乡大队把守。护城壕三面贯通，北关设有人行吊桥一座。由城关七大队，队长姓隗人称二虎把守。南关老爷庙西侧，留有八米宽土路（今中医院北侧），是通往各地咽喉要道，由2团团团长马德福把守。护城壕内建有工事，由12、15等还乡团把守。城墙上由张的嫡系部队把

守。旅部由手枪队、黑杀团把守。

2、保安团小队长以上人员，可携带家眷，居住城内，把圣水峪、三流水等村叛变和逃亡户安置在南北两关，加强管理，防止共党特工混进城内。成立了军民合作站，自新招待所，社会服务处等特务机构，每个机构内均有地主和叛徒参加。张德祥为收买逃亡户，每月每户发给一至二担粮食，如有士兵潜逃及私通八路者拿其家属问罪。

3、对城内商人农民严加管理，将多年的集市赶到城外西沙滩（今永安市场西北处）。各商号赶集出摊，回城时凭商会证明。农民外出种地，凭保公所路条限期三天，如遇雨淋无效，旁边等候有本村人证明方可通行。警察局的警察白天站岗，晚上查户口，有一次一夜警察到我家搜查两次。另外还有十多个警察骑着自行车在壕外人行小路巡视，见到可疑之人就带到警察局审问，只有担保才能放行。恶毒的是，张德祥任林茂为队长的“黑杀团”，这些人白天便衣暗访，夜间下手。据史料载：“一夜黑杀团出动，从城南顾册村杀起一直杀到长沟坟庄等 10 个村。杀害我党政干部及贫农团骨干 72 人”。杀害手段惨无人道，耸人听闻，提起黑杀团房山人民恨之入骨。某某在肃反时交待说，张德祥提升为旅长后，河北省保安司令部曾来过一名高官，听取城防汇报后登上西城视察。这个高官问陪同人员：“你们对城内商铺、老百姓是怎么管理的。”张德祥说：“我这城壕里边有 1400 多户，9000 多人，我是宁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共产党，叫共产党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再加上这三道防线，”手指山顶庙，小山坡护城壕还有这座铁城，“可以说是易守难攻呀。”此时这个高官伸出大拇指说：“房山不愧为河北省模范县”。

1948 年 12 月 14 日，冀中 7 纵队 58、59 团攻克房山县城，随后奉命撤离待命配合野战军攻打北平城。入城接管工作队经过几天的紧张工作，基本就绪，县委听取入城接管情况汇报后，接地委通知，要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易守难攻的铁城被解放军攻破，讲解我党保护工商业等各项政策，严格禁止乱捕乱杀，政策掌握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北平。当时决定 12 月 17 日上午在房山东操场召开庆祝房山县全境解放大会，察哈尔日报作了详细报道。散会后，县委对当前敌情和治安形势作了全面分析。

1、据公安局敌情报告，国民党在弃城逃跑前，将文件和户口册全部烧毁，并布置潜伏人员，张德祥在丰台被周文龙收编，又伺机脱逃，国民党新城县王风刚部旅长谢大千，团长石友等人，携带武器流窜到周口店一带，与张德祥残匪秘密串联，某某某汇报说，准备组成人民自卫军，反扑房山城纵火暴动。

2、支前任务繁重，在县城附近村庄要备好木柴、米面、运输车辆，随时运往前线，组织好担架队待命，这些重任，仅靠保公所难以完成。

3、张德祥统治县城多年，特务组织繁多，活动频繁“黑杀团”草菅人命，加之逃亡户及叛徒造谣蛊惑，形势严峻，我们的薄弱之处是城内没有我们的地下党组织和党员。大家知道，方锡智在咱们政府工作，张德祥以其父（名医方微武在南关永和祥坐堂）私通共党之罪，扬言活埋其全家。给城内商民造成恐惧，不敢与我方人员联系，难以扎根立足，仅靠出城人员了解一般敌情。

4、房山县城解放了而北平尚未解放，谈判一旦破裂，傅作义及国民党其他部队要突围出城，两军决战，房山这个地区可能变为敌我争夺、来回拉锯之地。

当务之急，立即派工作组深入南北两关。因这两个村贫下中农多，佃户多，便于扎根串联，务色农民代表。先接收保公所，在完成支前重任同时，建立民兵中队，早日发枪，协助县大队维持城内治安，保证土改顺利进行。1948年12月下旬，开大会以后，县区干部赵松年等第二次来到南关村。经过几天串联谈话，选举了7名农民代表接管了保公所。这7人中，我年纪最小，而文化比他们都高，叫我担任公安员。这活茬当时最忙，每天接待公安局及派出所的同志了解敌情，清理逃亡户，还有藏起来的顽伪人员，领着去派出所登记。吃完晚饭，村民家里来了亲朋好友到村公所报户口，问清写好，再到派出所把一天的情况作个汇报。重要事情与所长一起研究，夜十点以后几个人查户口，真是忙忙碌碌。在最后一次清理敌伪驻南关保安2团、12、15大队、还乡团和警察分局残留物资时，赵松年与我谈话，关于我入党一事，他也找过别人，谈什么谁也不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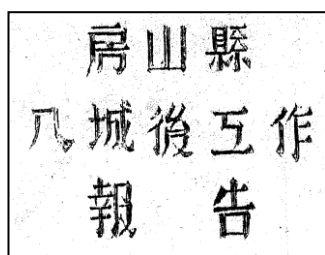


图 1：房山县入城后工作报告复印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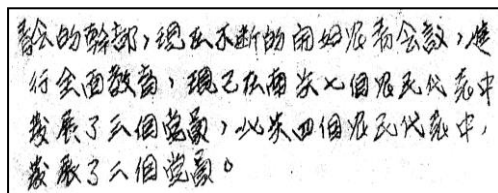


图 2：报告最后一页复印件

1948年12月底或1949年1月初，区委书记马永世、赵松年等进驻南关村，每晚给贫下中农讲解土改中保护工商业，划分阶级成份等有关规定，有时马叫我给念念有关土改的材料。一天晚上，马永世、赵松年、王永清、李树基和我一起来到南大庙后殿西侧。马永世说：“以前我俩与你们都谈过入党一事，

这属于特殊情况，个别发展，个别联系。按县委规定新区只能在土改分田中考查发展对象，土改结束后才能建立支部，发展党员。”崔乐春（县委书记）找我说：“房山县城在解放前没有咱们党的组织和党员，在当前这种情况下，要抓紧在县城建立个党支部。经区委研究，取消秘密个别联系，在你们村（南关）建立县城第一个党支部。今后由你们秘密发展党员报区委批准。李树基任党支部书记，兼民兵指导员。王绍清为委员兼公安员，多做宣传工作。王永清任农会主席（该同志是东关人离开后由赵山任农会主席）”。党支部成立后，工作队基本撤出，主要工作经支部研究，支委分工执行，重点抓了以下几点：

1、当时支前任务紧迫，首先从全村青壮年中挑选了 50 名组成担架队，将 25 头毛驴编成一个驮运组，名单公布后有的人提出了问题，由支委分工到户作思想工作。

2、工作队准备撤出时提出：根据形势需要和南关这么多工作仅靠几个人不成，必须抓紧发展党员，经支部研究确定 6 名对象，支委分工与发展对象谈话后，经区委批准了 4 名。

3、土改中在封门查抄浮财时，在贫农团内出现两种倾向：一是怕得罪人，以后受报复，不愿冲向前。二是有几个人为出口气，进门就骂还砸了一个缸。针对上述情况即时召开党员会定了两条：一、封门查抄浮财时党员带领贫农团冲在前面，查出金银及手表之物，不准私入腰包。二、对民兵，贫农团骨干讲明形势，去掉顾虑，还规定不准骂人砸东西，乱打，乱捆，一定要执行土改政策，所以在土改中没出现任何偏差。

4、关于民兵枪支发给个人后，各自保管，一次接到公安局通知，最近匪特准备抢劫南关民兵枪支手榴弹进城砸监狱。党支部决定，持抢民兵白天集中在北庙，晚上巡逻，20 多天过去了没什么动静，有两个民兵想带枪回家睡觉，党支部组织民兵学习，了解当前治安形势，克服了麻痹思想。土改基本结束，匪特两次跳进北庙北墙，被民兵追捕，大家共同感到民兵集中的必要。春暖花开开了，分到土地的农民高兴地在地里劳动，而民兵不敢放下大枪去地里干活，有几个村干部和民兵不想干了，当时有段顺口溜：“白天北庙看大枪，夜间巡逻脚不停，家里农活没人干，秋后少粮怎过冬。”党支部根据群众的反映请示了有关领导，将枪支手榴弹集中管理，扩大民兵队伍，轮流值班看守。扩大村干部带班人员，在村干部和民兵中组织了一个互助组，选举了一名组长，统一安排各家农活，群众见此举也组织了互助组。

5、剿匪，捉捕顽伪人员，组建共青团，妇联会，举办识字班及合作社等

工作，党内先研究，党员带头，工作成绩显著，曾受到城关区区长表扬。

1949年6月初的一天晚上，城关区委张某某，召开党员大会，评选模范党员，经讨论大家推举了我，主要事迹：二次捉捕匪特，机智勇敢，每天写户口，查户口，汇报情况，不辞辛苦夜间出去剿匪，堵劫逃兵回来累了，睡在北庙大桌子上，曾受到李所长的表扬。土改时带领贫农团冲在前头，分浮财时，分什么要什么，不挑五道六的。给贫农团念材料，上大街给群众念报纸，写标语，给党员上党课等。

散会后大约在6月25或26日区委张同志来南关召开群众大会，根据县委指示在“七一”前公开党支部和全体党员身份，最后宣布我为模范共产党员，颁发了奖状。



图 3：奖状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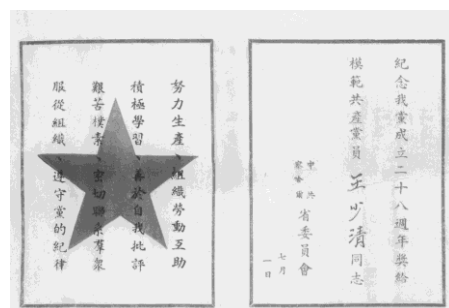


图 4：奖状里面

“土改”回忆

张启华

记得那是 1947 年 6 月农历 5 月份，天气很热了，一天上午 10 点多，从东庄村用河光石木檩条搭的简易桥上走过来四个穿灰色衣服的人。一个是县里的闫振峰科长，宛平县人，高高的个头，白净脸蛋，腰间系着的牛皮带上，串着皮盒套，套内装着勃朗宁小手枪，还串着装子弹的皮夹。另一个是三区的区委书记李兴民，宛平县火村人，挎着德国造的勃克匣的手枪，装在木盒的枪套里，枪纲里一绺细皮条儿。另外，两个是通信员，看上去也就二十来岁，他俩使的武器都是日式马三八步枪。倒背着枪口朝下，左肩上斜挎灰布做的弹袋，右肩挎着装着四棵手榴弹的灰布兜子。腰间系的皮带上栓着搪瓷缸子。四人来到河东村村公所，找村干部，值班的是张玉全，他是我们地下党支部书记。李兴民把他们来的任务对张玉全说道：“搞土地复查进行土地改革”。这时张玉全说：“停一下儿，稍等，我去通知民兵中队长魏天奎，多派几个民兵到进村路口加强岗哨，确保安全。”当时河东村是解放区河套沟大门口，是敌人进攻的必经之路。

不大一会儿，张玉全回来了。李兴民接着说：“通知村里贫雇农骨干，开个碰头儿会。”张玉全派出跟他值班的人员去通知，不到半个钟头时间，侯谦、马良营、付连生、蒋志才、吕振、段志奎、魏天奎、侯生、尹全有、张玉有、张玉棋、付森等来到村公所。张玉全对来的这些人说：“今晚八点都到村公所来开会，县、区领导给咱们讲有关土地改革方面的方针政策，大家要按时来。快到中午了，大家回去吧”。

中午 12 点多了，被派饭户儿来叫县区领导去吃饭，一户俩人，闫科长和一个通信员去我三伯父家，吃的饭是小米饭和玉米面糊糊粥，菜是淹杏叶、花椒叶。李兴民和一个通信员去一位老奶奶家，饭是玉米面窝窝头，稀的是小米粥，菜是淹萝卜条。刚刚被解放的山区在这战乱年景，这饭食算是上中等饭了。张玉全把他们安排好也回家吃午饭，他家的饭比不上被派饭的户，主食玉米面野菜窝头，稀的是不沾筷子的玉米面野菜粥。各自中午歇个晌，下午三点

多张玉全提一壶山茶水先来到村公所，把水壶放在地上，县区领导也陆续来了。张玉全又提起壶给每个人倒一碗山茶水，边喝着水边说着话儿。闫科长对张玉全说：“你们村有多少亩地，好地山坡地各多少亩，山地二亩折一亩好地。人口有多少，包括新生婴儿，统计出准确的数来，向来的人交个底。”

晚饭后八点，张营等人陆续来到村公所，因为屋子小，炕上地上都坐满了人。人到齐了，张玉全这才把两位领导的职务介绍给大家，并带头鼓起掌来。虽然人不多，但掌声十分整齐响亮，表示欢迎领导的到来。

李兴民对大家说：“日本完蛋了，人民得到解放，但蒋介石不叫我们过安稳的日子，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我们的生活仍然很困难，因为我们没有土地，土地还在地主老财手里，租他们的地要交地租，除了交地租我们落不下多少粮食，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农闲了，要背景离乡去门头沟煤窑挖煤，吃着阳间饭干阴间活，受矿主的剥削。进行土地改革，把地主老财、富农份子多霸占的土地夺回来，分给我们贫下中农。怎么个分法，得先成立农会，把贫下中农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团结就是力量。斗倒地主恶霸分田地，有了土地，打得粮食全归自己，生活才会逐步提高。”

接着闫科长宣布，农会组成人员名单，7人组成：有马良营、侯谦、蒋志才、段志奎、侯生、付连生、张玉全。马良营任主席，侯谦、蒋志才任副主席，段志奎任秘书长。二位领导向他们讲明土改的方针政策，进行摸底调查，为斗争大会做好准备。大概6月底，7月初的一天上午9点多，魏天奎安排民兵布置斗争大会会场。会场设在吕大白家那边金殿坡子上，会场四外贴好标语，标语上写：“打倒地主阶级，把土地分给贫下中农，消灭封建制度，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枪决地主恶霸国特（国民党的特务）”。与会的贫下中农手举着绿色、粉红色的纸制小旗子，上面写的跟标语上的相同。吊挂的红布横幅，上面写着“河东村土改斗争大会”九个大字，会场显得庄严肃穆，闫科长和农会的全体成员到主席台就座，与会的贫下中农和广大群众热烈鼓掌。马良营宣布：“斗争大会现在开始，把地主恶霸，富农份子全部压上来。”

民兵两人架一个，把五花大绑捆着的地主富农分子押到主席台前。口号声：“打倒地主阶级！”马良营宣布：“下面进行有苦的诉苦，有冤的诉冤，清算剥削阶级的罪行”。雇农张恒站起来说：“日本时期我欠地主殷祖新二斗租子，我实在还不起，他狠狠的说今年不还明年加倍还，不然我收回你租的地。幸亏日本投降了，共产党八路军来了，实行减租减息，才免掉这笔冤枉债”。之后又

是口号声。大会开的轰轰烈烈，灭了剥削阶级的威风，长了穷人的志气。最后马良营宣布：“把国特殷志三押赴刑场执行枪决”。与会的广大群众也跟随到刑场。蒋志才和一个民兵左右两侧牵着捆殷志三的绳子，一名民兵手持马三八步枪，立射托枪轻扣板机“啪”的一声，殷志三往后一仰躺在地下。散会以后，闫科长回到张玉全家，稍歇一会，坐在炕沿上跟张玉全说：“工作告一段落，你们村是解放区的大门口，咱队伍一走，坨里的还乡团白箍很可能进攻搔扰，我回去后跟武装部说一声，给你们村补充些地雷。贫下中农分了土地，倾向革命的劲头更足了，要对民兵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保护好胜利果实。”傍晚，闫科长和通信员回到县政府驻地，佛子庄乡班各庄村。

我亲历的“肃反”工作

白玉

1955年，大规模的清剿土匪和“镇反”运动已经基本结束，但是隐藏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等单位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尚未肃清，一些顽伪人员和军政警宪等反动党团的骨干分子，混进了各行各业，隐蔽在各个角落，有的占据了领导岗位，严重地影响了我们党的方针政策的落实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因此，良乡县委遵照上级的有关指示，从1955年全面地开展了“肃反”工作。

县委成立了“肃反”工作五人领导小组，县委常委、工会联合会主席胡长存同志主抓“肃反”工作。下设“肃反”办公室，由谭书生同志任办公室主任，并从文教、供销、粮食等单位抽调一批以党团员为骨干的“肃反”工作人员。

1955年10月，我被抽调搞“肃反”工作，各单位被抽上来的，全部是党团员骨干，一共抽调40多人。为了搞好“肃反”工作，我们这些人，在县城先要进行学习和培训，在学习培训时，主管领导特别要求我们：一是要掌握党的“肃反”方针政策和界限。方针是：“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冤枉一个好人”；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界限是“只有百分之五的是坏人”。二是要掌握和了解敌特、反动党团的组织系统及各个时期名称变化的情况。还要了解各种反动道会门的发展状况，组织设置的情况。要掌握政策界限，要知道什么是反革命，什么是一般政治历史问题，以及怎么确定敌特的界限等等。三是要掌握调查取证的工作方法和注意事项。除此，特别要注意的是：严格保密纪律，不得对任何人讲有关“肃反”工作的情况，有人问干什么，就说搞扫盲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培训，骨干队伍形成了，领导上对这样一支队伍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文教系统抽上来的骨干20余人，大体上分内勤组和外勤组。内勤组5人，在办公室工作，职责是：负责审查档案，列外调提纲，审查外调回来的材料，对是否结案提出意见。外勤组10多个人，职责是：根据内勤列的外调提纲去搞调查。一般问题是走村串乡的搞调查，重点人的问题，或去北京，或南下河南等五省，或北上黑龙江，还有的三下（河北省）南宫，不惜跑路，不惜花钱，

为的就是要把问题搞清楚。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那时我在驻北京的外调组工作，负责人是原良乡三区区长段士奎，他带我们跑遍北京的各区公安局、公安部门、双桥砖厂等单位，我不断地往来于北京良乡两地，经过四、五个月的详细调查，对重点人的问题基本搞清了，这样，就为“肃反”工作做好了必要的准备。

1956年7月初，教育系统教职员590余人，集中在良乡中学开始“肃反”学习。当时教育系统，算是一支人员较多的队伍，在这支队伍中，有些人员的政治身份及其履历确实是较为复杂的。那时，良乡县完全小学20余所，学区十七八个。经我们调查，有的完小主任是三青团员，有的是国民党员，有的是国民党的情报员，有的是中统特务。有的学区校长是日本翻译，还有的是黑龙江的外逃犯当了学区校长。有的老师是三青团区分队长，有的老师是国民党的情报员，有的老师是国民党的区分部委员……这些人，他们平日里都自称是公职人员，但是他们真正的底细却隐藏了起来。集中后的老师，参加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动员大会，会上领导讲了党的“肃反”方针政策。通过听报告，反复学习讨论，大家提高了认识，那些没问题的和一般问题的，都获得了解放。留下的是一些重点人，外调人员参加到重点人小组，对他们进行重点帮助，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让他们放下包袱。只要他们交待的与我们外调掌握的基本相符，就作出历史结论。这次“肃反”，原来确定的30名重点人，最后落实的有中统特务4人，反动党团骨干6人，国民党的情报员3人，有人命的2人（后被逮捕），党员通讯网的4人，伪军政人员4人，日本翻译2人。其中，既往不咎的1人，一般问题的4人，送劳动教养的3人，被开除的10人，其余的留用了。

经过这次“肃反”，教职员工的底数清了，情况明了，纯洁和净化了教师队伍，奠定了教育为政治为工农服务的思想基础，从而促进了教育事业的繁荣与发展。1956年10月，小学教职员工的“肃反”工作基本结束，之后，我回到了黑古台小学工作。

1957年10月，我再次抽去搞“肃反”工作，住良乡县委北院内。这次主要是对中小学“肃反”工作的遗留问题进行复查，同时还要参加公私合营等单位的“肃反”。当时的单位有：联运站、顾册铁厂、农机厂、服务公司、联合诊所、兽医站、市里下放的陶瓷厂、文具厂、长阳农场四大队和二大队等单位，其人员情况很复杂，当时被抽去的，文教的10人，县社的10人，还有粮食局的，联运站的，公安局的，检察院的，这些单位抽去的人比较少。我们这些

人，大都是 1956 年“肃反”工作的骨干，领导交给我们的任务主要是检查督促，搞好“肃反”的审查工作。

1958 年房山良乡两县合并后，我们搬到房山西大街路南（县委交通员宿舍）院内，后又搬到房山北大街路西检察院内办公。我们这 20 多人主要是对一些单位的人员进行内查外调（另有十来个人在东方大街路北院内搞审干）。那时候搞外调，一个人独立作战的时候多，很辛苦，我独自一人就去过唐山盐场（劳改队）、大兴、徐水、唐县等地，在去唐县那一次，我要找的人已离家修西大洋水库去了。于是我又赶忙到西大洋水库去找，在工地上，我看到了千军万马大干快上修水库的场景，在那热火朝天的劳动人群中，我终于找到了要找的人，打了证明。经过几个月内查外调的准备工作，于 1958 年 7、8 月间，上级将联合诊所的医生，兽医站的兽医，分别集中在原良乡县政府院内和原良乡县委院内进行“肃反”。人员多的单位，在本单位搞，人员少的单位如服务公司，则由“肃反”办公室直接负责，对重点人统一搞外调。在此期间，我曾派往茶淀农场做过调查，我还同另外一个人去固安县专门调查一个武装保长带枪的问题（此人在服务公司是修表工），为了把问题彻底搞清楚，我们在彭村乡走街串户整整调查了 20 天。10 月，“肃反”工作进行后期扫尾。领导交给我的工作任务是：与办公室的石玉柏同志到良乡陶瓷厂、文具厂、轮胎厂进行“肃反”审查；去长阳农场，检查对下放人员的“肃反”审查和重点人的外调情况；对良乡农机厂、服务公司、兽医站的重点人进行重点帮助，白天同他们一起参加炼铁劳动，晚上给他们反复讲政策，促使他们彻底交待问题。1959 年初，肃反工作基本结束，尚遗留的问题，移交到审干办公室。春节过后，领导对“肃反”工作做了简要的总结，至此，房山县的“肃反”工作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大跃进”年代忆事

姜玉卉

我的家乡在京西百花山下，大石河畔的佛子庄村。1958年，与全国农民一样，完成了由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的体制嬗变。接着，党中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全国各地又掀起“大跃进”、“超英赶美”的高潮，中国要提前进入社会主义了。

当时，我正读小学五年级，除了上学，生活、劳动也完全融入了这场“大跃进”的运动之中。在诸多新鲜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首当吃饭集体化，生产队办食堂，吃饭不要钱。这是亘古未有的好事，真是天上掉馅饼，天天吃大米、白面。要知道，吃食堂前，农民吃的是玉米粥、窝头、红薯。当地产粮不够吃，凭政府发的购粮本到粮店买东北玉米。吃食堂后，生产队的马车三天两头从山外往食堂拉大米白面。当钟声一响，男女老少，高高兴兴，甩开腮帮子，大吃大嚼。队长说得好，这是毛主席、共产党给咱们打的铁饭碗，叫咱们社员提前过上共产主义好日子。说来也巧，本村有户祖传作炸油条生意的，正好在我们四队。入了社，不让作生意，每日参加集体劳动，祖传手艺要失传。大跃进，讲究解放思想，队长找其谈话，手艺传给食堂。于是，我们四队每隔3天，吃一顿炸油条。孩子们高兴得不等敲钟，早早地到食堂等候。当时，佛子庄村周边的初中、高小学生，都到佛子庄村来上学，他们随老师一起分别到佛子庄村四个生产队来吃饭，也不花钱。我就领着与我要好的同学到我们队来吃油条，他们高兴极了。生产队隔三差五杀只羊，羊肉丁打卤，白面压饅饅，吃饭的场面如办喜事那样热闹。和面、压面、担水、抱柴、烧锅灶、生面条下锅、熟面捞起、端面上桌，出出进进，男女老少，吵吵嚷嚷，嘻嘻哈哈。其中，叔侄、叔嫂免不了取笑逗眼、打情骂俏，热闹非凡。

北方冬至节，讲究吃饺子。生产队杀了一口猪，猪肉剁馅加大葱，白面皮包饺子，往日过年也难吃上肉丸馅的饺子。妇女们包的饺子有元宝形的、小猪儿形的，尤其是鹅鸭形的，更吸引孩子们，逗出了口水。一位老爷爷，端着一锅拍儿饺子，边下锅边对孩子们说：“东边来了一群鹅，噗咚、噗咚跳下河，

两支牙门棍，夹着进了窝。”说完问是什么呀？孩子们高兴地大声回答：“饺子”！随之一阵欢笑。捞饺子的箊篱都是各户拿来的，直径小的捞得慢，不少饺子都煮破了。端上桌，孩子们争抢着肉丸馅吃，将面甩到盆外，受到队长一顿训斥。饺子熟得慢、吃得快，人又多。队长当机立断：愿意回家煮的，按人口分饺子，自己煮，快吃，不要误了下地干活。

农村“一大二公”的优越，集体食堂吃饭不花钱，大米白面敞开肚皮吃，使城市户口的人很是羡慕。村里30多户城市户口的矿工家属，主动提出“非转农”，批准后，将家里的存粮交到食堂，全家也加入了吃饭不花钱的队伍。还有两户解放前就落户北京，解放后有正式工作。回老家一看，社员生活比城里还好，动了心，辞了工作，举家还乡，其中，就有我的堂叔。没想到，大米白面吃了不到一年，就变成喝菜粥了，稀粥能照见人影。我饿的时候，就问父亲，不是说毛主席、共产党给咱们打的铁饭碗吗？要让我们天天吃大米白面，怎么说了不算数？父亲生气地斥责我，小孩子知道什么，到外边别瞎说。长大了才知道答案。

其次，给我记忆深刻的是大炼钢铁。党中央提出全民大炼钢铁，土洋结合。于是，在县、公社两级指导下，村里从每个生产队抽调10个壮劳力，在村东河对岸的大沙地上，建了6个3米多高的土炉子，炉旁安一架风箱。从社员家收集来的碎铁，放在炉子里，炉下烧柴和煤，等碎铁溶化，流出来凝固，沉沉的，黑黑的，认为就是钢铁了，实际是铁和煤的混合物——铁焦子。社员哪有这方面的知识，凭着跟党走的热情，日夜奋战，白天烟雾升腾，弥漫山谷；夜晚灯火通红，人影摇曳，干劲冲霄汉。我们中、小学生也积极参与，在辅导员的组织下，组成两个少先队服务小组。一组送水，一组收废铁。我在送水小组，家里没有暖水壶，我提一个大铁壶送凉白开。见拉风箱很好玩，因为4个年头村里还来一次河北省铸犁铧的。他们拉的大风箱呼哒呼哒很吸引我。这回我要亲手拉几下风箱，体会一下感觉，开始一推一拉总是急茬的，不合拍。几分钟后，随着前后腿脚虚实交替，手随身子前后一推一拉，节奏感有了，三个人形成合力，效果很好。收废铁小组成员，每人扛一只荆条篮子，走街串户收废铁。有一个单身汉，家里没有废铁，吃食堂，不用做饭。把原来做饭的小把儿锅砸了，支援大炼钢铁。受到大队干部的表扬。烈属姜振木抗日战争时期，送儿子当八路打鬼子，儿子牺牲在战场。他说炼钢铁，搞建设也要尽一份力量。于是，屋里院内到处翻腾，家里所有的废铁全装进学生的篮子里，扛到炼铁工地。几十个壮劳力，在土炉前折腾了半年多，也没炼出真正的好铁来，向上级虚报的

数字可不小。真正受损失的，是建土炉占了五亩好口粮田，再种地，还得花很多劳力收拾。后来，食堂垮掉停办，恢复各家起火做饭。砸了小把儿锅支援炼铁的单身汉，又得到供销社买新的小把儿锅了。

第三个给我记忆深刻的是兴修水利，深翻土地，种实验田。“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旱田变水田，提高产量，是无疑的，但要讲究科学。佛子庄村西有一个大平台叫西大地，有耕地二百多亩，最大的地块 30 亩，20 亩的地块有 5、6 个。地块平坦整齐，适合整畦种水田。西大地向西 1000 米是红煤厂的阴凉河，50 年代，大石河水充沛。公社、村两级领导决定引阴凉河水灌溉西大地，旱地变水田。上级奖励一台 35 马力蒸汽锅坨机，村里动用 100 个壮劳力修 1000 米引水渠。正是冬季，天寒地冻，工程进度慢，决定中、小学生每周一天支援修渠工程。师生带上工具，打着队旗，步行 8 里来到工地。实际上，师生干不了什么活儿，只是充个人数。渠址在南山根阴处，整日不见太阳，刺骨的河风，吹得脸如针刺，伸不出手。本来沙浆河滩不好挖，又冻得邦邦硬，壮劳力一镐下去，震得虎口生疼。师生们抄着手，跺着脚，在渠边打转转。有人捡些干柴，放在活地儿烧一烧，化一点，挖一点，进展很慢。

虽然天冷，活不好干，但这是政治任务，师生无怨言。劳动间歇，歌声此起彼伏，自编小节目为社员演出。经过一冬一春的奋战，水渠修成。春种之前，又掀起深翻土地运动。我们五年级参加了深翻土地劳动。要求深翻 5 尺，一边深翻一边用棚粪一层层地铺。种的秋玉米长得壮实，收获颇丰。到秋分节，砍倒玉米，耕地整畦。县、公社、村三级决定大搞小麦实验田，创高产，放卫星。试验田有三块，每块一亩。县级领导记不清是哪位了，公社领导是魏天相，村级领导是我父亲（当时任支书兼社主任）。每人一亩，实验密植，前面两位领导的地块，每亩下种 200 斤，父亲那块下种 70 斤。我听父亲说过，本地种冬麦，白露早、寒露迟，秋分下种正当时。秋分头下种 18 斤，秋分中下种 20 斤，秋分尾下种 22 斤。父亲这块实验田下种 70 斤，心有余悸。两级领导批评父亲思想保守，跟不上形势。记得种的小麦品种是白麦、高秆“农大 139”。麦苗长到尺来高时，绿油油发黑，煞是喜人。长到 2 尺高时，开始倒伏。于是，在畦两头插木棍，麦垅两侧用草绳拦上，防止了倒伏。旧的矛盾解决了，又出现了新矛盾。由于过度密植，下种 200 斤的地块麦垅里进不去风，麦苗烂根，出现死苗。技术员指导间苗，因苗密，苗根盘根错节，缠得太紧，无法间苗，一拔，苗全部出土。有人提出用手摇喷粉器向麦垅里吹风，实验也不行，人不能 24 小时不停地手摇喷粉器。再者，吹风会降低土壤温度，不利麦苗生长。

结果，一周内二块试验田的麦苗，除了畦两头有站着的，其余全部烂根、倒伏。我揪了一篓回家喂猪，猪都不吃。最后，二亩地抢栽了麦茬白薯。父亲那块实验田，尚能间苗，拔去多半，余下的麦苗生长良好，麦秋单收单打，过称 446 斤。

第四个是造林运动，给我的记忆也是深刻的。农业发展纲要提出：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是无可非议的，关键是扎扎实实地去落实。植树造林，绿化山区，不能当作口号。但“大跃进”时期，在造林运动中，搞了形式，走了过场，年年造林不见林，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无法计算。记得每到春节，从大年初二开始，带上工具、干粮上山挖鱼鳞坑。我至今还留恋当时的场面。在一面坡上，男女老少散开，按白灰点确定的坑位干起来。虽是天寒地冻，但人人热情高，干劲足，挥动镐头。有人来了情趣唱几句山邦子给大家鼓劲，有人讲个逗人的笑话，乐得学生们前仰后合，欢声笑语解疲劳。中午，生堆柴火，大家围一圈取暖、烤干粮。在山上吃饭，也许是因空气好的原故，就是吃窝头、咸菜、喝凉水也香。一冬天，七坡八岭挖了成千上万个鱼鳞坑，将数字上报了事。春天忙着种地，鱼鳞坑闲置成了摆设，远远望去，也很好看，名字没起错，坑坑匀势，真像鱼鳞片，成了山区的特色景观。然而，经过五、六年后，雨水冲刷，羊的蹬踩，鱼鳞坑也就没了踪影。

1958 年秋后，公社组织 2500 人，耗时 2 天时间，到北峪沟大兵团造林。发动社员、中学生、小学生（5、6 年级）、公社机关、商店、卫生所都要参加，声势空前。我们佛子庄小学是午夜 12 点钟出发，顺着磕磕绊绊的河滩石子路向东行进。开始，一路兴致勃勃，过了黑龙关村，西班牙庄村，然后向北进了北峪沟，很多同学有些疲倦，困劲儿也上来了。步履不整，迷迷糊糊，头重脚轻，有人头撞在前面同学的后背上。老师不断给大家鼓劲，讲笑话提神。20 里长的深沟，两侧是黑黑的山头，静静的，只听见脚踩石子的声音。这是我第一次走长距离的路，又是黑夜，感觉时间过得慢。一路问老师还有多远，快到了吗？突然，听到报晓的鸡叫，抬头见两侧的山坡上有光亮，老师告诉我们到了陈家坟村了。再往前走，天空出现了鱼肚白，到了白湖，天大亮了。又拐了不知多少弯，在一个三叉路口，队伍停下来，先到的在周围坡根黑压压地坐着，几十杆红旗随风飘扬。陈家坟、北峪村离此最近，他们敲起了锣鼓，迎接我们远道而来。公社机关人员在石头上、岩壁上贴起了标语，红、粉、绿色特别显眼。7 点钟，各村的队伍都到了，公社书记魏天相站在一块大石上讲话，接着一位领导带领大家高呼口号：“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

“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植树造林，绿化山区”！“人定胜天”！“超英赶美”……然后，各村带领劳动大军上了山坡，按事先撒的白灰点大干起来。中午，大家围坐在一起，啃从食堂统一带的豆窝头。这时，供销社的售货员背着小商品（香烟、火柴、糖果、手绢、毛巾等）服务到田头，可惜人们穷，口袋里没钱。我心里想：来不来没劲，怎么背来怎么背回去，来回一般沉。售货员吆喝了几声，见没人上前，悻悻而去。诊所的医生背着红十字药箱来了，大家老远就上前打招呼，医生马上过来免费给大家挑手上的血泡。用红药水擦拭手上的划伤，很受群众欢迎。太阳快下山时，生产队的马车运来成筐的豆窝头。告之是今天的晚饭和明天的早饭、午饭，明天晚饭在西班牙各庄村吃。我们每人拿了6-8个窝头和一大块咸菜。我以为在山上过夜，和几个男同学选好了山窝窝，找了很多干草预备铺在身下睡觉。这时，父亲和杨振成校长走来。告诉我们，学生全部到滴水岩村睡觉。我们集体来到村外的泉水边吃饱喝足，然后分配住房，小学生睡在炕上。住户大娘怕我们着凉，还将土炕烧得热乎乎的，我们12个学生和衣侧身而卧，也许是又累又困，一觉睡到大天亮。起床号一响，爬起来，草草吃几口窝头就咸菜，又开始上山挖鱼鳞坑。下午4点钟，结束了两天的战斗，人们鱼贯走出北峪沟，傍晚在西班牙各庄村吃了一顿热饭。在村前空地上用席子围了一个临时台子，由公社领导主持召开了总结大会。最后，向各村奖励劳动工具，中小學生奖励铅笔、橡皮。我代表佛子庄村小学上台领奖。

后来了解，当年挖的树坑，只有土厚的种了一些核桃，杏核树，长出的树苗没人管理全荒死了。

我陪部长走基层

肖文奎

岁去人头白，不知不觉间，我已是一位古稀之年的老人了。上了年纪的人，许多事情已经忘记，但 50 多年前我陪北京市委宣传部张大中副部长下乡了解情况的一段往事，至今记忆犹新。

1960 年，我在周口店公社党委作组织工作。7 月份的一天上午，公社干部正在学习和讨论如何贯彻国家《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精神，如何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和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会议正在开得热烈的时候，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大中，突然乘车来到公社，下车后就让司机回市委啦。当时在办公室看门的要到会场叫我和领导时，被他拦着了。他找了一个凳子，坐在会议室外面，一声不响地听着我们发言。这时，办公室的同事让我接电话，当我从会议室走出来时，才发现了部长在会场外面听我们开会，我当时不知所措。他笑着对我说：“紧张什么呀！你们开会，我在这儿听会不是很好吗？使我了解基层，掌握情况该有多好哇！哪找这么好的机会呀！你们继续开会，不要中断”。半个多小时后，会开完啦，大中副部长跟我一起到了我的办公室，对我说：“小肖，我在你们这里住几天，吃住由你安排。但有几点必须注意：第一，不能单独为我做饭，要到生产队食堂和社员一起吃，社员吃什么咱就吃什么。第二，下乡不坐车，能骑自行车的就骑自行车，不能骑自行车的村就步行。第三，白天尽量多串几个村，晚上回来和你一起住，一起研究分析白天了解的情况，你要和我住在一起。第四，适当参加一些集体劳动”。他在公社住了四天，我完全按照他的指示去做了。周口店公社，共有 20 个村，正是五黄六月天，热浪滔滔，大中副部长不顾疲劳，一顶草帽，一条毛巾，遮阳擦汗。四天里我陪他跑村庄，下食堂，走了 15 个村。他平易近人，关心群众，我们每到一个村，他就与社员席地而坐，跟社员聊到生产、生活，问生产队社员食堂办得怎么样？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劳动记工的方式方法，每个劳动日值多少钱？干部们参加不参加集体劳动……。他问的全面，社员们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跟他讲，他细心听，不时记在小本子上。白天，赤热炎炎他

不怕，他钻在一人高的玉米地里跟社员在一起锄地拔草。晚上，他不顾一天的劳累，不怕汗流浹背和蚊虫叮咬，认真细致地整理白天所见所闻所感，一忙就是深夜十一二点钟。有时，我劝他说：“早点休息吧！”他却说：“我下来一次不容易，百姓想什么、盼什么、疑惑什么，都要搞清楚，弄明白，对市委科学决策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可避免重大失误，我个人累点苦点没有什么。”

他不搞特殊化，与社员同甘共苦。来公社的第二天上午我们先去了周口店村，之后，又骑车去了周口村第三食堂。此时，已近午间，正好要吃中午饭。生产队长和食堂管理员跟我商量，另给我们做点饭菜，我没敢作主，对食堂管理员说：“等我请示部长后再定”，我一请示部长，他很严肃地对我说：“小肖，现在天灾人祸，百姓吃不饱肚子，我们怎能特殊？我们是人民中的一员，只不过分工不同，为什么不能跟群众一样吃，社员吃什么咱们也吃什么，不是很好吗？搞特殊，群众就疏远我们啦！”说到此，他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现在，比解放前我做地下工作时好多啦，那时我常常一天都吃不上一顿饭，更不用说吃好的，有时还被国民党特务追着跑”。他很有风趣地说：“那真是饥饱劳碌大尿泡，那时的地下斗争，第一，靠的是自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真。第二，是靠群众。人民群众是根基、是血脉、是力量、是源泉。没有群众，寸步难行，我们党必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第三，就是靠我们的两条腿要勤快。如果你一搞特殊，群众就躲你远点，工作就不能开展，更谈不上完成任务了，严重者，还可能有生命危险。”部长的一席话，让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进一步懂得了，这是我们党取得胜利的三大优良传统之一。第三天，我陪他去山口、官地、西庄、车厂、坟山几个村。这些村，山路崎岖，有的村是梯田乱石窝，出门就爬坡。我们只好走路，在去坟山村时，碰到几个社员在锄草灭荒，我们就直走到地里，蹲下就跟社员一起拔草，边干活，边和社员聊起来了。休息时，部长掏出烟，对男社员每人递给一支，然后，风趣的说：“女同志只好委屈了，看着我们吸吧。”说得大家都哈哈大笑。接着他和大家说：“没关系，我可以给你们讲故事。”于是，他就讲解放前在北京城里搞地下斗争时，如何依靠群众，群众如何不怕危险，用生命保护我地下工作者的一幕幕真实故事。社员越听越爱听。然后，让我把另一块地休息的社员也叫过来。他认真地讲，社员聚精会神地听。突然，他把话锋一转说：“不能光我一人讲呀？”稍加思索地说：“请你们说一说吃食堂好不好？干部关心不关心群众吧。”社员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讲了不少情况。在回公社的路上，他对我说：“小肖，这个村没白来呀！社员讲出了不少情况，这是在机关从来听不到的声音。要记住，今

后，不论做什么工作，都不能脱离群众，头脑里时刻想着群众，心里要装着群众，行动要为了群众，因为我们是人民的公仆。革命导师列宁曾讲过：“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要防止国家工作人员由人民的公仆，变为欺压人民的老爷。（大意）否则，工作就做不好，群众就不拥护，干部就不合格。”

他走路快如风。开始我怕他去山村走山路不习惯，又加上烈日炎炎似火烧的暑天，怕他中暑，可万万没想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他走起路来，我这个20多岁的小伙子硬是跟不上他。我一路小跑在后面，他笑着对我说：“我这两条腿是在解放前北京城里做地下工作时，跟国民党特务打交道练出来的。那时，一靠内线同志传递情报准确。另一条就全靠我们的两条腿脚了。常与敌人周旋，一天跑几十里甚至上百里路，为了完成任务，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抢在特务的前面。其结果，是我们胜利，敌人失败”。他一路走，一路给我讲故事，一席话使我进一步增强了对依靠人民群众重要性的认识。跟社员一起吃饭，我告诉了管理员，吃的是玉米面窝头和棒糝粥，淹咸菜。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跟社员聊天，了解到了不少真实情况。自打陪部长下乡以后，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他回机关以后，还经常给我打电话询问公社的情况，公社有什么需要他支持的，他也大力指导帮助。苏共22大以后，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和协议，撤走在华专家，给我国经济造成重大损失。当时，公社个别干部出现悲观情绪，我向他汇报后，他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为公社干部作了精彩的国际形势报告，进一步提高了认识，坚定了搞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心。

一年后，市委宣传部召开全市各区县及大型国有企业宣传部长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交流会，部长指示房山县委宣传部长佟建和通知我参加会议。会期3天，使我受到了很大教育和鼓舞。会后，还发给我《毛泽东著作选读》五本，毛主席语录15本，回公社后，我将这些书籍分发给公社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对推动公社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深入开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在南韩继村蹲点的回顾

肖文奎 口述 李志国 整理

人到老年，许多往事、许多故人、许多旧地，往往会在脑海里闪现。然而，记忆最深、最令我难忘的莫过于1964年在南韩继村蹲点的岁月。当时，我在周口店公社从事党委组织工作，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和通讯，介绍了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艰苦奋斗，发展生产的事迹。公社党委及时组织学习，并作出决定：要以小‘四清’为动力，重点抓好南韩继村先进典型，以点带面，掀起农业学大寨的高潮。并派我到南韩继村蹲点。

早高台变米粮川

1964年春节刚过，大地尚未苏醒，我怀着急切的心情，骑自行车，带上铺盖，来到南韩继村，党支部书记徐庆文同志热情的接待了我。向他说明来意，他高兴地说：“感谢公社党委派领导来帮助指导我们工作。”他向我简单介绍了村里的情况后，把我带到社员王富家的住处。他说：“王是建国前的老党员，这家人待人和善，住房也宽敞，你住在这里，吃饭由大队派饭员给你派。你有文化、又年轻，要多帮我拿主意，抓大事，咱俩一块唱好多打粮食这台戏。”我说：“咱们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努力，争取今年农业大丰收。”

通过“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个别走访，书记的介绍，我对这个村的村情民意，历年对土地的改造、兴修水利、实施农业“八字宪法”，粮食产量等情况，均有了一定了解，从而，结合大寨经验，帮助制订了四项措施。

1、学大寨，找差距。通过对大寨经验的学习，进一步解决了干部和社员中普遍存在的“地力用尽，产量到顶。”的故步自封认识，进一步激发干部和社员上水平、上档次、上台阶的热情，实现今年粮食生产再跨越。

2、学习《红旗》杂志“干部参加集体劳动的十大好处”，使干部认识到参加劳动的重要意义，干部坚持参加劳动，无特殊情况，白天不开会、少开会，把会议和学习都要放到晚上时间。

3、抓思想教育。结合实际，大讲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农田基本建设给南韩继村带来的好处。大讲为国家多生产粮食是社员的光荣义务与责任。大力宣传在生产劳动中涌现出来的好人好事，使社员学有榜样、赶有目标，形成人人学先进、赶先进的热潮。

4、对照农业“八字宪法”，着重在庄稼密植、施肥、管理上下功夫，做足力气，提高产量。这些举措，进一步激发和调动了干部和社员的积极性。社员们高兴地说：“干部下田间，有活一起干，问题解决快，社员干的欢。”干部深有体会地说：“锄头不用要生锈，干部不劳动会走邪路……”

通过“三同”我也与南韩继大队的干部和社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和感情。一次，我和社员一起搞夜战推粪，不甚伤了腿，社员硬把我送到住处，蔡大娘，一直几天守候在我的身旁，给我又是拿药、又是端水，又是送来吃的，对我关怀备至，真像母亲对待自己儿子那样照顾我，疼爱我。老人的恩情，我一直铭记在心里，至今难以忘怀。正当干部和社员们看着大地葱绿葱绿的麦苗儿长势喜人，盼着夏季大丰收的时候，突然，小麦黄锈病降到麦田，干部和社员心急如焚，及时向县农科部门的技术人员请教。得知用硫磺合剂喷洒的方法后，迅速组织 150 多名社员仅用两天时间，就将 800 亩麦田普遍喷洒了一遍。由于干部和社员齐心协力及时防治，控制了黄锈病的发展。小麦虽然遇上了灾害，但损失降到了最低，比计划略有减少。详细算账，粮食虽然因灾减产，但今年种植面积仍多于去年，白薯的种植也比去年多，总的产量影响不大。同时，提出：“夏粮减产，秋粮补”的口号，对秋庄稼多施肥，在管理上多下功夫，力争把减产的粮食补回来。

8 月的南韩继村，风景如画，300 多亩玉米竞相扬花吐穗，人们喜上眉梢。但天有不测风云，突然，一场狂风暴雨袭来，把喜人的玉米全都刮倒了。徐庆文跟我商量说：“雨一停咱们就组织人把玉米都扶起来，越早越好。”于是，立即组织 200 多名社员，用一天多的时间，把刮倒的玉米全都扶起来了。该培土的培了土，又多追了一次肥，多锄了一遍地。这一年，在大灾之年，粮食不仅没有减产，经过努力，粮食总产量达到了 1071200 斤，亩产平均 938 斤，比上年多增产粮食 9 万多斤，亩产增加 87 斤。南韩继村，为什么能够连年增产增收？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全面分析，主要是：

一是穷则思变。解放前，这个村是有名的穷困村，大部分土地都是“偏坡溜岗十八沟，十年九旱八不收”的旱高台。粮食亩产仅有百余斤，且大部分土地都掌握在少数富人手里，绝大多数都是受苦人。当地流传着这样的谚语：“三

把刀”、“三条路”和“三件宝”。农民头上“三把刀”即租重、税多、利钱高；“三条路”即逃荒、讨饭、到他乡；“三件宝”即背架子、蹠子鞋、破棉袄。解放后，农民翻了身，对新社会更加热爱，听党和政府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都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坚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大搞农业基本建设，先后投入人工4万多个，平坡岗、填大洼、修水渠、田间路等。打井百余眼，把绝大多数土地都改造成了大面积稳产高产田，使粮食连年增产。从1957年平均亩产356斤，到1964年一跃亩产达到938斤。从1957年到1964年，共向国家交售商品粮200多万斤。同时，社员的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1964年年终全村人均收入达到90多元比七年前有较大的提高。

二是好领头人。俗话说：“火车跑的快，全靠车头带”。党支部书记徐庆文，旧社会苦大仇深，后来参加了解放军，得到了锻炼，在部队，他出生入死，英勇杀敌，多次立功。回村后，他决心改变农村面貌，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他有一颗“为民、忠诚、公正、清廉、无私”的心，他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誓言，在农业战线上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受到了上级党委和农业主管部门的认可与肯定，也受到了南韩继村广大群众的真心拥护与爱戴。他也多次被评为市县的劳动模范，并受到北京市委和市政府的多次表彰。197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在劳模会上，受到了邓小平、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还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三是坚强的领导班子。南韩继村农业生产能够快速增长和他们的领导班子团结、民主分不开，这个村党支部共有五名委员组成，大队长孙凤成，副大队长王文忠，妇女大队长刘玉淑和民兵连长葛万成。五位同志各有分工，各负其责，原则问题坚持集体讨论，分工份内的工作不等不靠。五名支委都能做到原则问题不让步，小事不纠缠，每个支委都自觉坚持参加劳动，做到在劳动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支部形成了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政治气氛，在群众中形成很大的凝聚力。

我与将军同劳动

乡村四月闲人少，耙完麦子又插秧。四月的南韩继村，到处是一派繁忙的闹春耕景象。一天上午，军事学院的两位将军带着300名军官学员来到南韩继村。这天，徐庆文书记不在，由我负责接待和安排。他们分为三个连队，每连100人，一个连队住在这个村，另外两个连队住在瓦井村和小次洛村。他们共

七天的时间，学习和劳动都集中在这个村。他们来村的任务是：一是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二是了解农村阶级斗争情况，提高部队干部的阶级觉悟。三是调查了解这个村劳动人民在旧社会的苦难和新农村的变化。根据任务，制订了三天与社员一起劳动，两天集中学习，一天座谈和个人总结的工作计划。

当时，正值栽白薯秧时节，因栽白薯秧地块属尚未改造的土地，需要把水引到地下面的大坑内蓄水。然后，再从蓄水池用水桶往上淘，之后再挑到栽薯秧地方。挖坑、点水、培土。我和一位将军负责从蓄水池用水桶往上掏水，将军卷起裤腿、光着脚丫，先下池掏水，一直掏到80多桶时，腿有些抽筋，身体也有些发抖。我劝他上来，我下去，他怎么也不肯，笑着说：“我正是壮年，筋骨硬，也经冻，掏够一百桶时再说，战争年代365天，除打仗就是劳动，现在一年才干几天那！和平年代不劳动，就会变懒，一懒打起仗来就要吃败仗。今天机会难得，是锻炼的好机会。”他硬是坚持掏到百桶时，笑着对我说：“这回该你了。”我开玩笑地说：“你不再掏几桶了，发扬风格吗？”他笑着说：“你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我说着接过来桶，掏了起来。大校闫达（徐庆文的老战友）负责挑水，一连挑了很长时间，肩膀被压肿了，社员们劝他休息会儿，他却笑笑说：“没关系，肿了再把它压平了，平了就不疼了。”一直坚持挑了一整天。这批军官学员，脏活累活抢着干，有的脚被碰破了，坚持不停歇，令在场的社员深受鼓舞和感动。第一天军民同心干，就栽了50亩地，15万棵白薯秧，圆满完成栽薯秧的任务。

我向部长作汇报

6月的一天下午3时许，我正要出门，忽然一辆黑色轿车停在院子的门前，一位社员领着时任交通部长的王首道前来找我，我把他们领进屋。部长边用草帽扇着汗，边自报门户说：“我叫王首道，是交通部的，中央正在京开着会，下午休息，我趁这个机会到这里看看，了解一下村里学大寨情况。听社员说你是在这里蹲点的干部，所以，就来麻烦你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肖文奎”。他又指着那位女同志说：“这个是我的爱人”，“那个是我的秘书”。然后又说：“今天不是来检查工作，是来了解一下农村情况，怎么方便就怎么说”。我把南韩继村的基本情况，历年来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多年来粮食连年增长，社员增收及学大寨等情况——向部长作了汇报。部长有时插话，我也有问有答。我

汇报了一个多小时，汇报结束后，他说：“谢谢你为我们介绍了不少情况，这些情况，对我们很有帮助，我们在上面是很难得到的。”然后，他风趣地说：“你送人送到家吧，你再辛苦一下，带我们到地里看看，光听不行，眼见为实嘛，有听有看才叫了解全面。”我说：“您要不要休息会儿再下田？”他笑着说：“没关系，社员在田里劳动都不怕热，我们光看不干，就占了大便宜啦，走吧！抓紧时间。”我陪部长从村东先看了大场边的两块地，又到村南看了三队的两块地。最后我们到了村西，我们边走边看，他看得很认真，很仔细，一个多小时时间，部长看了全村大部分农作物。在村西边告别，他再一次握手，表示感谢，说以后有机会再来。约6点钟，离开南韩继村回京。

后来，部长还给我打过几次电话，十分关心南韩继村的发展。“文革”后失掉了联系。每当回首当年向王首道部长汇报南韩继村的情况时，他那和蔼可亲，没有一点官腔、官架子，平易近人的情景，总是令我难以忘怀。

彭真视察南韩继

8月的一天下午，我和徐庆文在田里正在检查生产情况，老远见到村西路边停着几辆轿车，有一帮头戴草帽、身穿白色衬衫的人，在玉米地边，边走边指指划划地在说些什么。我俩急忙向他们走去，走近一看，走在最前面的是身材魁梧高大的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彭真，还有市府赵凡、范谨、常甫等领导。徐庆文与领导一一握手问好，彭真风趣地说：“今天又来打扰你啦，你不会嫌烦吧？”庆文激动地说：“我们盼着领导经常来检查指导我们的工作，说什么打搅、麻烦那，您这话有点不对呀！”然后，徐庆文转向我，向领导们介绍说：“这位是在我们村蹲点的公社干部肖文奎，我们配合的很不错。领导与我一一握手问好，我和徐庆文陪同市委领导到了大队部，因天热，搬了几个凳子，在院子两棵大白果树下，拿来几个半大碗，一壶白开水，边喝边聊了起来。彭真问我：“你叫什么名子？”“我叫肖文奎。”“在公社做什么工作？”“组织工作，”“蹲点有什么具体任务吗？”我说：“以‘小四清’为动力，以大寨为榜样，使这个村全面发展，为国家多生产粮食，力争比去年再增产增收，使南韩继这个先进典型再创佳绩。”彭真听后，说：“好哇！我等你们的好消息”。他又深情地说：“干部要坚持深入群众，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我们党就靠这个‘法宝’领导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不管到什么时候，这个传统都不能丢掉！”我向市领导保证说：“请市长放心，我要永远记

住你今天的话。”市长高兴地说：“对！只要对群众有利的事，就坚决去做，对群众不利的事，要坚决不做，还要抵制。我们共产党人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接着转了话题，关切的问徐庆文：“有什么困难吗？，今年亩产能达到多少斤等等。”徐庆文都一一作了回答。他说：“有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关怀和公社领导的支持。目前没有困难。不过，亩产多少斤，一天不入库，我还不好说，还请领导原谅。”彭真笑着说：“你是怕大家说你吹牛吧！没关系，我们先订个君子协定，一不上报纸，二不上电台，三不在会上讲，怎么样？”转身问范谨副市长：“这样行不？”范谨点头说：“行！”彭真对徐庆文说：“你们什么时候入库，核实了产量，我们再见报，但，必须实事求是地告诉我们”。徐庆文征求我的意见后说：“如果不出意外，亩产 900 斤左右吧。”市长笑了，大家也都跟着笑了，笑声在大队办公室院内回荡着。此时，已近下午五点多钟了，我和庆文建议市领导吃晚饭再走，彭真笑着说：“不了，算你们欠我们一顿饭，这个账以后找时间要还的。”说的大家都笑了，在亲切的笑声中，我们送走了市领导。那笑声、那亲切的谈话声，那谆谆的教导声，虽已过去半个世纪，但，仍经常在我脑海中回荡，仿佛就在昨天，就在眼前。

彭真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市长期间，曾多次亲临南韩继村视察，与徐庆文等村干部和社员亲切交谈，并指示市有关部门搞好服务，大力宣传南韩继这个先进典型，他关心南韩继村的生产和建设，是南韩继村百姓十分崇敬和爱戴的老领导。南韩继村百姓永远不会忘记彭真的关怀和嘱托。

六十年代的一次下放劳动

苏维斌

自 1958 年开始，各行各业“放卫星”全面实行“大跃进”，迅速把人民公社运动在全国推向高潮。随之而来的就是搞一平二调、高指标、高征购、干部特殊化等。当时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使农业生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损失巨大。那时党群干群关系也比较紧张，社会秩序不够稳定。但可喜的是，在 1960 年的下半年，为改善党群、干群关系，保护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施行干部下放劳动的政策，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市委决定下放大批干部到基层任实职，协助当地领导解决问题。

1960 年 8 月初，根据市委统一部署，中共房山县委抽调县直机关 360 多人下放到大公社（全县共 7 个），下设的管理区和重点生产大队任副职，凡是这次抽调的委、办、局领导干部都担任管理区的党政副职，科级以上干部担任生产大队的党政副职，下放时间为 1 年零 3 个月，第二年收秋、种麦结束后返回原单位。这次下放干部的任务县委明确规定有三条：一是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做到与社员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参与管理区及生产大队的直接领导，组织好农业生产与社员的生活。二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帮助基层领导干部提高管理水平，改善工作作风。三是加强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稳定社会秩序，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县委对这次下放干部工作非常重视，决心很大，下放人数之多，时间之长，是从未有过的。当时，我在中共房山县委组织部任干事，被下放到马安公社，十渡生产大队任党支部副书记，住在隗功绵家，吃在农民食堂，坚持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虽然，生活比较艰苦，条件比较差，但我这个三门干部（出家门、进校门出校门、进机关门）来说，意义非常重大。我下定决心，通过这次劳动一定要把缺的课补上，一定要把这次下放劳动当成锻炼我的一个大熔炉，不怕吃苦迎接困难，敢于承担责任，决心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我主要做了如下的工作。

一、提高领导班子的管理水平。公社领导给我做了简要介绍，此大队约 350 户，共 1300 多人。这个大队比较大，各方面情况比较好，党员干部群众

的思想觉悟比较高，能够较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各项工作中都能走在前面。有位老劳模郑玉仙同志在各方面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她是个小脚老太太，虽然不是领导班子成员，但她的思想新，别人不爱管的事儿她主动去管，社员闹了矛盾她主动去调解，经常带头把一条街打扫得干干净净，起着模范带头作用，还曾到房山县城参加过演出。她的威信很高，大家从心眼里佩服她，是我学习的好榜样，我遇到问题经常向她请教，有了这样一位好同志，对我开展工作也更加有利。

党支部班子共由 5 人组成，党支部书记祁凤五，我任党支部副书记，支委祁凤堂（大队长），隗有勤、晋国润。他们几个人年龄都比我大，工作经验比我丰富，能力比我强，都是入党多年的老党员，对党忠诚，工作积极，认真负责，在群众中威信较高，不足之处就是文化水平较低，个别同志工作方法简单，群众有些意见，我想怎么解决呢？主要还是要加强学习，提高认识，除经常组织领导班子学习党的方针政策，重点学习毛主席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及《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结合实际进行讨论，这样对支部班子有很大启发，认识上有很大提高，都一致认为：在今后的工作中都必须注意工作方法，工作方法不当，就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对个别工作方法简单的同志，我多次耐心帮助，指出它的危害性，使他认识到今后一定要加以改正，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二、关心群众生活，办好农民食堂。办好农民食堂是当时的一项重要工作，这个大队多是山地，在正常的年景下产的粮食基本够吃。但由于瞎指挥，大刮共产风，加上连年自然灾害，造成大量减产，光靠国家给的定量是吃不饱的，必须想其他的办法。我与食堂管理人员共同研究，他们提出上山采集山桃叶，弄回先用开水焯，再用清水泡得不苦了，放在粥锅里，使粥变稠，我曾经几次上山和社员采集山桃叶。还有，这个大队盛产大柿子，把柿皮削去剁烂，掺在玉米面合起蒸窝头，也能解决部分粮食不足问题。通过这两项办法使食堂的生活有了进一步改善，社员也比较满意。

三、学习摘花椒的技能。这个大队花椒树比较多，每年一到处暑节就开始摘，一个月左右才能摘完。此活儿看起来简单，实际做起来不易。我见社员摘得又快又干净，而我从没干过，不仅摘得慢，还经常挨扎，挨扎多了手就肿了，总感觉胀痛胀痛的，回去后用热水洗洗才好些。后来就虚心向社员学习，他们也热心教我，并仔细观察他们是怎么摘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有了进步，也掌握了一定技能，比以前摘得快多了，挨扎也少了，我一天也能摘十多斤。

四、关心群众。1960年11月份有一天，社员刘占顺去挖煤土时，外层土坎突然塌了，把他的腰部以下全部埋在土里，上身及头部还在土洞里钻着，听到有人喊：“快救人啊！刘占顺被埋在土里啦！”我正在食堂吃饭，刚喝两口菜粥，感到事态非常紧急，放下碗筷立即跑到出事地点，我也是忙中出错，忘了带工具，到那一看，洞口还没被土封死，还有空隙，我大声问：“占顺怎么样？”他有气无力的说：“快挖我腰这儿。”我就用手挖，正挖时他爱人也赶到了，以为是死了，坐在地上就大哭。我说：“别哭了！还活着！快挖！”她也不哭了，起来赶紧挖。我说：“光咱俩挖也不行啊，我快去叫人。”立即跑回村，就大喊：“快救人啊！要带上铁锹和镐。”不一会儿来了十几人，很快将他挖出。经检查伤势不是太重，养了几天就好了。事后想起真有点后怕，从此，我俩结上了深厚的友谊，几十年没断联系，现在他的子女还来看我。

五、密切联系群众。由于我是从县委组织部下放的，加上我们的部长隗永树也是十渡人，去后干部社员对我很关心，也很尊重。我虚心向他们学习，没人拿我当外人，就如同到了家的感觉，年轻人都叫我老苏，实际我才二十多岁。年长者把我当成孩子，比较随便，整天和他们一起学习、劳动，说说笑笑，唱唱跳跳，很开心，这正是我开展工作最为有力的条件。房东大婶儿很关心我，经常给我烧水喝，我也融入了这个家庭，扫院子、担水，每月半斤粮票定量的点心都舍不得吃，给房东的两个小孩儿吃，临走时还把水缸担满了水，对大婶儿说：“您照顾得我很好，很感谢，有什么意见请给我提提。”她说：“你在这儿干的不错，有机会一定到家来。”我说：“肯定要来看您的。”1987年，我们单位在十渡办班，住在山光旅社，过去一起工作的老同志听说我去了，一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十渡喝酒，我想起房东大叔隗合春和祁凤堂，我说一定要把他二人找到，结果没找到祁凤堂找到了隗合春了，我们一起吃饭、喝酒、聊天，他非常高兴。我临回来时民兵连长隗合禄还请我吃了顿饺子，这在当时已经是非常好的招待了。

1960年11月底，因工作需要，提前把我调回，接到调令后，我立即做了些准备，向支部说明原因，并将工作交代了一下。我与支部书记说：“明天我该走了，今晚咱们开个简单的会，我向大家告别一下，大家对我有什么意见提提。”后来，我发现他们有些动作，我提醒道，你们什么也别弄，千万要注意影响。当时，生产大队确实什么也没有，到晚上开会时，不知他们从哪儿找了一挂羊杂碎和两瓶高粱杆酒，有全部支委和几个生产队长参加，一边喝一边聊。我说：“领导决定调我回去，我来这里后大家对我帮助很大，很感谢，对我有

什么意见请提提。”他们提了些意见，但多是表扬，我说主要是提不足之处，好在将来的工作中加以改进，就这样有说有笑，高高兴兴，我向大家告了别，他们给我送了行。总之，我在十渡大队下放劳动只有四个月，但是收获很大，向广大群众学到了很多优良品质，学到了很多艰苦奋斗的作风，学到了基层工作方法，也学到了很多农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和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些收获是从书本上学不来的，是用金钱买不到的。经过这次下放劳动，深深感到市委，县委采取的这项措施是非常重要的和及时的，对我在以后几十年的工作中起着指导的作用，是我一生中很重要的一段经历。